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碩士論文

從一位寫不出論文的研究生說起：逆寫社會工作專業帝國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指導教授：王增勇　教授

研究生：郭志南　撰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謝　誌

遙想從七年多前與死黨可樂牽著摩托車離家，搭上一路向北的自強號，直至我能夠順利完成這篇論文，取得政大社工碩士學位的人生旅程，我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首先，最要感謝的是父母這些年來無怨無悔的付出與等待，謝謝你們，也辛苦、委屈你們了；其次，我想要感謝的是總被我喊為乾媽的陳麗欣老師，如果沒有您在我求學路上的信任、拉拔及支持，我將不會是今天的我；此外，如果研究所復學那天沒有遇到增勇老師，我想斷裂非常嚴重的我至今依然還是混亂糾結的寫不出論文，所以我由衷的感激增勇老師兩年多來不離不棄的真心相待，總是不厭其煩忍受喋喋不休的我，想盡辦法協助我梳理自身剪不斷理還亂的斷裂經驗，竭盡所能的在所上幫我撐出自由書寫的空間，並製造機會讓我可以接連遇見王行老師、成虹飛老師、陶蕃瀛老師、Barbara 及書架上的陳光興老師，從而使得多元、豐富的對話經驗讓我敘說、書寫的視野和論述可以更加周全。然而，我之所以能夠完成這篇論文，絕非我一己之力可及，朝陽社工系師長們昔日的身教言行與栽培善待，以及政大社工所師長們的嚴謹教學與敦促我的思維辯證，悉心砥礪我的心神智識，才是我能夠超克社會工作專業帝國無所不在的現代性，論文最終得以順利成形的最大關鍵。

為了要完成論文，眾所皆知我的書寫過程並不平順，但身邊相信我可以把論文寫完的人卻一個都沒少過。對此，我最先要感謝的當然是朝陽社工系的死黨夥伴：建晃大哥、家豪、文能、仕軒、鴻穀、小明、小豬、寶妮、惠雯、子宇，還有在天堂守護著大家的怡靜，謝謝你們總是在我最困頓、失意的時候，願意為我打氣和伸出手拉我一把；再來，一定要特別感謝是從大學到研究所時期，不論是功課筆記或情緒上的噓寒問暖樣樣都沒少過的凱翔學長和雯琪學姐，謝謝你們總是能像我的大哥／大姐般設身處地的為我著想；還有，感謝在我研究所期間，只要經過台北就一定會特別晃過來貓空看看我或打電話約吃飯的君涵、宛菱、貞雅、虹如、小 C、豫兒、阿保，以及小嵐、宋美、春華、慧怡、大毛學長從我上研究所未曾間斷的線上支持；感謝同在台北求學或工作的瀞文、主維、君萍、立孟、淳婷、達達、巧姿的朝陽社工北區互助團，讓我沒有變成一個總是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喃喃自語的自閉兒；當然，我最要特別感謝的人是跟我以手足相稱的學弟揚

傑，謝謝你在我論文訪談期間，不但免費供我吃住，還不辭辛勞的騎車載著我這個超級大路癡一同跑遍了整個大台中四處去訪談收集資料。感謝你們每一個人的支持與信任，讓我能夠以朝陽科大社工的名份，直挺著腰桿豪邁前行。

除了朝陽眾多的同窗、友人的支持相伴之外，我同樣也必須對研究所時期的各路好友獻上最高的謝意：感謝總是願意認真傾聽我的困擾，即使畢業了仍不斷提供我學術意見和情緒性支持的偉迪；感謝在學期間總是願意默默接納我連珠炮般抱怨的阿盤；感謝一路陪著我橫跨淡水線南北兩側，從政大遠渡陽明衛福所上課，後來又製造機會讓我遇見增勇老師的健瑋，你是促成這篇論文最大的幕後推手；感謝在我剛復學又不斷被所上追討指導教授同意書時，總會抽空找我聊聊生活的思淳；感謝一同在電腦室或活動裡一同焚膏繼晷寫論文的文滿、宜樺、庭芸、伊伊、舒涵；感謝先畢業或先回到工作崗位的杰伶、玫馨、雅玲、靜芳、映潔、慧菁、榕芸、婉貞每逢我論文面臨重要時刻的貼心問候。此外，我也要感謝在政大結識的學長姐和學弟妹們：其中，最先要感謝的當然是推薦我來政大念研究所的婉真學姐，我永遠會記得你從推甄簡介資料到入學後一條龍的生活和課業協助；此外，我也要感謝思偉、晏宇、佳男、佳玲、李琪、譯婷、婷婷、佳琦等學長姐們的照顧與關心，以及和我同樣喧嘩吵鬧卻又不失貼心、總是互相吐槽求進步的承揚、若耘、玲巧、湘緣、宜璇、善喻、姿瑩、花花、致善、劍凜、海帆、雨潔、佩蓉、琦縈、昇倍、若杰、于婷等學弟妹，還有老王論文團隊暨辦公室成員的郁婷、純宜、苡安、慈瑩、美華、甡慧、美麟大哥、淑芳姐、又慧姐……在政大遇見來自不同社會位置、不同學院、不同科系的你們，還有與你們每一個人相處互動的真實經驗，是令我能夠與政大和解的寶貴資產，只因你們每一個人對於我／科大社工的善待與包容，其實就是我發展這篇論文時的核心概念。感謝你們每一個人嘉惠於我身的恩澤，讓我得以在書寫論文的過程中逐步安頓自我。

從朝陽到政大，回首這段跌跌撞撞的人生旅途中，我何其有幸一路得到許多貴人相助和扶持：感謝守軒與享立學長當初鼓勵我成為一名社工；感謝不論是在生活、工作及專業，總是能一語安撫我徬徨心靈的文良大哥；感謝願意在我休學工作期間，與我一同患難、成長的好兄弟郁翔；感謝聯勸的督導蕙萍、鳳雅、靜芸，勞委會勞工福利處的德進科長、玫瑩科長、衍伶督導，以及北市信義社福中心的督導茲總、巧翊主任、春妙主任、千愉、泳岑、玟玲、佳玲、佩樺、旻寧等

實務前輩們傳承、教導我的助人信念與知能。謝謝你們，讓我知道該如何成為一名社工，也更加熱愛成為社工的自己。

最後，我想要感謝後山、利嘎、燕茹、柏臻、頤得，還有每一位願意花時間與我對話，還有曾接受我訪談的同學和師長，因為你們的勇敢現身和發聲協助，我才得以寫出這篇論文。得之於人者實在太多，一時之間無法逐一記載。真心感謝上蒼讓我能夠遇見你們，感謝陪我走過這段歲月的每一個人，謝謝你們。

志南　謹致

民國一零二年　清明　於高雄後驛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中文摘要

研究的起點，始自於我寫不出社會工作碩士論文的生活混亂。後來，在自我敘事研究的觸動和感召下，過往熟悉量化科學實證典範的我，大膽決意以身為度，並選定後現代的自我民族誌為研究方法，企圖返身逆寫「我」寫不出論文的生命故事。因而，我開始動筆敘說、書寫「我」除了是「寫不出論文的研究生」之外，同時還是「勞動家庭的獨生子」、「科大社工」以及「政大社工所的研究生」的多重自我，藉此重說「我」如何成為一名「寫不出論文的研究生」的問題全貌。

於是，循著敘說、書寫生成多重自我的生命軌跡，還有反覆來回透過辨識自我內在慾望投射的自問自答，不斷穿梭、擺盪在內外衝突、夾擊的自我意識和社會／歷史情境後，我逐步超克了禁錮真實自我的自我懷疑與卑下意識，並將規訓、壓迫生命主體的生活／專業意識形態，有條理的循序外化至社群集體經驗與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建制史所銘刻的社會／歷史脈絡之中：由此，這終於使得我得以斷然覺悟「我」之所以寫不出論文的斷裂經驗，一方面主要是肇因於個人主體深陷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歷史主體（社會工作專業帝國的主體／美式社會工作專業）與主體歷史（自我殖民的主體／高教社工）對於本土助人工作多元主體的多重交互宰制；另一方面則是充份體現了台灣社會工作在專業建制的過程，絕大多數的社群成員迄今仍未省覺、滌清自身信仰、熟悉的專業制度／知識典範對於多元主體在本土助人工作實踐上的錯認與賤斥之虛假意識。

最後，敘說、書寫論文的過程讓我明白所謂的助人專業，其實就是助人工作者必須知曉如何讓自己成為「弱者／他者／劣者」，貼近常規邊陲者的日常生活經驗，而不是不斷企求更加崇高社會地位。所以，我終於能告訴自己：我已經不需要再為自我難堪的過去感到自卑了，只因過往的苦難經驗，以及被社群成員賤斥、責難為他者／劣者的不堪，如今反而讓我領悟我比誰都還要有條件能成為一名「好社工」。是故，努力在壓迫、衝突不斷的現實社會中活出自己最真實、自在的樣態，這也才是我所應信仰，所欲追求、實踐的社會工作專業。

關鍵字：自我民族誌、多重自我、他者、社會工作專業帝國、自我殖民、去殖民

Title of Thesis：Start from a graduate student who is trouble in the master thesis: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 empire writes back

Name of Institute：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age：

Graduation Time：01/2013 **Degree Conferred**：Master Degree

Student Name：Chih-Nan Kuo **Advisor Name**：Tsen-Yung Wang

Abstract

This thesis originated from a chaotic life that I led as a graduate student who could not produce a qualified master thesis on social work. Later, moved and inspired by self-narration, I, who used to be familiar with quantitative scientific experimental methodology, boldly made up my mind to choose postmodern autoethnography as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to reflexively investigate on my own life story in which "I" could not complete a thesis. Therefore, I started to write and narrate about "myself," with multiple identities of "a graduate student who couldn't write a thesis," " the only son from a working class family," "a social worker from 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a graduate student in Social Work Department of NCCU," hoping to reconstruct a full view of how "I" became "a graduate student who could not produce a master thesis."

Therefore, following the tracks by narrating and writing about the multiple selves in my life, and repetitive self-questioning and self-answering to distinguish the things reflected by the inner desire, I gradually overcame the self-suspiciousness and unconscious inferiority complex that imprison my true self after constantly going through and swinging between inner and outer conflicts, oppressed self-identity and social/historical context. Then I orderly connected the life/professional ideology that disciplined and repressed the subjects to the society's collective experience and social /historical context constructed by the establishment history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in Taiwan, from where I terminally realized why "I" could not produce my own master thesis. On the one hand, it was because I as an individual was trapped in the big subject, namely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 in Taiwan (the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subject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 empire/ American social work profession) and the subjective history(self-colonized subject/ highly-educated social workers), and dominated or controlled by multiple subjects of local social work. On the other hand, it perfectly presented the institutional process of social work in Taiwan, in which most members from many social groups are hardly aware of or clear about how the profession system/ knowledge example they believe and acquaint with results in misunderstanding and fake ideology of excluding others in the realization of local social work.

Last but not least, during the process of narrating and writing the thesis, I realized that the so-called helping profession means that helping professionals should know how to make themselves "the weaker/ the other/ the inferior" so that they can personally experience the daily of the minority groups instead of seeking for a higher and more noble social status. As a result, I can finally say to myself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feel self-abased about my own embarrassing past. The suffering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past including being excluded by members of social groups, and being censured as the other/ the inferior now become nutrients for me to understand that I am more competent and qualified to be "a good social worker." Therefore, I will try my best to be the real me and feel comfortable in such an oppressing and conflicting society, which is also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that I should hold on to, to look for, and to put into practice.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Key word：autoethnography, multiple selves, the other,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 empire, self colonialism, de-colonisation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章節目錄

第一章　疑雲：寫論文，因為「我寫不出論文」 1

第一節　問題的起點：寫不出論文的政大研究生 1

第二節　我要說故事：說「我」寫不出論文的故事 3

第三節　「我」的故事不只是故事：「我／社會」的故事 6

第二章　行動：說「我」故事的方法 11

第一節　研究／故事的設計：如何說「我」的故事？ 11

第二節　資料收集和整理方式：如何書寫「我」的故事文本？ 17

第三章　獻身：我，是黑桃大老二？ 25

第一節　家庭的故事：全球化下勞動家庭的宿願與夢魘 25

第二節　糾結難解的「不對勁」：我，是／不是社工？ 35

第三節　我，可不可以是玩世不恭的梅花三呢？ 46

第四章　歧路：清晰卻又顛簸的社工路 57

第一節　向上仰望的小社工：孤單寂寞的不歸路？ 57

第二節　糾結難解的「不對勁」：我，是／不是社工？ 73

第三節　躊躇在理智邊緣的自我懷疑：咦，我們不是「社工」嗎！？ 78

第五章　逆境：社工，不僅僅是「社工」 93

第一節　「誰是社工？」：社工主體群像變遷後的社會／歷史意涵 93

第二節　「誰的專業／專精？」：當科大社工，不是「社工」 109

第三節　「誰決定的歷史？」：顛覆自我／帝國臣民的異化輓歌 124

第六章　召喚：論文的故事與說好的「解放」呢？ 137

第一節　為母則強的裁縫女工：母親的願望／我的論文 137

第二節　傳授所學的恩師：專業的啟蒙、恩情及走向獨立 142

第三節　無以為報的師恩：超克禁錮自我的現代性 163

第七章　結論：成為真正的「人」 177

第一節　書寫自我的生命解放：橫跨兩代「賭徒」的共振參照 178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二節　「不僅僅是」的多重可能：成為像「蟑螂」的社工 181
第三節　下一站，下一戰：成為知識份子的現實困境與自我期許..... 193

表目錄

表 2-1：：說故事／研究的評鑑標準 22
表 4-1：舊版的社工師法考試資格（2012 年底前適用） 86
表 5-1：新版社工師法考試資格（2016 年起）..... 99

圖目錄

圖 2-1：研究／說故事的詮釋循環圖 13
圖 4-1：台灣教育體制的升學考試制度與層級分流 82
圖 4-2：「社工」的「分類」系統：以舊版社工師考試資格（2012 年底前）為例... 88
圖 5-1：「誰是社工？」：新版社工師法考試資格的認定邏輯(2016 年起) 101
圖 5-2：「助人工作」與「社工」的關係變化..... 102
圖 5-3：社工師法下的社群關係 105
圖 5-4：台灣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變遷歷程..... 112
圖 5-5：台灣社會工作／社福／相關系所(組)的成立時間與地理分布圖 113
圖 7-1：我寫不出論文的問題全貌..... 186

附表

附表一：我國大專院校暨宗教學院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系所概況..... 198
附表二：我國技職院校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系所概況..... 201
附表三：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認定標準..... 203

網頁資料 207
參考文獻 207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後記：與志南同行（王增勇）..... 219
令人悲傷的分類遊戲（胡善喻）..... 223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如果，沒有在台北和政大社工所經歷成為『瘋人』的經驗，那麼我／科大社工……或許永遠沒有機會成就真正的『人／社工』。敘寫這一篇論文的初衷，無非是為了抵抗我／科大社工所承載的原罪，但絕非是為了要報復任何一人。我的所作所為純粹是為了自我尊嚴的再造，還有協助曾與我遭遇相同苦難的人們得到解脫。縱使這必須要與整個社會工作的社會／歷史為敵，必須吹響革命的號角，我依然會毫無保留的親捧著自我慾望最深處的憤怒與自卑，並秉著最真摯的態度走到您的面前，期盼人們能夠正視我／科大社工人被迫成為『他者／劣者』的痛苦磨難，然後去除人我之間所有的偏見與歧視，直至『解放』真正到來的那一天。」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一章　疑雲：寫論文，因為「我」寫不出論文

Foucault：「在這裡，我們正好處於一個和古典體驗極端的對立位置上。在過去，瘋狂只是和非存有的錯誤，以及虛無的形像間的瞬間接觸，而且它總是有一個不受客觀掌握的向度；如果要追求它深藏的本質，圈圍出它的最終結構，這時，在可表達的範圍內，人們發現的只是理性的語言本身，但它這時卻被運用在妄想的完美邏輯之中；而且，這一點雖然使得瘋狂變得可以讓人接近，卻也同時遮掩了它。現在呢，則正好相反，人反而是透過瘋狂—即使他是在理性的狀態下—才能成為他眼中的具體和客觀的相向。由人走到真正的人，瘋人乃是必經之道」（林志明譯，1998：629）。

有關於社會工作的碩士論文，我最初聯想到的是研究者燃燒自我，懷抱無與倫比的狂熱信念，書寫貼近真理的生命刻痕，與人激辯是非對錯之類的印象。但，此時此刻，對一位離家七年、年逾三十、只有半年多的社會工作實務工作經驗、沒有任何經濟基礎、生活開支幾乎仰賴家母支援，歷經跟第一任指導教授鬧翻，休學，短暫投入半年的實務工作，復學，重訂論文題目，再尋論文指導教授，目送一個接著一個離開的同窗摯友，即將由碩三邁入碩四，且憂慮可能踏入碩五、碩六的社會工作研究生而言，會寫這篇論文，最大的原因其實是……「我」寫不出論文。

第一節　問題的起點：寫不出論文的政大研究生

2011 年，初春時分，休學半年再回政大所見的情景依舊，卻人事已非。流動的空氣裡依稀可聽見時鐘滴答、滴答、滴答急促的腳步聲，但鐵面無私的生理時針並沒有因我停滯不前的論文進度而歇息片刻。某日晨昏，漫步於道南橋頭，偶然回望政大綜合院館南棟十四樓[1]時，一閃而逝的記憶碎片，突然勾起昔日奮發圖強認真努力念書的離家誓言，以及一心一意考取國立研究所好繼續習取、探尋更多關於社會工作專業知識、技能的情熱和豪語，如今赫然再見自己欲振乏力的身軀，毫無幹勁的心靈，壓抑不了的負面情緒一擁而上，瞬時讓人感到一陣莫

[1] 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的位置。

名瘋狂的憤慨、慌亂、羞愧、失落及空虛。特別是當我開始警覺到教室內熟悉的同窗漸漸少了，走廊上開始出現一群叫不出名字的學弟妹和傳來一陣陌生的嬉鬧聲時，佇足在晦暗的走道盡頭，窗外恰巧透進一抹火紅的晚霞餘暉，焦躁的思緒應景似的混入了刺眼的燈管白光，炫目深邃的兩極光景不禁讓人恍如隔世。還有迫切又不安份的家庭經濟壓力和思鄉之愁，更持續攪和著寫不出論文的生活鬱悶和自我否定，而本應極其重要且攸關碩士學位的論文，如今似乎也僅如曹孟德口中的雞肋，全然食之無味，卻又棄之可惜。

春末夏初的某一天，我突然從房間連身鏡裡的面容發現我罹患了一種病，一種寫不出社會工作碩士論文的病，一種終日令人陷於鬱悶沮喪又如精神分裂的活死人病。它讓我必須一次又一次的反覆躊躇在堅持／放棄論文和碩士學位的拉扯心境，以及面對著最為親暱的他者們驚恐訝異的神情和焦慮擔心的詢問[2]，更是令我徹底陷入了完全無以言說和交待的悶痛苦楚。我真的不懂，我到底是怎麼了？不知為何，原先十分熱愛社會工作的我，日漸對於社會工作專業有了一堆說不清的懷疑與厭惡，而本應衝勁十足的我身上更不斷浮現一股「卡住」的不對勁和停滯感，宛如揮之不去的纏身鬼魅，常使我不帶一絲喜樂，讓我對於眼前的一切充滿懷疑，成天渾渾噩噩的往來於校園裡、河堤邊、研究室、圖書館，或住所的電腦螢幕前，自欺欺人的輾轉來回繪製一幅幅論文生產加工中的假像，抵禦家中長輩和大學師長的催促及掩飾接踵而至的慌亂與不安。可是毫無進展的論文和一成不變得生活狀態伴隨著時間的流逝和擠壓，終究還是敵不過持續積累的焦躁、疲倦、憂慮及恐懼。更糟的是，飄浮於眼前的過往、當下、未來、現實、夢境，來來往往，空洞破碎的畫面常使我混亂不堪，苦不堪言，復以鏡中自我經常性的尖叫怒吼，以及四溢橫生的妒忌仇恨。我知道，它是斷裂，它真實，卻也虛幻，它存在那，但卻又看不見也摸不著，讓我越想要真誠的面對自己，卻越是痛苦，我想逃，但又不知該往何處竄去。

隨著心裡總是不斷浮現莫名的恐慌和畢業年限即將到來的急促壓迫，渾身悠然繞轉的不自在，兼以論文題目來來回回的盤旋更替，多次的峰迴路轉，最後終於逼使疲累不堪的我不得不暫時先停下腳步，鼓起勇氣回過頭去正視寫不出論文

[2] 這些日子以來，知道我寫不出論文的狀態時，身邊的人最常對我提起的一句話大概是：「你怎麼可能會寫不出論文！？你怎麼可能不會做研究！？」

的活死人病，決定以「論文」的形式來重新梳整自我早已千瘡百孔且七零八落的思緒，好好仔細思量，悉心探尋這一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第二節　我要說故事：說「我」寫不出論文的故事

在決定面對自己寫不出論文的活死人病前，我其實已先經歷了一段宛如「砍掉重練」的心路歷程[3]。大學時期，「客觀、理性，還有量化到爆炸」通常是身旁友人對於我思維邏輯的貼切形容，特別是我還記得大學的學長、同學及學弟妹當初都曾不約而同的以「量化實證研究的工具人」調侃、挖苦我過度信奉實證主義，只求結果又疏於體察人心的冷酷模樣。坦白說，我還頗習慣這個稱號，只因對於做研究／寫論文，我一直自詡自己是一位熟悉量化研究方法，擁有異常自信且積極進取的好學生，但這間接也使得包含我自己在內，大概沒有人會料想到我從大學來到研究所後，大約是在碩三復學後的某一天，當我準備思索研究計畫和書寫論文時，我竟然會發現自己寫不出論文！然而，坐以待斃並不是我的性格。打從我發現我寫不出論文的那一刻起，我就已開始不斷找尋、嘗試各種方法，努力想要捕捉、克服、解決這個不請自來又莫名其妙的困擾，如我不斷透過詢問已畢業的同學書寫論文的經驗來釐清自己的寫不出論文的問題，或者持續來回徘徊於學校圖書館、實體書局及網際網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反覆翻閱大量文獻與各式各樣可能可以協助我重新規劃思量、提筆書寫論文的量化、質性研究的教科書或各式五花八門的論文寫作指南，但我始終一無所獲，依舊無法擺脫我寫不出論文的膠著狀態，再加上來自四面八方的關心、詢問、指責、質疑，還有遙遙無期的畢業時程，最後終於徹底壓垮了我的理智，更讓我的生活、精神從此陷入分崩離析的混亂狀態。

壹、我和說故事的初遇：來自敘說、書寫生命故事的感動

除非有必要，否則我還真的很不想再去繼續回想、交待我當初混亂的生活狀態，但也就是在我抓破頭皮又萬念俱灰，以及如同活死人般的生活苦悶也逐漸讓

[3] 熟識的大學同學聽到我的論文是自我敘事時，第一時間大概都是呈現出「你別鬧了，怎麼可能！」的表情；另外，論文計畫書口試時，兩位口試委員成虹飛和王行老師也都相繼說出：「我們相信你是被逼到走到無路才選擇自我敘說。」

我心灰意冷的浮現再度休學和放棄學位的念頭之際，或許是母親初一、十五誠心向玉皇大帝、關聖帝君的祈願顯靈，又或者是之前休學工作時結識的神父、修女、教友的禱告賜福，再加上第二任指導教授王增勇（以下統稱為老王）不厭其煩的引薦下，我終於在《應用心理研究》和鄧明宇（2005）相遇了。

認真說起來，遇見鄧明宇是讓我決意將論文徹底砍掉重練並「轉向自我」的關鍵，因為在鄧明宇書寫的字裡行間，我不斷看見一模一樣的自己，不論是男性獨子[4]、勞動家庭的出身背景，以及備受家庭期待，還有那期望能靠著教育達到階級翻身的心路歷程都與我有太多相似雷同之處。其中，更令我驚訝的是他書寫論文的動機和起點，竟然就是他和我一樣受夠了自己在鏡子所投射的「活死人」狀態！？而這不就是我現在的處境和問題嗎！？一見如故的悸動在冥冥中召喚著我，不斷勾起了我閱讀的好奇心，引導著我一路隨著他文字的流動軌跡，凝視著他經由自我敘說，書寫自己生命的故事，循序將問題回置個人的生命歷史與所處的社會文化，然後一步一步的跳脫了社會主流的認知視框，重新認識、理解、詮釋及超越了困擾他許久的憂鬱病症，再次尋回自我與專業雙重認同的經過後，我的眼淚終於不受控制的稀哩嘩啦流了下來。那是一種被召喚且又百感交集的感動，而我也終於知道我該怎麼解決我寫不出論文的論題－我決定，我要和鄧明宇一樣說一個故事，說一個「我」寫不出論文的故事。

貳、說故事是一種研究方法：說故事對我的意義

我想要說故事！但…說故事……是什麼？

說故事（Narrative），又可稱為敘事或敘說，是一種古老召喚知識的重要方法（王增勇，2005；Bruner, 1990）。若我們認真仔細的回想，人類本來就出身在一個充滿故事的世界，活在故事的世界，從小到大不斷的聽故事、說故事、也創造故事（柯麗評，2009）。通過口語表述的故事即是一種媒介、一種蹤跡，其與社會傳統習俗和制度彼此緊密相連（趙旭東、方文譯，2005），是人們生活經驗的再現（representation），亦是日常生活的實踐（蔡培元，2008），使得人們

[4] 在這裡要補充說明的是：鄧明宇對於男性獨子的定義和我不太相同，因為他有姐妹，但我是家庭裡只有一個孩子的獨生子（only child）。

說一個故事，不只是一種經驗給出的過程，同時也是表露我們選擇如何觀看的態度（鄧明宇，2005）。是故，承襲前人說故事的腳步，說一則「我」寫不出論文的故事，將可以讓我既是研究者又是敘說者，是觀看者又是被看的對象，並同時以兩造雙方的視野來重新瞭解我是以何種世界觀來描繪、陳述事件、經驗，理所當然的敘說故事或朗誦一篇故事，幫助我進一步立體化故事情境裡的個人與社會（互動）、過去、現在及未來（連續），還有地點（情境）（蔡敏玲、徐曉雯譯，2003），完整描繪出我先前理解的意義結構，以及培養出翻轉、重構生活世界的認識與意義之能力。

基於以上的理解，我替我的論文暫時草擬了一個概略的方向：我撰寫此篇論文的動機是，理解「我」為什麼寫不出論文；行動是：訴說並重新認識、理解、詮釋及超越「我」寫不出論文的狀態；目標是：重新敘說、書寫一個能讓自己、讀者通達和感動的好故事。我相信，決意投入說故事的行列對現在的我而言是重要的，特別是當我已經非常確定「我」寫不出論文的故事內容和歷來社會工作專業普遍流傳的故事類型大異其趣，而且我也無意延續旁人對於我寫不出論文的敘事結構，持續不假思索的如應聲蟲般陳述一成不變得故事。在這裡，我執意要以「我」為研究問題的中心，重新說一則貼近自身經驗的真實故事，藉此完整、清楚表達自己的心聲和處境。畢竟，我們都知道，很多時候，寫不出論文／做不出研究不應單只是「研究生」的個人問題[5]，如 Alford 先前就曾指出研究者個體情感和認知的斷裂情節往往沒有被學界妥善的重視和處理（王志弘譯，2011）；再者，法國的社會學大師 Bourdieu 也曾提醒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必須隨時反思自身的坐標（如階級、性別、種族）、知識的客觀空間，以及自身在學術權力場域中的地景位置等可能引發研究偏誤的相關因素（引自邱天助，2002），才能真正去除散布於生活裡的諸多成見，打破既有研究論述、社會結構中所隱藏的社會哲學（引自孫智綺譯，2002：51）。

可見，為了徹底翻轉我寫不出論文的現實困境，重新反思、檢視及認識自我，有自覺的進行返（反）身性（reflexively）認識的自我探究，批判自我的主觀意

[5] 研究生寫論文的社會情境向來是複雜的，除了不同系所歷來慣行的研究傳統之外，近來也有人對於研究生與指導教授兩者之間不對等且隱諱不能明說的權力關係進行探究。關於此議題的討論，詳細可閱莊宗翰（2008）、韋彥如（2008）等人的碩士論文。

識和社會結構的關係其實是必要的，是有學術根據的，更是被歷來眾多社會科學界的質性研究者，特別是民族誌研究者所推崇、支持、認定的（Clandinin & Connelly, 1994；Denzin & Lincoln, 2011；Eills & Bochner, 2000；Jones, 2005；Spry, 2011）！而這也就如翁開誠（2002：54）說：「說自己的故事時，自己拿起了創作與詮釋自己生命的責任與權力，同時也在這個過程中由自身生命的體悟開顯出生命的學問」。所以，說一則「我」寫不出論文的故事，不僅僅是我個人在探究知識方法上的典範轉移，同時也是我挺身面對自己寫不出論文的生命斷裂，從而對於自我和社會的再認識、再探查及再評析的斷然覺悟[6]；是我試圖取回自我生命／知識主體的主導權和問題的詮釋權，重新學做生活世界的專家和主人之努力，以及增進自我理解，重塑自我主體認同的返身行動；亦是我以自己作為探究問題的實務場域，體現自身對於知識探索的批判實踐和社會學習。

第三節　「我」的故事不只是故事：「我／社會」的故事

當我確定說故事的確是可以解決我寫不出論文的方法後，我的心情是雀躍的，但我心裡也有股不安，因為身為一名深黯社會工作慣行之科學實證典範的研究生而言，我知道在敘說、書寫的過程中，一定有人會不斷追問，說一個「我」寫不出論文的故事對於社會工作的貢獻會是什麼？

壹、故事有兩種：「能說」和「不能說」的故事

就學理而言，伴隨人們成長的故事通常被分類為兩種，一是被社會允許公開訴說的主流故事，反之則是較貼近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但卻是隱晦、說不出、也說不清楚，感受多於言辭、被壓抑噤聲的非主流故事（簡憶鈴、王增勇譯，2005）。然若依上述的分類方式，我此刻寫不出論文的狀態，亦即可說是一全然不符合於人們認知常規，缺乏詮釋架構的非主流故事。但就在我閱讀完鄧明宇（2005）的故事，以及透過滾雪球式的搜索、翻閱一系列說故事相關的書刊、篇章、碩博士論文（如：王增勇，2005；王永智、鄧明宇譯，2003；洪嫈琳譯，2010；何粵東，

[6] 夏林清（2010：47）引述 Fanon 對於被殖民主體的心理存有情緒解構分析的思想，指出所謂的「斷然覺悟」是任一有殖民經驗的社會內部極為複雜難解且需一再接續奮鬥的社會政治心理歷程。

2010；陳阿月譯，2008；廖世德譯，2001；蔡培元，2008；蔡敏玲、徐曉雯譯，2003；蔡敦浩、劉育忠、王慧蘭，2011；Bruner, 1990；Clandinin & Connelly, 1994；Eills, 2004, 2007, 2009；Jones, 2005；Manning & Swan, 1994；Spry, 2011；Tillmann, 1996, 2009）後，我接連發現諸多說故事相關的研究皆不斷企圖基進、專橫的預設了一個崇尚、廣納多元聲音且又挑戰、破壞、顛覆現代性世界觀下過度趨於單一化的敘事／文化／研究立場；更重要的是，我充分感受到說故事的研究論述無條件的同理、擁抱了我長期以來求助無門的噤聲狀態，只因故事相信人類主體的歷史價值本來就是非客觀、非中立的，隨著歷史流轉持續更替的，而且它更鼓舞了我說「我」的故事，是能夠彰顯、反應出主流和非主流群體認同的道德價值在自我與社會集體於精神層次上的交互糾葛與衝突角力（鄧明宇，2005；蔡培元，2008；Bruner, 1990）。

是故，打從我決定研究自我、書寫「我」寫不出論文的故事那一刻起，我就清楚意識到我的論文研究／故事，將不可避免的是立足於批判典範的質性研究，是後／去殖民的故事－雖然我說的是我個人的故事。但，我的故事絕不僅是我寫不出論文的哀怨自憐，而是能解放自我意識的故事，能與擁有相同經驗的他者產生共鳴的故事，能與各種社會差異進行批判對話的故事，以及蘊藏顛覆既有的認知和學術傳統，能涵養出新知識的動人故事。誠如余德慧（2003）先前對於自我敘說的描述：「自我敘說的主體不是個體，而是敘說的情節化，自我敘說才能與社會文化接壤，但透過啟迪，自我敘說才獲得認同的地位。」或 Blanchot 也曾表示：

> 「敘事是朝向一點的運動，這一點不單是未被認識、不為人知、陌生，而且彷彿沒有任何在這運動之前和在這運動以外的實在性。但它卻是如此專橫，敘事所有吸引力都是由它而來，以致敘事在到達這點前甚至不能『開始』[7]，然而唯有敘事和敘事那專橫的運動才能提供這點變得真實、有力和吸引的空間」（引自洪維信，2003：48）。

也就是說，說故事的研究方法，除了能給我一個重說、重新詮釋自己寫不出

[7] 「開始」一詞，在這裡意謂「自己」的本源。

論文的機會之外，為能讓我的故事能夠情節化，我接下來在書寫和分析故事文本時，我將必須特別注意自身是「為了什麼」、「為何」、「誰」、「如何」、「同意何者」及「反對何者」等一連串的價值探索和對比的範疇（黃素菲，2005），藉此積極營造出一個能令我不斷自觀、他觀、再自觀的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並逐步將個體的故事解構為共同體的、論述的、歷史的、時間和地點的獨立存在，以便讓我能夠不斷來回穿梭其中，持續不斷的創造、產生新的理解和詮釋，好為現階段無秩序的混亂狀態帶來新的秩序（丁興祥等譯，2006）。

貳、說「我」的故事是為了顛覆社會建構的主流故事

聚焦個人故事的學術研究雖已逐漸形成一股新興的研究風潮，但目前仍有不少推崇科學理性的實證論者普遍對於個人故事的概推性，抱持著懷疑或不信任的態度。但有關於研究樣本數和概推性的疑義，先前也有批判論者指出，評斷一份批判研究／故事文本品質優劣之關鍵並非樣本數的多寡，而應著重於審視研究者是否能返身性的揭露壓迫結構的全貌，提供多元的發聲空間（潘慧玲，2003），解除歷史建構的矛盾情結，有效協助受壓迫者衝破自身的虛假意識及獲得解放的實質程度（陳向明，2002）。

說故事絕不只是「說說個人的故事」，其對外將是一種文化衝突的分析（Tillmann, 2009），對內則是一場對於自我內在慾望、精神層次的政治鬥爭（蔡培元，2008）。從事說故事的研究者需要持之以恆的不斷釐清、掌握每一則故事所銘刻（inscription）、鑲嵌、對應的社會結構和特定歷史情節，以讓敘說自我的故事不但可以是對社會系統性的壓迫提出質疑抗拒或另類的聲音，亦不失為是一條自我追尋和尋覓集體瞭解的生命之道（蔡敦浩、劉育忠、王慧蘭，2011：61）。由此，說一個好的個人故事其實是可以被視為是由個體私領域轉向至集體公領域的實踐行動（蔡敏玲、徐曉雯譯，2003），以及協助被主流壓迫噤聲、人數相對稀少或弱勢邊緣族群的知識經驗、心聲得以被傳遞、被聽見的現身管道（廖世德譯，2001）；譬如，Tillmann（1996, 2009）至今依然持續透過敘說自我的生命故事，不斷重新詮釋暴食症（bulimia）的自我經驗，或 Riessman 過去也曾實際以一名南印度的不孕婦女為例，闡釋說故事的研究重點並不是受訪者的人數或故事本身，而是研究者如何能夠詮釋和通達故事為何會以某種特定的方式被人們講述，

以及如何對於個人故事所存在的社會歷史脈絡進行深入探查（如當地的傳統文化、社會政策），進而能透過重新詮釋個人故事後所得的結果，反過來顛覆故事背後的權力支配系統（引自陳秋山等譯，2008），造就個人經驗的敘說得以作為解放自我與社會的批判途徑，實踐生產貼近常民生活與在地知識的重要方法。

據此，在看似離經叛道、脫離常規的研究主題／故事背後，執意敘說「我」的生命故事，毫無掩飾的赤裸的告白，無非是旨在如實呈現出「我」寫不出論文的故事，何以會成為一則難以被台灣社會工作專業與研究言說、接受的非主流故事之緣由，進而能讓「我」寫不出論文的非主流故事能夠與社群集體的生活經驗、主流社會／歷史文化產生交互辯證的批判連結。也就是這麼一個可以讓故事情節化的敘說、書寫過程，將如實記錄了我從非主流故事的邊陲位置出發，一路輾轉反覆的對內向遭受壓迫的自我（自我主觀的意識結構），對外向製造壓迫的社會結構（建構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的客觀現實與社會／歷史脈絡），同時、持續且雙向性的辯證、反抗及解放歷程，並期盼能在人們僵持不下的認識與紛歧間，在既有的是與非、對與錯之間，重新覓得新的連結點，找到一條嶄新的出路。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二章　行動：說「我」故事的方法

王增勇（2005）:「故事雖然溫柔，影響卻是深遠，因為它不僅改變我們的認知，更改變我們認識世界的感性結構，而且這個改變是會從我們自己開始，改變自己其實才是最困難的。說故事是危險的，因為你無法預知開始說之後，你會說出的內容是否你原先所期待的，但也因為危險，所以才讓說故事具有創造自我的可能。說故事是有致命吸引力的，因為他會召喚其他人現身。問題是，我們準備好要一同冒險了嗎？」

行文至此，我已非常確定我要說一則「我」寫不出論文的故事。但，我究竟該如何有條有理的連續開展、梳爬「我」寫不出論文的斷裂摺皺？又能透過書寫的文字一步步將我個人的問題與社會體制連結在一起，鋪陳出具備「深描詮釋」的書寫架構，完成兼具歷史、人類學及批判想像的文本（鄒川雄，2005），簡明扼要、不拖泥帶水的把故事說通、說透，以及符合說故事於學術研究層次上的規範與倫理，避免內文僅流於個人自戀的呢喃囈語，從而讓我的故事對於社會工作知識、學理的累積也能有所貢獻呢？對此，我接下來將依序交代我的研究／故事的設計（研究／說故事的架構、研究／說故事的方法取向）、資料收集和記錄、分析的方式，清楚說明說我將如何敘說、書寫「我」寫不出論文的故事。

第一節　研究／故事的設計：如何說「我」的故事？

由於這是一篇以「我」為主角的研究，所以「我」毫無疑問的是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和最重要文本素材。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於「我」的探尋和追問，加拿大社會工作學者 Chambon 就曾援引 Foucault 的哲學思想，指出社會工作對於「我」的定義不應是問題的起點，相反的，「我」是必須藉由探索才能到達的終點，因為「我」並非無中生有的自然產物，而是在一連串事件、環境流變得動態過程中形成的社會結晶，所以我們應把「我」和歷史流變、建構的過程聯繫在一起（官晨怡譯，2005）。因此，我的故事內容將不是僅只交代「我是誰？」，而是還需要清楚交代「我，何以為我？」的生成經過。而這也就如女性主義者的名言：「**個人的都是政治的**」（personal is political）（Dominelli，2002），或如 Foucault

和 Bakhtin 等解構主義者也都曾指出人們外顯的身體形貌和日常的生活經驗，無疑都是經由社會、文化、歷史、父權……等諸多霸權一連串交織共構的故事文本（黃心雅，2009）。換言之，人的身體，即是人們體現、發生一系列復雜關係的社會場域（Turner，1980），這使得個人的身體和日常生活必然是人們破除、解放自我的虛假意識，體現自我存在過程中必經的殺戮戰場，更揭示了「自我現身的形式」和「生成自我的生活環境與社會／歷史脈絡」皆是我接下來不得不仔細探查、處理的重要議題。

承上所述，為能不斷重新認識、理解、詮釋及超越「我」寫不出論文的問題全貌，我後續敘說、書寫的範疇都將不免俗的先以「我是誰？」（我所扮演的社會角色）為故事的發端，接著再循序以「我，何以為我？」（形塑社會角色的田野）為故事的經緯，交互構築出我描繪故事和進行詮釋循環的基調。是故，我對於研究／說故事的架構、研究／說故事的方法取向之構思，茲敘述如下：

壹、研究／說故事的架構：「我，何以是寫不出論文的我」的詮釋循環

就如蔡培元（2008）說「胖子」是他這輩子最勾勾纏的對象，反觀在「我」寫不出論文的故事裡，我最先連想到跟我有最密切、直接關係的社會角色，除了寫不出論文的「研究生」，大概不外乎是午夜時分裡諸多有關於「獨生子」和「科大社工」的纏身惡夢。然而，考慮到上述的命名可能無法讓讀者立即感受到故事的特殊性、豐富性及其相對應的田野位置。於是，為了改善這個問題，讓角色的命名能更貼近真實世界的「我」一些，我因而決定實際依據我原生家庭的階級位置和我投入社會工作專業的歷程，重新為角色名稱標示出相對應的田野位置，以及安排後續的論文章節，還有著手收集有關於以上幾個社會角色的他者回應（如家人、師長、同學、朋友、對於我研究／故事有興趣的關係人）和相關的文獻資料，同時也開始試著描繪我研究／說故事的詮釋循環圖（如下頁圖 2-1）。

基於以上的種種想法，我的研究場域最後係定調由：我是「勞動家庭的獨生子」、我大學時是「科大社工／轉學生」、我現在是「政大社工所研究生／科大社工」等三個主要的社會角色來共構編織出「我」寫不出論文的生命故事和社會／歷史脈絡。其中，我之所以會特別選用「科大社工／轉學生」、「政大社工所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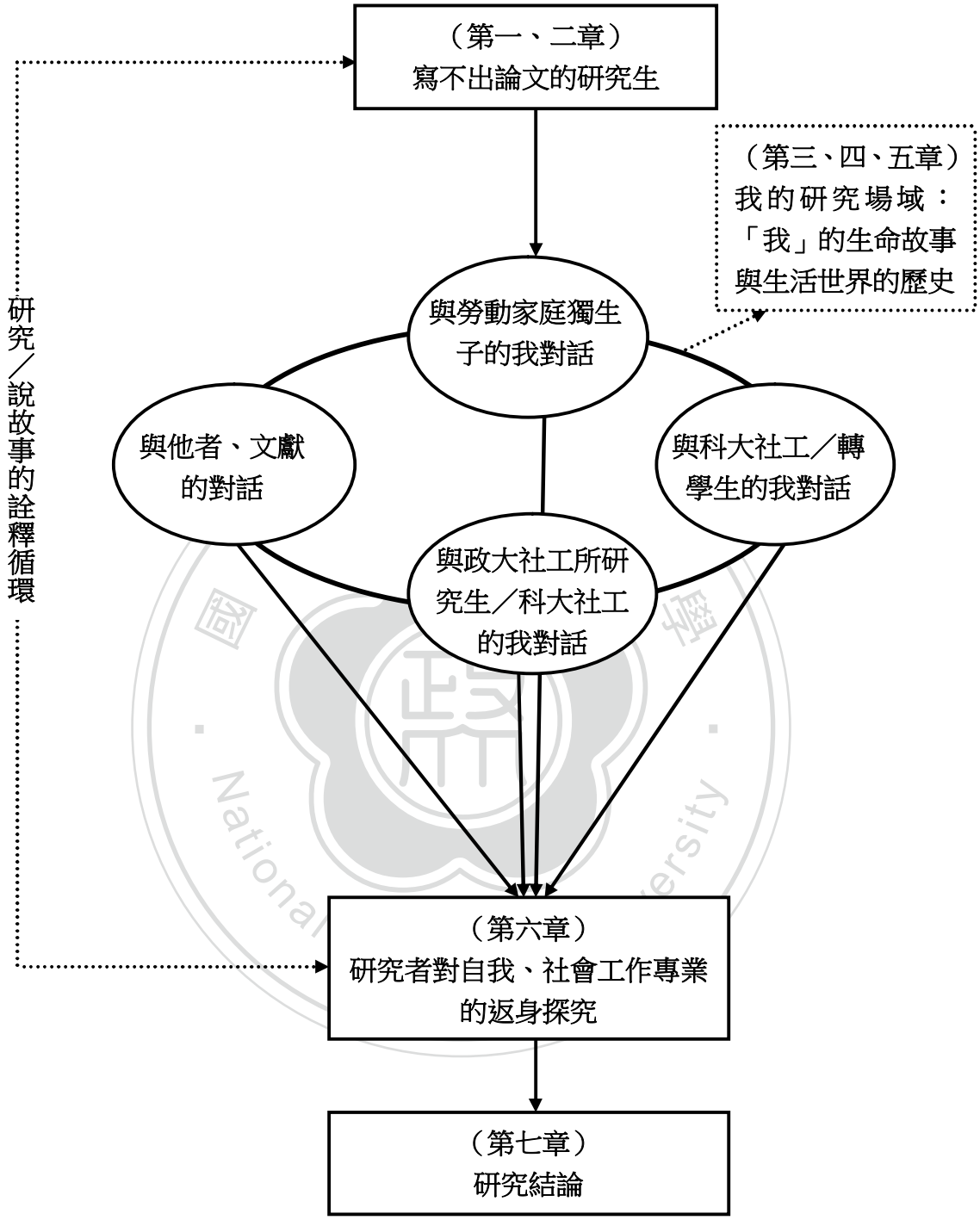

圖 2-1：研究／說故事的詮釋循環圖[8]

[8] 我研究／說故事的詮釋循環圖最初的靈感來自於鄧明宇（2005）之外的另一位「活死人」－我在朝陽科大社工系的學長，後來就讀台北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的莊凱翔（2009：23）之敘說論文。或許是某種說不清、剪不斷的緣分，讓我們寫論文的動機幾乎如出一轍，如他論文摘要的開頭就是寫著：「我死了，我在社會工作教育中死了。我在社會工作教育中不明不白的死了。而且，我還發現死的不只我一個……。」就這樣，身處在不同時間、位置、個性也截然不同的我們，如今卻不約而同的走上了尋找自我困境成因的敘說、書寫自我之道。

生／科大社工」呈現的用意是希望能夠傳達給讀者們某種身處於「少數、邊緣」的矛盾主體位置／意象，只因我一直自認是個「不太一樣」的社工人。例如，若以我「專業社會化」的親身經驗來看，我算是一位半路出家的社工，更是一名同時擁有多重、矛盾血統的「雜種社工」，因為我是社會替代役退伍後才以五專電子科的學歷，透過插大轉學考進入台中霧峰的私立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成為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裡極少數的轉學生；大學畢業後，我接著來到了台北文山貓空的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成為高教體系知名系所的社會工作研究生，但這時候我卻又一次發現，除了非本科系的同學之外，在同是本科系的同學裡，僅有我是來自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

總結上述，「我」故事的發生背景即是我勞動家庭的出身，以及特殊的專業社會化歷程，再加上社群、學界迄今依然缺乏貼近於我個人經驗解釋性文獻的交界處，這讓我研究／說故事的架構重點和問題核心，接下來將有很大一部分會刻意著重在持續不斷的交待、呈現及重新觀看、釐清、回應「我」投入社會工作專業後一直和別人「不太一樣」的「少數、邊緣」狀態，以及處理「我」因為和別「不太一樣」而生的差異、緊張、矛盾及衝突的相關議題。為此，我敘說、書寫多重自我（multiple selves）的故事之目的，即是期待能在研究／說故事的過程中辨識、釐清上述問題成因的系譜軌跡，並同步指出其所對應的社會／歷史脈絡－社會工作專業的結構性問題－藉此完整構築出一個能讓我同步對內反思自我、對外參照社群和社會整體，清楚說明「我，何以是寫不出論文的我」的詮釋循環，協助自己逐步超克（overcoming）被各式社會關係層層建構、包裹的虛假意識，如願通達另一種「我，何以為現在的我」生命實相的解放路徑。

貳、研究／說故事的方法取向：自我民族誌[9]

當我擬定好我的研究／說故事架構後，我便開始思索我該採取何種「方法」來敘說、書寫「我」的故事。而先前在翻閱一系列有關於說故事方法的期刊論文時，我注意到何粵東（2005）日前曾整理出目前投身說故事行列的各家學者在說

[9] 國內目前將自我民族誌相關資料整理最詳細的應該是何粵東（2009）的博士論文；另外若要對於自我民族誌整體的歷史發展系譜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我認為除 Reed-Danahay（1997）之外，也可參閱 Smith-Sullivan（2008）的《The autoethnographic call: Current considerations and possible futures》，其清楚呈現了自我民族誌發展至今的演變與傳承。

故事研究的方法取向大致可分為：個人經驗法（personal experience methods）、自傳（autobiography）、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書寫（writing）等幾種方法類型。於是，我簡單比對各路學者的介紹和我研究／說故事的架構後，我認為最適合我的說故事方法取向是自我民族誌。

一、自我民族誌的歷史與定義：起源、分歧及初步共識

自我民族誌，係源自於 1980 年代社會科學在後現代（postmodern）思潮衝擊下引發「再現的危機」（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期間，經由傳統民族誌衍生而來的一支質性／說故事研究方法（Ellis & Bochner, 2000；Wall, 2006），其通常同時指涉「自我」於民族誌和自傳的敘說、書寫研究，是「自我於社會脈絡下的自我敘事，它是一種方法，也是一種文本」（Reed-Danahay, 1997：9），亦時常被人們視為一種挑戰既有的人我界線和研究常規（Spry, 2001），企圖促進政治、社會正義及社會意識行動變革的研究方法（Adams & Jones, 2008）。

通常而言，自我民族誌鼓勵研究者實際依據個人經歷和現實處境的變化，隨時變動、調整及挪移研究／說故事的位置，自行決定研究是針對何人（who）、何事（what）、何時（when）、何地（where），研究者不一定要全盤接受既有研究體制（學術規範）、資源（金錢）、個人所在環境的限制（Ellis & Bochner, 2011），以求能夠形塑出更具彈性、積極及營造與社會環境互為主體的研究氛圍；不過，這卻也造就了自我民族誌即使發展至今已近乎三十餘年，目前眾多學者對於自我民族誌的操作定義卻仍存有諸多歧異的現況。

如 Ellis & Bochner（2000：742）認為自我民族誌是：「自我有意識的探索、反思內在的影響，讓人可以參與文化描述的自傳式研究，而此描述是經由語言、歷史及民族誌調交互和而成的」，而 Eills（2004）後來也更進一步明確指出自我民族誌的書寫內容必須同時兼備「『自我』（auto）是指個人的經驗；『民族』（ethno）則是為了瞭解文化的體驗；『誌』（graphy）是一描述和系統的分析」，否則就無法被視為是自我民族誌；相對於前者，Heewon（2007）指出自我民族誌是「民族誌」與「個人自傳」的融合體，是一以民族誌為主，自傳為輔，勘查、連繫個體與他者社會文化關係的研究方法，因而略為有別於其他說故事的著作，如一般

性的自傳、回憶錄、期刊，其定義明顯較強調「民族誌」，而非前者所說的「自傳」；Chang（2008：48-49）對自我民族誌的操作定義則綜融了以上兩者，他認為自我民族誌在方法論上是民族誌取向，在詮釋上是文化取向，在內容上是自傳取向；然而，Jones（2005）又不同於以上三者，她特別指出自我民族誌並沒有一個特定和清晰的範疇或型態，其主要特性是透過書寫來記錄世界在故事和社會脈絡、書寫者與讀者、危機與結局之間的變動情形，藉此維持自我和文化的連結，無論其是處於穩定或停滯的狀態。

綜觀諸多學者所述，自我民族誌的操作定義雖然頗為殊途，但其所設定的研究焦點／目標和核心價值，絕大多數依然不脫同歸於支持身處不同社會位置的研究者，透過敘說、書寫自我遭受社會壓抑的故事，「返身」重看「個體與社會」的連動關係；對此，我認為強調揭露、破解現世不斷經由殖民主義／貨幣主義／專業主義等層層建構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Adams & Jones, 2008；Alsop, 2002；Conquergood, 1991；Ellis, 2007；Pratt, 1992），以及去除政治、經濟、社會的外在束縛和宰制，藉此重新創造人類生活意義和精神世界，基本上應可被視為是自我民族誌自創建以來最重要的核心精神和價值意義。

二、我對自我民族誌的理解： 政治批判與自我培力的雙向實踐

循著以上的認識，為能進一步掌握自我民族誌，我稍微又持續比較了自我民族誌與傳統民族誌／其他的研究方法的差別。其中，我認為自我民族誌和我過往熟悉、研讀過的研究方法最大的差異點在於：自我民族誌的研究者是以研究者最熟悉的田野場域（自我的生活世界）作為研究的起點，反觀傳統民族誌／其他的研究方法通常則是從研究者陌生、未知的田野場域（他者／未被探究的問題世界）為出發點（Chang, 2008）。

因此，選擇敘說／書寫自我，選擇自我民族誌的理由，除是為了能夠拉開觀看的距離，逐步將人們原先認定為「理所當然」的一切暫時「存而不論」外，關鍵就在於「陌生化」、「客體化」研究者原先熟悉的自我，而陌生化、客體化自我的目的則是為了能夠彰顯、揭示受苦的個人主體在社會化／歷史化過程中所受的社會壓迫／殖民，從而協助研究者破除、拒絕禁錮自身的虛假意識，達成自我

意識覺醒，實現反壓迫／去殖民的自我實踐（Adams & Jones, 2008；Alsop, 2002；Conquergood, 1991；Ellis, 2007；Pratt, 1992）；而這也正對應著 Said 呼籲知識份子應秉持「書寫本身就是一種逃脫、要逃脫一切為了抑止它、抑制它、框架它、與它相比擬得絲毫不差而設定的計謀」的說真話精神（薛絢譯，2009：294），積極成就書寫得以成為是一種對於壓迫／殖民者的政治鬥爭行動。所以，選擇敘說／書寫自我，選擇自我民族誌，可說等同於一種針對社會政治的批判實踐。

不過，只有針對社會政治的批判實踐卻是不夠的，選擇敘說／書寫自我，選擇自我民族誌，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和目的，那就是對於易受傷害自我（研究者經歷的悲劇和負向事件的研究者）進行自我培力的生活實踐（蔡培元，2008；Ellis, 2004, 2009）。畢竟，面對不知所謂困境，我們或許都渴求能夠改變世界，但當各式各樣的壓迫已經是無所不在又不斷隱匿、變形時，在改變世界之前，我們勢必要先面對和改變自己：即使是鐵石心腸，人心依然是肉做的，所以人們往往會下意識選擇逃避或壓抑自己的故事，我們多多少少都藏著難以說出口的秘密故事，因為我們往往很清楚許多故事是不被主流社會所接受的，更是不能主動言說、公開的。所以，透過自我民族誌來敘說、書寫自己的生命故事是一種發聲的練習，是一種自我的行動，是一種對外開放的告解，是一種救贖的解放，同時也是一種反覆自我探索、療癒及復原的歷程。換言之，我認為自我民族誌研究者的最重要身形樣貌，即是不斷打破主流故事的敘事框架，持續探索主流故事外圍世界的「邊界跨越者」（Reed-Danahay, 1997：3）。

總結上述，我認為自我民族誌即似是一種協助研究者重新閱讀自我和梳理多重自我的研究方法。從而透過不斷敘說和書寫，讓研究者可以不斷在敘說、書寫故事的歷程中反思、辨識及淬練出多元的自我樣貌，同時尋找另一種超越主流故事和重新詮釋痛苦生命的可能，而這不也正是現在的我最需要的嗎？我想，這大概就是我當初第一次翻越自我民族誌的相關文獻後，隨即就毫不猶豫決定是它的根本理由。

第二節　資料收集和整理方式：如何書寫「我」的故事文本

交待完適合我所欲採用的研究／說故事方法取向後，我接下來將配合自我民

族誌的說故事方法與研究內涵，依序說明我將如何進行「我」的研究／故事，同時也將試著交待我如何檢視「我」的故事／研究的價值。

壹、研究／故事資料收集方式

關於自我民族誌的資料種類可說十分多元，諸如各種第一人稱為主的短篇故事、詩、小說、相片的隨筆紀錄、個人的隨筆記錄、日誌、零散或多層次的寫作，或社會科學的散文等，幾乎皆可作為研究進行時的文本（Eills & Bochner, 2000：739）。因此，在我的研究／故事裡，相關文本的素材（或說書寫靈感）主要來自於以下幾種管道：

一、日常生活經驗與個人的記憶

日常生經驗與個人的回憶，是我書寫文本時最重要的素材來源，但由於日常生活經驗通常是直接來自我對於事件的主觀感受，再加上部份文本的書寫起點或內容，往往涉及一些令人不太愉快的事件，從而使得我除了必須時常提醒自己注意我在事件當時的立場之外，我個人的記憶對於事件描述的精準度，也將直接影響文本的品質（蔡敏玲、徐曉雯譯，2003）。關於這個問題，我的處理方式是，在評估可行的狀態下，我會試著詢問事件的關係人，盡量描寫符合於當時情況的狀態；反之，在訪談不可行的情況下，我則會視況多方面的呈現出某些關係人的言論和行為，力求讓事件的情境能夠情節化和立體化，以彌補部分因記憶不清所造成的缺失，但我想這個問題應該是我能夠克服和妥善處理的。

二、正式／非正式受訪者的訪談記錄

當我決定敘說自我的故事，並陸續對同學表示我要透過訪談來瞭解他們的經驗時，我常不經意的發現有些人有時會露出「你不是要敘說自我？怎麼會需要訪談？」的狐疑神情。然而，我必須說，這其實是人們對於敘說自我故事一個很大的誤解。事實上，無論是自我民族誌或是其他的說故事方法，適度的呈現出自我和他人的想法和意見，豐富研究／故事的視野是一項重要的工作（Eills, 2002）。所以，我在寫作的過程中，除了我與家庭成員的對話之外，我也不斷企圖以我「不太一樣」的「少數、邊緣」狀態，以及「我」因為和別人不太一樣而生的「差異」、

「矛盾」及「衝突」為實例，透過我自己的人際關係和網際網路招募對於我研究／故事議題感興趣的受訪者；訪談過程通常是互相交流主客雙方的生命故事為主，我會先清楚講述自己成為社工的經驗和想法，接著再請受訪者同樣循著考試升學和就讀社工系、進入職場(或研究所)的生命歷程；最後，我總共約累積與二十多位來自北、中、南、東的普通大學畢業的社工、社福系畢業的社工、科技大學畢業的社工、學分班的社工、神學院社工及數位社工教授有過數場正式訪談，或以餐敘、口頭交換意見、簡單會晤、通信對話等方式進行的非正式訪談[10]。

三、 正式和非正式的文件記錄

我所謂正式的文件記錄意旨跟我研究／故事文本內容相關的學術文獻，如「勞動家庭的獨生子」主要將涉及台灣政治經濟、產業類型的變化、獨生子女等相關文獻；「科大社工／轉學生」、「政大社工所研究生／科大社工」則將針對台灣歷來社會工作專業建制的歷史、社會工作教育體制的發展，教育和階級流動等相關的學術文獻進行通盤檢視；此外，由於我的研究／故事的背景與我受教育歷程密切相關，同時我也宣稱我的研究／故事是批判典範，是後／去殖民的，所以我在過程中也將持續與 Bourdieu、Fanon、Foucault、Freire、Said 等學者的相關文獻進行對話。

另外，非正式的文件記錄，主要是指我個人日記，隨筆，信件，家庭相簿，或是一些能夠協助激發我書寫靈感的文學作品，如胡晴舫（2010）的《我這一代人》、中川雅也的《東京鐵塔：我和老媽，有時還有老爸》（曹姮譯，2007）、Orwell 的《動物農莊》（陳枻樵譯，2010）、Tõnu Õnnepalu 的《邊境國》（梁家瑜譯，2011）等，都是伴隨我無數個寫作夜晚的隨身讀物。

四、 重要他人、網友的建議和回饋

在論文寫作的過程，每當完成一小段的文本，或遭遇暫時、偶發性無法一言蔽之的寫作低潮時，我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找人對話。我對話的對象可能是家人，可能是師長（我最常找的大概就是老王與我大學的研究法老師），可能是

[10] 正式和非正式訪談的區隔，以我有無錄音存檔作為標準。

身邊同學和朋友，可能是同為老王的指導學生們，可能是我質性團體的夥伴[11]，或是我有時候也會發表在社會工作相關的網路討論區，尋求社群夥伴的回應。以上所述，大致是我在寫作過程，用來創作、補充、修正及豐富文本內容，提升文本品質和完成度的幾個方法。而此種匯集眾人聲的書寫手法，除了可說是質性研究裡的三角檢證（triangulation）之外，最後或許也能讓我的研究／故事能夠被視為是某一種集體說故事的成果吧！

貳、研究／故事資料記錄、分析方式

我資料記錄的方式，主要是依據研究／說故事架構（圖 2-1）中的「勞動家庭的獨生子」、「科大社工／轉學生」、「政大社工所研究生／科大社工」來作為我書寫故事文本的基底與橫縱。此外，我同時也參考了蔡培元（2008：27-28）亂寫與簡寫、歸類、架構、分析、再歸類、再架構、資料再蒐集的書寫步驟，融合我所理解的自我民族誌，進而在稍微修飾、轉化為較貼近於我說故事風格的書寫方式。綜上所述，回想整個敘說、書寫過程，大致應可分成下列幾個交互參照、來來回回的書寫步驟：

一、按照各個故事章節的隨性書寫：針對事件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書寫文本的主軸皆是依據研究／說故事架構設定的故事主題，並實際依我的生命階段的時間序列，逐步書寫發生在我周遭大大小小的重要生活事件。另外，我也會隨性寫下某些靈光一閃的記憶片段、我對生活情境的觀察記錄或是旁人的隻字片語。總之，在這個書寫階段，我大概是想到什麼就寫什麼，盡可能透過不同的管道和靈感來完成各式各樣的文本。

[11] 在 2012 年的四月到六月間，老王邀請先前修過質性研究課程的同學，舉辦了一個質性研究的團體。當時參加的成員除了老王之外，另外有包含我在內的三位政大研究生，兩位台北大學的研究生，兩位陽明的博士生，一位外校的教授等，共八名成員。每個成員分別有兩次報告的機會，內容主要是報告自己的研究主題，以及收集、分析資料的方式和心得，並由各個參與的成員給予回饋和建議。

二、歸納式的深描性書寫：針對社會／歷史脈絡

隨著故事文本的累積到一定程度時，我會開始對於各個文本進行歸納分類，使其能逐漸聚焦為某一特定或我關心的議題，並配合、匯集相關的學術文獻或旁人的言語論述，並針對該議題所處的當社會／歷史結構、文化背景，逐次進行多層次的深厚描繪，促使其能夠構築出一則內涵故事情節的章節雛形。基本上，這一個步驟的重點除了是我對於資料的理解與交涉之外，亦可說是一段由「點」（單一、零散的文本）到「線」（歸納相互關連的文本），再到「面」（故事情節的雛形）的書寫歷程。

三、分析式的詮釋性書寫：針對自我內在慾望的政治角力

每當各個故事的情節逐步浮現一個可閱讀的概略輪廓時，我會開始嘗試判別個人和社會在各個故事章節後的衝突事件。當然，分析衝突事件的文本必然會直接涉及我個人和他者各自所據的價值立場，而這也使得我在分析和重新詮釋「我」的故事時，往往必須要求自己的書寫能夠一併呈現出「個人主觀／社會客觀」在自我內在慾望深處激烈纏鬥的政治角力。坦白說，這是整個研究過程裡最困難，也是最耗時的一個書寫步驟，因為我知道它是必定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這卻也是能讓我得以重新認識「我」、理解「我」、解放「我」的必經之道。

四、補充、編輯、再確認的解放性書寫：針對研究價值的評估和自我期許

隨著「我」的故事逐漸完成到一定程度時，為了能充分達成解放自我的目標，我會開始思考有無不足或其它可加強之處，或者是仍存有其他詮釋方式的可能。而我的做法是把產出的文本分別交予我的重要他人或先前的受訪者，再次透過他們的意見和回饋，不斷重新補充、編輯、再確認我的文本內容。然而，不斷補充、編輯、再確認的目的，即是為了呼應 Speedy 曾為說故事／研究的文本所整理出幾項評估標準（如表 2-1）（洪媖琳譯，2010：72-73）：

表 2-1：說故事／研究的評估標準

透明度	➢ 作者如何開始書寫這文本 ➢ 資訊如何被收集 ➢ 作者是否製造目的、觀點及位置已影響可用文本的建構？
信賴度	➢ 這文本是否看起來「真實」——個在文化、社會、個體和社群等意義層面的世界裡可信的敘述？ ➢ 對於擬真性（真實）及知識的主張是否著根於多元標準以敘說「生命經驗」？
美學價值	➢ 這文本在美學上是否成功？ ➢ 它是否使用創意實踐為文本開啟新視野，以及邀請對其詮釋的回應？ ➢ 文本是否在藝術上適當、令人滿意並且（最重要的）不無趣？ ➢ 這書寫是否讓我的心哼唱起歌來？
反思能力	➢ 這文本是否在作者的部分包含個人體現和／或文化著根的意識？ ➢ 這文本是偏頗的、被定位的且偶發的？
責信度	➢ 這文本所代表的是那一族群的興趣？ ➢ 研究者用什麼方式對那些人解釋負責？ ➢ 倫理議題與合作／參與議題以及權力關係是否被討論？ ➢ 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空間如何被正確處理？ ➢ 這貢獻是否超越參與者／作者、讀者的倫理兩難／痛苦？ ➢ 私領域和公領域的劃分是否被逾越？
大量且恆久的貢獻	➢ 這對我們瞭解社會／文化生活有沒有貢獻，另外對人類而言有何意義？ ➢ 這文本是否持久並且在知識領域中存在有長久的價值？
影響及改變	➢ 我對這文本有沒有共鳴？ ➢ 它是否在情感上／智識上／精神上／政治上影響我？ ➢ 是否會產生新的問題？ ➢ 讓我會想要嘗試新的研究實務？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讓我想要行動？ ➢ 超越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假設？ ➢ 轉換／做改變？ ➢ 實行解放的工作？

資料來源：引自洪嫈琳譯（2010：72-73）。

如同 Phillips 與 Pugh 曾提及研究不一定是去探討未曾觸及的新世界，而是在生活周遭一些想當然爾的事物中發現新觀點、指出既有的研究偏見（引自畢恆達，2005）。換言之，形成我論文問題意識最重要的關鍵即在於研究者必須隨時注意自己是採取何種觀點、何種立場進行自我問題的探索與敘說，進而與既存的研究／知識展開批判性的對話。所以，列出上述評估標準，不外乎是我自知敘說、書寫出一篇能夠通達解放自我的自我民族誌並不簡單，再加上台灣社會工作歷來慣習的碩士論文又多以科學實證典範為主，針對我個人生命經驗的故事／研究是否某能代表社群集體的共同經驗，我相信這會是我接下來不斷會被人們質疑和挑戰的議題（特別是我所處的政大社工所迄今還未曾有研究生以「自我」為研究範疇，不免使得我必須承受不少額外的壓力）。是故，完整的交待說故事／研究的評估標準，是協助我未來得以自行逐一檢視文本品質的指標，亦是我對於質疑者們的學術性回應，更是我對於論文研究成果的自我期許：我承諾我一定會盡力達成、實現表 2-1 裡的各項評估指標，力證這不是一篇「胡搞亂來」的社會工作碩士論文……我誓言用「自我」產出一篇能夠超越台灣社會工作學術領域過往今來的故事／研究型態的文本！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三章　獻身：我，是黑桃大老二？

台灣像是一部拼裝車，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系統中，「家」做為勞動力的提供單位，是用一種拼裝車的型式去銜接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環節，市場化的經濟則讓拼裝車批著小轎車的外殼。多數的家庭其實是非常辛苦的像一部拼裝車，要幫台灣的經濟往上拉，而父母做為這樣的成年人，只能拼命為了讓拼裝車的零件不要脫落、崩解；他們在賺錢的同時，還要去使用各種的可能性讓家有基本的穩定，這樣小孩才不會變中輟生，每個家庭都承擔了很多辛苦，這種辛苦很多時候會展現在夫妻關係的分離、親人的死亡，甚至是展現在性別認同的抗爭上，或是小孩的發病上，或者是書念不好上（夏林清，2011：240）。

「我」寫不出論文的故事／研究，首先將由我是一個獨生子說起。獨生子，是我生活世界裡最重要，同時也最糾葛的身份角色和自我認同，以及眾多社會關係的原型：我自知我終有一天是要承擔家庭一切的獨生子。然而，若仔細回想自己成長的生活經驗，我想我應該會毫不猶豫在一開始就對所有的人說：「人們平常所說的、所寫的獨生子都不是我，人們所認識的獨生子都是錯的，只因我雖然是個獨生子，但我不是生來就是獨生子，而是『被』周遭的一切變成獨生子的！」

第一節　家庭的故事：全球化下勞動家庭的宿願與夢魘

當我想要重新認識自己如何是生成為一名今日眾人眼前所見的獨生子，似乎就不得不先談及生我養我育我的家庭，因為「家」是社會價值體系運作、傳遞的試煉場（夏林清，2011），是孕養、啟蒙人們社會價值的初始之地（吳就君譯，2006；魏章玲譯，1988），更是影響個體日後連結其它家庭和更廣大社會網絡，決定個體社會位置／地位的起點與基石（鄭麗珍，2011）。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擁有和追求一個幸福美滿、合乎於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型態，我想應該可以說是大多數人的期待。然而，我成長的家庭卻無法被歸類於朝九晚五的白領、中產家庭，打從我上小學起，我的家庭圖像，就和老師、同學口中，或是父母於國外結識的大戶友人家中所見識到的，或課本上所描述的男主外、女主內，還是三代同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堂幸福和樂的模樣差異極大，或該是說……根本截然不同，而這個願望似乎也隨著我年齡的增長，隨著時代巨輪的滾動而越來越模糊，也越來越遙遠。

壹、地球彼端的淘金夢：浪跡南美大地的異鄉人

1949 年，昔日被葡萄牙人喻為福爾摩沙的台灣，當時仍只是一個國民平均所得一百五十多美元，名不見經傳的貧窮島國，此後一路歷經國共戰亂和大江大海的跨省遷徙，咬緊牙根挨過了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族群分裂與政治衝突的挑戰及由農轉工的經濟轉型陣痛期，台灣人胼手胝足的打拼、犧牲及奮鬥，靠著「代工」一步一步的將台灣由資本體系中的「邊陲」地帶推向「半邊陲」的位置（夏曉鵑，2008），也終於在 1980 年代開始嚐到現代化帶來的甜美果實，換得苦候多時的經濟奇蹟。當時，民間市場一片大好，股市萬點，奔流的資本與熱錢，欣欣向榮的房市，正式開啟了台灣錢淹腳目的黃金傳說；就在台灣島內苦苦追尋著各項經濟成長指數的同一時刻，宛若幾世紀前歐洲諸國的大航海時代，國內許多小老闆和市井小民紛紛秉著一股大無畏的冒險精神，拎著一紙大皮箱，告別家中老小或者乾脆攜家帶眷，前仆後繼踏上旅途，遠赴遙遠又夢幻的異國，只為實現那不知在何處的淘金大夢[12]。

據多位長輩的回憶口述，父系的家族成員和眾多旅外的友人[13]，當初就是抓緊台幣幣值急升和南美諸國音戰動動盪使得匯率狂貶之際離鄉背井[14]，從此成為魂牽故土，卻又日久他鄉變故鄉，流轉浮沉於全球經濟之海，苦盼著有天能夠榮歸故里的異鄉人。父系宗族旅外的故事版本眾說紛紜又精彩可期，故事裡是希望，是野心，更是充斥著數不盡的血淚與鄉愁。但有關於父系宗族血脈的歷史，打娘

[12] 我從小在家族、親友間聽聞眾多關於跳機、非法入境，或是走私虎骨、象牙，還是在肛門裡塞珠寶、鑽石（台灣早期禁止貴金屬的進口）躲避海關查緝之類的傳說和軼聞；說穿了，眼前的大人們不折手段的目的，不外乎是為圓一個成為「有錢人」的夢，然後能讓家庭過好一點的生活，因而不斷與環境拼搏著吧？

[13] 我父系家族的樹狀共計有大姑、大伯（大郭）、父親（中郭）、小叔（小郭）四支；1970 年後，父系家族以大姑為首，陸續移居南美洲的玻利維亞、厄瓜多爾、阿根廷等地經商貿易（如今是以後兩者為主）；我是父系家族的次孫，所以父系友人通常會稱呼我為「中郭的兒子」或「小小郭」。

[14] 當時台幣和美元的匯率處於高點，而南美諸國則是政爭、內亂、對外戰事頻傳，使得幣值大幅貶值，極大化的匯差，無獨有偶的創造出賺錢的機會和空間；另外，有關於南美洲的經濟發展的過程和歷史（被殖民史），可閱《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王玟等譯，2011）；而父系家族最早發跡於玻利維亞，後來陸續遷徙至阿根廷、厄瓜多爾。不過，近年面對中國大陸移民、跨國資本大舉遷入的挑戰，家族在南美的經商環境日益艱辛。

胎迄今，我始終無法從找到太多關於「過去」的蛛絲馬跡。這個家族沒有埋藏故人骨骸的墓地，也沒有任何可供後人追憶的歷史符碼，更沒有任何有關於「根」的傳說、故事或文本（以上對我最直接的影響，大概就是我從未有過清明掃墓的經驗）[15]。靜默，向來是這家人看待過去的態度；漂泊，是這家人身處俗世的姿態；冷酷無情的快、狠、準，是這家人堅信的從商之道；向前看，向錢走，還有覺察異鄉政經局勢風頭不對就立即遷徙和流動的投機性格，則是我們一家人為了生存，必須深深烙印在骨子裡的生存鐵律。

沒有太多的「理由」、「眷念」或「顧忌」，我的父母在 1980 年代間，多次抱著嗷嗷待哺的我，理所當然的循著家族旅外流轉的足跡，飛越遼闊的太平洋，橫跨國際換日線，踏足南美諸國，陸續依附不同的親戚友人，逐一體驗著不同的異國文化，諸如品嚐亞馬遜河的食人魚，眷養巴西龜、南美洲鷹或獼猴[16]在自家庭院，領受拉巴斯[17]的高地氣壓，逼近南極圈的酷寒，走進過玻利維亞的貧民窟，甚至在布宜諾艾克斯[18]親眼目睹臭氧層的破洞，見證宛如末日即將到來的奇幻景像。對此，我的父母總是說，這個世界實在是大到令人難以想像，更是無奇不有。

貳、 孩提的床邊故事：未完全待續的翻身隱喻

離地三萬英呎的高空，昔日巴別塔意欲染指之處，伴著氧氣、氮氣、二氧化碳被超音速引擎捲入、攪碎後吐出的陣陣氣流聲，正是開啟我生命記憶和靈魂之窗的初始地；乍醒又坐立難安的我，先是看了一眼身旁緊抓嘔吐袋昏沉入眠的母親，接著熟練的把手舉高，歪著頭，擺出童稚的笑容，不急不徐對高挑的來人說出「C…o….k…e…Coke」，然後在接過飲料後，再一次微笑和點頭，禮貌的補上一句「Thanks」；那年，是西元 1986 年，我四歲，母親三十四歲，而這是我第幾

[15] 這可能肇因於祖父自幼喪父和曾祖母隨即改嫁，再加上祖父對於自己的過去幾乎閉口不談，我除了探得祖父從前是一位板模工，並一度賺了不少錢讓家庭衣食無虞的訊息之外，其餘有關於家族故人的線索全都非常片段，甚至是趨近於零。

[16] 那天，父親牽我走過市集時，我偶然看見一隻待售的小猴子，接著我對父親說我想要把牠帶回家，我記得父親當下很豪爽的就掏出一百塊美金買下牠（我們回家後，還被母親念了好一下子）。這是我童年裡非常重要的記憶，因為這隻猴子是父親生平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禮物。

[17] 玻利維亞的首都，有世界最高首都的稱號，其海拔接近 4000 公尺。我對拉巴斯印象很深刻的原因是，我跟母親在那不約而同的戴起了氧氣罩，那種缺氧瀕死的感覺讓人難以忘懷。

[18] 阿根廷的首都。

次搭波音 747 了呢？一邊吸著飲料，一邊望著雲底芝麻綠豆般的住房、車輛、田地及溪流，我沒有太多「哇嗚」的興奮，反而是想著城裡住的跟我一樣的黃種人，還是對坐的捲髮黑人，亦或後排金髮白人呢？他們說的是台語，是國語，是英語，是西班牙語，或葡萄牙語呢？現在飛越的國境的是美國，是巴拿馬，是秘魯，還是巴西的領土呢？算了，不知道，記不得又數不清的，也已不再重要。

我，是出於 1982 年英阿福克蘭之役終戰後兩天，自幼即跟著父母、族人遊走世界各地的獨生子。雖然，幼時旅外的記憶瓦片幾乎已經模糊、零碎的令人難以拼湊，但偶爾回想起的童年往事，總好似母親百說不厭的床邊故事，那裡能掙錢，我們一家子就會出現在那，我們全家都是一群努力實踐「發財夢」的異鄉旅人，每個人都深信，只要不怨天尤人，用力祈禱，靜待時機，等我們那天賺夠了錢，我們就能衣錦還鄉，能夠擁有一間舒適的大宅院，不用繼續流浪，該有的，我們一定都會有。

「有一天，總有那麼一天……。」母親的神情總是透露了堅定的光芒。

每當我翻著一張又一張泛黃的照片，想起這則深切暗喻階級翻身與充斥濃郁鄉愁的床邊故事，我常挖苦自己。我苦笑小小的腦袋瓜當初不知領悟、吸納了多少，特別是在所剩不多的童年記憶裡，我現在也僅只依稀記得，除了不遺餘力的努力認識和探索未知的世界，猛問忙進忙出的大人「這是什麼」之外，大概就是牽著一條體積是我這小鬼頭的數倍，名為「馬沙」的德國大狼犬，姿意的穿梭在吵雜的小小廠房或昏黃的房間裡，手持著黑色的熱融膠槍跟著當地的工人、母親一起製作小飾品等待販售，或向大人們炫耀自己今天又從某一位工人那新學到的西班牙語……就像很久很久以前，我似乎曾經夢想我未來一定會是一位緊盯窗外飛馳畫面、自由自在的吟遊詩人，我將大無畏的走過寒冷的冰雪極地和酷熱的遼闊沙漠，然後隨機坐在不知名的廣場，口沫橫飛的對著天真無邪的孩子們闡述著世界各地的不思議……幼年旅外的種種經歷或多或少讓我從小就深信這個世界千奇百怪，如夢似幻，沒有什麼是單一不變得定律和對錯，其總是有許多特殊、有趣的事物供人們追尋、探索，從而滋養了我往後看待世界的眼光，更奠定了往後我熱愛新鮮事物的冒險性格。

可惜，馳騁在南美大地的尋寶和冒險故事並沒有持續下去。1988 年，不知是累了，是倦了，是看透了，還是淘金夢醒了，亦或是受夠了語言不通、天氣嚴寒／酷熱，或徹底認清寄人籬下必須看人臉色卻又苦無發展生財機會的現實，我的父母毅然出清了存貨，選擇回到台灣，重新開始。那年，父親三十八歲，母親三十六歲，我六歲。我們，終於要回「家」了。

參、家庭即工廠，工廠即客廳：忙碌擠壓的生活印象

返回台灣後，我和父母開始和祖父母同住，家庭的型態由原先父母子三人的核心家庭，轉為三代同堂的折衷家庭；此後，父親先是在一間生產塑膠製品的中小企業任職，但或許是流竄在體內的冒險之血，始終讓他難以忘懷千里之外的淘金夢，父親因而為此數度放下手邊的工作機會，依然執意多次往返中南美洲依親試圖發展；不過，父親殷切期盼的淘金大夢始終沒有兌現，且流逝的時間也讓父親的年紀和工作技能逐漸與 1990 年代後台灣劇變中的經濟產業型態所需脫落，繼而造成他後來待業多年才又輾轉在友人所經營的小額信貸公司找到一份小差。或許，是淘金夢碎的失意落寞，以及時常必須忍受他人訕笑、嫌棄的無奈苦悶，父親酒癮和賭債逐漸在這些年間開始越演越烈，越滾越大，每月收入幾乎也都所剩無幾或負債累累，每天回到家時經常是呈現爛醉如泥的狀態，逐漸埋下日後家中許多的爭執紛擾和財務隱憂。

相對於長年滯外未歸的家庭缺位、工作和收入起伏不定的父親，母親回國後旋即受雇於離家不到兩百公尺遠的家庭式裁縫工廠。雖然母親數度有轉換職業的意圖[19]，但受限工作之餘仍需兼顧奉養公婆和照顧年幼多病的我，母親始終無法真正脫離裁縫代工。後來，母親索性買下兩台功能迥異的縫紉車，從受雇者轉型為在家工作的自雇者（自由業者）[20]，我們家的客廳自此變成棲身於街角巷弄間的家庭代工廠（謝國雄，1992，1994）。運氣不錯的是母親工作型態的轉變，恰巧也適逢我國小到國中這段期間住家附近成衣銷售聚落（商圈）日漸成型、擴張[21]（約是 1995 年前後），因而帶來了大量的零售商、批發盤商、散客的代工、外

[19] 母親雖然只有國中夜間部補校畢業，但我記得母親在這段期間內，曾任職於高雄市某盲人協會，也當過某原木貿易商的秘書，我甚至還記得我們母子倆在高雄的各大夜市擺過地攤。

[20] 自由業者是我國小填答父母職業欄時，母親告訴我的答案。

[21] 高雄後火車站的成衣聚落，在地人通常會將其稱呼為安寧商圈或後驛商圈。對於安寧商圈興衰、

包訂單和修改委託，直至我五專畢業（2002 年）時，家中放眼望去經常都是堆積如山的布品、成衣，還有絡繹不絕的修改委託，等候著忙碌不已的母親抽空處理。

然而，就如福無雙至的古諺，大量的代工訂單、修改委託雖讓家庭的收入逐漸增加，但忙累的生活常態卻也同時造成家庭關係日趨的緊張。不需要太多的對話的工作性質，以及平淡規律卻又一成不變得「急」和「忙」，還有凡事以「最短時間完成」的生活步調是這個家最大的特徵。這時候的家，無論何時，只要走入門內，隨即可聽見裁縫機平穩又吵雜的運轉聲，看見成批成堆的布料與成衣，聞見空氣中更無時無刻飄浮著數不清的棉絮，感知到屋內瀰漫一股忙、茫、盲的詭異氛圍。工作、工作、工作、除了工作還是工作，母親想盡辦法讓家庭得以維持能夠吃飽喝足的安穩，但忙碌的生活、高度的勞力付出、侍親育兒的照顧責任及沉重的經濟壓力卻也使得蠟燭多頭燒的母親和祖父母的關係是相互怨懟的，壓抑的，緊張的，易起爭執的，家庭中因而常充斥著一股分崩離析的茫然，也十分缺乏信任、溝通及諒解。忙碌的生活讓家人們總是習慣隱忍、醞釀著彼此平日裡說不清又理不明的諸多矛盾、不滿、怨恨及苦悶，直到某個無辜或不識相的人事時地物，故意或總是不知其然的引爆某人的情緒火種後，其餘眾人再如餓虎撲羊般，盲目的將積蓄許久的憤恨一次出清。

人們常掛在嘴邊，或者電視、書刊裡常記述的相互信任、依存、體諒，還是良好冷靜的互動、溝通方式，對這家人而言，根本彷彿是天方夜譚般的奢求。我的成長經驗，完全誠如祖母常操著流利的閩南語對鄰人誇耀：「我的孫子怎麼可能會笨，笨孩子才不得人疼」的語意：當家庭裡相同的衝突戲碼總是數十年如一日，不厭其煩的重複上演時，作為這個家唯一的孩子，我總是必須自行、隨時繃緊全身上下的感官神經，然後從屁股上熱呼呼的藤條印，自行參透、領悟出如何不動聲色的逃離現場置身事外的靈巧身手、如何在大人的謾罵時自動開啟左耳進右耳出的過濾功能、如何迅速的忍住悲傷和抽離情緒、如何表現出自己沒有事情以免家醜外揚的模樣、如何踏進門就能隨即感受家庭的「天氣」（晴天／陰天／大雷雨）狀態、如何快速精準的辨識大人的臉色、如何觀察大人肢體的小動作、

變遷的歷史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郭芷余（2005：94-96）的碩士論文，裡頭有詳細的介紹。

如何準確的盤算出什麼時候可以討得零用錢[22]，或如何在家庭紛爭中適時的表態選對邊站以迴避無妄之災等得以降低自己遭受責罵機率的眉眉角角，一直是我家庭生活的重要功課。

肆、勞動即生活，生活即算計：自律的陀螺與耳濡目染的預備勞動力

裁縫代工，最核心的概念是「論件計酬」，也就是做多少件工作，就領多少錢。白話文的實例解釋是母親最常掛在嘴邊的：「我們家不是朝九晚五、吃月的上班族／公務員，固定時間一到就有錢領……我今天沒有工作，明天全家就沒有錢吃飯。」相對應的生活畫面則是自我懂事以來，為了替補父親，為了要把家撐住，為了多掙一些錢，母親總是日以繼夜的坐在裁縫車前，焚膏繼晷的重複著相同的動作，衣服一件接著一件，手不斷的滑動，腳不斷的踩踏，從來都沒有停過。

「是這個家逼她必須如此。」這是母親數十年來始終不變得結論。

當初春嫩葉上的露珠順著葉梢滑落，高雄中學早自修的晨鐘響起，恰恰代表著一日之初；當最早駛過家門前的自強號疾駛而過的鐵軌震動，晃動的鐵軌，不經連同讓老屋裡的大理石地板和木製窗戶都微微的晃著，接著又盪起了昨天夜裡累積的塵埃，飄散在空氣裡的微塵則不安份吵醒了棉絮，開始一同肆無忌憚的飄著；不久之後，當黑色的啟動鈕解放了裁縫車的電流脈衝，動力引擎奮力發出一陣刺耳的嘶吼聲後，死心塌的為主人的轉著，伴著一塊又一塊五顏六色的七彩布料持續轉著，隨著整條人車鼎沸的成衣街拼命轉著。

「陀螺」，是母親許給自己的代號，貼切道盡她每天睡醒睜開眼睛，就必須為這個家，必須像陀螺一樣自動自發的轉啊、轉啊、轉啊、轉啊、轉到深夜的日常生活和心境，工作、經濟及照顧老小的責任全落在她身上的無奈不斷積累著。後來，母親在我小學三年級時，即使身旁眾人苦勸多次，甚至是在祖母百般承諾將協助托育下，她仍堅持拿掉了我期待許久的弟妹，只因多一個人多一張嘴，她已經無法也無力再負荷更多的工作、經濟及一家老小的照顧壓力，更不想要未出

[22] 判斷母親什麼時候領工錢，或懂得父親賭博輸贏的結果，是成功討取零用錢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

世的弟妹將來必須跟著我們全家一起受苦，無法快樂無憂的長大。那年，母親也把我叫到裁縫車前，對著我說：「媽媽沒念過多少書，你的功課對媽媽來說已經太難了，所以媽媽沒辦法教你了……你想做什麼媽媽都會盡量滿足你，但這個家沒辦法多給你什麼，你要記住……從今天開始你只能靠你自己。」

隨著年紀漸增，偶爾回想起母親那句「只能靠自己」，慢慢讓我明白「勞動」的概念一點都不簡單。生在這個常常要什麼沒什麼，資源匱乏的家庭，讓我明白其所依賴、寄託的勞動者，似乎不只有母親。我記得，國小二年級的我第一次問母親為什麼都不能和別人家一樣多帶我出去遊玩時，母親摸了摸我的頭後對我說：「對不起，媽媽很忙，下一次吧。」國小六年級時，結果相同，但母親的回答開始有了一些不一樣：「媽媽很忙，你自己去玩吧……但出去之前，你可以先幫忙媽媽數一下那堆衣服有幾件嗎？」等我升上國中、五專及有了機車駕照後，母親自此變得只會回答我：「不要每天想著玩，出去玩誰賺錢養你……還有書念完了嗎？不念書的話去把那些衣服燙一燙，然後等下把這兩袋衣服載去給人。」當大量勞動是維持家庭運作的核心時，即便你只是個孩子，一個滿腦子只有玩的孩子，一個時常被大人稱呼為「小哪吒」的孩子[23]，你依然必須適時的參與和協助。

勞動，其實就是一種讓中下階層家庭得以順利、穩定持續運作的生活邏輯，更是一種 DNA 的遺傳，無聲無息影響著家庭裡大大小小的每一件事；從小到大，母親對我說教、訓話、溝通，甚至連對我講述兩性關係，通通都是在裁縫車前，只因忙碌的勞動生活極度壓縮了親子對話的可能，剝奪了許多培育親情的時間和機會，迫使人們必須轉化為另一種互動型式；於此同時，我就站在母親的裁縫車旁，一次又一次看著母親接單、應對、標會……然後又一知半解的聽著母親對我講述不同老闆的性格、那些老闆可能會積欠或苛刻工資、各店家的經營狀況的好壞、標會要怎麼標、小心那種人可能會倒會，或者是代工同業間競爭／合作者等話題，努力認識大人們複雜的世界是如何運行；母親如數家珍的將她如何在市場上競爭、生存及維持家庭的經驗，藉由耳濡目染的方式，在無形之中一點一滴的傳授予如影隨形的我；我，就是這麼站在母親身旁，靠著身體的記憶和本能刻印

[23] 小時候因為不聽話，或是因為收驚遇到的多位廟公、乩童都曾不約而同的卜卦出「我是個像三太子哪吒一樣愛到處玩耍、個性衝動又靜不下來的孩子」的類似結果。母親也為了這件事情，從此初一、十五都會去關帝廟祈福拜拜，迄今不曾間斷（因為母親的友人說，關聖帝君比較有威嚴，可以壓制三太子愛玩的性格，也會保佑我比較會讀書）。

著勞動生活的模樣，參透了家庭的無奈，理解了資本主義最基本卻也是最重要，弱肉強食的市場競爭邏輯：人只能靠自己，必須盡其所能想辦法贏過別人，站穩腳步，不然你有天可能會沒飯吃。

我總是自嘲，如果說遲鈍、單純、憨厚是這個不斷遊走四海的父系宗族，從不需要明說的生活大忌且必然要盡力驅除的人格特質，那麼這個唯一存在台灣的宗族分支，以裁縫代工為生的原生家庭，不由分說的就是學會世故和投機。世故和投機讓人懂得跟客人應對進退，懂得掌握老闆和客群的人格特質，懂得觀察、區隔成衣市場的流行和特性，懂得提升自家在代工市場的口碑和競爭力，懂得獲取足夠工作和提高代工薪酬；家庭的經濟和勞動型態，某種程度早早決定我必須是一個懂得評估利用周遭他者所能給予的最大利益、懂得算計自身可承受的利害得失、懂得看清時勢風向和趨樂避苦的小大人；我知道，這對某些中上階層的家庭來說，以上無疑盡是一些難登大雅之堂的人格特質，或是學術研究領域通常會以「異化」、「過於早熟」、「過度社會化」來形容的現象。但我卻也必須說，世故和投機對於勞動家庭孩子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對許多處在家庭需要付出高度勞動力的現實生活環境裡，無法擁有過多經濟、文化資本保護的孩子而言，世故和投機是緩衝現實生活的壓力，或是令日常生活稍微過得比較輕鬆愉悅一些的重要因子；或者，若更直接一點的說，當大多數的孩子一路靠著教育逐步成長前，勞動家庭裡早熟的孩子，不願意放棄希望的孩子，想要過得更好的孩子，早早循著身體的勞動印記，長成了某種樣子，處心積慮、費盡心思盼望自己能夠安穩的活下來，渴望著自己將來能夠活的比誰都還要精彩、比誰都還要出類拔萃。

伍、全球化的輓歌：消失工作與崩塌的家庭圖像

家庭內諸多莫名其妙又索然無味的爭執事件雖然有點惱人，但時間久了，相同的畫面看多了，麻木了，時間滴答，滴答，滴答的快步走，我長大了，習慣了，適應了，遺忘了，某些帶來痛苦的理由好像也可以不在重要了。只是，冷酷的命運之神好像沒有打算放過這一家：我的家面臨了難以迴避的生存危機—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台灣原有的經濟型態、產業結構、生產制度及生產關係開始大幅度的改弦易轍，位處勞動市場邊際（無技術、半技術）的勞動人口逐漸面臨結構性失業的衝擊（王振寰，2003；李易駿，2002，2003；李誠等，2003；林宗弘等，

2011；瞿宛文，2003；Ku，1997）一劇變得世局宛若狂風暴雨，徹底把我們一家人擁有的一切通通打亂：母親依附的成衣裁縫外包制度日漸凋零崩潰，全家賴以維生的代工機會逐漸消失。就如 Castells 曾說：

「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成功最後終將導致它自己的消亡，及彌賽亞般夢想的破滅。由它們在血汗中所扶育出來的社會的確已經成為工業化的現代國家」（引自王振寰，2003）。

嫌棄工作總是做不完的好日子，終於還是過完了。現在回想起來，家庭內部產生劇變前的徵兆，完全始自於母親無意間的一句話。2003 年，甫退伍不久的我陪母親將修改完成的成衣送至店家時，母親隨手拿起幾件新進的服飾，摸幾下後，順口問了店老闆一句：「這不是台灣做的，對吧？」在成衣商圈打滾多年的母親對於布料的品質和流行款式變化的觀察是敏銳的，但當時的我們卻渾然不知，更絲毫無感於我們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正無聲無息的劇烈變動，忙碌的日子已一點一點的離我們遠去。台灣整體產業結構變遷和外移造成「**想工作卻沒有工作可以做**」的狂風暴雨即將鋪天蓋地的襲捲而來（Ku，1997）。

布料材質的變化，亦即呼應著台灣大多數的成衣加工廠正陸續外移至工資低廉的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國家，且成衣的進貨源已逐漸改由中國或東南亞進口，不再是由台灣本地製作供給的全球化效應。於此同時，商圈也開始全面轉型為純販售、純批發的精品店面，過去自產自銷的產銷型態和外包制度的生產鏈開始全面崩解，兼以 2002 年後台灣經濟景氣低迷造成消費人口持續衰退，陸續造成商圈多次爆發店家經營不善的倒閉潮。在以上諸多因素交互衝擊、影響下，終使母親的工作量有一搭沒一搭的直線下滑，近年僅剩下一些批發熟客帶來極少量的成衣修改，或要等到換季時節才可能有較多店家的工作委託[24]，再加上母親身體的病痛與視力的老化，縫紉車運轉的次數和時程也漸漸越來越少，越來越短。

禍不單行的是，當母親工作收入每況愈下之際，父親的賭債問題卻接連如雪球般越滾越大，可是此時的母親，已經無法，也日漸無力填補父親持續不斷桶出

[24] 季節性的工作通常是長袖改成短袖（通常是冬轉春，或春轉夏），是一種店家出 清存貨變換現金的方式。

的財務大洞和經濟危機，且父親的酒癮在此時更是變本加厲，諸如警局半夜打來的路倒通知，酒駕被抓，時常讓全家雞飛狗跳，而母親在深夜接到警察局的電話時，單獨一個人坐在客廳沙發上抽泣的模樣，更是深烙我心頭。為此，我曾試著想和父親對話，可是父親卻只冷冷的對我說了一句：「你不會懂。」聽到他這麼回應，我也馬上很生氣的對他說：「我當然懂，我從小就要被親戚，被母親說我如果不努力，就會跟你一樣沒用！……沒用、沒用、沒用、沒用！每做錯一件事情，就要被人家講一次我會跟你一樣沒用，你知道我多痛苦嗎！？」父親傻了一會，瞥了我一眼，什麼都沒說，就默默騎著摩托車走掉了，留下怒不可抑的我在門口怒吼：「混蛋！你為什麼每次都要逃走！？你這沒有用的男人！」

在那當下，遠望父親落寞、逃離的身影，想起母親焦急、無奈、啜泣的模樣，再回頭探見家門內兩位高齡九十幾歲卻又爭執不休的祖父母，站在分崩離析的家門前，我有股想逃的念頭，但我該逃去那？又能逃到什麼時候？我想面對，但誰能告訴我該如何面對？我想改變這一切，但我究竟該如何改變？我猛烈的感受到這個家已快禁不住外界驚濤駭浪的拍打侵蝕，更逐漸露出崩塌毀壞的跡象。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油然而生的擔憂、恐懼，忍不住讓人頭皮發麻，不寒而慄。

第二節　我，是逆轉人生牌局的黑桃大老二？

沉淪，或許你接下來會反覆看到我持續刻意操弄類似的字眼來形容家庭成員的精神狀態。可是，這並不是我真正追尋的字眼。矛盾，才是真正令我傾心的形容。是的，惟有矛盾這個字眼，才能如實呈現我原生家庭在台灣產業結構變遷解組的過程中，在高度勞動又經濟困窘的擠壓、拉扯下，彼此不斷衝突、徘徊在夢想和絕望之間的掙扎模樣。

壹、必須成為男子漢的原罪：我，有一個失敗的父親？

我的記憶裡一直有那麼一幕。小時候，受日本教育且威嚴的外祖父總會驅走旁人，一手抱起因吵著要買玩具而挨罰大哭的我，然後一邊撫摸著我的頭，一邊溫柔哄我：「我的孫啊，你要聽話，你要當個乖孩子，你要諒解身邊的大人，你有天一定會長成一個堅強幹練的男子漢，守護你苦命的阿母不受傷害，啊公相信

你有天一定能讓你的家人過好日子，你一定可以…來…不哭、不哭、不哭…我們打勾勾…。」或者，若對比其他的表兄弟姊妹，我經常不自覺的意識到阿姨、舅舅們[25]會特別對我強調：「你要聽話，不要讓你媽操心……你家只有你一個小孩，你媽以後只能靠你了……你要認真念書，以後當個有用的人。 」到我年紀大一點後，我開始能夠理解身旁的大人不斷提醒我的原因，其實有很大一部份肇因於大家都認為母親嫁的不好……因為大家都說我的父親，沒有出息，沒有三小路用。

一、生命陰影的返照鏡：我，可不可以沒有這個父親？

父親，是什麼？

母親曾說：「這個家就算少了你爸，依然能夠持續運作，依然不會出現任何問題，沒有人會發現少了一個人」誠如母親所言，父親在家中就是這麼一個可有可無、無關痛癢的角色。記憶裡，我很少對別人提起我的父親，一方面是我不想編織謊言（即使我很擅長），另一方面是我很不喜歡我說實話後，別人忽然對我皺起眉頭或露出不可思議和深感同情的表情。父親在我的記憶裡，幾乎盡是些不及格的和缺席的畫面，每當他人聊起自己的父親如何又如何時，我的腦海通常會直接浮現父親喝醉路倒、賭博欠債、對家庭的勞動和經濟狀況毫無貢獻，或他人咒罵、譏諷我將來會像他一樣沒用，或是他跟母親爭執的畫面。久而久之，為避免在他人面前情緒失控，我通常習慣會以沉默、嘻笑或謊言等顧左右而言他的方式扯開話題，或者就乾脆直接迴避會令自己尷尬的場面。少數幾位親近的友人或深交的同窗都很清楚這是他們絕對不能主動碰觸的底線，除非是我沒由來的自己說出口，否則這極端不適合作為和我聊天的話題和素材。

在我和父親數不清的紛爭裡，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和最要好的五專死黨看完午夜場（散場約莫是凌晨兩點）的電影準備回家時，剛好接到一通母親痛哭

[25] 母親的娘家總共有五女一男，母親排行老二，舅舅則是老么。就母親的口述，母親小時候家裡非常非常的窮，再加上大姨很小就去大戶人家幫傭，所以母親當時除了要幫外祖父打理流動的香腸攤，勤練打彈珠和擲骰子和客人對賭香腸來熱絡生意之外，家庭生活裡大大小小的事情，基本上也都是由母親跟著外祖母張羅、決定及發落。而這種時時刻刻要顧全大局，細心看住每一個人， 堅持要把一家老小都照顧好的信念（習慣），是母親至今都還非常顯性／改不掉的人格特質。

失聲的電話。警察五分鐘前打電話給母親，告知父親因酒醉路倒而被送往高醫的急診室，希望家屬能過去一趟。然而，原本有些焦急擔心的心情，隨即就在我站在急診室的門口，遠遠聽見角落病床上的打呼聲時，心頭的無名怒火馬上不由分說的崩裂炸開，但當理智斷線的我準備一個箭步向前去翻了病床的瞬間，死黨卻看穿了我的心思，他拉住了我，並搖頭對我說：「不要再傷害你自己了……不管怎樣，他都是你爸。」

「不，他不是我爸，他不是！！！！」那天，我瘋狂的大叫，哭到癱軟在高醫急診室的門口，只因我真的想不通為什麼我的父親會是這個樣子？每次別人問我，我總是不知道該怎麼形容我的父親，我為什麼會這麼倒楣？我為什麼要這麼辛苦？我為什麼不能跟其他人一樣過著安穩自在，悠閒有品質的生活？我為什麼不能好好安心念書？為什麼身邊的每一個人都要把責任和期望全部壓在我身上？我仔細想來想去，最後能歸咎的對象和理由似乎也只剩下終日無所事事的父親。對，我的痛苦、我的不幸都是父親造成的，是他不夠努力，是他拖累全家，我一點都不想要有一個毫無功能又拖累全家的父親；從那一天起，迴避、疏遠和絕口不提就一直是我面對父親的方式，因為不去認真去想，就不會煩……遠遠逃開不去碰，就不會痛。

帶著某種不知名的痛，在成長的歲月中，我不著痕跡的將有關於父親的一切，從我的記憶、生活、言談、舉手投足間，一點一滴的徹底抹消，就像我沒有父親一樣；我努力讓自己的經歷、形像、舉手投足跟父親完全不一樣，我不菸、不酒、不賭[26]，我甚至還曾在我五專四年級時法律類的通識課中細心鑽研過如何拋棄繼承，藉此清楚的知曉以後該如何迴避父親層出不窮又令人害怕的賭債；而這種不斷逃避的心態又一直要到某一次，我跟某位大學學姐餐敘時，學姐不經意的刺探我說：「你有沒有發現你平常都只會講你媽，但我認識你這麼久，我從來沒有聽過你說你爸……你爸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啊？」[27]我才第一次猛然意識到原來父親

[26] 我不賭，但我偶爾還是會在同學的邀約下玩起一張一塊錢的大老二。只是，同學們後來也很少跟我玩，一方面是功課很忙，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我很快就能把他們的牌記起來（我想這大概是拜我從小都自己一個人練習玩四人份的大富翁和撲克牌所賜）。我曾經好幾次贏了將近五百多塊，有人還因為輸到快翻臉，大喊我實在太邪門。我為此也只能用非常誇張的表情，搞笑的模仿電影情節安慰他說：「因為我是賭徒的兒子，賭神。」

[27] 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我的另一個影響是讓我意識到我必須修正自己的言談舉止，避免再次引起他人的懷疑（這或許也是我第一次覺得社工系的人很可怕）。於是，我開始會偶爾說說父親事

對我而言，就像空氣一樣，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一直知道他在，但我從來不願、不敢看見他。

二、回首嘶吼「凍蒜」的社會現場：你覺得「阿扁」錯了嗎？

我對於父親的印象很糟，真的很糟，糟到我不知道該如何形容，甚至習慣絕口不提。但在論文口試的會場，王行和成虹飛老師卻異口同聲的當眾問我：「**你的父親真的毫無優點嗎？你真的有認真回想過嗎？**」師長們突兀、尖銳的提問逆轉了我長期以來慣行的認識和思考，讓我訝異、遲疑、思考了好幾個月；我忘了我花了多久的時間，半夜尖叫過多少回，暗罵過指導和口委「該死」幾次，我有天終於忍著痛，試著劃開自己對於父親的怨懟和仇恨。我緩緩的走向悠遠的記憶深處，我回想起父親在不喝酒、不賭博及有工作機會的穩定狀態下，我好像偶爾也會相信父親的內心深處應該是很想扮演稱職的好男人的；例如他和母親雖時常爭執，但母親生病時，他總是比誰都還要緊張；在外祖父母臨終的病榻前，深夜和清晨時替代舅媽和母親的照顧者，一直都是父親[28]；即使祖父母平日對他百般刁難和咒罵他難堪的字句，但遇到兩老身體微恙，縱使他心頭有很多的怨氣，他最後還是會一如往昔的帶兩老去掛號看診；或者，自認絲毫不像父親，不斷努力讓自己完全不像父親的我，在 2012 年總統大選被研究所同學挖苦、吐槽是極重度的深綠選民和時常腦充血的台獨份子時[29]，猛然想起我和父親之間，其實仍有一個我直言不諱且公開承認過的相同之處：我和父親有一模一樣的政黨傾向。是的，我和父親都是民主進步黨的狂信者[30]，民主進步黨，是我和父親之間的「最小」公約數。而我之所會這麼「綠」，其實一切都跟父親有關。

情……恩，不過大概都是修飾後的居多。

[28] 這件事情是舅舅最感激父親的地方，所以舅舅有時候會私下塞錢給沒有工作的父親還賭債。

[29] 研究所同學吐槽我的理由是因為我一向非常堅持自己是淺綠的理性、中間選民，只因我其實也會臭罵民進黨啊，也會認為阿扁貪污就是要接受懲罰（「阿扁錯了嗎？」可是我們班熱門的討論議題喔），也會把政黨票投給綠黨啊，我最多只是絕對不會投給國民黨而已，但他們完全不接受我這種說法。後來，我只能悻悻然的接受自己是深綠選民這件事情，不過有偶爾機會我還是說大聲疾呼讓我是淺綠的理性選民，想想還真好笑。

[30] 認真說起來，祖父也算是狂信者（祖父還非常討厭李登輝）。不過，祖父支持民進黨的原因是因為他被國民黨迫害過，而這跟他跟祖母年輕時一起親身經歷過二二八事變和白色恐怖的生命背景有直接的關係。基本上，我們家大概就是政治分類裡的那一種支持獨立建國，然後十分厭惡國民黨，絕對不會把票投給國民黨，更是把國民黨視為萬惡之源的本省籍綠營家庭。如我當初念政大時，就還曾特別被父親告誡別被國民黨的老師洗腦（家中長輩對於政大是黨校的印象非常根深蒂固），加入國民黨就不用回家了。

1. 我老爸的偶像是陳水扁！

我的父親，是一個非常熱衷民進黨選舉和街頭運動的人，只要到了選舉時節，相關的造勢遊行、宣傳演講或者是協助選務監票的種種活動[31]，父親幾乎是無役不到，不論刮風下雨，他一定會想盡辦法到現場參加；我第一次被父親帶上街頭遊行是 1994 年的高雄市長選舉，對一個只有十二歲的孩子而言，那其實是很奇妙的體驗；在悶熱推擠的造勢現場，小小的我不斷看到、聽見、感受到一群大人齊心隨著陳菊渾厚低沉的嗓音，不斷揮舞著手邊的旗幟，不斷齊聲高喊著震耳欲聾的「凍蒜」！更重要的是，那天是父親和母親第一次同時牽著我的手，也是我第一次看見父親和母親一起開心的笑，而且我永遠記得父親眼神閃爍的某種光輝對我說：「民進黨這次贏的話，高雄就會改變，我們家以後可以過更好的生活。」可惜，父親的願望並沒有即刻實現，那年高雄市的選舉，民進黨輸了，但台北市的選舉，民進黨贏了，民進黨的政治明星陳水扁（以下簡稱阿扁）當選了台北市長；年紀還小的我不知道陳水扁是何許人物，但從那時候起，父親看電視時，就常會把「你們看……陳水扁改變了台北，台北變得更好了，但高雄依然停滯不前」的遺憾怨嘆掛在嘴邊，於是「陳水扁」這三個字，從此深烙在我的成長記憶之中；不過，或許是命運之神的戲弄，四年後（1998 年）的北高兩市的市長選舉的結果顛倒過來，謝長廷替民進黨贏得高雄市，而執政滿意度創下歷史新高的陳水扁卻是留下了一句：「對進步的團隊無情，是偉大城市的象徵」後，於市長選舉慘敗給國民黨的馬英九。

但在陳水扁落選的那一天，神情有些落寞的父親卻又異常堅定的脫口說出：「沒關係，阿扁兩年後可以選總統」。是的，阿扁還可以選總統，而且兩年後的阿扁真的出來選總統，最後還真的讓他選上了；天啊，三級貧戶出身的阿扁，竟然能夠一路考上台大，考取律師，當選市議員、立委、台北市長，更是擊潰了長期執政五十年又萬惡貪腐的國民黨，選上了台灣的總統，這是多麼感人、勵志的精彩故事；更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總統就職日幾天後，父親不知道從那拿到了阿扁總統的玉照，從那天起，阿扁幾乎是和祖宗、神明的牌位並列，高掛在我家

[31] 父親總是說國民黨會做票，所以他都會自發性的主動去投開票所幫忙監督開票；像謝長廷與吳敦義當初競選高雄市長時，由於最後雙方票數只差一點點，當街坊鄰居一發出國民黨要搞小動作的消息後，本來在家看電視開票的父親，馬上就跟著一大群人衝到最後幾個投開票所幫忙顧票。

客廳牆上。

不過，勝選的喜悅終究只有一天，平日的生活還是要過。當我年紀長了，接觸的人和看的事情多了，我慢慢發覺不論是謝長廷當選市長，還是阿扁當選總統，我依然沒有感受到我的家和國民黨執政時期有什麼太大的改變，反而只是遭遇越來越多的衝突；我開始有種被騙的感覺，為此，有次我過年回家和父親搶電視機遙控器時，就曾質問過不斷想轉台到政論節目的父親說：「你看阿扁說的福利政策全部都跳票，你被騙了拉，阿扁早就背叛我們了，就你這種沒腦袋的傻子才會相信他。」[32]接著，搶輸遙控器的我乾脆一不作二不休的企圖要想把阿扁的照片從牆上拿下來時，父親一邊氣的大罵我念書念到被國民黨洗腦，一邊則是試圖提出是國民黨佔據了立法院的多數席次導致阿扁不能有所發揮的證據，所以我不能把全部的責任和錯誤都怪阿扁的長篇大論；更誇張的是，在阿扁貪污被收押之後，我甚至還看見父親床邊有一本阿扁入獄後寫的《台灣的十字架》（父親除了政黨傾向偏綠的自由時報之外，平時幾乎是從來不看書和其他報章雜誌的），他始終堅信阿扁是被國民黨陷害的。對此，我好像只能無奈的說，他對阿扁忠貞不二的程度，真的是至死不渝。

2. 阿扁／父親錯了嗎？

隨著對於社會結構問題的認識，眼睜睜看著越來越難以逆轉的家庭經濟狀況，不論是民進黨也好，國民黨也罷，我逐漸對於只會逢場作戲的政治人物沒有太多的好感，但父親對於阿扁至死不渝的信任和忠貞，卻也意外成了讓我能夠重新看見父親的轉機；我記得，阿扁入獄時，好多同學、朋友都曾問過我：「你覺得阿扁錯了嗎？」出乎他們意料的是我的答案一直都很肯定，我覺得阿扁錯了，而且錯的離譜。我以為貪污當然是不對的，建國基金什麼的都只是鬼話，我無法厚臉皮的說出「反觀」國民黨也都一堆人貪污之類的詭辯之詞，錯的事情就是錯的，不對就是不對。但真正更令我憤怒的，其實是阿扁讓長期失業又無力持家的父親徹底失去了希望，一點一點的失去了自我救贖的機會；對於找不到工作、無力面對家庭向下沉淪的父親而言，「阿扁」不只是一個人或一位總統，而是一種改變

[32] 關於阿扁福利政策跳票（如三三三和五五五的社福政策）的記錄，詳可見 Lin & Chou（2007）。

得寄託、一種精神的符號，一種翻轉自我存在的信仰，而要這樣子的父親去否定「阿扁」，去控訴「阿扁」犯下的錯誤，實在太過沉重。畢竟，這幾乎就等於是要父親全盤否定自己，更是要父親承認了自己作為一家之主卻對於家庭和世局的無能為力。對我來說，像父親這一類失落在全球化時代下的失業者，或許才是「阿扁」真正應該要背負的沉重十字架吧？

隨著時間來到 2012 年的總統大選開票結束的那一晚，當深夜的電視新聞反覆播放著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一字一句娓娓道著敗選宣言：「今晚，我相信大家都很難過。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洩氣。你可以悲傷，但是不要放棄。我們要像過去四年一樣勇敢並充滿著希望」時，我腦子浮現的不是台灣的未來，不是同情政客敗選的哀嘆，而是父親今晚大概又免不了是會喝到酩酊大醉才會回家，然後醉茫茫開始不斷抱怨台灣沒救了，接著大概是一陣嘔吐，最後再和母親大吵一架；我很無奈，但我卻慢慢開始能夠理解和看懂父親在時代洪流侵蝕下流離失散的夢想，因為父親之所以堅信「阿扁」沒有錯，死忠支持民進黨，其實就是父親自認虧欠家庭的生命轉化。

我不由自主的回想起那一年，隨著陳菊一同忘情吶喊「凍蒜」的父親……告訴我「民進黨贏了，我們家就能夠過的更好」的父親。

我知道，在那當下我已經稍微能夠同理和轉化父親的「不負責任」。然而，撕裂生命的矛盾卻還是沒有解除，家庭的經濟問題依然存在。即使我真的能夠開始試著原諒父親……但父親無法協助承擔這個家依舊是事實，就像我曾無助的問過老王：「就算我能夠原諒父親，但誰能原諒拼了命想要彌補錯誤的一切又愛害怕失敗的我呢？」存在於我身上的痛苦並沒有即刻消失，原諒父親終究還是不足以讓我知曉接下來該如何去處理讓這個家持續向下沉淪的詛咒。

貳、充斥虛偽和謊言的人生：見光即死的家庭秘密？

如同不對外人提起父親的生命咒印，我同時也很少對他人聊起家庭的狀況。就算偶然提起，我大多只會提起一些無關緊要，或者是很快丟出一些能夠說說笑笑的趣事。其中，最能代表、呈現此種表裡不一衝突的象徵物，大概就是我的自

傳。一直以來，我的自傳中對於家庭的陳述，約略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都是虛構的，我寫的從來都不是我「真實」的家，而是我「理想」和「想像」的那個不存在的家（但這後來卻也莫名衍生成一種特殊技巧，我變得很知道該如何幫有相同困擾的人寫出不違背自己良心太多又幾可亂真的「假」自傳）。

一、不能說的秘密：來自他者灼人的凝視

無論是日常生活的言說，或是假自傳的書寫，我之所以會這麼難以對外人提起原生家庭的種種，其實跟母親有很大的關係；母親從我懂事以來，就不斷對我耳提面命即使是親戚（如母親的娘家）和學校老師，都不可以隨便向其提起家人的衝突狀況（特別是關於父親的一切），因為這很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我知道母親不是愛面子，很多時候她只是不希望娘家的親人擔心，或是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我並不是沒有懷疑過母親的提醒。但當我有次走在回家的路上，聽見迎面走來一對逛街的母女哀嘆的說著：「女兒啊，你看剛那個駝背的阿婆好可憐喔，那麼老了還要拖著推車四處撿紙箱，他們家的孩子一定都不成材，也一定都很不孝。」我原先並沒有很在意，不過我往前走幾步路之後，確認映入眼簾的是我熟悉身影時，我馬上意識到她們所指的那位可憐的阿婆[33]……原來是我的祖母。身體的冷顫無情的告訴我，原來我們家在人們眼中是可憐又不孝的家庭……原來這就是母親當初要我不能對別人說太多的理由？

等我念五專時（十八歲左右），母親有天又忽然把我叫去裁縫車前，講了一句迄今影響我最深的話：「不要隨便帶你喜歡的女孩子回家……不然人家看到我們這個破破爛爛的家，人家可能會怕，然後很可能就不要你了。」我這時也才又明白，原來我住了十幾年的家在他人眼中可能算是破破爛爛的？原來我的家庭狀況可能會讓人們感到害怕？原來我家可能會讓我變成是愛情市場上的不良瑕疵品？原來……我的生命是這麼的見不得光？久而久之，這股疑惑和恐懼，從那時候起就這麼變成我藏在心底的一種怕，一種傷，一種害怕、憂慮被別人知道家庭狀況的傷。

[33] 祖母和祖父的感情不太好，而祖母為了證明自己能夠養活自己，一直都是靠著撿拾商圈店家進貨後的紙箱來賺取自己的生活費，她從不主動向子女伸手拿錢。

二、撲朔迷離的壞習慣：你／妳能接納真實的我嗎？

因著母親的提醒和擔心他者灼人的凝視，我一直把有關於父親和家庭的一切藏匿的很好。只因，判斷什麼時候說真話還是說假話？誰能信任又誰不能信任？就算要說真話，真話能說到什麼樣的程度？說真話會對於生活造成何種影響？許許多多的顧慮，全部都是一連串非常惱人且又時常必須小心注意的生活課題。

記憶裡，深知我的猶疑，向來和我私交甚篤的學姐為此就曾多次語重心長的對我說：「你有個讓人難以捉摸的壞習慣……你時常會不經意的測試別人……你看似人畜無害和隨性邋塌的模樣其實只是假象，你骨子裡根本是一個完全沒有辦法跟人們建立起良好信任／親密關係又害怕受傷害的孤僻鬼……多信任別人和相信自己一些，好嗎？」其實，學姊是極少數能注意到走進我生活圈的朋友，大多是經過我層層「測試」的受試者。通常來說，我最常做的測試是趁著人們聊起家庭狀況時，偶然不經意丟出我的父親是賭徒或酒鬼的一段話，而人們第一時間的身體反應和口語眼神，往往是我決定這個人之後能不能朋友的關鍵（認真說起來，我的兩任指導教授也都被我測試過）；我必須說，我不是故意的，但我無法否認這真的是我用來判斷人們能不能進一步成為朋友的自我防衛機制：我會主動排除聽不懂或常不自覺侵入我家庭經驗的人成為我的朋友（如習慣主動分享父母職業和良好家庭經驗的人）。所以，如果沒有通過這項測試，就無端自行深入探問我的家庭狀況……大概都不會得到太好的結果，如果還不死心的持續追問（不得不說，這似乎是部份社工人經常發作於日常生活的職業病），接下來絕對會被我以非常難堪的言語羞辱；也因為這樣，我通常會刻意迴避家庭經驗十分正向的友人長時間相處，只因我十分害怕他們興高采烈的對我分享家庭經驗時冷不防的回過頭要我也跟著分享。我很清楚，我沒辦法跟這種人當好朋友，因為我不只一次發現我們彼此對於生活認知的差異太大，而造成差異的理由，人們似乎習慣將其命名為……「階級」。

是的，它的名字叫「階級」。我曾經以為「階級」沒有那麼重要，而我也不是沒想過多信任別人一點，多相信自己一些。然而，當我不斷試著不要太在乎他者的眼光，慢慢想要讓自己活的更真實、更自在一些時，不斷逼使我必須回過頭去面對、承受殘酷生活現實的他者……是我在政大的女友；她，讓我深刻的體認

到家庭經驗和階級位置所造成的人我差異難以被無視和抹消；我記得我第一次毫無保留的對女友講述完父親和家庭的生活、經濟狀況後，我隨即就後悔了，我落寞的望見她眼神閃過諸多猶豫和驚恐，從那時候起，我覺察到我們倆是不同世界／階級的人，我們很難有好的結果；只是，我並不想輕易放棄這段感情，我以為這能夠隨著時間而有所改變，我認真努力的期盼我們能夠有一個好的未來，但事實證明我是錯的，我在女友身上，一點一點的認清了我生命的真實；特別是當我某次試探性的問她：「**如果我無法完成政大的碩士學位，就只是朝陽科大社工系畢業的大學生，我們還能夠在一起嗎？**」那晚，她很肯定的對我搖了頭，然後沉默不語。

女友的誠實讓我想起了母親當初的提醒，憶起了我那絲毫見不得光的生命本相。在那一刻，我的心很痛，我感覺到真實的自我更加往陰暗處瑟縮，我體認到家庭的生活經驗和階級位置終究是一道難以跨越的高牆……我努力的想要找可以原諒彼此無法更靠近，無法繼續在一起的理由……但我卻始終找不到可以停止懷疑自己和原諒自己的答案：我，真的還能對親密的他者展現出真實的自我嗎？

參、母親失望的眼淚：我，必須是逆轉人生牌局的黑桃大老二？

不論是日常生活，或是感情世界，我的生命宛如背負著一種無法逃離的罪。長大成人，對我而言則很像是件殘忍的考驗，因為這幾乎等同於我的獨子責任越來越沉，也越來越重。特別是當我看見母親耗盡心力好不容易穩住全家得以續存、溫飽的局面，逐漸因全球化的效應讓成衣裁縫外包體制瞬間全盤變了調；緊接著，2008 年的金融風暴也終於讓父親棲身的小額信貸公司逐漸無利可圖而收了攤；就這樣，全家賴以維生的工作機會相繼一溜煙的消失，穩定的收入也沒了，隨之而來的經濟壓力，父母工作機會和條件越來越被限縮擠壓的心慌，以及家中可運用的存款迅速減少，再加上父親不知何來的賭債總是無預警的如冬雪山崩般的越滾越大，接二連三又急又快的變故，終於使得無力回天的母親心力交瘁，也讓積累多年的失落、不滿及怨懟終於忍不住一次通通爆開。

在家庭經濟狀態最混亂、低迷的日子裡，母親有好一陣子宛若瘋人，非常容易就和家人起衝突，而且只要她和父親或公婆之間稍有不快或爭執，隨即就會把

又急又快的怒氣和情緒傾倒到我身上，常讓我莫名其妙又措手不及。類似的事件直至母親有天莫名歇斯底里的對我斥責：「你為什麼說我很煩！？如果連你都不聽我說，你要我真的瘋掉，要我去死嗎！？……**你跟你爸一樣啦，講幾句都不行！**」聽到母親又拿我跟父親比較，忍受許久的我終於也一時忍不住直衝腦門的怒氣，失控拿起手邊的雜物奮力丟向母親，轟隆一聲巨響，將沙發砸破一個大洞，毫不留情的痛斥母親：「你們每一個人都不希望自己發瘋，都希望自己好過，那我呢？那我呢？那我呢！？你們有人問過我嗎？我也不想發瘋啊，可是我能把氣出在誰身上！？對啦，我像那個沒用的老爸，我跟他一樣沒三小路用啦，這樣妳高興了嗎？」我反常的舉動，將母親嚇傻了，接著就坐在沙發上痛哭失聲，不斷重覆訴說著：「我……我該怎麼辦……連你都變成這樣子……**你爸這樣…你也這樣，你怎麼變得和你爸一樣**……我的命怎麼這麼苦…我的命怎麼這麼苦…我該怎麼辦？」

「我像父親一樣？」聽到這句話，我忽然全身發抖，接著再看見母親哀戚吶喊的痛苦絕叫，原先氣急攻心的我瞬間如洩了氣的皮球般癱軟在地上，跟著母親一起啜泣，我知道我錯了，我傷了母親的心，只因我比誰都還清楚母親的犧牲、辛酸及煎熬。我心疼母親，我知道她確實需要一個能夠讓她排解情緒的垃圾桶。只是，面對越來越頻繁的母子衝突，我的心情是和她一樣是矛盾的，是痛苦的，是糾結的。我很清楚母親對我的期待，她把她擁有的一切，還有她的未來，甚至是這個家的一切全盤託付給我，把翻身的希望全部賭在我身上。但面對日趨混亂的家庭狀況，我其實也和母親一樣茫然若失，飄散於家庭間的失落和無奈的情緒不斷相互交錯蔓延，而我們倆的情緒都處於瀕臨崩潰的邊緣，只能一同被鎖在名為「沉淪」的家庭苦牢裡。

作為這個家的一份子，我時常很無奈，也很無辜，更有股說不出口的憤怒：我不是父親，但為什麼每一個人都要把父親的責任往我身上推？當相似、重複的事件不斷發生，我一度想聽從身旁友人的建議，試著逃離這個令我痛苦不堪的家，狠下心來放任它攤塌崩壞，單純的只是為了自己活著。但每當我看到長期失業缺位又暗自嘆息的父親，無法力往狂瀾又痛哭失聲的母親，身體狀態越來越差的祖父母，心頭卻也不由得馬上意識到自己是這家人在人生牌局上僅存的翻身籌碼，是這家人緊握在手中準備孤注一擲時的黑桃大老二：我的成就與否，幾乎是直接

連繫著這家人未來的生死存亡。如果，連我都完全棄他們於不顧，他們以後該怎麼辦？可是……我，真的能逆轉這一切？我，真的能改變這個家？我，最後會不會變成和父親一樣沒三小路用的失敗者？我，身上為什麼總有一股好沉、好重的責任。我，真的好擔心，真的好怕。我，到底該怎麼辦？

第三節　我，可不可以是玩世不恭的梅花三呢？

相較於傳統多子女的勞動家庭，獨生子的身份確實直接免去了我和其他兄弟姊妹競爭家庭資源的衝突，更令我能理所當然的集萬千寵愛於一身，想要什麼就有什麼。只是，看似眾多優待與特權背後，有很大一部分其實是母親在經濟匱乏的情境中算盡機關，不斷壓抑自己，大量付出自身的勞動力和兼職賺取微薄的薪水，甚至是以弟妹的出生所換取而來的優渥假象；除此之外，為了延續、穩住家庭的經濟命脈，在繁忙的勞動生活中，這家人往往沒有太多選擇，每個人都必須認命繃緊在所屬的家庭位置上，犧牲自己過多的生命想望，維持著微妙的恐怖平衡，如大人應該要辛勤工作，健康的老人要自理簡單的家務或自行從事資回收貼補家用，小孩子要適時替補不足的勞動力。而且，只要有人稍不適任、逃離或有過多額外欲求，或是有特殊的狀況，隨即就要有人遞補、犧牲或付出更多，否則家庭即刻就有傾斜、崩塌的疑慮。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上打頭風，全球化的效應所帶來的失業風暴，卻又將原本就已經搖搖欲墜的家更往支離崩解的險境推去。於是，原本飄散在家庭間種種失落、無奈的情緒及沉淪的恐懼逐漸轉化為「靠下一代翻身」的悲願，進而又逐步內化成我生命裡最沉重、矛盾又畏懼的「獨子責任」。而我和我家庭的故事，某種程度或許也正類比、隱喻著台灣許多努力拼搏、亟欲渴望翻身向上卻又抵禦不了全球化浪潮和產業結構變遷下的邊際勞動家庭，擔憂逐漸被勞動市場排除，被社會排除的鮮明縮影。然而，生在如此家庭的我，究竟有沒有另外一種面對自己的可能？

壹、父母望子成龍的苦盼：回不了頭的過河兵卒？

在沒有道標的人生旅途裡，我重覆獨自在夢想、理想及現實裡，一步接著一步旅行、找答案、跌倒、起身、徘徊及打轉兒；但曾幾何時，我發現夢想變得好廉價，理想常遙不可及，現實更是殘酷不堪。我開始不得不開始擺盪在母親、父

親、家庭、朋友、情人、師長及學校之間，不斷與其碰撞、拉扯及妥協，試圖尋求恰如其分的位置；我努力想當一個好兒子，努力想當個好學生，努力想當個好哥們，努力想當個好情人，努力想當一個好社工，努力想寫篇好的論文，努力趕快畢業，努力累積能量，努力籌備、壁畫自己想像的那個未來，努力拖著早已疲倦不堪的身軀與心靈，妄想把一切都背在身上，在失控的現實及越來越遙遠的理想和夢想間，努力扮演好每一個角色，就只是為了實現心裡小小的願望，努力的改變還不夠完美的自己；於是，為了迎合眾人的期待，為了學會堅強，為了學會長大，我理所當然的把全部疑惑、不安、懦弱及恐慌深鎖在心底，暫時不去碰觸、刻意不想處理，努力在是非對錯相互交織而成的現實夾縫中，努力的掙扎，努力不問為什麼，努力不哭，努力讓人不擔心，也努力讓人看見；然而，本以為自己努力往前走，努力往上爬，努力多讀點書，努力多見點世面，或是等我長大，等我更懂事，等我更成熟之後，我深信有天我一定能回頭面對、處理及克服，甚至期盼自己會隨著時間流轉而逐漸淡忘家庭帶給我的恐懼。我總是這麼說服自己，鼓勵自己，安慰自己；可惜天不從人願，生活中接二連三的變卦，壓抑許久的疑惑、不安、懦弱及恐慌，終於還是一股腦的破網而出，全部湧上心頭。

一、一路向北的自強號：有家歸不得的鄉愁

我從未忘記，退伍後離家求學的前一晚，父親先是左右張望，確認四下無人後，眼神盯著激辯中的政論節目，嘴角露出一抹苦澀，緩緩對我道出：「好好念書，別變成跟我一樣沒用的人。」離家前一刻，母親背對我，如往常般平穩的踏著裁縫車，平淡的對我說：「我年紀大了，也快不能工作了……我快不行了，這個家也快不行了，我已經沒有多餘的金錢供你揮霍，如果你還是不知向上……我隨時會叫你回來……去吧…你這次一定要認真念書…。」

二十三歲離家啟程前往霧峰朝陽科大的那一天，沒有親人的送別，沒有停不下來的眼淚，沒有太多的猶豫，亦無太多的感傷，就只有我跟死黨牽著自己的摩托車，各自帶著父母對於自己的期待，忐忑的搭上一路駛向北奔馳和不會中途停止的自強號火車；搭上火車，從小到大的回憶隨著窗外飛逝的光景越跑越快，而越來越遠的距離也使得對於家庭的印象越來越模糊；那天，我走向了未知的生命彼端，代表全家人擲出人生賭局最大的籌碼，就像十幾年前父母隨著家族的腳步，

漂洋過海成為異鄉人的境遇，從此難以回頭的心情。從那一天起，「一路向北的自強號」就這麼變成是沒有成功就不能回家的翻身隱喻。

我要改變。我必須要改變屬於我的一切。我總是這麼對自己呼喊著。

為了實現離家時的承諾，也為了讓自己有天有能力擔起家庭的一切，這些年來，我身體力行著眾多貧窮研究裡「好好念書，好好接受教育」是改變家庭經濟條件的翻身鐵則，煞費苦心的在教育體制中攀爬向上。很久很久以前，我天真的以為來到「政大」後，在晉升「專業菁英／知識份子」的光環加持下，一方面除了是象徵著家庭階級地位的攀升，另一方面則是我往後應該也可以從此一勞永逸的躲在金光閃閃的招牌後頭好好喘一口氣，可以讓自己充滿自信的站在陽光下面對人群，可以不用在擔心別人異樣的眼光，可以證明自己和洗刷他人因父親而加諸於我身的無用汙名。就好像是童年時母親的床邊故事，我告訴自己，我會改變，我一定會改變，我相信只要肯努力，我有天一定會洗刷、逆轉我像父親一樣見不得人又上不了檯面的慘澹命運。

二、尾大不掉又扭曲變形的「獨子責任」：白晝之間的拉扯與斷裂

我想要改變我的命運、父母的命運、家庭的命運，但阻礙在我前頭的生活現實，卻遠遠超乎我的想像和我所能背負、承擔的重量。就像大學時的某一次期末考週，幾乎不會和我連繫的父親忽然打了一通電話給我，簡單的交待他存摺、印鑑的所在位置後，反常的補上一句「**我對不起你和你媽**」就關機失聯；驚覺狀況有些不對，我趕緊打電話母親，但母親當時歇斯底里不斷從電話的另一頭傳來氣瘋似的哭喊，我只好接著打給母舅和舅媽求援，才暫時把事情緩下來－那次，父親瞞著全家，欠了五十萬的卡（賭）債；又或者是祖父和祖母一言不合打了起來，然後祖父摔斷了一條腿，祖母摔斷了一隻手，以致父親又一次放棄好不容易靠著母舅的人際關係應徵上的臨時粗工，回家照顧兩老；亦或是前往政大註冊組報到那天，當我正準備踏進政大校門前，母舅從公司打了一通電話給我，口氣嚴厲的問我：「你還要念多久？你幾歲了？你還不去工作！你媽老了，你知道嗎！？你難道還要讓她自己一個人撐你家撐多久！？」面對難得氣急敗壞的母舅，我當下難過的一度想要放棄，但母親在後續的電話裡，卻又是悠悠的嘆了口氣，接著淡

然的我說：「你想念就念吧，不要管你舅舅說的，他沒有惡意，你不也知道你的學費有時都是他瞞著舅媽偷偷幫你付的嗎……多個兩年而已，我還撐得住，你不要想太多……你不要別人一講什麼就很在意……**唉……你啊，跟你爸一樣軟弱、禁不起挫折…你們郭家的種（血統）都不好。**」[34]

從高雄車站旁的勞動家庭一路攀爬至象徵階級翻身的台北政大，我外在的身分改變了，我就快要得到眾人稱羨的地位了，但我同時也深刻體悟了離家和階級翻身要忍受的終究不只是孤單和寂寞，真正令人苦不堪言和難堪無力的，其實是內在自我必須不斷壓抑自己不受控制的真實情緒，必須想盡辦法抵抗如潮水般不斷湧出的鄉愁。而那很像是一種躲不了又逃不掉的宿命枷鎖，更像是一種永遠無法抗拒的絕望，它永遠死纏著你不放。如鄧明宇（2005：126）就曾對於自己離家求學的經歷有過這麼一段深刻描述：

> 「十五歲的我離開了家，帶著鄉里的榮耀、父母的期待與自我的要求，獨自踏上了到台北求學的路，我不知道如果沒有這個轉折，我的生命將會是如何，是較少不快樂的本質，還是較平凡的生活？是較順遂的道路，還是較真實的存在？不管如何，這個劇變為我的生命帶來的斷層，伴隨著而來的痛苦、衝突與焦慮……我努力想要做個堅強的孩子，一個不讓父母擔心的孩子，可是生活中的不順，卻無時無刻不在牽動著我的痛苦，我一個人掙扎著抵抗這一切，卻發現自己是如此的無助，如此的難以忍受這一切。孤單時，安靜像是會窒息的空氣，讓你幾乎快要崩潰，但在沉默之中，有時卻也竄出各種聲音，各種細小的聲音會被放大，而你的害怕、恐懼、孤單、憂鬱，也不斷的被放大，為了對抗這些幻聽，於是你必須發展出各種策略，才能抵抗這些負向的情緒。從鄉村到都市，接觸的不再是農人或工人的小孩，身旁同學的階級總是挑動你敏感的神經，它耀眼的宣示你沒有的物質和個人生活，這種匱乏使人必須壓抑自己，我必須不斷壓抑自己的心理需求，把心力投注在為一的榮耀上，而與別人保持的一定的距離，期待能在成績上換取一點尊嚴。」

[34] 「郭家的壞種」大概是從我懂事以來，母親對於我犯錯、遭遇問題時的歸因方式；我有跟母親溝通過數次，但或許是母親對於這個家太多的不平，致使母親仍會不經意在對話時對我說出這句話。

自離家以來，我的理智和情感、思緒及行動一直是完全分離和斷裂的，我一直必須要與一股無以名之的情緒困擾奮戰著；理智告訴我要當個堅強果決的孩子，告訴我一定要認真念書，告訴我不顧一切的往前看，告訴我要試著放下家庭裡的紛紛擾擾，告訴我要諒解長輩們的苦衷和難處，告訴我只要等到自己長出能夠應對家庭困境能力的那一天到來時，這個家也一定將隨之改變；但在現實生活裡，原生家庭裡的誰病了、誰和誰又吵架了、父親酗酒路倒了或又欠債了、母親老了快不能工作了……一切的一切總是家庭經濟的惡化，持續不斷如洪水猛獸般的拼命襲來；就算我用盡全身的力氣努力不去想，身邊還是會有人不經意的透過言談、暗示、提醒，一次又一次挑動著我最敏感的情感神經[35]。

我想家，想回家，但我比誰都還要清楚我不能夠回家，因為我只要一回到家，家中起因不明又經年累月持續不斷的間歇性爭執、衝突、暴動、嘶吼，總是讓人神經繃緊，總是讓人心力交瘁，總是讓人更加混亂，我不知道該如何面對，所以我只能逃，逃的遠遠的，從高雄逃到台中，從台中再逃到台北；我忍著生活裡大大小小的困惑和不順遂，死命的抓住成績帶來的榮耀，努力證明自己比誰都還要優秀，藉此彌補和安撫自己不斷湧現的困頓和不安。於是，忙碌的白天，我努力讓自己是一個眾人稱羨的好學生；但在漫長的黑夜裡，隨著離家越來越遠，隨著從台中的霧峰朝陽到台北的貓空政大，隨著我佇足在人來人往的台北街頭和人文薈萃的政大校園，身體卻越是敏感的感受到周圍的人事時地物和運作模式已與我過去認識、熟悉的一切差距越來越大，師生與人際之間的距離、關係也越來越錯綜複雜，日常生活要注意、考量的問題也越來越難理解、預測及掌握。就這樣，承受著越來越多的內、外衝突，身體的生存本能總會自發性的驅使著我拖著早已疲憊不堪的身軀，再一次的與他人競爭，再一次小心翼翼的藏匿真實、弱小的自我，再一次想盡辦法壓抑自己和其他人不太一樣的焦慮，再一次竭盡所能的維持、達到他者／社會認定的「好」形象；但我也越來越害怕自己有天會無力順利回應身旁他人的標準和期待，越來越擔心什麼都不是、什麼都沒有的自己有天會原型

[35] 我想，最直接的例子大概就是朋友們的婚宴。隨著研究所休業時間的拉長，適婚年齡的同學們開始一個接著一個的走入禮堂。參加婚宴，大家互相招呼時，大多難免不斷提醒我要快畢業，要準備趕快成家，坦白說，這是我在寫論文過程中，一個非常大的壓力來源。特別是有次某位五專故友無意對我說了一句：「你媽很老了，你還在搞什麼，政大碩士出來還不是領三萬……五專畢業出來去當作業員的薪水說不定領的還多，你自己好好想想」後，我從此都是請人代包紅包，不再主動參加朋友們的婚宴。

畢露，然後身旁的人如母親說出類似「郭家壞種」的相對詞句時[36]，蟄伏在體內矛盾的罪惡感總是會瞬間浮現，讓我處於一種失序混亂的精神狀態；最後，隨著白晝之間的平穩一點一點的崩潰，我有天終於發現自己累到「壞掉」[37]了。

我……終於動彈不得。

三、翻越兩代賭徒的血脈限界：論文，可以作為一種生命的轉機？

突來的混亂失控令我措手不及，而我也反常的完全壓抑不了自己不斷浮現的恐慌。縱使我三番兩次努力告訴自己，沒事的，沒事的，沒事的。我要忍著，忍著，忍著，我要爬起來，我要爬起來，我一定爬起來。我不只一次對自己狂叫怒吼：「我要堅強！」可是，停滯的論文，排山倒海而來又拒絕不了的關心與壓力，卻真的讓我再也忍不下去，從此爬不起來。

從那時候起，我開始時常會在深夜裡夢見我拿不到政大碩士學位，然後站在父親身旁一同接受他人的嘻笑與謾罵；夢見我無力拉起衰老病倒的母親，然後自己不敢直視母親的愧疚神情；夢見我站在頹敗的家門前，而祖父母倒在地上淒厲的呼喊著我的名字……每當我碰上這一些惡夢，我總是嚇的一身冷汗，獨自在空蕩蕩的房間裡抱頭痛哭、搥牆尖叫。驚見我就讀研究所後長期性徬徨失落的反常疲態，母親急慌了，大學恩師嚇傻了，死黨同窗們愣住了。每個人看到我時都接二連三的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一個接著一個驚呼：「你到底怎麼了？這不是我們認識的你啊！」我知道他們都非常關心我，也非常擔心我，但每當瞧見他們的反應和憂慮，我卻又更分不清楚，到底那個才是真實的我，那個是虛偽的我？我到底該扮演誰？我能不能只是我自己？我想振作起來，但卻完全使不上力，我似乎失去了生存的理由，就只是成天渾渾噩噩的如行屍走肉的四處遊蕩，坐在電腦前發呆空想，成天在網路遊戲中虛度時光。

---

[36] 如後來研究所師長對我說：「你們那間學校的都那樣（不夠好、很糟）」就對我的精神狀態有很強的破壞力，而這部份我在後續的章節會清楚交待。

[37] 壞掉，是某個大學同學來台北找我吃飯時，看到我時隨即脫口而出的形容詞：「政大把你折磨到壞掉了嗎？你到底在搞什麼，你怎麼可能會把自己搞成這樣？」

失序的生活圖像一直到某天夜裡，我忽然做了一個不太一樣夢，一個不同於平日的惡夢。夢裡是某個快入冬的午后，我在研究室裡幫忙批改考卷的選擇題時，話一向不多、批改申論題改到一半的社會學老師忽然冷不防的抬起頭問我：「志南，從高雄到朝陽有多遠？」聽到這突來的提問，我很快就「警覺」到師長想要對我傳達什麼；我記得我回答他：「從我家走到高雄車站大概是五分鐘，從高雄搭自強號到台中大概是兩個半小時，接著騎摩托車到霧峰朝陽約莫是四十分鐘，從停車場停好車，走到人文學院的社工系辦公室要七分鐘[38]，所以從高雄到朝陽的距離總共是兩小時又五十七分。」聽完我四兩撥千斤的回應，師長忽然悠悠嘆了一口氣說：「希望兩百公里的距離，有天能讓你試著放下你對於父親的仇恨……**你的輕浮、你的傲慢、你的積極、你的快樂、你的笑容都是裝出來的，你只是在保護你自己**……放過你自己吧，你已經不需要為了回應母親、師長的期待而念書……**志南，你不是你父親……你要學著只為了你自己念書，只為了你自己活。**」

「什麼是自己？什麼是只為了自己活？」我被我自己反覆的呢喃驚醒。我走到浴室，順手打開了蓮蓬頭，讓水柱由頭頂順著臉龐奔騰流下。清醒過來的我，冷眼望著鏡子裡頹靡失神的自己，想起師長昔日的提醒，我忍不住抱頭痛哭。我想不通，也猜不透我到底是要「為家庭」？還是「為自己」？為什麼我用盡全力想要向上攀爬，但我卻始終逃離不了勞動家庭的血脈牢籠，最後甚至發覺自己只是以另一種形式再一次重現父母翻身失敗的老路？難道我真的逃離不了勞動家庭的沉淪宿命？我想動起來，但我卻又發現自己已經沒有多餘的力氣繼續追逐和維持親密他者期待的堅強的自我；望著鏡子裡兩眼總是空洞無神、毫無行動力的自己，眼淚不爭氣的流了下來。我……真的好不甘心……但我究竟該怎麼辦？

「我真的好不甘心啊！」我聲嘶力竭的對著鏡子裡的自己大叫。

忽然之間，如同火山爆發的憤怒在一瞬之間意外撐開了我最純粹又瘋狂的慾念：如果真的被逼到這種無可退路的地步，那我乾脆就完全背棄一般研究的常態，我要僅僅只是為了我自己，我要把我為什麼要過的這麼痛苦給說清楚和講明白。

[38] 朝陽社工系在人文學院三樓（最早在六樓）。

不可思議的是，就像是同意了瘋狂的想法般，我感覺到我的身體長出了力氣，緩緩動了起來，停滯又糾結許久的思緒慢慢的再一次轉了起來。久違的身體直覺準確的告訴我，我真的可以用我的論文寫出我的痛苦，並藉此搞懂這些痛苦是怎麼來的，即使在那當下腦海裡也一度防衛性的閃過「如果我這麼做，這鐵定不會是普遍被人們（特別是政大社工所）接受的論文」，但我已經不想管那麼多，就算被他人說我蠻幹亂來也無所謂，我就是只想為了我自己念書，我要為了我自己活……我一定要為了我自己寫出這篇論文。

貳、獨子責任的「破」與「立」：我，可不可以僅僅只是我自己？

我知道「我」的故事充斥著許多的情緒，更帶有很強烈的瘋狂和脫序的悲情色彩。此外，在寫不出論文的日子裡，我也真的拼了命的想弄懂這些日子以來「我」到底怎麼了？又或者，我不斷想要甩脫的「獨子責任」究竟是什麼？

透過敘說、書寫自我的生命故事，我反覆來回觀看，努力辨識著自己生存的模樣；我必須說，這個過程是辛苦是一時之間難以想像和交待的，但當我真的一點一點的將困擾我多時的獨子責任扣連了家庭的生活記憶，並依序置放回台灣在全球化下政治經濟的社會脈絡後，我終於清楚看見了「我」是循著他者和社會的期待才逐漸成為一名獨生子的生命軌跡（Sorensen, 2008）；同時，我也辨識了我的獨子責任是自我經由從事裁縫加工的家庭－勞動階級－主流社會一路交互建構而成，是一相對於一般非獨生子女的「政治產物」。對我而言，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和轉向，原來令我痛苦不堪的獨子責任並不只是我個人的問題，更不是獨生子女家庭的問題，而應是邊際勞動家庭在全球化下的「政治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我逐漸明白，這一切其實不完全是父親不夠努力的錯，也不是全然是我應該承擔的責任。更重要的是，我終於從禁錮我許久的獨子責任中發現，我不斷他者被鼓勵成為某一種人，被期待飾演某一種人，卻也不斷擔心自己無法成為某一種人，但這卻是人們很少提起、述說、交待的。而且，我如果沒有經歷過一連串爆炸式的瘋狂和脫序，這個問題似乎也很難被人們發現，不是嗎？

一、成為「某一種人」的返身覺察：通達論述的分歧與弔詭處

我所謂「成為某一種人，飾演某一種人又害怕無法成為某一種人」的慾望和恐懼，其實非常類似於 Goffman 在《汙名：管理受損身份的筆記》裡對美國成功男性形象的深刻描述：

> 「在一個重要的意義上，美國只有一種完全不用怕羞的男人：年輕、已婚、白種、居住在都市、北方人、異性戀、新教徒、為人父、具大學教育程度、有全職工作、有良好的膚色、體重與身高，以及最近能保持運動記錄[39]。所有美國男性都常是從這個觀點來看待世界，這構成一種意義，讓我們可以談論美國的共同價值體系。所有在任一項上無法符合資格的男人可能是自己－至少有些時候－是無用的、不足的及劣等的；有時候他可能矇混通關、有時他可能發現自己為了某些為人所知、被認為不可取的面向進行辯護或爭辯。社會的普遍性身份價值可能無法在任何地方都完全鞏固，但它們仍然會對日常生活任何地方的偶遇投下某種陰影」[40]（曾凡慈譯，2010：151-152）。

雖然台灣和美國對於成功男性的概念可能不盡相同，但此成為某一種人的慾望投射和擔心無法達成的恐懼，一方面不也正提醒著我們應回頭審視自身認同的價值體系，另一方面則是呼應著 Foucault 先前曾指出現代的國家機器不斷透過各種社會制度和言語論述，巧妙的迫使人們內化、臣服於「應該」、「必須」長成某種「正常」模樣的價值準則和規範論述，同時也造成人們處於某種害怕被他者視為「異常」的焦慮、不安、羞恥感及道德恐慌之中，進而讓人們自行在日常生活中運作、實踐自我規訓與社會控制（劉北成等譯，1992a，1992b）嗎？

原來……成為一名符合眾人期待的獨生子是假議題！？

---

[39] 除了上述所列，Nussbaum 在《逃避人性：噁心、羞恥與法律》中進一步指出 Goffman 忽略了「收入」。她認為這是汙名的另一個來源，如大學畢業生從事洗碗工的工作，那他可能也會覺得非常丟臉（方佳俊譯，2007：269）。

[40] 就性別經驗而言，Goffman 的例子是以男性的經驗為主，關於女性的經驗，有興趣的讀者可另外參考 Griffith & Smith （2005）在《Mothering for Schooling》以女性的經驗出發，揭露學校對於母職照顧的想像是以男主外、女主內的中產階級家庭為主之批判評析。

於是，在這個寫不出論文和停滯的生命斷點上，我終於頓悟我無時無刻都在期待自己能當一個可以改變家庭經濟環境的獨生子，但我始終害怕，也不敢多想，更逃避、憂慮面對我必須背負的獨子責任，其實有著自我規訓和社會控制的意涵；也就是說，雖然我的獨子責任確實是一旁人無法置喙太多的苦痛，但今天不一樣的是，我從我的生命故事裡梳理出一個和過去完全不同於以往的答案。有關於獨子責任的種種，重點其實不在於我「是」或「不是」獨生子，也不在於我「承擔」或「逃避」獨子責任，更不在於我「有能力」或「沒有能力」實踐，或者是我「不夠好」或「不努力」，亦或是我該「為家庭」／「為自己」而努力，而是在於周遭的他者和社會不斷期待、要求我成為的「某一種人（好的獨生子）」的想像，是它讓我忘了自己是誰，是它讓我喪失了自我真實的面貌，是它巧妙掩飾了既有社會結構中的不公平[41]；同理，造成我不斷「想要」、「必須」、「應該」成為或「害怕」自己無法成為「某一種人」的各種自我期待、慾望、恐懼、焦慮，就是強化獨子責任的原兇，就是社會控制和言語論述所欲達成的結果；所以，當我還在猶疑不安、無力改變現況之前，我認為選擇返身「看見自己」是重要的。

返身「看見自己」其實就是習得如何「否思獨子責任」的先決條件（而不是又一次的習得無助或覺得理所當然），經由敘說／書寫自己來梳理和否決他者和社會期待所謂的獨子責任，呈現完全未經掩飾，脆弱而又害怕受傷害的真實自我，重新看見自己的無能和軟弱，認清自我心靈深處想要成為某一種人的慾望投射；而「否思獨子責任」是為了「辨識差異」，辨識自我無法成為某一種人（如人們認為的好獨生子）的差異，但辨識差異必須要先掌握造成人們生命斷裂的論述邏輯，以及生成人我差異的社會位置和價值系統；而「辨識差異」則是為了「學會遊走」，藉著遊走在各個不同社會位置和價值系統，進而破壞、逾越既有論述邏輯的認知疆界，找出真正的問題之所在；而「學會遊走」最終是為了能夠「重新建立」論述，透過敘說／書寫造成自我苦痛的過程，通達和創造另一種理解，並循序指出社會結構的控制和壓迫，而這就是一個自我意識逐漸覺醒的過程，就是一個自我充權和重構自我的過程，就是一個練習創造出不同以往的另一種論述過

[41] 在這裡，我對於獨生子女父母老年照顧問題的思路轉折在於，我們必須跳脫子女數多寡的迷思，只因獨生子女照顧父母老年會出現問題的預設，其實是建構在人們必須「自行」照顧父母的家庭意識形態上。也由於這個發現，我認為獨生子女同樣得以進入許多「家庭照顧者」的集體／社會經驗之中。換言之，我認為目前許多學者提出隨著我國獨生子女越來越多，老人照顧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的相關論述，背後其實有著意識形態上的瑕疵與不足。

程。在這裡，我終於找到能夠解放自我意識的新契機：我，不需要再藏匿真實／痛苦的自我。

二、學習重新理解痛苦的自己：我想要僅僅只是梅花三

雖然，「自我」很多時候大多無可避免的如 Ssasz 所說：「**在動物的王國，規律是：吃或被吃；人類的王國：定義與被定義**」（引自丘延亮譯，2012：218）般的無奈；雖然，我開始有能力，也已經知道該如何揭露了論述邏輯的分歧和弔詭處，但在造成壓迫的社會結構還未完全改變前，令我內外煎熬的獨子責任和不斷緊隨其後的壓力及痛苦並不會瞬間消失，或者它依然會如影隨形的跟著我一輩子。但，我已經不想再繼續迴避諸多令我痛苦的情緒，所以我要開始試著學習接受和理解它。

坦白說，敘說和書寫自我的確是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從返身「看見自己」一路到「重新建立」論述的過程，其實就是我鼓起勇氣嘗試學習面對真實自我的過程，就是我學習理解自我生成的過程，就是我學習翻轉獨子責任，是一場自我內在的小革命，更是在現實生活中尋找、創造、實踐另一種行動和可能的過程。透過敘說和書寫，讓我逐漸開始明白該如何「看懂」我的痛苦和不安，而解決這一連串問題的重要關鍵和發端，就在於我要回頭擁抱正在受苦的自己；敘說和書寫自我的生命故事，很像是在剝洋蔥，讓我總是一邊流著淚，一邊來來回回的反覆練習去除自我外在一層又一層的「應該」、「必須」要成為「某一種人」的虛假意識，同時也藉由不斷返身認清、肯認自我的過程，進而讓真實自我逐漸覺醒：我想要輕鬆自在的活著，別人說是好是壞都沒關係，我想要活的更像自己一點，我想要僅僅只是我自己，不要再受到他者和社會的太多、太多的期待、束縛；所以，為能更清楚探知、理解我為何寫不出論文的生命創傷，我要堅持說下去，我要繼續往埋藏在內心深處的痛苦和疑惑寫下去……然後，試著一點一點的找出另一種詮釋生命痛苦的可能。

我，想要單純僅僅只是一張梅花三，什麼都不會，也什麼都不是的梅花三。

我……想要僅僅只是我自己。

第四章　歧路：清晰卻又顛簸的社工路

Fanon：「『**髒黑鬼！**』或者只是簡單一句：『**瞧，一個黑鬼！**』我來到世上，一心想從事物中提取意義，我的心靈滿溢著想要處於世界源頭的想望，卻發現自己是個在其他客體之間的客體」（陳瑞樺譯，2009：193）。

如果，前一章的故事／研究內容所欲訴說、探索的重點是我和原生家庭在全球化下的掙扎和處境。那麼，從這一章開啟的主題旨在重新呈現和企圖深描詮釋之標的，是我二十一歲退伍，二十三歲踏離家門，接著花了七年多的時間，一路從一個絲毫不知社會工作是什麼的門外漢，到立志成為社會工作的專業菁英和知識份子，為此一路由南向北，從高雄到台中再到台北，從朝陽社工系的轉學生到政大社工所研究生，一步一步從邊陲朝向社會工作專業知識／權力核心的求學歷程，或者是說……走到一半時發現自己陷於精神分裂、存在異化的斷裂困境。是的，我在這一章要敘說、書寫的是觸發我眾多疑惑、痛苦、混亂的罪咎根源：我成為「社工」的故事。

第一節　向上仰望的小社工：孤單寂寞的不歸路？

我回高雄時，很喜歡站在家門前，想像我站的位置是世界的中心，然後放空冥想自己離家以來的點點滴滴；家門右手邊是踏上旅途的高雄車站，依火車離站時的汽笛聲響，兼以目測推估大約有兩百公尺；沿著鐵路一路向北，四百五十二公里外的蘇澳舊車站，是我邂逅社會工作的初始之地；離家一百五十多公里遠的台中霧峰朝陽，是我決定與社會工作締結契約的修練場；三百五十公里外的台北猫空政大，則浮現我寄望充實知識、辛勤閱讀、學習專業技能、體驗社會工作多元實務，還有努力自我實現的身影。可是，當我幾乎快擁有我離家時所想要的一切時，我卻發現我變了，徹底的變了；我變得不開心，變得不快樂，變得沒自信，變得不勇敢，變得自暴自棄，變得神經兮兮，變得像行屍走肉，變得不樂觀，變得不相信人，變得不堅強，變得愛哭，變得只會怨天尤人，變得不愛念書，變得不會大喊我要改變世界…變得同窗、摯友紛紛說我的文字失去了靈魂的悸動且又充滿怨懟，變得母親說我不像她那樂天、固執卻又叛逆的獨生兒子，變得大學恩

師嘆息我不像昔日她那衝勁十足的古怪學生……我變得完全不像我認識的自己……我到底是怎麼了？

壹、遙念蘇澳的寒冬細雨：從登徒浪子到菜鳥替代役

2003 年四月，我二十一歲，五專（電子科）畢業後，由於不會讀書，不喜歡念書，也沒有打算選擇繼續升學，對於人生毫無目標，成天就只是掛在日本線上網路遊戲線上得過且過[42]，所以我隨即就打定主意趕快去當兵，希望能早日把欠國家的「兵債」還清，至於以後會如何，就等退伍後再來煩惱。雖說是當兵，我因為體位因素成為了「替代役」，而不是一般義務役的大頭兵；替代役一般而言，是統一先在成功嶺受訓一個月。接著在選兵（役別）時，受惠於我是那一梯裡極少數的大專兵[43]，再加上先前五專時曾擔任社團幹部，以及在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擔任志工接近四年多的經歷，讓我幾乎在沒什麼競爭的狀態下，就順利入選聽起來好像可以回饋社會的社會役（十八梯）；接著再受完社會役的專業訓練後，想說趁機體驗一下外縣市的生活樣貌，於是我選擇了宜蘭作為服役的地點，進入了（社會福利館）40 位社會役男的編制內，結識日後人們所謂的社會工作。

一、初出茅廬的小菜鳥：新兵打雜兼鄉村冒險日記

我服務的地點，主管役男業務的是宜蘭社福館內的一位約聘社工員，而當時役男的編制主要可概略分為兩組，一組外勤，負責訪視縣內各區域的弱勢獨居老人；一組內勤，主要協助社會福利館內各科室的行政事務；我一開始被分配在內勤，主責的工作與另外兩位學長輪流看顧館內相關的活動空間（如圖書室、電腦

[42] 人們對於網路遊戲的印象或許都不太好，但我當初接觸的這款日本網路遊戲，卻讓我認識了一票如股票分析師、台大內科醫師、英特爾和台灣各大電子產業的工程師、遠嫁加拿大人的台灣人、電玩店老闆、海事類的公務員、傳統寢具加工廠的老闆、手工金飾店老闆兼師傅、美編插畫人員、環評公司的副總等等。和這些分別處在不同人生階段和社會位置的朋友相遇，反而是讓我有機會能增進了解許多平常接觸不到的專業知識和生活訊息，而這是透過一般的交友方式很難形成的。母親為此就常對我說，我總是會認識一堆奇奇怪怪的朋友。譬如，環評公司的副總就曾推薦我到高雄的分公司面試，但由於後來得知工作需要爬上幾百公尺高的煙囪進行排煙測試，有懼高症的我最後還是回絕了，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面試官們只問我：「我是怎麼認識副總的？」接著就開始介紹工作內容和薪資待遇（對方態度讓我感覺到是已經打算要用我了）。

[43] 整體的狀況我不清楚，但近乎六十多人的連隊，五專和大學生不超過十個，其餘幾乎都是高職畢業或國中、國小畢業，甚至還有許多國小沒畢業的；在大澡堂洗澡時常見識人們背上龍虎亂舞的畫面，可說非常精彩。

室、活動室、康樂室）；但因適逢 SARS 疫情惡化，我初任階段的工作是在社會福利館的入口量體溫，待幾個月後疫情稍稍趨緩，館內空間重新開放，我才真正進入館內工作；進入館內後，工作內容大致上是維持室內空間的整齊、秩序及器材借用，或處理一些周遭的突發狀況，如家長帶來的嬰幼兒亂大小便、避免小孩子打架或在公用電腦亂灌軟體、排解老人家為了搶麥克風唱卡拉 OK 的爭執等時常令人無可奈何又啼笑皆非的雜務；後來，一成不變又毫無樂趣的生活狀態，我終於在半年後某一次的職務調整的機會改派外勤組，結束了較為單調的內勤生活，開啟了往後天天到處「找」獨居老人的新生活。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是「找」獨居老人呢？這是因為我對宜蘭的路況完全不熟（我真心感受到高雄九宮格式的道路規劃有多麼平易近人），另一方面則是從宜蘭市到我主責的蘇澳鎮，我的行車路徑剛好一路橫跨了宜蘭市區、近郊的農區、靠山區及濱海區，地景差異非常之大。而我也常遇見許多住在不可思議之處的老人家，譬如蘇花公路起點旁的小矮屋，蘇澳舊車站旁拐了快六、七個小彎後幽暗巷弄內的夾板屋，臨近蘇澳港灣邊又充滿海水腥味的矮房子，或是放眼看過去都是農田和漁塭，甚至是你絕對不會想到正中央那不到三至四坪大的漂島上的鐵皮屋……那裡竟然會有住人。總之，這對在都市長大的孩子而言，一切都太不可思議，且又需要一段時間來重新適應和習慣相信世界還有著有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模樣。

另外，在地圖不可信也不可靠的情況下要找到老人家（當時可沒有手機無線上網這種東西），很多時候除了需要點直覺跟運氣之外，更必須經常保持警戒。像是有一次我跟大我兩梯的阿美族學長好不容易找到一位住在山區的獨居老人，到達目的地後，學長熟練的跳下摩托車先準備去敲門，而我則準備去找個能停好摩托車的平地，但不到三十秒，我看見他神情驚慌、拼了命的跑回來，並瘋狂大叫：「快快快！志南！快發車！快！快！快！」若我沒記錯，當時他後頭一共有五隻兇狠的野狗張牙舞爪又惡狠狠追著他跑出來，而我們倆當下也完全顧不得沒還見到老人家，滿腦子只想保住小命。於是，我機警的丟出掛在摩托車上吃到一半的三明治分散野狗的注意力，兩個人飛快的離開現場[44]。至於我們再次去訪視

[44] 這養成我後來去訪視山區老人家時，早餐的三明治一定會留一點掛在摩托車上，以做為逃跑時轉移野狗注意力的食物。

那老人家，那大概又是半個月之後的事情了。

二、助人的喜悅：我……不專業，但我真的很開心

找路、迷路、老人不在家、閃躲前往蘇花公路的砂石車或被野狗追趕跑跳，或者是支援縣府大型活動（如綠色博覽會期間，外勤組的役男要輪流去幫忙門口收票，不得不說役男真的是雜役萬能），還有一邊訪視老人家，趁機一邊打混、摸魚、吃名產等大大小小的事件佔據了訪視生活的一大半[45]，如果真的要確切說明我這時候的工作內容是什麼，我好像也只能說「**除了特殊狀況[46]，我的工作就是去蘇澳遊蕩，然後確認我負責的老人家健在（活著）吧！**」

認真說起來，當時的我完全不知道「社會工作」或「專業」是什麼（滿腦子大概也只想著如何趕快退伍吧），沒有人教過我社工理論，也沒有人向我條列什麼兩難複雜的專業倫理，更沒有受過什麼在職的訓練（除了心肺復甦術）。面對老人時常突如其來、千奇百怪又五花八門的疑難雜症，我幾乎大都是跟在前幾梯的學長旁邊試、邊做、邊看、邊問、邊學，例如要怎麼跟每次看到你就是吵著要補助的老人建立關係（有這種狀況的大概都是領不到補助的，有些老人家會向我們抱怨，甚至是罵我們出氣）、不著痕跡的觀察老人的就醫和用藥情形（這也可以順便知道老人家每週前往醫院的天數，可以降低自己訪視撲空的機率）、天氣大幅度忽冷忽熱的變化周間一定要實際訪視老人家（老人家在天氣變化時身體很容易不適，所以這種日子絕對、絕對、絕對不能摸魚打混）；說來有趣的是，這群先前所學完全和社會工作專業完全扯不上太多關係的役男，就這麼靠著反覆的摸索和同儕之間的口耳相傳，一個接著一個的自行衍生出了一套互相掩護又盡量不出包的工作形式（我們早上進辦公室打完卡之後，通常會一群人去吃早餐，然後一邊吃一邊向役男管理幹部報告訪視狀況，而管理幹部這時候也大多會提出一

[45] 就規定來說，我們一天要訪三到四個，但有時候老人家剛好都不在，或是剛好狀態都不太好，我們不能久留(這些其實是常態，但這卻也常造成我們要回報的個案記錄很難寫)，我們役男繞了負責區域一圈後又不能太早回去，這時候就是「不能明說」的自由活動時間了。

[46] 所謂的特殊狀況是指一些有關於老人家的補助、醫療、環境清潔的相關需求，以及持續多次訪視未遇或確定去世等，需要直接回報給主管老人業務的社工員協助，否則我平常幾乎不會到接觸到社工（我們役男自己通常不會太主動去找社工，兩者之間還是有某種程度的緊張關係，我們大多不想被增加額外的工作量或太過麻煩的業務，能沒事最好這樣）。

些問題要大家注意）[47]；或者，我也曾遇過一位拾荒的獨居老爺爺因為一時貪小便宜而被詐騙集團當人頭戶（他戶頭有大量的金錢流動），向我碎念他中低收的補助無法通過。雖然這跟我的業務沒有太大的關係，但為了幫他解決問題，我跟幾位學長很雞婆的跑去問銀行、警局、鎮公所、主管的社工，最後終於幫老爺爺把問題處理好。

回想過去各種不同的事件給我最大的學習是，除了老人家和生活環境的狀態之外，我也必須要熟稔社會事件（因為若有老人相關的社會事件，我們役男就會被特別盯）、政策法規及政府單位的運作狀況要有一定的理解，這樣才能讓自己幫忙老人家時事半功倍，影響則是……我從此十分厭惡服務窗口沒有整合、責任踢來踢去的公家單位和公務人員[48]，但更重要的是老爺爺緊緊拉著我的手說「謝謝」時，自幼常被別人指責會和父親一樣沒用的我，第一次非常肯定的發現自己好像可以做些什麼，可以改變些什麼，而且這似乎對於社會還滿有意義的！我真的好開心，我是個有用、是個被肯定、是個被需要的人。

我真的超愛這種感覺！我好喜歡我自己能夠把爺爺奶奶們的笑容找回來。

雖然，替代役常被人說是爽兵，或是被人嘲笑身體有缺陷及對社會沒有貢獻；雖然，回想當初的工作滿偏向志工性質又非關社會工作專業，再加上宜蘭的冬天常常下雨，有時候出門時天氣還好，但騎到一半時卻常突然大雨磅礴，穿上雨衣後再騎一個多小時到蘇澳時往往都是冷到手狂發抖的敲著爺爺奶奶的家門；雖然，摸魚、打混、找時間繞去吃頓好料的下午茶絕對少不了，而老人家的訪視記錄幾乎也是多到寫不完（很多時候只是去看看老人家，陪他們聊聊天、看電視，我有時候還真不知道訪視記錄可以寫些什麼）。可是，每當我想到自己能確保他們每日平安，可以聽聽他們年輕時的故事（好多榮民爺爺超愛說國共內戰和八二三砲

---

[47] 例如，我們曾經遇到某個鄉鎮的多位老人家連續被詐騙集團假冒縣府人員騙走了許多錢，這使得我們就有幾位役男一進入剛鄉鎮就被老人家用掃把趕出來(這大概跟我們開場白大多是「您好，我是宜蘭縣政府社會局的」有很大的關係吧)。碰上這種的，我們的處理方式大概都報請上級單位處理，然後先略過一陣子暫時不去訪視。

[48] 對於公務人員根深蒂固的壞印象，後來一直要到我研究所去了勞委會和台北市社福中心實習時才逐漸有了改變：熱血負責、想要讓大眾過得更好的公務員其實是存在的，而且還很多；另外，我也慢慢明白，很多時候是政策、法規的體制制約，特別是在依法行政的限制下，並不完全是基層的公務人員不願意做，而是沒辦法做(或是說會惹來不必要的麻煩)。他們很多時候也很無奈。所以，我從前對於基層公務人員的認識並不完全正確。

戰的戰績），或者是爺爺奶奶握著我冷到瑟縮發抖的手，然後遞了一杯熱茶給我時，我總覺得辛苦是值得的。即使我很多時候無法給他們任何實質的經濟補助，或者是對於他們生活有直接顯著的改善，但我天真的相信這一份微弱的改變，可以慢慢累積，畢竟我可是比誰都還要瞭解蘇澳這群老人家的生活作息和思維邏輯，而這些可是學校教授絕對不會教、教科書上永遠不會寫的獨門技藝，而這一份在單純不過的初衷、自信及感動，就這麼默默常存在我的心中。

貳、我只是想要一份穩定的工作：從待業的退役青年到走路很快的轉學生

遙想剛進入社工系就讀時，幾乎是十個人裡頭就會有九個人認識我的第一個問題，都是問我怎麼會想從電子轉來社工。說真的，這是一個令我非常難開口回答的問題，因為我很常猶豫是否該向問這個問題的人說實話。雖然社會役的助人經驗對我投入社會工作有十分正面的影響，但我當初會選擇社工系的主要理由，其實……很單純的就只是我想要以後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一、來自五專電子科的異類：我，為什麼讀社工？

退伍後的生命課題看似複雜和徬徨，但實際經歷後卻是極其簡單。除了找工作、找工作、找工作，還是找工作。生活的重心和話題幾乎都是圍繞著工作、薪水待遇、工作福利的多寡。我沒有想太多的投履歷試著找了幾份工，一路從補習班的工讀生，到慢慢褪去了自己習慣 T 恤、短褲及布鞋，學著馬路上的上班族穿起了熨斗燙過的有領襯衫、西裝褲及擦的閃亮亮的皮鞋，成為了某知名電台的企劃業務。我開始覺得自己長大了，從男孩變成男人了，但生命也開始如同鏡子裡的穿著打扮，雖然合身，卻又有點令人不太不自在，有點不太習慣，有點彆扭，但又必須要努力告訴自己一定要努力習慣。

1. 出社會的第一份正職工作：體驗人吃人的社會

我的第一份工作很酷又很炫，而且跟我五專所學一點關係都沒有，我找到了一份電台廣告的企劃工作（說白一點是拉廣告的業務）。我很喜歡我的第一份工作，不過卻是個一直不知道該如何跟強勢女主管相處的笨下屬。我總覺得主管對

我說一堆她的經驗後，反倒不如我自己拿起數據和報表研究幾天，消化、觀察一下她和許多老鳥前輩分享過的，我野性的直覺很快就讓我找到了一條肥美大魚（會長期下單金主）。即使我連續被主管告誡了好多次[49]，但我仍一心一意的堅持相信自己的判斷，雖然我也很清楚若我這個案子沒成功，我接下來幾個月的業績很可能會一路掛零，間接也會使得主管可能背負著公司高層的壓力，但想到會長期下單的客戶幾乎都被像主管一樣的老鳥企劃壟斷（如百貨公司的周年慶、公家單位的活動訊息、大專院校的招生廣告），新進菜鳥大多只能花費大量的時間去挖掘部分開了又倒、倒了又開的小店，反覆領著最低的底薪，說穿了其實也只是種變相的剝削（再加上撐不下去離職菜鳥的案子，會自動轉到老鳥手上，菜鳥根本只是用來開發市場的消耗品），所以我最後還是決定照自己的意思做，卻同時也埋下了日後跟主管不合的苦果。

工作不到一個月，我即照著我原先的計畫去拜訪了目標公司的南部主管，但接下來等著我的卻是完全超乎想像的悲喜劇；最一開始和我接洽的負責人是一個豪邁的中年大叔，我們第一次見面聊沒幾句，當他知道我剛退伍沒多久，很多事情都還在起步學習，再加上聽到我要來找他談合作案之前被眾人說不可能的經歷，他邊大笑邊豪氣的對我說：「一切都是老天註定的，我們剛好在思考南部市場要怎麼做的跟北部區隔……你來的正好，我一定給你這年輕人機會。你放心，我們公司會下單給你。」就這樣，如同奇蹟一般，我以小菜鳥之姿，意外敲開了眾多老鳥前輩們認為根本不可能敲開的金庫大門：我談成了一件長期性的大案子，如果照抽成來說，我以後每個月的薪水可以穩定多出好幾千塊。

只不過，這並不是一部振奮人心的菜鳥成功日記，在我釣起大魚的瞬間，卻也開啟另一段厄運。某天，當我和合作對象談的差不多時，我偶然接到了大叔的一通電話，他暗示我的主管找上了他們的總公司，向他們公司高層反應這種大案子應該要給老鳥企劃接手，給我這小菜鳥可能會有砸鍋的危險。我忘了當時的情緒是什麼，是失落？是憤怒？亦或是不解？但我不久之後就主動丟了辭呈，離開

[49] 當時我第一個目標是一間跨國的大公司，但就行內人的經驗，這類大公司下單的模式通常是先由台北總部下給同樣是北部大型的廣告公司(如奧美)，接著才再由大型的廣告公司發包給中南部的下游單位來執行。所以，主管打從心底認定我的合作企劃會做白工(她認為即使對方下單給我，最後還是會回歸北部的下單系統，我們獲利的機會渺茫)，所以她強烈希望我花更多時間去跑剛開業的小餐廳，而不要浪費時間在這個案子上。

了那份工作。

離職那天，開車送我回家的一位任職許久的老鳥同事，他邊轉著方向盤邊點了根菸，然後在吐了一大口瀰漫的煙霧後對我說：「你當初如果先主動把案子的抽成自發性的分一半出來給你主管，表示你願意跟她（主管）共享成果，藉此感謝她的帶領，或是想辦法先開幾個小案，忍一下領幾個月低薪，在被逼退離職之前再把談好的大案子丟出來，或許今天就不會落到這種下場……但你也不需要悲傷，因為你沒有做錯，你的能力和判斷也都沒有太大的問題，但如果真的要說你那邊做錯了，那大概是你忘了這是個人吃人的社會，也忘了人是會為了利益背叛同伴……年輕人啊，學會沉住氣和更有城府一些，千萬別太信任身旁的人……永遠要記得，活下去是需要『手段』的，強者才能生存。」[50]

我下了車，關上了車門，遠眺著老鳥同事逐漸消失在車陣中的車牌號碼，默默呢喃著：「是啊……是啊……這是個人吃人的世界，活著是需要心機的，是需要手段的……社會就是弱肉強食的戰場，我不是早就知道了嗎？商人，傷人，我怎麼會忘了呢？」我站在馬路邊哭了，為了自己太單純而哭泣。

2. 五專死黨的邀約：把消逝的夢想找回來？

我離職後一度頹廢了好幾個月。在那段期間，任由家人怎麼唸、怎麼罵，除了打工之外的時間，我都只是都龜縮在網路遊戲的世界裡，完全不想跟別人接觸。後來，由於真的被家人唸到覺得有點煩，我索性聽從母親的建議，報名參加初等公務員考試的補習（但我根本沒想過要當公務員），藉此躲避家人的碎唸。有了一個新的生活目標看似不錯，然而，無止盡的背誦，異常擁擠的教室，三不五時忽冷忽熱的空調，終日埋首在鑽研 ABCD 四個選項究竟何者為正確答案的單調生活，很快就讓我感到無趣和厭煩。於是，在考過一次，以快九十分的分數落榜後（當年錄取要平均九十五分以上），我很乾脆的舉白旗放棄了，因為我知道我

[50] 幾個月之後在跟母親聊起這件事時，母親說她也認為我的行為和判斷沒有錯，但我自己必須重新思考、注意到老鳥們的處境。因為，我突來的成功經驗不但打破了老鳥們原來習慣的工作型態和思考模式，同時也可能變相讓高層注意到組織工作模式僵化的問題（被一個剛來的菜鳥搞出大案，那老鳥都在做什麼，這會讓老鳥們很沒面子），進而會帶給許多不願改變得老鳥們壓力，所以我當然會被老鳥主管想辦法處理掉。為此，母親常提醒我在還沒有站穩腳步，還沒摸清週遭人際關係的底細之前，適度的從眾和隱藏自己是必須學習的職場功課。

沒有持續追求高分的毅力和抗壓性，而這也不是我要的生活。但，我要的生活是什麼呢？坦白說，我也不知道。

放下了公職考生的身分，重新試著投了幾封正職工作的履歷，但幾乎都沒有下文，而且我似乎也慢慢注意到求職網站上的學歷要求慢慢都變成了「大學」以上，自己的五專學歷好似已不如父執輩們過去所說的那麼管用(母系家族的母舅、還有表哥們的學歷都是五專)；高不成又低不就的學歷，苦尋不著的工作機會，不禁讓人有種「卡住」的無奈，也讓生活中最重要的目標和樂趣，彷彿只剩下將網路遊戲打通關，拿到最精實的裝備，戰勝最凶惡的魔物，踏足未知的世界盡頭，奮力將寶劍插入魔王的胸膛，獲得最勇敢聖潔的騎士稱號……只是，即使我都做到了，然後呢？把魔王殺死了，那麼被稱為英雄的勇者接下來又該去那呢？

坐在電腦前，不禁幽怨的為自己嘆了一口氣。揮霍了太多永遠追不回的青春和歲月，二十三歲的生命仍日復一日的徬徨躊躇在原地，而一事無成的表現也持續召來了親戚友人說我越來越像父親的指責。心中有股憤怒，卻又無力反擊。不想認命，但望著日益混亂又衰敗的家，心頭悶著一堆說不出口的難過、心痛、自責的情緒，卻又覺得一切都只是自己不夠努力的咎由自取；想結束生命，卻又沒有足夠的勇氣；有天，遺忘我許久的老天爺似乎還沒有放棄我。就在我最徬徨、茫然時，最要好五專死黨「可樂」忽然問了我一句：「**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把消逝的夢想找回來？我們去考二技還是插大吧！？**」

「**夢想**」……一個熟悉卻又早已遺忘多時的口頭禪。

可樂的提議著實讓我感到非常興奮，可是我對於自己該念什麼科系卻沒有頭緒；由於我不想繼續念電子，縱使我知道那是就業的保證（但在 2008－2009 年間，當我看到許多五專同學陷入無薪假的窘境中，我似乎也只能感嘆時代的變動已經超乎常人的想像了)；就個人的興趣，我想去念歷史系，但退伍以來的求職、工作經驗讓我直覺得想到這個科系以後畢業可能陷於找不到穩定的工作，而且這相對的也會讓家人同意、支持我念大學的機率不高，畢竟興趣有時候真的很難跟麵包畫上等號；呆坐在電腦前，我想了很久後突然想到退伍時，很照顧我的學長曾對我提起我的個性說不定很適合當社工，如果退伍後還想繼續升學念書，我可

以考慮去念社工系；更重要的是，我記得有一位東海社工研究所畢業的學長曾對我說：「社工的薪水是不高，但只要肯做，社工幾乎不愁找不到工作。」[51]是的，就是社工系了。想起過往服役的種種，還有學長那句「一定找的到工作」，讓我下了人生最大的賭注：我，決定回去念書……決定要去念社工系。也就在那一刻，我重新訂下了我的夢想：我想當個有用的人。所以，我想要改變我自己，然後想要改變我的父母，想要改變我的家庭……我，要改變有關於我一切。

二：讓人很挫折的社工系：我一定要活下來，然後……爬上去！

決定就讀社工系後，接著要煩惱的是選擇學校，而選擇學校就必然要牽扯到我的考試入學方式。我的考試入學方式並不是統一招生聯考（或後來的指考、學測），而是各校獨自於寒暑假期間舉辦的轉學考。

於是，我簡單的搜索網路後發現了位於中、南部的長榮、東海、朝陽這幾間可以納入考慮（我認定自己考不上國立的學校，因為除了專業科目之外，國立的共同科目要考國文、英文的大多很難，那對我而言是個很大的應考阻礙；另外考慮到北部的生活費可能太高，加上轉學考的競爭更加激烈，所以我打一開始就沒有列入考慮）。而我後來決定報考朝陽的原因，一方面主要是想說可以跟可樂有個伴，另外則是東海和朝陽雖然同是中部的學校，但我看過網路上的考古題後發現兩者難度相差甚遠，東海的考科比較多，並要以申論題的方式作答，朝陽則全部都是選擇題為主，所以若我要考東海，勢必還要花費一筆補習費且又不一定考的上（另一個潛在問題是當時南部補習班的社工轉學考只能看錄影帶，而我後來才知道相較於中、北部，社工轉學考在南部比較沒有市場，因為社工相關系所大多集中在中北部，南部的社工系所本來就不多）；另外，雖然我當時已耳聞東海社工很有名，但問了幾個中部的朋友，我確認過朝陽在中部的風評還不錯，再加上純經濟層面和自身準備度的考量，我後來就只有報考朝陽，而我最後也非常幸運的以備取三的吊車尾成績低空錄取。

[51] 當兵的學長們每次聚餐吃飯時都還是很愛提起他們當初無意間的一段話，竟然意外造就了一位政大社工碩士。這可是他們最自豪又津津樂道的一件陳年往事。

1. 疲累匆忙的大學生活：我不能和你們一樣慢慢來！

重回學生生活讓人很期待，但開學卻又是一連串疲勞轟炸和生活挑戰的發端。我開學第一天就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只能抵免十一學分（規定的畢業學分一百二十八），換言之，我在重回大學生活的第一天就很清楚的知道若我想要隨著原班準時三年畢業，我就必須要盡一切所能的在六學期內修完四年份的學分[52]。於是，為了達成能夠準時畢業的目標，再加上學校規定的勞作教育（新生每天都要打掃校園），還有社工系兩百小時的志願服務規定，我整個大二時幾乎都是起床就去上課，下午去志願服務，晚上再趕回來上夜間部課的匆忙生活[53]。然若回想最能代表我生活狀態的一句話，大概就是同為轉學生的同學很常對我喊說：「**你台北人喔，走路慢一點啦。**」

第一次聽見同學這麼對我說我是「台北人」時，我記得我還停下腳步，不滿意的轉過頭大喊：「瓦『下港人』[54]啦」。但當我望見他們還在離我好幾步的階梯下（朝陽是一路順著山坡地蓋上去的學校，所以走在前頭往回看會形成居高臨下的視角），還一步一步慢慢往上爬的模樣，我忽然很強烈的感受到我自己和身邊的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是的，我和身邊的每一個人都不一樣，完完全全的不一樣。只因，我雖然是新生，但我並不是大一的小菜鳥，而是一進去就有學弟妹喊我學長的大二；我雖然是大學生，但我前身並不是校內、系上大多數的高職生或少部分的高中生，而是更為少數的五專工科轉學生；或者，即使同樣是轉學生，比起抵免了三十幾學分的轉學生（本科或相關科系的轉學生大概能抵到四十幾甚至是五十幾學分），我和大多數的轉學生夥伴們所要面對的畢業壓力截然不同，我時常從早到晚都在學校上課（我常戲稱這是一種讓人腦漿呈現乾掉的生活）。所以，同學打電話找我，我通常不是準備去上下一堂課，就是在討論永遠討論不完的團體報告（有些時候，團體報告不是學習合作，而是讓人們瞭解到，有些人只能當朋友，但不能

[52] 我雖然抵掉了軍訓，但許多如體育類等零學分的課程都不能抵，這讓我每學期平均都要修超過二十學分以上的課才能準時畢業(正常每學期學分上限是二十二)，而且這還是不能有任何科目被當或出現任何意外的狀況。

[53] 上夜間部的課的原因是一年級和二年級的專業科目常互相衝堂，很多時候課都連同通識課一起調來調去的。我想這種痛苦，只要是非本科系的轉學生就一定都會懂。

[54] 下港是高雄的台語詞彙。

當工作夥伴），再不然就一定正是去學校的路上。還有，就如同班同學「**你的年紀多念我們一輪大學耶**」的玩笑話（我剛好大同屆的學生四歲），更讓我感受到我已經沒有多餘的時間再停下腳步陪著身邊的人慢慢來。

或許，也就是以上種種的人我差異，使得我站在同學身邊時，時常會讓我不由自主的想起我還有好多事情沒有做，我絕不能重蹈一事無成的錯誤過往。結果，起跑點落後他人一大截的焦慮實在太過深刻，直到現在我都還是這些造成人我差異的原因記得清清楚楚，而修不完的課、向上的階梯和斜坡、努力走在別人前頭、倉促的步伐及獨自行路的身影也就這麼成為了最貼近我大學生活的身體記憶。

2. 看不懂的書、考不好的試：被恐懼激發的生存本能

難解的生活問題還沒結束。身體的疲累和擔心學分修不完、無法準時畢業的焦慮和壓力終究只是能夠解決的小問題，手上的書看不懂、考試持續一團糟才真的是讓我感到異常恐慌的問題元凶。

由於要補修的學分很多，我一方面需要下修大一的專業科目，如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學、心理學，另一方則要隨著原班一起修大二的個案工作、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大二上的社會心理學我大三上才回來修）；大一的課程因為同學們都是新手，彼此成績的差異大致是取決於自己閱讀、複習時間的多寡，但大二的課程則讓我很明顯的感受到，自己有很多基本概念的轉化遠遠跟不上身邊的同學（如同理心、兒童發展理論、佛洛依德、人類發展階段……這些我才剛開始學）；可是，當我花了許多時間把自己還不懂的內容背起來後，我小考的成績依然低迷不振，因為……我始終抓不著申論題的答題訣竅（我永遠記得我人行第一次只考了二十六分，第二次四十三分）。而這也讓我開始不斷焦慮如果這麼繼續下去，我期末可能會被當掉……我學分可能會修不完……我會不能準時畢業。

於是，為了解決因考試成績不佳而起的諸多焦慮，我除了積極詢問授課的師長之外，同時也多次試著向班上成績的不錯的同學借考卷來看，藉此了解成績好的同學是如何答題。不過，因為我不太好意思直接要求同學將考卷借我回家仔細研究（同班同學間不免還是存在著某種競爭關係，我不想引起同儕間不必要的誤

會和緊張），所以我轉而把腦筋動到了沒有直接競爭關係的學長姐身上。為此，我約莫花了兩週多的時間藉著與學長姐聊天、吃飯的機會仔細記錄、詳細整理了他們對於各科考試題型的描述和各科師長先前的出題習慣，同時也積極的四處蒐集學長姐們在大一、大二時的個人考卷和筆記；就這樣，我從學長姐們的經驗、考卷及筆記裡勾勒出了部分系上老師的出題方向和習慣（這讓我猜考題的命中率很高），也慢慢學會該如何應答申論題：我那時才逐漸了領悟應答申論題不但要把背起來的東西寫出來，原來也還要適時加入自己的論點、分析及回饋（以前工科的答題慣例大概就是把公式寫出來，接著幾行就要快速計算出答案，有時候甚至是只要看到題目就一翻兩瞪眼了，因為電子的學科訓練是追求一個「絕對正確」的答案，而不是像社工會容許人們適度的闡述自己的想法）。

回顧自己在大學求學階段，當時為了大幅提升考試成績，我幾乎可以說是想盡辦法又竭盡所能、不擇手段的把全身上下能用上的世故和投機細胞發揮到某種極致的程度[55]。雖然這後來不免也招來許多同學、學長姐及師長私下提醒我此種不夠踏實、投機取巧的學習方式不太好，大家似乎普遍都認為這種方法只能應付在校的小型考試，但等到以後如研究所、社工師、高普考等需要綜融思考的大型考試，我的基礎將不夠穩固，將會很吃虧。然而，旁人苦口婆心的勸，卻也常讓我有著許多無言以對的矛盾和不解。因為，縱使我很清楚旁人的提醒絕大多數都是出自於好意和關心，但除了要釋懷自身的匆忙與焦慮之外，這陸續也引來許多我常不守規矩的負面標籤。畢竟，比起取得好成績，人們對於學習這檔事似乎還有某種應該如何學習的「常態」想像？我雖然無法明確的交待那是什麼，但我很清楚的感受到我的學習方式是不被人們認可的，是不夠踏實的，進而又更進一步加深了我和旁人不太一樣的自我印象和人際嫌隙；我隱約覺察到有個問題卡心裡，但慌亂忙碌又分身乏術的生活狀態卻又讓我無暇停下腳步思考和解決問題，而此種時常必須要摸摸鼻子認了自己沒有按部就班、不符合學習常態的矛盾和不解，大概也就是我大學階段最熟悉的心情寫照。

[55] 當時就連可樂也說過我念書、追求成績分數到到某種走火入魔的狀態。

參、變調失溫的台北夢：從斐陶斐[56]到充滿困惑的政大研究生與社工師

不管人們認為我是偷吃步也好，或憑實力也罷，縱使身上有著許多不明不白的矛盾和不解，我仍告誡自己一定要盡量學會成為一名「社工」所應該具備的各式職能，只因我不想再次重蹈一事無成的過往，也不想讓母親失望，更不想再被人有機會脫口說出我像沒路用的父親；所以，老師說什麼、教什麼，我就做什麼，學什麼，我以為把書念好就能當個好社工；所以，不論是練文筆、跑統計、帶團體、寫計畫、做研究、寫方案，或者是會談、訪視、寫作、思辨、資源探索，我牢牢的抓住了人們關於「優秀」的想像和讚美，大步追逐著所有足以彰顯自我和家庭的象徵和榮耀。於是，當大學畢業時，我先是得到了學業成績第一名畢業的殊榮，同時也幸運獲得了能夠前往位於台北，被人們譽為是社會科學名校的升學機會[57]。我滿心的期待我將改變，我一定會變得更好。然而，我卻不知道所要面對、承擔的苦難和挑戰……其實還未完結，糾結難解的麻煩才正要逐一襲來。

一、沉默的城市秩序：外地台北人的默會知識與斷然覺悟

在實際生活在台北之前，我印象中的台北，是台灣政治、經濟的核心，是中西潮流文化的匯集和發散地，是許多長輩口耳相傳的打拼處，更是昔日許多異鄉遊子為了增廣見聞，為了尋找發展機會，為了實現夢想的理想鄉。而我也就像是夏夜裡聚集在街燈下在的蚋蚊，為了追求那未曾見過又憧憬不已的閃耀光芒，循著內心想要發光發熱的慾念指引，搭上了一路向北的火車，隨著不斷搖晃的車廂，搖啊搖、晃啊晃的來到了這座傳說中的偉大城市。

只是，繁華的台北卻不如我預期般的如此美好。如果，台北 101 大樓是人類物質文明的優越象徵。那麼，我認為「沉默」或許是最能代表和形容人們生在活台北的精神詞彙。是的，沉默。生活在這座行人、車輛、大樓時時刻刻都擠在一起，各式資訊迅速更迭又總令人喘不過氣的首都城市，似乎不太需要動太多腦筋，更不需要多說話。你只要在人群中稍微停下腳步約莫五秒，當你呈現出與路人動

[56] 斐陶斐是畢業成績第一名的獎項名稱。

[57] 我是以推甄備取三的排序幸運錄取政大社工所的，當初這個結果連母親都說是神明保佑的奇蹟。

作不一致的那一瞬間，路人的目光和表情就會斷斷續續提醒你，傳遞出你不符城市印象的訊息。看似便利無比的台北，其實存在著許多讓異鄉人在一時之間難以捉摸的理所當然，就好像是捷運手扶梯要自動靠右邊、搭公車是上車或下車刷票、大眾運輸的深色坐位是老弱婦孺的博愛座、行人的腳步每一個都快得像是在賽跑、每個路人都匆忙好似害怕落於人後。而你也只要多花點心思稍微留神，其實立刻就可以從人們某些慌亂、遲疑、不自在的言行舉止找出誰不屬於這座城市的線索，而我們每個人、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也都不斷靠著這些不成文的默契，安靜的區別、分類彼此是否屬於這座城市。

久而久之，我隱約地發現生活在台北的人們都非常習慣以「台北」來合理化自身的不平和疑惑，例如，當你抱怨令人感到窒息的高額房租時，人們會對你說因為這裡是台北，你必須要習慣；當你碎念生活飲食的花費很高時，人們會對你說因為這裡是台北，你必須要習慣；或者，當你有天猛然發覺你已跟不上旁人的腳步，害怕自己要被這座城市淘汰時，人們還是會對你說因為這裡是台北，你必須要習慣……台北就是這麼的激烈競爭，就是這麼的冷漠無情，而這就是人們企圖走向夢想彼端的必然試煉；所以，無論發生什麼事，台北都不會有問題，台北依然完美偉大，它有著最先進的內涵和外表，它從不犯錯，它仍是人們夢想的所在，但卻很少有人想起那些被這座城市否定和驅除的人們，也沒有人試著理解過異鄉人生活在這座城市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和辛酸，或者試著去懷疑這座城市那裡出了問題，也使得問題永遠都只會是人們不夠努力；就這樣，台北，神乎其技的解釋了所有人們無法釋懷的事物，同時也在無形中掩飾、吞噬了人們必須承擔的苦難和空虛。跟著走、照著做又不思考，似乎就是這座城市的常態，而這一切總是這麼的理所當然，因為……這裡是台北，你必須要習慣。

台北這座城市本身彷彿藏匿著某種神祕的生活秩序，因為它總是能信手拈來的定義各式各樣的人們，也總是能不著痕跡的指揮著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隨時各就各位。人們若想要生活在這座城市，就不得不逐一臣服於它的定義和指揮，否則就將可能被它否定，甚至必須遭逢被驅逐出境的命運。為此，我如履薄冰的服膺著台北從未明說的城市秩序，想辦法讓自己盡快摸透、適應這座城市的默會知識，然後努力讓自己可以過得更好些，活的更快樂一些，變得更像台北人一點。但這個天真的願望在某天終究還是破滅了。

就像那天，站在拒絕吐出千元鈔票的提款機前，餓到發昏、飢腸轆轆又失去受控制的大腦終於忍不住發怒，並對我揭發了赤裸血淋的城市真相：原來，提款卡提領千元鈔票的次數，早就決定了我身為台北人的摩登程度；原來，若沒有手上這張離家時母親交給我的提款卡，我就什麼都不是，我其實只是個披著台北皮的假台北人；原來，我並不屬於台北，我終究只是個靠著像臍帶般的提款卡，貪婪的汲取著那遠在四百公里外且快要崩坍毀壞的家，卻又悻悻然迷失在五光十色城市裡的異鄉遊子。我終於明白，原來……對於勞動家庭的孩子而言，生活在台北的代價，竟是如此之重。

二、憂鬱的異鄉遊子：我，是不是走錯路了？

不知「教育，是階級攀升的捷徑」這句話是否同樣深烙在每個人的心裡？我始終相信這句話，也身體力行的這句話。所以，我努力爭取來到台北的社工名校，然後盡可能的隱藏、消弭生活在台北的諸多不順，盡可能的吞忍漂泊在異鄉的孤獨和寂寞，盡可能的努力認真念書，盡可能的告訴自己只要熬過辛苦的日子，等著我的明天一定會更美好。是的，我記得很久很久以前，我曾是這麼一個積極、樂觀的孩子，有著無比的自信，堅信著自己能夠更好，也必然將會成為一名能夠讓人們重拾笑容的好社工。但不知為何，當我來到台北，進入政大，成為一名自詡為知識份子的研究生後，「社工」卻開始變得很複雜，複雜到我完全看不懂也釐不清，甚至還開始回過頭去不斷懷疑自己能不能夠成為一名「社工」：當我真正擁有漂亮的政大研究所學歷，也幸運的考上有被專業體制認可的社工師證照後，我某天赫然發現我已經沒有昔日助人的熱忱與感動，我常覺得我不快樂，覺得混亂，覺得惶恐，覺得憂鬱，覺得悲傷，心裡不斷孳生自己是不是走錯路的內在衝突，只因……我在台北，在政大……我發現，我……好像不被人們認為是「社工」……而且，我還越來越懷疑念社工的書、考國立的社工所、來台北見世面、擁有社工師證照對於自己成為一名社工和精進自身的助人行為，彼此之間似乎完全沒關係！？

我不懂，我到底怎麼了？

第二節　糾結難解的「不對勁」：我，是／不是社工？

對很多人來說，能夠成為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的研究生可能是令人非常歡欣鼓舞的人生樂事，但當我真的來到夢寐以求的政大社工研究所後，除了必須面對有些惱人的家庭經濟、長期成因不明的水土不服[58]、努力適應緊湊的課業、濕冷的天氣及快速生活步調等一連串的生活問題之外，同時卻也意外驚覺到我先前所學的社會工作，好像不被許多師長認為是正統的社會工作！？更可怕的是，當我對別人傾訴我的遭遇和問題時，沒有人願意相信我！對此，我只能不斷的說，不斷的問，不斷發狂的怒吼，但總是沒有太多的人能夠理解我。最後，連我自己都開始覺得是不是我太敏感、太神經質、太愛抱怨。我每天都有一種崩潰發瘋的衝動，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似乎碰上了一個前所未聞的超級大麻煩。

壹、從朝陽到政大的「不對勁」：不被「認可」的自卑？

對於自己能從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到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成為知名、頂端社會工作學院的研究生，我曾感到無比驕傲。想到接下來可以享有圖書館裡大量的藏書，以及能夠和來自各校的優秀同學，還有眾多深具學術名望的師長一起教學相長，更是令我欣喜若狂。但這卻只是曾經，就只是曾經。恩……曾經。遙想離開大學母校時，師長臨別前千叮嚀萬囑咐：「好好加油，我們已經把能教的都教給你了……去吧，你一定會變得更好，……**去讓那些台北的老師知道我們朝陽的學生只是英文差了一點，但專業能力可是完全不輸給任何人**……還有記得謙虛一點，姿態放低一點」的勉勵和教誨依稀在耳，但當我到了政大之後，現實竟是遠比我原先預期的還要複雜百倍。

一、莫名的「不對勁」：我／朝陽科大社工很糟糕？

研究所開學的第一天，碩一新生和碩二學生各四人，共八人，按學年分坐在 U 字桌的兩側，而教授坐在 U 字的底端，並依序詢問台下的我們感興趣的方案領域和主題，由於還搞不太清楚狀況，我依稀記得我是回答：「……老人送餐評

[58] 初來政大時，我幾乎是只要一喝下校內飲水機的白開水，就會開始不斷拉肚子。而這種症狀大概要到第一個學期末，才逐漸慢慢好轉。

估方案……想要結合便利商店，可以在社區送餐／供餐……」之類有點不太完整和天馬行空的突發奇想。但可能是我回應說錯了些什麼，師長隨即板起臉孔對我訓斥：「**你那間學校畢業的！怎麼被教成這樣子！？**」並接著問我：「**你們學校是不是最近設立了老人什麼的系……你們那些學校都只想著要賺錢……。**」[59]師長晴天霹靂又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激烈反應著實讓我呆若木雞且又驚又恐，可是當我想試圖澄清些什麼時，卻隱約察覺到坐在對面的學長姐們深鎖眉頭，呈現出非常戒慎恐之的表情，我的身體直覺馬上敏感的告訴我，這裡的師生關係和界限似乎跟以前大學非常不一樣。我不能用以前的學習經驗來處理眼前的狀況，我若繼續說下去必定會大難臨頭，我即刻就要修正自己愛問、亂答的言行舉止，要變得正經、拘謹一些。於是，我暫時選擇了沉默。

對於第一堂課的震撼教育，我當下最直覺的反省是意識到我自己的所學不足、專業程度不佳、態度過於自滿或還未適應政大的師生關係所造成的誤會。只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卻又慢慢發現這似乎不僅是針對我個人的問題，或者是單一的事件和誤會。相關刺耳、不堪或特別針對技職體系科大院校社工系所的批評語句，在台北的求學過程中，在不同場合時有所聞[60]。身處在眾人稱羨的學術殿堂裡，我一次又一次的遇見、聽聞許多位高權重的教授坐在黑板前，瞇起了眼睛，靜靜細數、評論著古往今來的社會工作學院。台下的研究生總是屏息以待，或皺起眉頭，心裡一邊惟恐台上的教授為何遲遲還沒說出自己的大學母校，一邊擔憂等等會不會冷不防的來一句招架不住的批評指責。每當我嘗試順著教授嘴邊念過的歷史珠璣放眼望去……台大、師大、北大、東吳、東海、輔仁……隨即都可以看見有人自信滿滿的會心一笑、有人露出狐疑的表情，有人如釋重負鬆了一口氣，有人猶疑不定坐立難安、有人面無表情……但無論如何，我總是確定自己會是最失落猶疑的那個人，因為打從一開始，我就知道我的母校不會被提起，就算有機會被提起，往往也只是一連串卑下難堪卻又無力駁斥的奚落[61]。

---

59 2007 年，我大四，我進入政大的前一年，朝陽設立老人事業服務管理系，創系主任為原社工系的陳麗欣教授。也因為我大四時是老師的教學、研究助理，使得老服系的南部迎新，家長校園參訪，學弟妹們剛入學時的活動我幾乎是無役不與，所以我當下對於政大師長的反應非常不能理解，也非常的氣憤。

60 例如：某國立研究所最近很糟糕，收了一堆科大的學生（偏偏那間學校這些年來只收了母校的學生）；那間機構怎麼都用朝陽的；或我也曾在同學論文口試的會場，聽見外校師長公開批評中部學校的實習制度都亂搞，但非常不巧的是……她是母校的評鑑委員。

61 我在這段期間實際問過幾位來台北念國立研究所的母校學弟妹，他們或多或少也曾有過類似的經驗。

二、思緒越來越焦躁混亂的我：我，不知道我怎麼了？

有別於大多數研究所同學來自高教體系普通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的出身，政大社工所創所以來唯一畢業於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系的我對於師長慣以學校出身來評定專業能力高低的方式，總是既生氣又不解。啞巴吃黃蓮的感覺更是讓人渾身不舒服，十分的不愉快、不服氣也不甘心，但我不知道我該說些什麼，也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說（或者是說，在這種氛圍中，我感受到我多說只是會多錯，並更讓自己陷於過度突出的不安情境）。於是，不想被看不起，不想認輸，不想讓母校丟臉，想要證明自己大學階段所學不虛，想要以身作則駁斥師長們對於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系所不利的言論，想要變得更好，想要被肯定，想要被認同、肯定的念頭如噪音般，開始不斷從四面八方穿過耳膜警告我還不夠努力，時時刻刻催促著我要更奮發向上，三申五誡的告訴我不可以輕易低頭認輸。

我努力的想要讓自己恢復正常生活的步調，想盡辦法找回原有的自我價值，可是我偏偏又遇到一個很大的麻煩。來到政大研究所後的閱讀幾乎都是以英文為主，但英文剛好是宛若外語文盲的我一時之間無法完全克服的死穴。英文程度低落對於我的學習造成了相當程度的阻礙，特別是時常看到身旁許多同學們信手拈來就可以翻出一大段，總會不自覺的萌生一股害怕自己翻譯錯誤或曲解文獻的挫折和無力；接連幾次下來，就算同學和師長沒說什麼，回家拿起自己語句不通又錯誤百出的翻譯時，我也不禁開始擔心，更不斷回想起台上教授先前對於我的批評是否屬實，我是不是從前沒有學好？來自糟糕的學校？難道，我從前所學的，真的是非正統、亂七八糟的社會工作？

後來，即使偶爾因為課堂或實習表現不錯而被師長在督導、外人面前誇獎我很優秀[62]，無以名之的不對勁，卻依然還是不斷湧上心頭：為什麼代表政大的我就是優秀？但代表朝陽的我卻是低劣的？為什麼好的都歸政大？不好的全部歸朝陽／科大社工[63]？我明明是同一個人，都做著同樣的工作，為什麼學校之間的

[62] 在暑期實習的成果發表會上，學校督導在我和我機構督導面前，對著我的實習夥伴說：「**我們家志南很優秀，如果給你很大的壓力，在這裡先跟你說聲不好意思。**」說真的，我那時並沒有覺得因為被誇獎而感到任何喜悅，反而是覺得很愧疚，回去後還不斷向督導和實習夥伴道歉。

[63] 我始終覺得奇怪的是，我自覺我是個能接受師長說「我」不夠好，不夠認真的學生。但更多時

程度差異真的有這麼的大？

貳、越來越不對勁又無言以對的「不對勁」：錯置的自卑情結！？

研究所的日子一天一天過，難懂的英文文獻字字查篇篇翻，我一點一點的慢慢從英文文盲進化為識字階段，但坐在教室裡，環顧著學經歷皆無懈可擊又十分照顧學生的師長、表現優異且適應良好的同學，回頭對比著混亂又毫無存在和價值感的自己，越來越覺得格格不入。我總是小心翼翼的擔心自己那邊表現不夠好，害怕這又會讓台上的師長無心或冷不防對我來了一句：「**這麼聰明的一個孩子，可惜以前沒有被教好。**」[64]

我想不通，為什麼我／科大社工在政大社工所一直無法甩脫「科大社工就是不如他人」的印象？我無從得知或求證這些鄙夷的話語是師長們自身對於不同院校社工系的刻板印象、或偏見，又或者只是無心的口頭禪，亦或是惋惜我沒有認真努力學習，但這些是我來政大後心底最大的困惑和疙瘩，且一次又一次莫名挑釁著我記憶深處「我出身不夠好、我不如人、我和父親一樣沒用」那條最敏感的自我認同神經；後來，我警覺到當政大師長們說出類似話語時，我不由自主的立刻會想起開學第一堂課的畫面，以及師長在台上暴怒、毫不留情否定我的神情，我的情緒就開始會遊走在焦躁、不安、防衛、抵抗、憤怒及失落的狀態：我一方面期許自己能夠成為一名實現家庭期待、符合社會、專業要求，優秀卓絕的政大研究生；但另一方面，來自技職體系的我同時也越來越對於某些師長對於科大社工的批評指責感到不平與質疑－我是誰？我是朝陽社工？我是政大社工？為何我總是覺得自己持續來回擺盪在追求卓越與被賤斥（abject）為他者／劣者的二元對立論述裡，如同失根的浮萍不知道自己該歸屬何處？全然相斥的思緒裡蘊藏著一股越來越詭異的矛盾、混亂及無法壓抑克制的憤怒。

候，我發現我犯錯時，政大的師長很常對我說：「**因為你們學校就那樣啊。**」(譬如偏重實務技術性的教學、不擅長政策性的統整思考)頭幾次聽到時，我曾一度認為還滿有道理的，所以縱使心裡有點不舒服，我自己也是摸摸鼻子認了。直到師長有次又對我說出同樣一句話時，我猛然注意並確定真的有那裡怪怪……因為那一次討論的主題是個案、實務類的問題，問題的邏輯卻顛倒過來了；而這種情況也就這麼毫無邏輯的反覆發生著。

[64] 研究所師長對我非常照顧，對於我能力不足之處也多有提點和協助，但我始終無法明白，為什麼每當提起我的母校時，她們傳遞的語句總是讓我非常的不舒服，而且時常帶有輕視和貶抑。

於是，為了修補徬徨不安的矛盾思緒，我不斷試圖由身旁的重要他人找到可能的答案來安頓自己止不住的徬徨焦慮，但我總是得到類似於「我想太多」、「我太偏激」、「我為何不滿足、接納現況」的回覆。譬如，我的母親對我說：「這一切都是我的自卑感在作祟」、「朝陽跟政大的社會評價本來就不能比」、「比不上人家就更努力」；大學的師長對我說：「教授說的不是你，是那些更後段又更糟的科大學生」、「你要對自己的母校的教學更有自信一點，不要活在別人的世界裡」、「你以前一直都是前幾名，是最優秀的，是被老師們捧上手上的大珍珠，但你在政大只是閃耀星空裡一點小星，你自己要學會調適，不要因為得不到師長的關愛就沮喪」，或者是說：「因為你在的地方叫政大，這就是社會的現實」；政大的師長對我說：「你不能一直死守著朝陽的經驗」；我的研究所的同學對我說：「唉呦，壞學校有好學生，好學校也會有壞學生啊！你都在政大了，你徹頭徹尾都是個政大人，不要在乎老師們說的話，相信你自己，做好你自己就好了」、「如何在教授們的專業、權威及個性下，磨出自己的樣子，是研究生必然要面對的課題」、「你的能力不管去那工作都一定都沒問題，而且實務界不會只看學校出身，別繼續賴在這個莫名其妙的問題上，這沒有任何意義」、「別管那麼多，什麼都是假的，只有趕快寫完論文、趕快畢業、趕快拿到學位才是真的」。

面對眾人苦口婆心的勸，我努力理解、吸納每一個提醒，但我總覺得他們說的都不對，總覺得他們都根本沒有「同理」或協助「解決」我的問題。我很確定我的問題不是自卑、我不是想要贏過別人，我的問題不是不要去理會、回想就會沒有事。不知為何，我真的很想多說些什麼、多回應些什麼，卻總是無法有條理的說出個所以然；我總覺得自己彷彿處於一種精神分裂的狀態，只能極力壓抑著心底的恐慌和不滿。更惱人的是，我發現我越是想處理它，它就變得越是混亂糾結[65]。然而，原本就已經十分混亂的精神狀態，在我碩一升碩二暑期實習時遇見一位私立社福系所的小女孩後，終於完全崩潰決堤，更被無限放大。

「你是政大的……你超強的……你一定什麼都會……但我……無法。」

[65] 關於自我長期性的混亂，很久之後我才偶然經由夏曉鵑(2002：83-84)敘說自己留學時被白人歧視的經驗中發現，我的混亂肇因於「只要把每個人當成個體就能消弭族群偏見」的個人主義，這其實是強勢群體迫使位居弱勢群體的個體必須排除自身的集體認同，成為孤立流離的個體，並只能由優、劣二元對立的認識論中選擇出唯一、純粹認同所引發的斷裂經驗。

打從第一次見面開始，小女孩總是畢恭畢敬的把這句話掛在嘴邊。面對我時，無論我和督導說什麼，她就是她認定她自己比較差。她天真的臉龐完全不帶任何一絲的猶豫或遲疑，這也讓我很確定她不是奉承，不是虛偽，那幾近無瑕的真摯和肯定的態度，反而流露出一種讓我不寒而慄的恐懼。但，我意識我止不住的冷顫並不是顧慮自己聰明智識輸給她，而是她的身體、言行及反應就如同一面誠實的三菱鏡，毫無保留的來回映射出我最真實的模樣—作為科大社工的自己，害怕被他人賤斥的自己；作為政大研究生的自己，期望被眾人肯認的自己；期待地位攀升，卻又害怕壓迫他人的自己—很不可思議的異常現象發生了，為何在政大自覺被否認，害怕被賤斥的科大社工，如今竟然會成為自己當初最不屑、厭惡、敵視的壓迫者！？

不，這不可能啊，我怎麼可能變成壓迫者！？

她，一個來自社福相關系所的小女孩對於我的想像和投射，讓我再一次注意到自己諷刺又矛盾的存在。我確定這不僅僅只是人們所說的自卑情結，不是以往人們習慣認知、描述的缺乏自信，更不是人們說不要去理會就會自動消失的問題。但究竟是為什麼眼前的這個小女孩的言行舉止，會和當初剛來到政大的我如此相像？為什麼我會變成壓迫者？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難道，有問題的人不只是我一個人嗎？天啊……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我會找不到合理的答案？

第三節　躊躇在理智邊緣的自我懷疑：咦，我們不是「社工」嗎！？

這股糾纏難辨的不對勁究竟是什麼？我一直在探索這個來路不明的難題，而摸不著頭緒的混亂更是讓我的精神不斷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我真的很想對身邊的同學、友人說些什麼，卻又不知道該怎麼說，不然就是即使說了別人也理解不能的狀況一直持續膠著；不被理解的懊惱，接連浮現生活鬱悶的都快要逼瘋我；特別是當從早到晚都坐在書桌前，課堂派下來的英文文獻怎麼都念不完，或者是電話的另一頭又傳來母親身體微恙、父親酗酒和賭博欠債的惱人瑣事連同生活的壓力一個接著一個全部攪和在一起時，苦悶更是升到最高點；太陽出現的白天，我可以是一個能和同學們說說笑笑、打打鬧鬧的開心果，但在許許多多的漫漫長夜，只要我不小心回想起開學第一天被師長責難的畫面，我就只是對著牆壁哭，

哭到不斷打電話給親近的人，然後再不斷的哭；哭到身邊每個人好說歹說都是還束手無策，口氣開始露出些許厭煩，逐漸不願意理會我，甚至冷不防的脫口說出：「你是不是有憂鬱症？你要不要去看醫生」[66]時，我終於不哭了，因為我確定人們根本從未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在那當下，我終於明白，我只能靠自己把困擾我的椎心之痛說清楚和講明白。

壹、從「我」到「我們／社會」的問題：個人－集體－社會的視框挪移

難懂的不對勁一點一點的侵蝕著我日常生活中所有的言行舉止，如研究所的同學就不止一次提醒我，跟他們在一起時，我的口語表達幾乎都是「**你們政大**」和「**我們朝陽**」，有幾個同學還為此曾對我反應過「**我從沒把他們當成自己人**」、「**我缺少政大社工所的認同感**」、「**我拒絕融入他們，成為政大社工所的一份子**」。不知為何，我跟我同學們的感情很好，但我始終打從心底抗拒和嫌惡承認自己是政大社工所的一員[67]，可是我又很難對十分關心我的研究所同學清楚表達我意識深處的野性直覺總是不斷隱約傳來「**成為政大人的前提和代價，就是承認自己是卑賤的朝陽人**」的斷裂衝突。

我曾想試著對週遭的研究所同學解釋，但幾次之後，我發現身邊大多來自社工名校或非本科系的研究所同學無法完全體會，也很確定他們身上並沒有發生我所遭遇到的問題，而我也暫時沒有辦法真正把我的問題給說清楚；於是，一方面抱持著某種固執又消極的抵抗[68]，一方面我卻也越是跟正常無礙的他們相處在一起，我的內在衝突就越嚴重。對此，我好幾次想交出休學單好讓自己能夠一了百了[69]，無所不用其極的想逃離這種裡內外煎熬的瘋狂窘境，可是每當想起當初對於母親和大學恩師的承諾，我每次都還是默默回過頭來面對眼前越來越混亂、斷裂的景象。而此種左搖右擺的精神狀態一直要到 2012 年初，我論文計畫書口試

---

[66] 這個提問是我就讀研究所和書寫論文的過程中，最無助又最錯愕的精神打擊，我知道我在這段期間有著非常嚴重的情緒困擾，但我卻不知道我該承認還是該否認「我有病」，而這也使得我有幾度想試著去掛精神科，不過我最後都沒有成行，因為我總覺得有那裡不對，而我去看病，不就是承認我自己有問題嗎？

[67] 幾個念台北國立研究所的學弟妹後來也對我說，他們在自我介紹時，也一定都會不由自主的先強調自己是朝陽科大畢業的，接著才會說研究所的名稱。

[68] 我有時候會以戲謔的口吻對政大的同學或學弟妹說：「你們好像毫無個人特色、整齊劃一的高級罐頭。」

[69] 我在論文計畫書口試之前，我的書包幾乎是隨時放著一張休學單。

結束，開始訪談與我有相同遭遇的社工人後，我對於問題的認識，才又逐漸有了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轉向[70]。

一、我／科大社工人的原罪：科大社工，是社群的他者？

其實，現在回看我的訪談和田野記錄後，我會覺得這很像是一段尋找同伴、協助自我充權及促成意識覺醒的歷程。更重要的是，透過大量的訪談和對話經驗，我越來越確定我遭遇的問題，不只是我個人的問題，只因許多科大社工都曾遭遇過和我極其相似的集體問題。

譬如，有受訪者略帶哽咽的對我闡述她研究所的師長不只一次在台上直言：「**技職體系和中、後段的大專院校根本不應該設社工系所**」的尷尬場面，我馬上就連想到這不就是我在台北、政大社工所的遭遇嗎？當時，她和另一位來自他校的科大社工、後段大學的高教社工彼此互看一眼，更不約而同的在心裡問了自己：「那坐在這裡我們是誰？我們不是社工嗎？」於此同時，人在南部工作兩年多，剛進入屏科大社工研究所就讀的母校學妹輾轉聽聞我的研究主題後，立刻打電話聯絡我說：「學長！我知道你的感受……我也以為我從私立科大的社工系來到國立科大的社工所，我的身份就能夠有些不一樣，就能夠更被其他人肯定，但當國立社工所畢業的主管對我說『你還是科大生』時，我才發現我在她眼裡依然是糟糕的科大社工……我們真的那麼糟糕嗎？」然而，此種被社群成員賤斥為他者，不被認可為社群成員又有苦難言的苦悶感受，並不全然是極少數成員的特例，如有位正就讀嘉藥社工系四年級的網友也曾來信對我傾訴：

> 「與同學討論實習經驗時，在醫院實習的同學在第一天上班與來自知名私立大學實習夥伴一同與醫院執行長會面，執行長所給予的態度的確有很明顯的差別，而執行長或許也看不出來我的同學對於助人這個工作抱有多大的熱忱，以及他在學校所努力的優良成績」（摘自信件文本）。

[70] 在計劃書口試時，兩位口試委員都非常鼓勵我除了整理自己的經驗之外，同時也可以試著訪談有類似經驗的科大社工，因此我主要是透過網路和個人的人際網路，以滾雪球的方式徵求曾經因為自己是科大社工而自覺遭受他者排斥、羞辱或是常認為自己技不如人經驗的受訪者。

除此之外，在訪談過程中，我也接連遇到好幾位畢業於科大社工系的實務工作者對我透露，他們在求學期間（主要是實習階段）就已常自覺不被知名社工院校的夥伴當成自己人，或者是剛進入職場時只要遇到東海、東吳、暨大或者其他知名社工系所的工作同儕，心裡常不由自主的出現一股莫名的壓力，例如有位受訪者曾向我反應：「我剛開始工作時，每次看到那個台大畢業的……我就好怕……。」這不就是我暑假實習時小女孩的翻版嗎？

不過，當我進一步追問她：「即使一起工作了幾個月後，還會覺得自己輸給他們嗎？」她卻又是想都沒想的說：「不會，這種感覺會在工作過程中逐漸消失，我覺得我自己沒有比較差」。聽到她的回應，我心中鬆了一口氣，因為我以為這個問題將會隨著時間和經驗的累積而逐漸被淡化，但隨著訪談的進行，我很快的卻又發現這其實只是我個人一廂情願的錯誤期待。許多科大社工人在後續的訪談中都會陸續表示，這種矮人一截的自覺會在社工師考試後再一次的浮現：因為……這些受訪者絕大多數都考不上社工師執照。

事實上，這是一連串頗為弔詭卻又很少被人們正視、公開陳述的問題和現象，接受我訪問的科大社工或多或少都肯定自己能夠勝任目前的工作，但不擅考試的他們卻對於社工師考試感到十分挫折，而這不免也讓他們對於社會工作專業開始有些質疑，例如有好幾位受訪者都曾反問我：「如果我當初很會考試，我就不會念高職，更不會念私立科大了啊，不是嗎？……社會工作專業需要的到底是要會念書、考試的社工？還是要會做實務的社工呢？」

經過與數十位科大社工的經驗分享和對話訪談，我確實發現有許多科大社工都曾因學校出身的關係而有被社群成員賤斥為他者的經驗，或是在實務的工作場域中出現某種自我懷疑或自卑情結，最後甚至還必須面對自己被專業體制的社工師考試否定的窘境。不過，我也開始注意到我／科大社工人的問題並不是單獨發生或單一的特例，而是從**在學、實習、職場再到證照考試的連續且正不斷變化的多重問題**，所以我接下來想要繼續追問的是：為什麼有這麼多像我一樣的科大社工人會不斷發生以上種種的問題？透過一連串斷斷續續的對話、訪談及反思整理，我開始隱約的警覺到此刻發生、作用在我／科大社工身上的問題和現象，絕對不單只是個人層次的問題，而應是集體共同的斷裂經驗，其中更有很大一部份可能

是跟台灣教育體制的升學考試制度與層級分流（下頁圖 4-1），以及社工師法造成的結構性制約脫不了干係。對此，我依稀在我個人問題的背後，看見了社群集體和社會結構規訓、制約的斑斑鑿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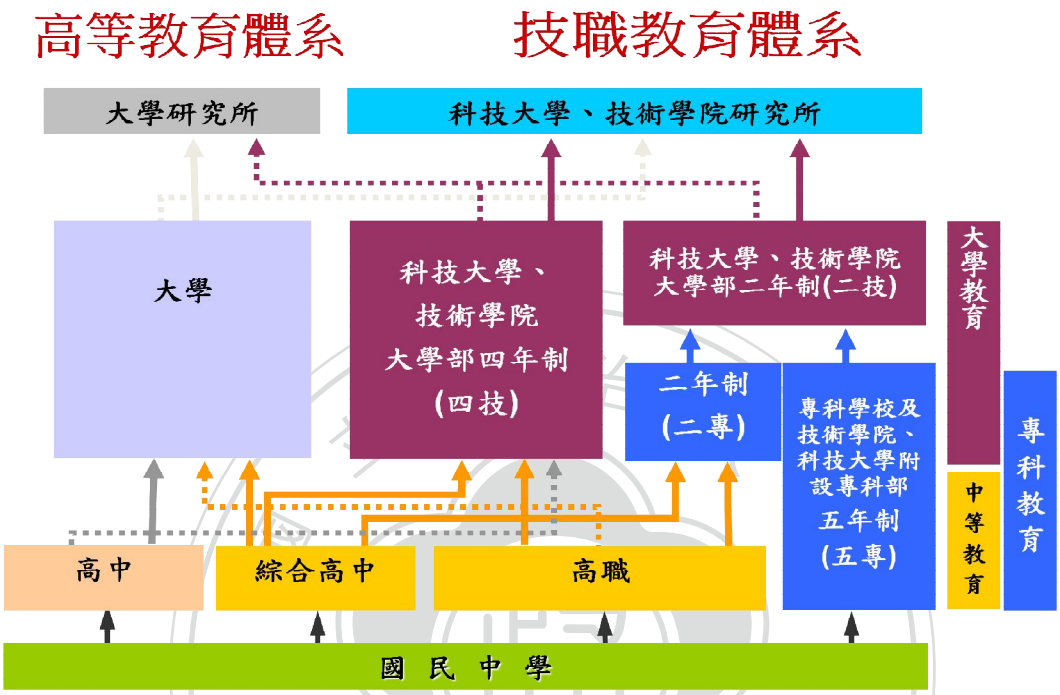

圖 4-1：台灣教育體制的升學考試制度與層級分流[71]

二、其他社群夥伴的自我懷疑：耶？原來你不是「社工」！？

無獨有偶的，就在我逐漸對於問題有了一番新的見解時，另一群不屬於是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的社群夥伴，在透過網路上或朋友間口耳相傳而聽聞我／科大社工人的經驗分享後，出乎意料的也一個接著一個跳出來發聲：原來，有許多社群夥伴也遇到了和我／科大社工人一樣的問題：他們同樣遭遇過自己「是／不是社工？」的認知／認同斷裂。

[71] 資料來源為教育部技職司。圖中實線箭頭是學子們主要升學路徑，虛線為次要的升學路徑。通常來說，台灣的教育體制主要是以九年國教為基底（國小六年，國中三年），之後依據考試成績的高低分流為高中、綜合高中、高職及五專；然若我們實際以大多數社工人的升學路徑為例觀察之，我們可以看到在目前的升學、考試制度與層級分流下，高中和綜合高中有較多的機會可選擇進入高教體系的普通大學和技職體系的科技大學之社工／社福／相關學系就讀，然而當初選擇進入技職體系的高職學生，其實是沒有機會進入高教體系普通大學的社工／社福／相關學系，以致我們在高教體系的普通大學社工學系裡只會看到高中生，反之在技職體系的科技大學社工系中卻同時能看見高中生和高職生的流動軌跡。

1. 是，但又不是完全是社工的社福系夥伴

關於非科大社工的受訪者，我最先遇到的是社福系的夥伴。我記得有一位受訪者先是對我分享曾有社工本科畢業的前輩在公開場合詢問他的畢業學校後對她說「**社福系的不算是社工**」的經驗；但在後續的訪談過程中，雖然該位受訪者一度對於社群的內部分化感到有些失落和不解，不過她最後還是表示她其實能夠釋懷接受這種說法。她答道：畢竟認真說起來，社福系本來就沒有像社工本科畢業的學生那麼「社工」；聽到她的回應，我很快就想到社福系夥伴的自我懷疑，主要的起因可能是來自於台灣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的學科關係不同於歐美的學科分野，因為台灣社會工作的研究與教學通常包含社會福利，但社會福利則不一定兩者兼具，或仍不甚完整（林萬億，沈詩涵，2008a），以致社福相關系所的夥伴難免產生一種「**是，但又不是完全是**」的模糊定位[72]。畢竟，他們能考社工師，也有許多人在政府、民間社會服務事業中工作，如果要說他們完全不是「社工」，好像有點說不過去。對此，我好像也只能先將問題暫時擱置[73]。

2. 不被認為是「社工」的社群夥伴？

接著定位不清的社福系夥伴出場的受訪者，是衝突經驗更加外顯的學分班社工和神學院社工。學分班社工很直接的對我表達說他就讀的研究所時，他的系所很強硬的不承認他曾經修習過的學分，因為學分班的訓練素質往往很容易直接被人們預設為是沒有品質的，是不合格的[74]；另一位任教於神學院的教學者則是一臉無奈的說她們／神學院社工已經是被社會工作排除、遺忘的他者，而她接下來也可能因為學生數的銳減而失業。平實而論，我認為學分班社工和神學院社工被否決和排除經驗的共通點，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大概是出自於學分班和神學院都不屬於正式教育體系（四年制的大學教育）出身的「學院派社工」……但他們真

---

[72] 除了社福系的朋友之外，後來也有一位陽明衛福所的朋友向我反應，他有次報名某社會工作專業協會的相關活動時，該單位就以他不是「社工相關」系所的學生拒絕他報名參加。

[73] 我也曾趁著參加某次工作坊的機會，公開詢問過中正社福系的某位教授：「**您覺得您教的學生是社福還是社工？**」該教授很明確的回應我說：「**我很確定我教的是社福……但其他老師我無法肯定。**」由此可見，社福和社工的糾葛似乎不是一個能輕易解決的問題；另外，我想要特別補充的是部分，我後來也遇見部分醫社系的夥伴似乎也有著與社福系夥伴類似的經驗。

[74] 此外，有位學分班社工曾跟我說：「**之前機構評鑑時，常因為是學分班社工而被評鑑委員挑毛病，但自從她念了知名研究所之後，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的不是社群的一份子嗎？不能被視為是「社工」嗎？說真的，在多次親身經歷，以及聽聞多位夥伴被賤斥的經驗後，我似乎無法很肯定的認定他們不是「社工」。

3. 輔大社工系畢業的社工，快要不是「社工」！？

透過一連串的訪談，最後讓我能夠順利定調、聚焦的關鍵，是當時就讀輔大社工研究所的好友「後山」[75]脫口而出「**我以後說不定不是社工了……因為新制的社工師法快要讓我不能考社工師了**」的怨嘆[76]。而且，後山同時更反問了我一個問題：「**你忘了你師弟（意指老王另一位跨校指導學生），你看他從台大財金系畢業，考上台大社工所後最多也是再補修過幾個學分，這樣他以後能算是社工嗎？這跟學分班社工有什麼不一樣？台大社工所出來的真的比學分班的好？**」[77]後山的突來反應和質問推翻了我原先的研究假設（我一開始認為高教體系社會工作系的學生應該不會有與我類似的經驗）。特別是當我看見連輔大社工系畢業，正就讀輔大社工研究所的後山，身上都還會發生和我類似的衝突和不滿時，我終於翻轉、頓悟眼前的分崩離析的混亂光景似乎真的不只是我個人的問題，更不全然是我／科大社工人的錯。我更加確定台灣社會工作對應的教育體制和專業體制有很大的問題，是它讓人們錯亂，讓人們受苦，更讓許多人必須不斷懷疑自己「是／不是社工？」

貳、變調的社群關係：異化人性的「分類」系統 ？

經由前述的討論，不論是科大社工或不是科大社工，我發現絕大多數的社群夥伴原先對於「社工」大概都保有一個常態性的認知基模。例如，我個人最初的認知基模原先大概就如張紉、林萬億、王永慈（2003：51）對於「社工」所下的概念定義：「**接受過社會工作學士學位以上的教育訓練，以及完成一定時數、受到督導的實務工作**」。但我後來卻又發現這個定義完全無法解釋我／科大社工人被社群夥伴賤斥為他者的經驗和現象：因為我完全符合上述的條件。

---

[75] 在我眼中，後山是個非常有想法和行動力的朋友，他更是我探究、思考問題過程中很重要的對話者，而我也因為他的關係，陸續認識了許多對於社會工作有所懷疑的社群夥伴。

[76] 後山會這麼說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他之前沒修過「方案設計與評估」、「社會福利行政」，而這將影響他在 2016 年後無法符合社工師考試的考試資格。

[77] 這段我稍微有以比較誇飾的口氣呈現，但因為我們三個人其實彼此都算熟識，後山當時其實是以一個吐嘈、挖苦的語氣帶出這個問題。

對此，如果說真的有越來越多社群夥伴和我一樣開始不斷對於自己「是／不是社工？」感到困惑或自卑，那麼究竟誰才是能夠代表台灣社會工作的「社工」？又或者是誰才能問心無愧的被稱為「社工」？問題到底是出在那裡？就我先前的敘說和書寫的生活故事中，這個困惑是真實存在的，我確定它是源自於社群內部的個體（主觀）試圖走向社群全體（客觀）時遭遇「**我以為我是社工，但他者卻認為我不是社工**」的認知／認同斷裂，且這並不只是我個人哀怨自憐的呢喃自語，而已經逐漸是部份社群成員的共同經驗。所以，若我想要了解「誰是／不是社工？」，我接下來似乎不得不先回頭自問我自己究竟是如何看待、認識彼此？如何區別彼此「誰是／不是社工？」呢？

一、「社工」的「分類」：你，是那一種「社工」呢？

「分類」（categorization），是形成人類思維、認同，還有認識彼此的基模由來，亦是形成人類社會集體秩序的基礎（王志弘、許妍飛譯，2006）。因此，「分類」這個動作通常帶有社會整合的功能，也藉由各式各樣的分類系統，人類社會才得以有條不紊的穩定持續運作（陳逸淳，2003）。基本上，「分類」的運作方式通常是透過反覆將擁有相同特徵的人、事、物，不斷分化、整合、歸類為某一群體，並賦予其某種命名、印象及秩序。就好像是我們時常會依據性別、種族、國籍的分類結果來對群體內的成員特質進行推論，藉此協助自己能夠快速的形成某一種認識、理解或行動來回應他們，賦予其相對的意義。如在男／女的分類中，「男生的力氣會比較大，適合粗重的工作；反之女生通常會比較細心，則適合文書記帳的工作」就是一個頗為鮮明的生活實例。

那……我們（社工）是如何「分類」彼此呢？

雖然，我在大學階段就曾約莫注意到「社工」之間除了校名的差別之外，似乎仍還存在著某種眾人皆知卻很少明說的細微「分類」（大概是因地區的關係，我從事志願服務時大多會遇到東海社工系、靜宜兒福系、中山醫醫社系的服務夥伴和志工督導，或者有位一直很照顧我的志工督導就是學分班的社工，聽他們分

享自己的求學經歷時，常會讓我覺察到他們的學習路徑和我很不一樣。至於我會這麼敏感的原因，我想大概因為我自己是五專電子科轉學生的關係），但讓我真正確定「社工」的「分類」的契機，則一直要到我回想起大學畢業（2008 年）第一次報考社工師考試必須填選自己是第幾類的報考資格時（如表 4-1），我才終於恍然大悟。

表 4-1：舊版的社工師法考試資格（2012 年底前適用）

	中華民國國民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應本考試：	法條指涉、影響對象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科、系、組、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	具有專科／大學學歷的社會工作的**本科系**畢業生／社工
二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相當科、系、組、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曾修習社會工作（概論）或社會工作（福利）理論、人類行為（發展）與社會環境、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或社區工作、社會（工作）研究方法或社會及行為研究法或社會調查與研究、社會福利概論或社會福利通論、社會福利行政（與立法）或社會工作管理、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社會工作方法或臨床社會工作或醫療社會工作、高等社會工作或高等社會個案工作或高等社會團體工作或高等社會社區工作或進階社會工作或進階社會個案工作或進階社會團體工作或進階社會社區工作、社會工作督導、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或社會服務機構（行政）管理或方案規劃與評估、社會政策分析或比較社會政策、家庭政策或家庭（福利）服務或家庭社會工作、社會福利（服務）或兒童福利（服務）或青少年福利（服務）或老人福利（服務）或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或婦女福利（服務）等學科至少七科，合計二十學分以上，每學科至多採計三學分，其中須包括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有證明文件者。	學分班社工
三	中華民國九十年七月三十一日前，經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青少年兒童福利、兒童	2001 年七月底前設立之社福／相關科、系、組、所畢業

	福利、社會學、社會教育、社會福利、醫學社會學等科、系、組、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	生／社工
四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具有國內公立或立案之私立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以上非社會工作相關學系畢業，有國內社會工作實務經驗二年以上，並領有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證明文件者。	2000 年底前非社會工作相關學系畢業，具備兩年以上工作經驗的實務工作者
五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具有國內已設立十年以上之宗教大學或獨立學院之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有國內社會工作實務經驗二年以上，並領有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證明文件者。	1996 年中前神學院畢業生／社工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考選部網站

為了確定、填答自己的報名資格，我是依照表 4-1 的舊社工師法來確認自己的考試資格（2012 年底前適用），而其對於應考資格的區別、判定主要是以四年制大學的「系所名稱」和人們曾修習過的「社工學分數」作為判定社工師考試資格的基準，進而有系統的將「社工」逐一「分類」為**「社工本科」、「非社工本科」、「社福／相關」、「學分班社工」、「神學院社工」**等五大類；於此同時，我也有稍微注意到社工師法對於某些社群成員內藏著排除的時效性，使得未來一定會有些社群夥伴逐漸被排除於「社工」的「分類」之外，造成他們將不再被社群承認為「社工」。只是，想到自己於法有據的屬於非常穩固的第一類「社工」，再加上自己忙都忙死了，那還有時間去關心其他人會怎麼樣，又或者他們難道不會想辦法補足二十學分嗎？

不過，在我來到政大社工所後，我卻又更進一步體現了人們對於「社工」的「分類」並沒有我原先所想的那麼單純、簡單。特別是當我有過突然被政大師長賤斥、責難為「他者」的經驗後，我才赫然發現「社工本科」內其實還必須要再新增一項「分類」，也就是「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的「分類」。就這樣，我依據自己的求學經驗，暫時重新描繪完成我國目前對於各種「社工」的「分類」輪廓（如下頁圖 4-2）。在圖 4-2 裡，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我國社會工作專業體制內的「社工」依序可分為「社工本科」、「非社工本科」兩種；接著，在「社工本科」裡在又可分為曾接受社會工作大學教育的「高教體系（普通大學）」和「技職體系（科技大學）」，以及非受社會工作大學教育出身的「學分班社工」和宗教類的

「神學院社工」；最後，我們還能再從「高教體系」和「技職體系」再區分出「本科生（高教社工／科大社工）」和「社福／相關」兩種社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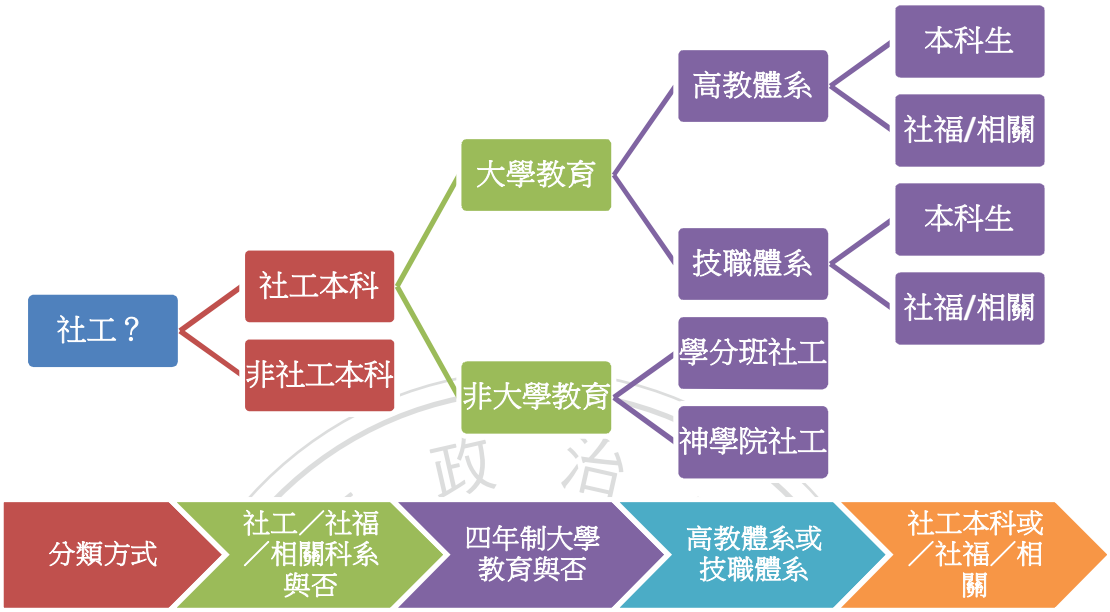

圖 4-2：「社工」的「分類」系統：以舊版社工師考試資格（2012 年底前）為例

就常理而言，在這個「分類」系統中，越右邊的分類結果，照理說應該是越符合我們對於「社工」的認識與印象。然若實際以我自己為例說明，在大學時期的我是屬於社工本科－四年制的大學教育－技職體系科技大學的本科生，人們通常稱呼我為「科大社工」；爾後，來到政大社工所的我，則是變成了社工本科－大學教育－高教體系普通大學的本科生，我將這時候的自己的類屬命名為「高教社工」。只是，比起其他沒有那麼「社工」的社群夥伴，為什麼我／科大社工人卻也常會人們被賤斥為是社群的他者／劣者，甚至是不被認為是「社工」呢？難道，真的就只是因為「技職體系」的關係嗎？

二、持續進化的「分類」：當「學校階序」亦成為判別彼此的常識經驗

身為一名科大社工，我始終無法充分理解我為何「不是社工／不夠社工？」所以，我總是照著圖 4-1 的分類圖示，無時無刻的在想，比起「社福／相關」（如中正與玄奘社福系，或者是高醫、中山醫社系，亦或是靜宜兒福系）的社群夥伴

[78]，母校不論是系所名稱或是課程規劃（像有些系所的社工必修學分大概就只是比社工師法規定的二十學分多一點），我／科大社工照理說應該比他們還「社工」吧？如果他們比科大社工還「社工」，那他們為什麼不乾脆改名成社會工作學系？而且，若真要找出「不是社工」的社群夥伴，不應該是那些不是社工系畢業、跟社工完全沒有關係的「非本科系」、只上過二十學分又四處林立的「學分班社工」，或者是課程規畫大多完全和社工沒關係的「神學院社工」才對啊？無論如何，這筆宛如汙泥的爛帳怎麼算都不應該算到我／科大社工人身上吧！？

然而，也就在我不斷企求足以安頓自我的解答時，母親卻又意外丟出另一個令我更加混亂的問題。母親有天忽然對我說：「你怎麼不是社工？你一定是社工啊，你大學都念完了，你管那些政大的老師說什麼……她們罵你大概就只是因為她們認為政治大學比朝陽科大好啊……一般大學本來就比你們科大好，這不是常識嗎？你書是念到背上去喔？」母親突來的一段話，讓我先是愣了一下，想了一下才回母親說：「什麼，政大比朝陽好？……好啦好啦，我承認政大是一般大學，也比朝陽難考，政大的社會地位比朝陽高，所以政大比朝陽好，但朝陽社工系怎麼說都不應該糟到不被人們視為是『社工』啊？這不對啊，妳不覺得說不通嗎？而且，妳兒子是第一名畢業的耶！」聽見我的答辯，母親忽然啞口無言，隨後索性丟了一句：「我沒念書說不過你拉……不然，你是不會去問老師喔？」

於是，衝著母親這句話，我接著跑去問了某位大學老師。老師聽完我的問題後對我說：「你怎麼不是社工？我們朝陽社工系怎麼會有問題？有問題的是更後面的那些更糟糕的科技大學或普通大學的社工系吧？你認真去看看他們的師資和課程很多都不符規定，所以他們會被批評不意外啊！但我們沒有問題啊，我們朝陽社工系完全照規定來……有些國立大學的教授來評鑑過我們學校後，也對我們讚譽有加啊[79]……你怎麼會對自己、對朝陽社工系這麼沒有自信？又為什麼要不斷把你自己跟那些後段、糟糕的科大學生擺在一起？你明明跟他們完全不一樣啊！」

問題繞來繞去，最後似乎又繞回到了原點。不知為何，我本能的抗拒接受母

[78] 我沒有預設立場，純粹只是想到具有代表性的相關系所作為例子。
[79] 然而，老師口中的幾位教授，偏偏都是我當場見識、聽聞過他們賤斥科大社工的社工教授。

親和老師的言論，我真的覺得有那裡怪怪的。但也就在我反覆來回觀看、整理我和母親及老師的對話記錄的同時，我慢慢覺察到決定「誰是／不是社工？」的「分類」系統，似乎已由原先的「系所名稱」和「社工學分數」的分類方式，進一步轉化為決定「誰優？誰劣？」（或者是說誰比較專業／不專業）的「階序」排列。再者，我認為前述「階序」排列的「分類」標準很明顯的是直接以「學校在教育體制所對應層級位置」為依歸，而其主要則是依據人們過去的「考試成績」排列組合的「學校階序」[80]。換言之，也就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普遍習慣接受、服膺於這個以「考試成績」為主的階序排列，從而使得「高教體系普通大學（高中生）優於技職體系的科技大學（高職生）」的常識認知能夠成立，所以「政大社工當然比朝陽社工好」得以成為一種合理的常態性解釋。而這不也充分解釋了和我一樣的科大社工人遇見國立或私立知名社工院校的社工人時，之所以常會不自覺得出現某種自卑情結，即是因為我們進入了這個以「學校階序」決定的「分類」系統，接受、體現了自己是次等的認知／認同基模嗎？

更重要的是，我不想依賴著貶低後段學院的社工人來證明我自己是社工，因為我打從心底認定我／科大社工人本來就應該是社工，所以我何苦又再一次將自己被賤斥、責難的負面經驗移轉到更後段學院的社工夥伴身上。而且，如果我真的這麼做，那麼我又跟缺乏自省的社工人／社工教授有何不同？然而，我不懂，我是真的不懂，我／科大社工很單純的只是想要作為一名「社工」的社群集體認同，我渴望能夠被他者普遍的肯認，而非總是只能用特例或孤獨的將自己／朝陽科大社工自外於「科大社工」之外，證實自己和前段、主流學院的身形十分雷同類似時（縱使我很清楚這確實是一非常實際的脫困方式，但這真的無法幫助我解決我所欲處理的問題），才能夠證明、解釋自己是一名沒有問題的「社工」。

這些日子以來，我真的受夠了我個人可以是優秀的、沒問題的科大社工，但代表集體的「科大社工」卻必然是象徵差勁的、有問題的社會現實。而這後來更不斷造成我／科大社工人只能以「個體」解釋自己，但當我／科大社工人企圖更進一步提升至集體層級解釋時，卻必然很容易遭遇被社群成員否決的斷裂困境。但究竟是為什麼科大社工總是給人負面、差勁的印象？甚至有時候還會無端被視

[80] 關於各社工院校的考試錄取成績，詳可參閱附表一與附表二。

為是社群的他者？或者是說，我們社工人真的還要繼續奉行、忍受這種把「人」徹底異化、不斷撕裂彼此、極其不友善的「分類」系統嗎？

叁、當助人初衷早已不在：我，究竟為何異化？

坦白說，最初會寫這篇論文最主要的理由，有很大一部分無非是出自於我亟欲探究因政大社工所師長一句：「你那間學校畢業的！怎麼被教成這樣子！？」所引起的一連串不對勁。突來的賤斥、責難給了立志成為專業菁英／知識份子的我雷電般的致命一擊，更讓我陷於混亂，而這彷彿也就是出身於法屬安的列斯的殖民地，名為 Fanon 的黑人精神科醫生，當初散步在巴黎街頭時，偶然被一位法國小男孩的喊了一聲「**髒黑鬼**」的經驗翻版。那天，Fanon 長期培養起來的尊嚴，出乎意料的竟然經不起這麼一句鄙夷的稱呼，他原先所信仰的文化價值和精神層面竟然在一瞬之間完全崩解了。於是，Fanon 斷然覺悟了文化對他而言原來只不過是白色的面具，黑皮膚才是他生命的實相，只因當他走在巴黎街頭，絕不是他一個人被觀看被凝視，而是整個種族、整個先民、整個非洲都受到殘酷的檢驗（陳芳明，2009：14）。

為了解釋自己的斷裂經驗，我亦步亦趨循著 Fanon 的思想啟示和黑人自我去殖民的經驗理路，決定透過返身敘說、書寫自我成為社工的心路歷程來尋索答案。然而，就在不斷向內探尋自我、爬梳生命的過程中，我卻也面臨和 Fanon 一模一樣的慾望難題：「從我靈魂最黑的部分，穿越暈影地帶，升起此種突然變成白人的慾望。我不要被看成黑人，我要被看成白人。那是黑格爾也未曾描述的承認」（陳瑞樺譯，2009：141）。

就如同 Fanon 面對自我內在慾望後的意識覺醒，我在敘說和書寫自我的歷程中，我先是看見自己由一個勞動家庭的獨生子到菜鳥社會替代役和廣告企劃業務的生命經歷，還有自己成為了一名科大社工時所懷抱的初衷；然後，我接著發現我身上有著一股成為專業菁英／知識份子的想望，也由著這股不斷想要變得更好，想要變得更優秀，想要變得更加上位的自我期待，我努力奔走在他人前頭，**努力追求好成績，努力想辦法推甄上台北／國立的高教院校，努力考取社工師證照**（就是這裡充份反應了「社工」的「分類」與「階序」）……最後，我在自我意識的

最深處，窺見自己努力追尋的早已不是找回人們笑顏的助人初衷，而是極度渴望成為「台北、國立、高教社工」的上升慾望。這是我無法不承認的深層慾望，亦是造成我意識混亂、錯置的異化之源。

我無法否認，我一直是熟知卻又不敢正面承認「社工」的「分類」和「階序」的。或者是說，我根本已經非常習慣接受、深深內化這套社會工作用來判別彼此優劣好壞的「分類」系統，但我卻又極端厭惡、恐懼這套「分類」賦予我／科大社工的卑下評價；然若反過來說，我／科大社工人被賤斥為社群的他者時之所以會感到痛苦和困惑，不也代表著我們正臣服、認同、體現了這套扭曲、異化人性的「分類」系統，最終才會使得外界對於我／科大社工人的賤斥、責難得以師出有名嗎？ 也就因為我認定我自己是「社工」，所以我總是難以躲掉人們對於「社工」的「分類」與「階序」。是故，如果社群內部對於「社工」的各式「分類」與「階序」真的是造成我／科大社工人／許多社工人必須懷疑自己和產生卑下意識的起因，那我接下來是否要開始試著瞭解它的形成脈絡，並著手改變它呢？我不想再逃避它，我想要堂堂正正的面對它，我要……重新徹底改寫、顛覆扭曲「我／科大社工」的社會／歷史。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五章　逆境：社工，不僅僅是「社工」

Bhabha：「殖民的雜種不是系譜學的問題，也不是兩個不同文化間的認同可以被當作文化相對論的問題來解決。雜種是殖民再現與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問題意識，它翻轉了殖民者否認／渺視(disavowal)的多重效果，以致於其它『被否定』的知識進入了主流的強勢論述，鬆動了(enstrange)其權威的基礎－這就是認可的規則。……雜種翻轉了否認／渺視的形式／正式(formal)過程，以致於殖民行徑的強烈錯位成為殖民論述的條件」(引自陳光興，2006：149)。

延續前一章末段的意識覺醒和未完任務，我在這一章將返身直入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社會／歷史脈絡，重新深究、探問、辯證及理解我和許多社工人所遭遇的問題：形塑、造成許多社工人必須懷疑自己「是／不是社工？」和個體自我卑下意識的「分類」和「階序」是如何生成。因此，這一章即是我身為政大社工所研究生，但我仍帶著科大社工的主體性對於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發展始末的返身探究與自省，亦是記錄我用自己／科大社工最主觀的個人經驗，一路與實證、客觀文獻貼身肉搏的鬥爭過程。

第一節 「誰是社工？」：社工主體群像變遷後的社會／歷史意涵

在整理社會工作發展歷史相關文獻的過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大學是心理系畢業，在精障就服界服務許多年的大姐，她有次和我餐敘時，曾不經意的問我：「話說，我能不能考社工師啊？」在那當下，我想都沒想的就回她：「不行。」(社工師法的各款考試資格快速浮現，詳見前章表 4-1）但她卻又不死心的繼續追問我：「我不是社工嗎？」我咬了一口漢堡，皺了一下眉頭後回答她：「大姐，妳別來亂了啦，妳當然不是啊，妳心理系畢業的來湊什麼熱鬧！而且你的專業認同不是精障就服員嗎？」[81]聽見我這麼說，大姐忍不住劈哩啪啦的繼續質問我：「我畢業的時候，根本沒這麼多規矩！現在是只有你們『社工』能從事助人

[81] 我之前一直在口頭上稱大姐是社工，但我好幾次被老王糾正回是就服員，而不是社工。所以先前的經驗很直接的反應在我們這次的對話上。稱謂，反應了我們不同的社會位置。

工作喔？……而且，我在這個領域工作十幾年，我不夠資深、不夠專業嗎？你們社工師證照不就是要代表專業能力嗎？結果我連考都不能考？啊……你最近不是在研究一堆人覺得自己不是『社工』的問題嗎？你怎麼會不知道答案？」被她這麼一吐嘈，而且看似又滿言之有理的，所以我只好無奈的回應：「好啦…我……回去整理一下和好好想想……兩個禮拜後再跟妳說。」[82]

基於被大姐吐槽的無奈和應許的承諾，我當天一回到家隨即就著手翻閱可以協助我理解問題的相關文獻。雖然，我心裡真的不斷浮現「心理系畢業的大姐絕對不是社工」的念頭，覺得這個問題很莫名其妙，但想到大姐平常很照顧我，還有她的質疑似乎不無道理，再加上我在先前的社工師法也曾注意到非本科系可以應考的條款，基於以上種種的理由，所以除了我自己原先所欲探究的問題之外，我最後還是很講信用、有義氣的一併帶上大姐的問題，並實際以大姐非社工本科系畢業的助人位置為出發點，踏上了追尋「我們，為什麼不是社工？」的旅程。

壹、從國家／黨政機器到學院派為主體的助人專業

我搜索文獻的動機其實很單純：我想要知道「社工」的演變過程。於是，追溯當代社會工作專業之濫觴，今日的社會工作最早始自 19 世紀末的歐、美西方工業先進國家（李宗派，2002；蔡漢賢，1972；簡春安，趙善如，2010；鄭怡世，2006；Austin, 1997），繼而隨著時空的演進陸續擴散至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Midgley, 1981）。此後，社會工作依循著各國不同的政治民主的變革進程、經濟型態的轉變、重大社會政策的頒訂、文化歷史的傳統價值觀及社會環境的變遷，以及社會科學研究典範（潘慧玲，2003）和社會工作專業社群思潮之轉移（劉曉春，2009），一方面持續以英、美兩國為主，陸續派生出諸多理念不盡相同的理論知識與助人工作方法 （宋麗玉等，2002；林萬億，2002；簡春安，趙善如，2010；Payne, 1997）。而培訓方式同時也由早期單純的濟貧、慈善行為，一路轉變為短期的教育訓練，再逐步轉型為正式的學院教育，開始透過教育體制有系統的培育社會工作的從業人員（張紉、林萬億、王永

[82] 認真說起來，大姐說不定可以用從事相關業務兩年以上的條款取得考試資格。但另外一個問題是，就算她真的可以考，我也不覺得她考的上，因為考試內容基本上都和她工作內容差異太大，或者是說根本無關。不過，以她的資歷和口碑，大概也不需要證照了吧。

慈，2003；Grinnell, 1993）；但另一方面，我卻也看到，即使沿襲、共享著相同的理論、方法及專業價值（Weiss, 2005），歧異的社會／歷史脈絡同時也讓各國的社會工作呈現出大異其趣的專業建制[83]路徑，更使得各國的「社工」有著截然不同的形貌 （周月清，2004；張紉等，2003；蔡漢賢，1972；Midgley, 1981）。注意到世界各地的「社工」好像都有些不一樣後，我也開始在想，那我們台灣的「社工」是如何演變呢？

一、依附、滲合於國家／黨政機器邊陲的美式助人專業

循著本土文獻的軌跡，我先是注意到台灣社會工作的起源本質上是經過「二手擴散」（secondary diffusion），也就是先由歐、美西方先進國家傳入日本和二戰前的中國，再由兩者分別傳入台灣（林萬億，1994）。後來才又轉由美國直接傳入，但時間相隔不久（林萬億、沈詩涵，2008a）。換言之，端詳台灣社會工作之發軔點，時間約莫始自中國國民黨戰敗來台的 1950 年代，當時主要係透過民間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非營利組織和隨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的學者等開始傳入國內，陸續結合國家體系相關的婦女聯合會、救國團及國民黨民眾服務系統逐步落地生根，進而一路隨著台灣政治、經濟及社會政策的發展，逐漸開枝散葉（林萬億，1994；陶蕃瀛，1999；黃彥宜，1991；莫藜藜，2007；詹火生，2007）。

不過，在國民黨政府戰敗來台初期（1950 年代），台灣的「社工」主要仍是用來指稱國家／黨政機器下「中央社會工作會」的政令推行人員，其組成份子大多為退休的情報人員，是稱國家／黨政機器行使統治權和進行社會控制機制的一環（鄭怡世，2006），當時反而僅有少部份如 1949 年的台灣省立台北醫院（今北市中興醫院）和 1951 年臺大醫院成立的社會服務部內的工作人員，或極少數的學者、技術官僚等才較貼近於我們今日的「社工」印象（林萬億，2011）。而此種不對等又二元分立的雙元發展態勢，約莫要到 1970 年代後在開始有了大幅度的轉變，起因則是隨著旅美歸國的社會工作學者和技術官僚的中介和發揮影響力，再加上我國政府從這時候起陸續在各縣市政府開辦各式實驗計畫（最具代表

[83] 「建制」（institution），主要是指「為了實現某種特定目的（如教育、醫療、福利）而建構權力關係」。這種權力關係通常可以跨時、跨域連結，以及滲透日常生活，促使人們由下而上參與建制運作的共構特徵，使得「建制」是一與時俱進的動態行進過程，而不僅是靜態的現象描述(王增勇等譯，2012；Devault, 2006)。

性的應為 1974 年的小康計畫），以一年一聘的方式雇用基層社工的成功經驗，開始使得美式社會工作專業的知識論述和工作方法開始逐漸被我國的福利行政部門吸納、滲合。爾後，在福利部門工作人力需求日漸擴增的趨勢下，終使得我國的「社工」自此得以在國家機器和教育體制的邊陲位置稍微取得一個較為明確普遍、較為貼近符合於今日服務貧窮、弱勢的主體形象（鄭怡世，2006）。

二、「社工」主體的變化軌跡：從多元並立到學院主導的助人工作

隨著我國社工開始有了服務、貧窮的主體形象，然若我們持續透過文獻回顧探析我國「社工」主體在實務工作和教育場域中的變遷趨勢，我發現在社工師立法前，我國的「社工」一度曾呈現多元的樣貌。如部份研究文獻都曾明載我國政府部門或民間單位都曾聘任非本科或相關科系畢業生擔任的社工(張秀卿，1985；林萬億，2002)、世界展望會的山地原住民社工（王增勇、陶蕃瀛，2006；林瀚生，1997）、神學院社工（呂又慧、王增勇，2010）或本土宗教廟寺的助人工作者（陶蕃瀛，1999）等各式不同的助人工作身影。或者，自我國社會工作逐漸脫離社會學系，陸續達成分組、獨立自主的目標後，學院派裡的社工本科同時也逐漸再分化、衍生出如社會福利學系和「長」字輩學系（如中正社會福利學系、暨大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陽明衛生福利研究所、高醫大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靜宜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84]）（引自許展耀，2004）。換言之，在社工師立法之前，我們雖然無法否認我國的「社工」確實慘澹度過一段主體認同不明和缺乏社會認可的日子（呂寶靜，1979），還有被國家機器和其他強勢專業漠視、打壓的艱辛歲月（方雅麗，1999；黃侃如，2004；羅曉瑩，2005），但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國的「社工」主體形貌在實務工作和教育場域中，曾一度共有過百家爭鳴的多元盛況，而這也是過往社會工作研究較少特別強調、突顯的部份。

爾後，隨著政府部門社工人力的納編爭議與社會情勢的需求變遷，社群的基層與學界開始推行社會工作專業化相關的建制立法（楊玫瑩，2000）。然而，當 1997 年社工師法建制立法通過，確立以修習過「二十社工學分」作為「社工」的入門資格標準後，以高教體系普通大學社會工作／社福／相關科系大學畢業

[84] 後更名為社會工作與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

等學院派的社群成員（也就是今日的高教社工），從此正式晉升成為我國「社工」的主體。但反觀長期服務原鄉卻缺乏正式教育體制承認的原住民社工（王增勇，陶蕃瀛，2006；林瀚生，1997），傳統宗廟的助人工作者（陶蕃瀛，1999），以及系所名稱不是「社會工作學系」或「社會工作系」[85]的「非本科系」和「神學院」畢業的社群夥伴等非社工相關科系或非正統大學教育體系出身的社群成員，卻開始面臨不得不被迫面臨被社群排除的危機。其中，在這群被排除的社群夥伴裡，我又特別注意到除了沒有發聲管道就被排除的原住民社工，最令人感到無比諷刺的，又莫過於是在 1995 年 10 月 26 日於台北中正紀念堂集結的社工師請願遊行中，曾被讚譽為「正義援軍」的神學院社工（簡春安、趙善如 2010：93）[86]。可惜的是，近來除呂又慧、王增勇（2010）曾一度發文揭露、聲援他們之外，社群內部似乎早已鮮少有人提起、省思這群昔日戰友岌岌可危的處境。

不過，也在社群極力排除部分成員的同一時刻，學院內部又再一次的出現細部分化。只是，這一次並不是源自高教體系社工本科的內部分化，而是相對於高教體系的外部分化：學分班社工和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在社工師立法後開始大量出現。不同於其他不符我國社工師法規範的「社工」主體形貌而遭遇被排除風險的社群成員，此刻出現的學分班社工主要是以取得最低二十學分的應考身份進場；而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大多則是透過異卵孿生的雙胞形式[87]，直接依循、延續高教體系普通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過往的創立經驗相繼現身，或者是說，科大社工與高教社工除了學制和學生來源（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高中生與高職生）的差異之外，兩者期待、預設的「社工」主體形貌，基本上可說是完全相同的（周怡君，2007）。

總而言之，1997 年社工師法對於應考資格的設限，一方面意味著社群成員決意開始採取排除、壟斷、保護及聯合的手段，確保社群免於遭受外來團體的競

---

[85] 兩者命名的差異點在於高教體系為社會工作學系，技職體系為社會工作系。

[86] 當時，南部的台南神學院社會服務系的練馬可博士親自率領系上師生共 71 人前來會師聲援，而簡春安、趙善如（2010：93）曾對此特別寫下：「（台南神學院）坐著遊覽車有如正義的援軍聲勢浩蕩的前來，令人精神為之一振。」

[87] 我會以「異卵孿生」形容，主要的原因在於 2000 年後技職體系科技大學設立社會工作系的主要操盤手，大多都是經由原先任教於高教社工院校的教授有很大的關係，如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的創系主任陳麗欣（原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與美和技術學院社會工作系的創系重要關係人陳宇嘉（原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爭和提供服務的 獨占性；另一方面，以高教體系／技職體系社工／社福／相關系所（組）為主的學院派社工，以及修習二十學分班的社群夥伴，目前大致就是構築我國社會工作專業的主要成員。

貳、日漸嚴苛的社群門檻：未來「社工」只能有一種？

在這一連串的探索過程中，我不由得開始注意到社工師的建制立法，不僅只是社群加強對於國家依附關係的改變（陶蕃瀛，1999），其同時也對於實務工作和教育場域也造成非常大的衝擊和影響：特別是當國家機器開始透過福利民營化、方案化對於人事補助規定以社工師考試資格為補助基準，因而不符社工師考試資格，被實務工作場域排除的社群夥伴，通常只能以取得二十社工學分的「學分班社工」或是提升學歷資格的方式取得社工師考試資格的姿態重新出場[88]，反之則是只能被迫走上被社群排除一途。此外，我國的社會工作教育亦明顯出現「考試領導教學」的制約現象（林萬億，2010；莫藜藜，2007）。也就是說，社工師的建制立法在無形之中已將產（實務）、官（政府）、學（學界、社會工作教育）三方緊緊的綁在一起，結果就是形成某種看似平行卻又相互監視、強化的規訓體制。

然而，一體成型的「排除」惡夢似乎還未完結。由於社群迄今似乎仍不斷致力追求著邁向更高階、更專精的專業想望，也為了能讓社工人越來越像理想、期待的「社工」。為此，2007 年在社工師法修法聯盟（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的協調、運作，以及王榮璋立委的提案下[89]，立法院再一次正式三讀通過了「社會工作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並於 2013 年開始實施。於是，自 2013 年起（民國一百零二年），我國的社工師法的考試資格，即將由先前的「二十社工學分」進一步提升為「四十五社工學分」（詳見下頁表 5-1），而「二十社工學分」的考試資格也將在 2016 年（民國一零五年）全面落日。

---

[88] 另外，這其實也是許多非本科系的大學畢業生，後來才進入社會工作研究所就讀的社群夥伴們取得社工師考試資格的方式之一。但他們究竟要算是學分班社工？還是社工本科生呢？

[89] 詳細經過請見社工專協網頁：http://blog.roodo.com/tasw/archives/4692353.html

表 5-1：新版社工師法考試資格(2016 年起)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起，中華民國國民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應本考試：	法條指涉、影響對象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相當科、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曾修習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領有畢業證書者。所稱社會工作相當科、系、組、所、學位學程係指開設之必修課程包括下列五領域各課程，每一學科至多採計三學分，合計十五學科四十五學分以上，且經考選部審議通過並公告者： （一）社會工作概論領域課程二學科：包括 1.社會工作概論。 2.社會福利概論或社會工作倫理。 （二）社會工作直接服務方法領域課程三學科：包括 1.社會個案工作。 2.社會團體工作。 3.社區工作或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 （三）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領域課程四學科：包括 1.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2.社會學。 3.心理學。 4.社會心理學。 （四）社會政策立法與行政管理領域課程四學科：包括 1.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2.社會福利行政。 3.方案設計與評估。 4.社會工作管理或非營利組織管理。 （五）社會工作研究法領域課程二學科：包括 1.社會工作研究法或社會研究法。 2.社會統計。	學分班社工
二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曾修習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領有畢業證書，且其修習之課程符合前款規定之五領域課程，有證明文件者。	社福／相關科系畢業生／社工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三	前二項實習或實地工作認定標準由考選部另定之[90]。	實習內容 實習機構 機構督導
四	具有第一項各款資格之一者，限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得應本考試。	符合舊版社工師法考試資格的社工人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考選部網站

承上，若重新以新社工師法的學分規定進行推估，我悲觀的認為未來我國會持續限縮至只剩下三種類型的「社工」：曾接受社會工作大學教育的「高教體系（普通大學）」和「技職體系（科技大學）」裡的「本科生」（高教社工與科大社工），以及非受社會工作大學教育出身的「學分班社工」（如下頁圖 5-1）；除此之外，目前僅符合舊版社工師法考試資格又尚未考取社工師的社群夥伴，後續也勢必都要著手準備補修不足的相關學分，否則未來將有可能無法符合新版的考試資格。不可避免的，基於先前的經驗，這接下來勢必將對於社群內部造成一連串重大的動盪與衝擊。對此，我們可能還必須特別注意的是，近期已陸續有部分民間單位打出「**不具備 102 年之後社工師考試資格者恕不接受應徵（已取得社工師資格者不在此限）**」的徵才訊息，可見接下來事態的演變與威脅絕對已遠遠超乎林萬億、沈詩涵（2008b：200）當初說：「考不上或不想考社會工作師的人，繼續做社會工作也不會被禁止，更沒有被社會工作界排除的危機」如此簡單。昔日社群內部對於原住民社工、神學院社工的大規模排除現象，不久之後是否會再次捲土重來，值得我們密切追蹤觀察。

此外，或許有人會想要探問「社福／相關」的社群夥伴們到那去了？平心而論，我無法精準的回應這個提問。不過，若他們很有骨氣的繼續保有系所歷來慣行的課程安排，在沒有其他特殊意外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可以合理的推測他們未來有很高的機率會被排除。然若他們轉而選擇服膺「四十五社工學分」，那我不禁也想問，當社福系的課程設計屆時和社工系越來越像，甚至幾乎同調時，社福系還是社福系嗎？由此，我似乎在社工師法中隱約看見了某種「常態化」的慾望，某種想要把所有的社工／社福／相關科系的學子們通通「純化」為同一種「社工」的慾望。

[90] 詳細規定請參閱附表三：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認定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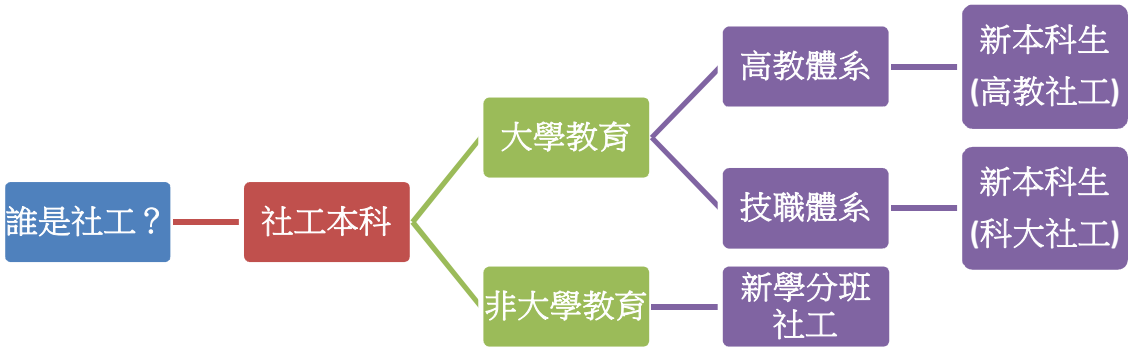

圖 5-1：「誰是社工？」：新版社工師法考試資格的認定邏輯(2016 年起)[91]

叁、君臨助人工作的主體：逆探社會工作專業帝國之眼

透過一系列的文獻探查，心理系畢業、從事助人工作十多年的大姐對於自己為何不是「社工」的提問，意外為我開啟了一扇另類的窗，同時也讓我對於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歷程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和產生了新的見解。只因，大姐對於我的提問，比起先前的科大社工、社福／相關科系、學分班社工、神學院社工，還有輔大社工系本科畢業的後山等憂慮自己不夠社工或不是社工的社群夥伴都還要來的尷尬又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大姐雖然是心理系畢業，現職卻是精障領域的就服員督導。認真說起來，大姐的身份與「社工」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多重關係！也因為熟識大姐，清楚大姐十幾年豐富的助人工作資歷，讓我不得不重新審思自己對於助人工作的認識[92]，進而讓我在翻閱文獻來回辨識誰是「自家人」時，我一方面特別注意到從前的「助人工作」，其實是「大家」都可以做，而不只有「社工」可以做；但另一方面，我同時也發現我國「社工」的種類跟我現在認識的很不一樣，也就是說，我國對於「社工」的「分類」一直在改變，但主要似乎是持續呈現「純化」的趨勢。所以，我接下來要藉著描繪台灣社會工作社群對於「社工」主體的上升慾望，一點一點的勾勒出其後來自於美式社會工作專業帝國

[91] 多加一個「新」字的用意是為了進一步區別舊制二十學分和新制四十五學分的差別。

[92] 我曾經試著對自己自問自答：今天如果是一個心理系剛畢業一陣子的新人對我提出相同的問題，我大概不會理她，也就不會引發這麼大的後續效應吧？另外，我會如此肯定大姐的經驗對我有意義的原因在於，我實際跟隨過幾次大姐的機構督導，我確認過台下的工作者，幾乎都是社工本科畢業，甚至還遇過多位社工系和社工所的實習生，所以我的直覺告訴我，大姐的經驗一定會在什麼地方跟我的論文／社會工作專業有所關連。對大姐的助人經歷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參閱陳淑芳(2011)的自我敘事論文。

對於台灣本土助人工作的遙遠凝視與深層制約。

一、「社工」的我群與他者：日漸「有名」卻逐漸「無實」的助人工作！？

在探尋問題的一開始，最先映入我眼簾的問題焦點不外乎是：那些人才是「社工」？或者是說，那些人才是助人工作者？但從事助人工作十幾年、時常四處協助督導許多精障類社福機構卻不是「社工」的大姐，意外讓我認清「助人工作」原先是「大家」都能擔任的工作，後來才逐漸變成只剩下是社工本科／社福／相關的學院派「社工」才能做的工作。這讓我意識到大姐當初對我的提問絕非單純的抱怨，因為我理智雖然能夠確定心理系畢業的大姐絕對不是「社工」，但我的情感卻無法完全否認她是非常資深又非常優秀的助人工作者。於是，在自我不斷反覆探問的過程中，我發現這背後其實涉及了「助人工作」與「社工」的關係變化（如圖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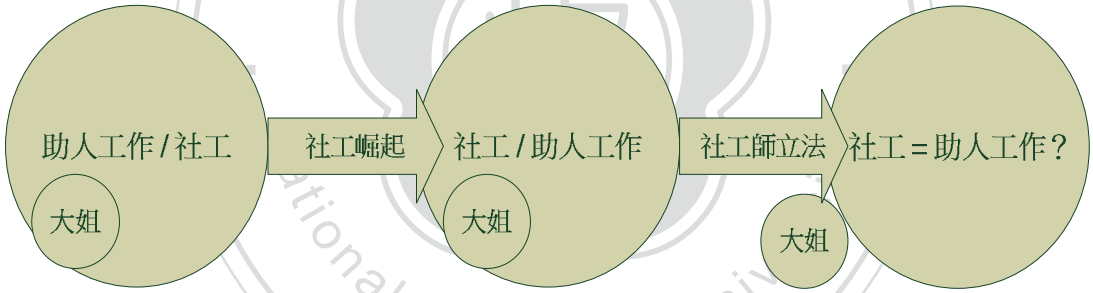

圖 5-2：「助人工作」與「社工」的關係變化

配合先前社會工作發展的歷史文獻，我們或許可以對於大姐對於「我是社工嗎？」的提問重新進行一些簡單的詮釋和解析。首先，大姐大學畢業後先在民間的社福機構工作，當時她從事的是「助人工作」，而「社工」是「助人工作」的一種；只是，隨著相關社會福利政策的頒布施行和「社工」的崛起，越來越多的「社工」人力開始陸續散佈在各個「助人工作」的場域之中，逐漸成為「助人工作」的主力和代名詞。這時的大姐依然從事的是「助人工作」，但大姐是不是「社工」呢？如果以 1997 年社工師法的考試資格來說，大姐有機會可以被視為「社工」，因為她的工作資歷可以讓她取得社工師的考試資格；不過，隨著社工師立

法、修法及時間的流逝，從沒有想過要考試，沒有修過相關社工學分，也一直沒有進行考試資格認定的大姐，終於被排除於「社工」的社群之外，不再被視為是社群的一份子，但這卻同步衍生了另一個矛盾的問題：我們「社工」真的能夠完全取代大姐的「助人工作」嗎？

換言之，我同意社會工作專業化的建制立法的確暫時化解、舒緩了社群內部對於人人皆可成為「社工」的部分焦慮，亦確立了「社工」的專業地位（林萬億，2010），但專業化的結果除了不免加重了我們對於資格文憑的依賴（Klaybor, 1996）之外，同時也正逐漸造成社會工作與助人工作的關係質變與封閉壟斷。大姐不是「社工」，卻是「助人工作者」即是反應出了這個問題的矛盾處。於是，在看似日漸強大、擁有地位名望的外表下，「社工」內在的助人本質與外部的社會關係實際上卻是相對衰退、減弱的。而這正好就如蕭信斌（2006）先前曾透過觀察、分析台灣的家庭暴力、性侵害犯罪、老人福利、身心障礙福利、兒童及青少年等數個社會問題和相關社會政策的發展趨勢後指出，我國的社會工作在「推動專業化就能保障案主權益」的呼聲下，特別是在社工師建制立法後，社群集體呈現持續落入「發展社會工作專業能夠解決社會問題」的弔詭迷思，「社工」儼然已將自己神化為能夠處理眾多社會問題的唯一代言人。為此，香港學者馮立可（2008）也曾指出，在社會資源日益吃緊的情勢下，社會工作專業不斷被要求承擔更多責任、提升服務品質的結果，到頭來極有可能演變為變相的自我剝削，其是以不斷犧牲多數社工人的身心健康和家庭生活的等價交換。如今，「社工」是否已成為自己要為案主解決問題的一部份（王增勇，2009）呢？

我想，非本科系為什麼不是「社工」的問題，我對於大姐（或是說大姐所代表的非本科系，或是缺乏學歷資格的社群夥伴）應該已經暫時能夠有個合理的交待。然而，從一個不是「社工」的助人工作者的社會位置，重新開始探索誰才是「社工」的過程，同時也讓我認清如今台灣社會工作的「社工」不一定完全等同（或代表）「助人工作」。雖然我依然還是「社工」，但是此刻「社工」對我的意義在這個重新探索的過程中逐漸翻轉、改變了。對我來說，「我是／不是社工」變成了一個假議題，真正重要的自覺應該是我所從事的「是／不是助人工作」。也就是說，惟有當我開始不再陷入人們現在所認定的「社工」的認知框架時，我接下來才有機會重新做為一名社工。我重新學會了如何否認來自於他者的賤斥和

自在肯認自我的助人初衷，這還真是一個有趣的學習和發現。

二、成為「某一種社工」的純化壓迫：未被辨識的上升慾望

循著先前的討論和辯證，結束誰才是「社工」的問題後，我接下來要處理的議題是「社工」社群的內部性問題，也就是先前不太確定自己「是／不是社工？」的社群夥伴們身上的自我懷疑與自卑情結。我想，在經過先前一連串的歷史文獻探討後，我認為眾人的問題很明顯是源自於社工師的建制立法、修法造成「社工」主體的持續「純化」為「某一種社工」，從而才使得有越來越多的社群夥伴出現「我，是／不是社工？」的問題，因為這些人往往都不是社工師法裡預設的「某一種社工」。因而，在既有的分類結構下，特別是當科大社工不被認為是「社工」時，我最初曾一度以為「某一種社工」應該是相對於科大社工的「高教社工」。但輔大社工系畢業的後山對於自己未來將不再是社工的疑惑，卻又大幅翻轉了我先前的假設，深化了我對於問題的認識。後山的經驗著實讓我感到十分納悶。只因，如果連後山／輔大社工系所代表的「高教社工」有天都可能不是「社工」，那我們到底要「純化」成那一種「社工」？在那瞬間，我才真的意識到 Hall 先前的提醒：「某種意義上，在能夠說明獨立運動的主體是誰，以及文化去殖民是以誰之名進行，否則『獨立』和『去殖民』是不可能完成的」（引自陳光興，2006：98）。也就是說，在進行自我主體的反抗運動之前，我似乎必須先試著釐清我國社會工作專業建制內藏的慾望投射：我們（台灣的社工人），究竟期待（或被迫）要成為何種「社工」？ 以及揭露成為「某一種社工」後所代表的意識型態和知識／權力結構。

1. 「我們」其實很不一樣：透視多元「社工」主體的論述指涉與純化壓迫

1997 年的社工師立法為我國的「社工」徹底鞏固了一道名為「專業」的疆界範疇後，其自此圈圍、預設了特定族群得以成為「社工」，同時亦在無形之中逐步排除、隔離了部分舊有的社群成員（如下頁圖 5-3 所示）。所以，我在這裡想要進一步特別說明和提請眾人注意的幾個重點是：首先，當我們都服膺於社工師法，也都理所當然認為自己是「社工」時，我們依然要不斷試著辨識我國的「社工」並不是單一純粹的主體，而是一社群內部組成非常多元、複雜、模糊的差異

集合體。誠如 Benedict Anderson 認為「民族／國族」（nation）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吳叡人譯，2010）。同樣的，我認為我國的「社工」大致上亦符合於此概念：我國的社工師法清楚刻畫了社群成員對於「社工」的想像與資格限制，賦予其在助人工作的權力，同時亦造就這群來自四方八方的多元助人主體得以成為擁有相同價值信念的共同體；但遺憾的是，縱使不同的多元主體擁有著共同的助人價值信念，從先前的訪談和討論中我們已約莫得知，我國的社工師法並未順利消弭多元主體之間的差異和集聚社群共識，反而是一路隨著社工師立法、修法的建制歷程更加確立、激化了多元主體間對立仇視，最終不可避免的造成社群集體的關係日益衝突緊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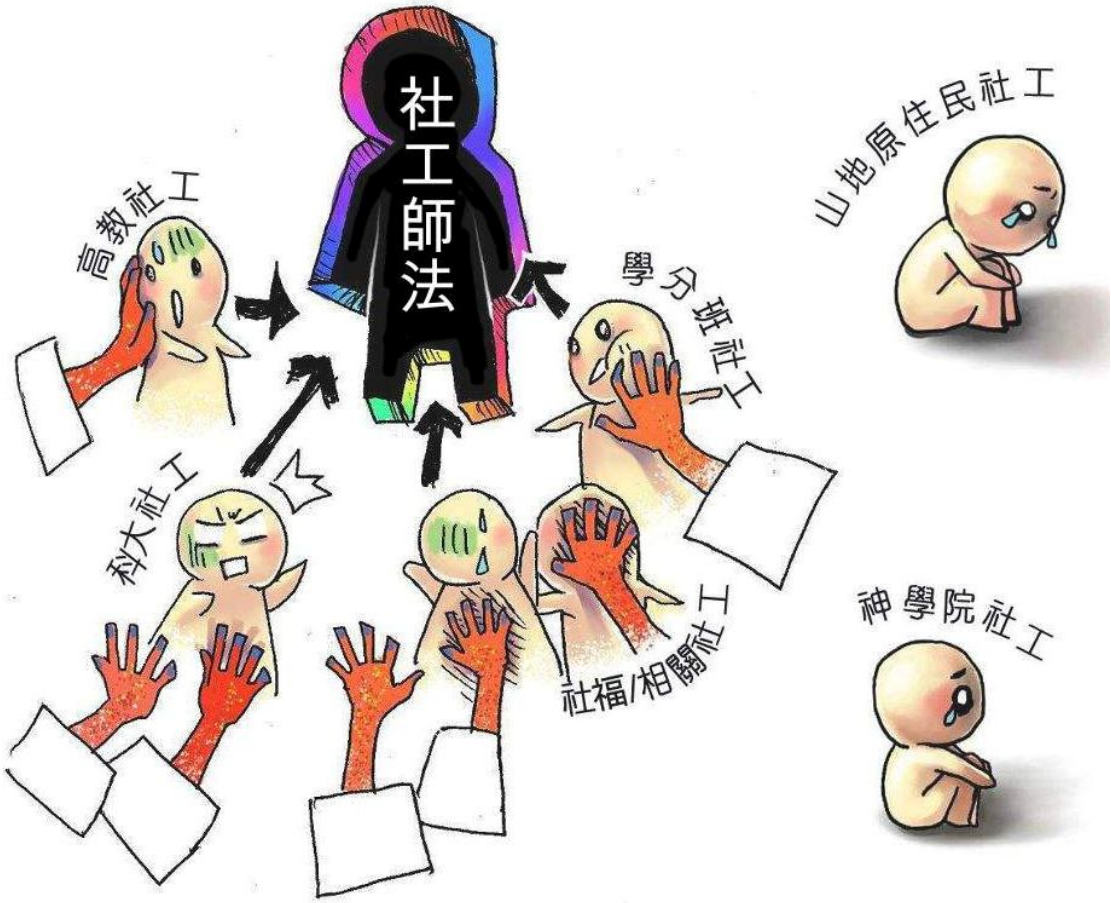

圖 5-3：社工師法下的社群關係[93]

彷彿是某種巨大的集體無意識般，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眼下最矛盾和詭譎之處，

[93] 原圖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畢業，後為輔大社工所研究生黃燕茹協助繪製。

就在於每一位社群成員都鄉愿的以為是自己是「社工」，但在主體意識的精神鬥爭上卻不是如此。而且更令人憂心的是，絕大多數的社群成員從未「真正發現」社工師的立法、修法在這場分類遊戲中所投下的震撼彈：台灣所有的「社工」正逐漸純化為「某一種社工」。依循著先前的討論，我在這裡所謂的「某一種社工」必須分為對內與對外兩個主體層次說明，首先對內的是台灣社會工作的主體歷史，其次對外的則是社會工作的歷史主體。

(1) 台灣社會工作主體的歷史：高教社工的主體霸權

我認為發現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主體差異最簡單的方式是貼近自我的意識，或者是仔細觀察各個社群夥伴的出身差異與人我衝突，然後承認、正視社群內部的賤斥、排除現象是事實，是真實發生的事件。就好像是我先前在第四章裡陸續訪談各種不同出身的社工人時就發現，許多社群成員在面臨賤斥和排除的衝突、挑戰時，大多很快就能夠辨識人我之間的差異／比較基礎，覺察自我遭遇賤斥和排除的理由和原因（如社福／相關科系的夥伴會說自己不是社工系；學分班或神學院的社群夥伴會說自己不是正統四年級制的社工系畢業；科大社工會說自己不是高教社工）。但更重要的是，在各種不同成員的衝突組合中，不論是何種出身的社群成員，其最容易產生衝突的對立主體，往往很容易指向「高教社工」。

因著自己從朝陽到政大後，我／科大社工被政大社工所的師長／高教社工質疑的經驗，讓我警覺到高教社工與科大社工矛盾的異同處，並發現兩者是對立的主體。此外，辨識社工師的立法與修法變革（參照圖 4-2 與 5-1 的變化），同時也讓我進一步確認了「高教社工」作為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的核心主體。也就是說，我國的社工師法的建制歷程，其實就是以高教社工的主體形貌為基礎的建制歷程」。而這也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社群夥伴會出現懷疑自己「是／不是社工？」只因為我們……不是高教社工。就這就是問題的真相。

(2) 社會工作的歷史主體：美式社會工作專業的虛幻主體

我知道，一定有人會問：為什麼高教社工得以佔據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主體的位置。其實，高教社工之所以能夠成為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的主體並不是歷史的偶

然。只因，若我們重新回返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歷史經驗，我們應該很快就可以發現許多「高教社工」的教授與台灣社會工作專業體制的建制關係人（特別是那些留外海歸教授們），很多都是深受「美式社會工作專業」指引、奧援及背書的重要關係人／引介者、傳道者，而這些人不就都任教於高教體系的社工系所嗎？是故，這也就是為什麼部份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系所在面對被賤斥、排除的挑戰時，會反過來很有意識援引「**德國的社會工作教育設立於技職體系**」[94]，或者是社福／相關的系所可能會據理提出「**你們社會工作都不懂鉅視的福利體制**」來鞏固、維持自我主體存在的正當性。但很可惜的是，置身於高教社工的主體歷史與美式社會工作專業的歷史主體交互夾擊的困境下，所有社群夥伴的努力終究都是徒勞無功的，因為台灣社會工作的主體形貌早已被高教社工／美式社會工作專業所交互建構的社工師法決定了。所以，只要不是高教社工人的社群夥伴，就有可能要面臨「我不是社工／不夠社工？」的斷裂危機。

可是，危機還未完結，我還想要繼續補充的是，後山／輔大社工系／高教社工訴說自己快要不是社工的經驗，卻又讓我更進一步注意到高教社工鶴立雞群的立場有了戲劇性的爆炸逆轉。因為，後山發現自己即將不是社工的斷裂經驗其實就是提醒著過往今來的高教社工人，即便高教社工有著美式社會工作專業作為現代性主體的依靠，但隨著社工師法迫使人們純化為「某一種社工」的趨勢越演越烈，高教社工的內群體有天必然會出現嚴重的分歧斷裂。更直接一點的說，社群逐漸純化為「某一種社工」的結果，必然也將造成越來越多的高教社工有天會忽然驚覺自己竟然不是「社工」。

或許，我的言論和發現稍微過於杞人憂天，但也可能真的要到那一天真的到來，台灣的社工人也才可能會真正覺悟自己苦心追尋、堅貞信仰的「社工」主體，竟然是如此虛無飄渺又殘酷不堪的幻象吧？

2. 社會工作專業帝國的遙遠凝視：本土助人工作知識／權力的制約糾葛

承接上段，當我發現我國社會工作專業建制過程內藏一股成為「高教社工／

[94] 我很確定朝陽的師長會說這種話。

美式社會工作專業」的純化壓迫後，不免讓我想起了國內學者周月清（2004：429）在參與「社會工作與社會－前瞻與規劃」國際學術會議（International Summer Academy: Social Work and Society－Mapping the Way forward）後曾發出：「是否台灣學習、採借別人太多，而失去本土與發展屬於自己的模式……究竟什麼是台灣的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呢？」的返身自問。

無獨有偶的是，關於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的被殖民和本土化，歷來一直是我國許多學者不斷來回反覆提及、強調的重要議題（呂寶靜，2011；林萬億等，1999；曾華源、黃俐婷，1996；鄭怡世，2006；蔡漢賢，1972；簡春安，2004），但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真的可能「去殖民／本土化」嗎？若就現今的情勢觀之，非常遺憾的，我大膽認為台灣的社會工作專業非但不可能實現去殖民／本土化，更甚者，我們台灣的社會工作根本就還未能擺脫美式社會工作專業帝國（social work professional empire）的遙遠凝視。我在這裡所謂的「社會工作專業帝國」，是一徹底凌駕、規訓、制約台灣社會工作社群對於「社工」主體的意識形態霸權（ideology hegemony），也就是說，我國的「社工」主體逐漸純化「高教社工」的壓迫態勢，其某種程度亦即是體現「美式社會工作專業」對於台灣本土助人工作多元主體的殖民壓迫之延伸與糾葛。

事實上，早在 1980 年代初期，Midgley（1981）就曾對於新興的第三世界國家提出美式社會工作專業的帝國主義宰制了第三世界國家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警告，然台灣的社會工作不論是在專業建制，亦或學科、知識的發展，迄今似乎依然都還是深受美式社會工作專業的「殖民」，而此種被殖民情結更是被國內學者不斷呼籲需要正視的重大議題（周月清，2004）。但我們在這裡還需要進一步特別注意的是，由於被殖民／壓迫者對於強大的殖民／壓迫者通常會有著愛恨交織、難纏衝突的矛盾情結（方永泉譯，2003），因此僅停留在「覺知」被殖民的存在位置斷然是不足以徹底改變被殖民現況和促進專業本土化的。

就諸多二次大戰後第三世界去殖民／本土化的經驗來說，去殖民／本土化的啟動關鍵通常直接代表著起身反抗、顛覆、去除帝國殖民的狀態（陳光興，2006）。不過，實現真正的去殖民通常是一連串極其繁複、浩大的社會／歷史再造工程。為此，Fanon 就曾大聲疾呼：未能清楚辨識、徹底根除殖民母國意識、思想、陰

影的被殖民者／殖民屬國的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不但無法有效協助底層常民改善惡劣的生活狀態，其最終更將使得諸多第三世界國家追求、實現的獨立／去殖民運動落入表象化的去殖民，並帶來另一波更加混亂的社會動盪和衝突（楊碧川譯，2009）；又或者，Memmi 先前對於第三世界國家追求本土化的批判核心，同樣也指出被殖民者意欲實踐本土化的首要任務，即是要對於自身存有進行一連串的否定：「他要接受殖民者對他的否定，要接受他是殖民者的對立否定體……最後對殖民者的全面否定，也就是對於自身的否定」（引自陳光興，2006：133）。有鑑於此，國內學者王行（2005：316）就曾深切寫下：

> 「在『西方－本土』二元化的介面擺盪之際，對長久被殖民的社工專業族群而言，已不只停留在尋找平衡點（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層次，透過一些對於『現代性』的批判與解構的理論，而可以進一步的突破『西方－本土』二元相對介面，反思知識典範之下的『主體性』，包括了：文化的主體性、性別的主體性、個體主體性、是如何被看待與對待？以及社會工作者在被知識典範建構下的專業體制，是如何被看待與對待？這些議題涉及到深層次批判與反省，因此不是在『專業方法』上，而更是反省『專業方法背後的意識型態』；不是在『專業知識』上作文章，更是批判『專業知識背後的權力結構』！」

因而，在「誰是社工？」的爭執、衝突背後，我們一方面除了要持續通透、瞭解的問題重點不僅僅在於「社工」的定義或分類的變遷，同時亦必須要進一步返身自省自我內在的意識究竟期待（或被迫必須）要成為「某一種社工」的慾望指涉；另一方面，我們亦必須要更有意識的警覺台灣作為社會工作的後進國、作為美式社會工作專業的被殖民者，我們如今是否真的已經擺脫美式社會工作專業殖民於自我意識層次的深層制約了嗎？或者，我們迄今仍毫不自覺得深陷於「**西方即進步，本土即落後**」的帝國神話而不自知？為此，我將繼續探究下去。

第二節 「誰的專業／專精？」：當科大社工，不是「社工」

當我穿透自我上升慾望的盡頭，覺察社會工作專業帝國對於台灣「社工」主體的深層制約後，我更加確定我對於問題的探索依然還未結束。只因，我還未完

全釐清我／科大社工毫無疑問、理所當然的認為自己是「社工」，而技職體系培育科大社工的社工系所也正想辦法致力迎合、服膺各項社會工作教育的課程、師資標準，社會工作師的考試資格，但為何還是有些社群夥伴（特別是某些高教社工和社工教授），依然會先入為主又斬釘截鐵的認定科大社工不是，或擺明認為科大社工不符專業期待？那麼，究竟誰才能算是好的、合格的、專業的社工？又誰是差勁的、不合格的、不專業的社工？

上述的提問也就好像有位政大社會系社工組畢業，工作好幾年後再回來念研究所的學妹[95]曾跟我分享：「我大概知道你在意什麼……我自己是政大社會系社工組畢業的（2002 年），我也有過因為自己是社會系畢業，因而被他人質疑且說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社工』的經驗，所以我大概可以同理你的感受……再加上這幾年的工作經驗，我也很清楚不能用『學校』來判斷一個人能不能當『社工』……但我相信你休學工作過一陣子也應該知道，甚至已經注意到，你真的很難否認有些『學校／科大』的學生真的不能用。」我很清楚實務工作多年且經驗豐富的研究所學妹想要提醒我學校教育對於專業能力養成的影響，但這背後同時卻不免也隱涉著：我／科大社工和中、後段學院出身的社工學子似乎永遠躲不掉「學校」與「專業」之間的嫌隙，因為很多時候「學校」出身往往很容易會被人們視為是的「專業」能力的參考指標。據此，我這裡想呈現的是我整理、反思從朝陽到政大的求學經驗後，嘗試提出一些我國社會工作學者們在社會工作專業和社會工作教育研究中甚少講述、記錄、面對及揭露的社會／歷史摺皺：我，要試著「重說」屬於我／科大社工人的一切。

壹、菁英學院與私立科技大學的差異：從邊陲到核心的回返探究

由於我擁有朝陽科大和政大研究所的雙重身分，所以我比起絕大多數的社工學子和社工教授很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我同時能夠親身見識了兩校在教育體制上的差異、接觸兩類的人群、體驗兩種的文化，甚至跨越了南北的地域。一般來說，技職體系和高教體系，最常被人們提及的差異，大概不外乎是技職體系高職生和高教體系高中生的身份差異，或者更直接一點的說：兩者在智識程度的差異。

[95] 她名義上是我「學妹」，但平常我還是都喊她「姐姐」。

我並不想要否認或掩飾這個事實，甚至還想要極力附和、承認接受這個宛如天堂地獄般的差異，只因就我從台中到台北，從台中霧峰朝陽到台北貓空政大的經歷（外加在政大幾個系所，以及台大、陽明等國立名校的修課、學生相處經驗），我的確深刻的體驗了按照考試成績篩選、排列而成的學院階序，很多時候幾乎就等同於人們在聰明才智上的差距，同時也更讓人難以否認有許多超越常人想像的「天才」，確確實實存在於這些前段學院之中。可是，我卻也必須補充說明和大聲疾呼：這並不代表技職體系科大社工或中、後段普通大學的高教社工們的專業能力不好，或者是他們沒有資格成為「社工」。特別是當我發現許多技職體系科大社工或中、後段普通大學的高教社工，有很多都跟我一樣是來自於中、下階級的勞動家庭的學生，這與我在政大、台大等菁英學院裡大多遇見來自中產階級以上家庭的學生有著懸殊的比例差異。所以，我想要為自己，也要為和我有相同境遇的夥伴對台灣的社會工作專業發出不平之冤：因為，科大社工／中、後段社工學院學子們的自我懷疑與卑下意識，其實完全是被「建構」的！

一、從菁英到普羅的社工教育：截然不同的社會／歷史位置

一般來說，台灣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最早的紀錄約莫是於 1950 年代，透過跟隨國民政府遷台學者與第一代歸國學者傳入，正式掀開啟我國社會工作教育的一頁新猷（林萬億，1994；莫藜藜，2007）。發展初期，受限於當時社會工作專業教師學群之不足，我國社會工作教育早期並非獨立的學科，而是依附於社會學系下的少數課程；接著一直要到 1970 年代間，社會工作才慢慢擺脫只是社會學系下幾門弱勢課程的窘境，逐步轉為分組教學（比較特別的是 1973 年實踐家專直接以「社會工作科」為名開設）；此後再依序循著 1980 年代台灣政治經濟情勢的變遷、政府部門對於專業工作人才的需求，以及第二、三代的專業師資的培育與返國，社會工作自此終於徹底脫離社會學系的附庸，陸續正式獨立設系[96]（沙依仁，2002；林萬億，2011；莫藜藜，2007；詹火生，2007；許展耀，2005），同時也自此逐漸奠下了日後主要是以「高教體系普通大學（日間部）」為主的教育培訓體制（鄭怡世，2006）。

[96] 有關於我國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系所（組）之設立、分組、更名年表，以及考試錄取分數請參閱附表一、附表二。

緊接著，我國的社會工作教育先是搭上了 1990 年代高等教育擴張的熱潮（林萬億，2011），造就了越來越多的普羅大眾和中下階層家庭出身的學子有更多機會接受大學教育。再兼以預期收割諸多社會政策及建構福利服務體系就業職缺的預期心理，以及 1997 年社工師立法的鼓舞（王卓聖，2004；王增勇、陶藩瀛，2006；Feng，2007），使得社會工作教育體制一反原先以北部為主的發展型態，中、南部私立的普通大學、技職院校紛紛設立社會工作／社福／相關系所（組）（見圖 5-4 與圖 5-5）。自此，台灣的社會工作教育不再是獨厚於大台北地區，或獨屬少數高教體系前段國立大學、老牌私立大學的精英教育，轉而是快速擴增為遍地開花的普羅教育。截至 2011 年底，我國教育體制裡關於社會工作／社福相關系所（組），已由 1996 年（社工師立法前一年）的大學部 14 所，碩士班 10 所，博士班 2 所，短短十五年間迅速倍增為大學部 31 所，碩士班 26 所，博士班 5 所，成為擁有近 10,500 多名在校生，每年培養近 3000 多名大學部及 400 多名的碩士畢業生的熱門科系（教育部，2011），而這還不包含持續四處林立的社工學分班。若就時勢觀之，在服膺和不違背社工師法規定學分數的大原則下，我們或許可以合理推估，未來勢必將有越來越多人有機會可以成為「社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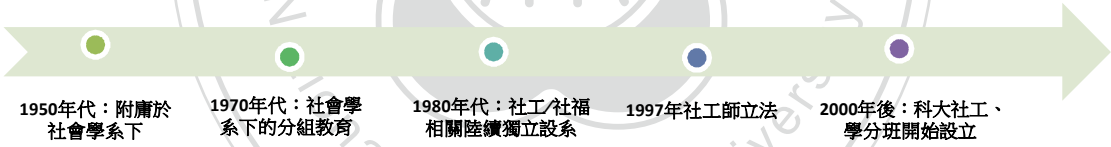

圖 5-4：台灣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變遷歷程

可惜，社會工作／社福／相關系所（組）及學分班急遽增加和遍地開花的結果，並不完全等同於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地位的向上提升（林萬億，2001；彭懷真，2002），或是有助於紓緩我國福利服務體系人力不足（王秀燕，2010；曾華源、白倩如、李仰慈，2010），反而是又吹皺一池春水，更激化一連串關於校際間之學制（主要是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學生素質、學校等第、課程安排、專業師資、專業社會化程度的優劣爭議日漸白熱化（王卓聖，2004；林萬億，2010；林萬億、沈詩涵，2008b；簡春安，趙善如，2010；Feng, 2007）。也就因著社群內部對於教育品質的專業自律要求，社工教育體制急速擴張的結果，最終不可避免的引爆社群內部的二元對立衝突，一連串關於那些社工院校才得以培育出「專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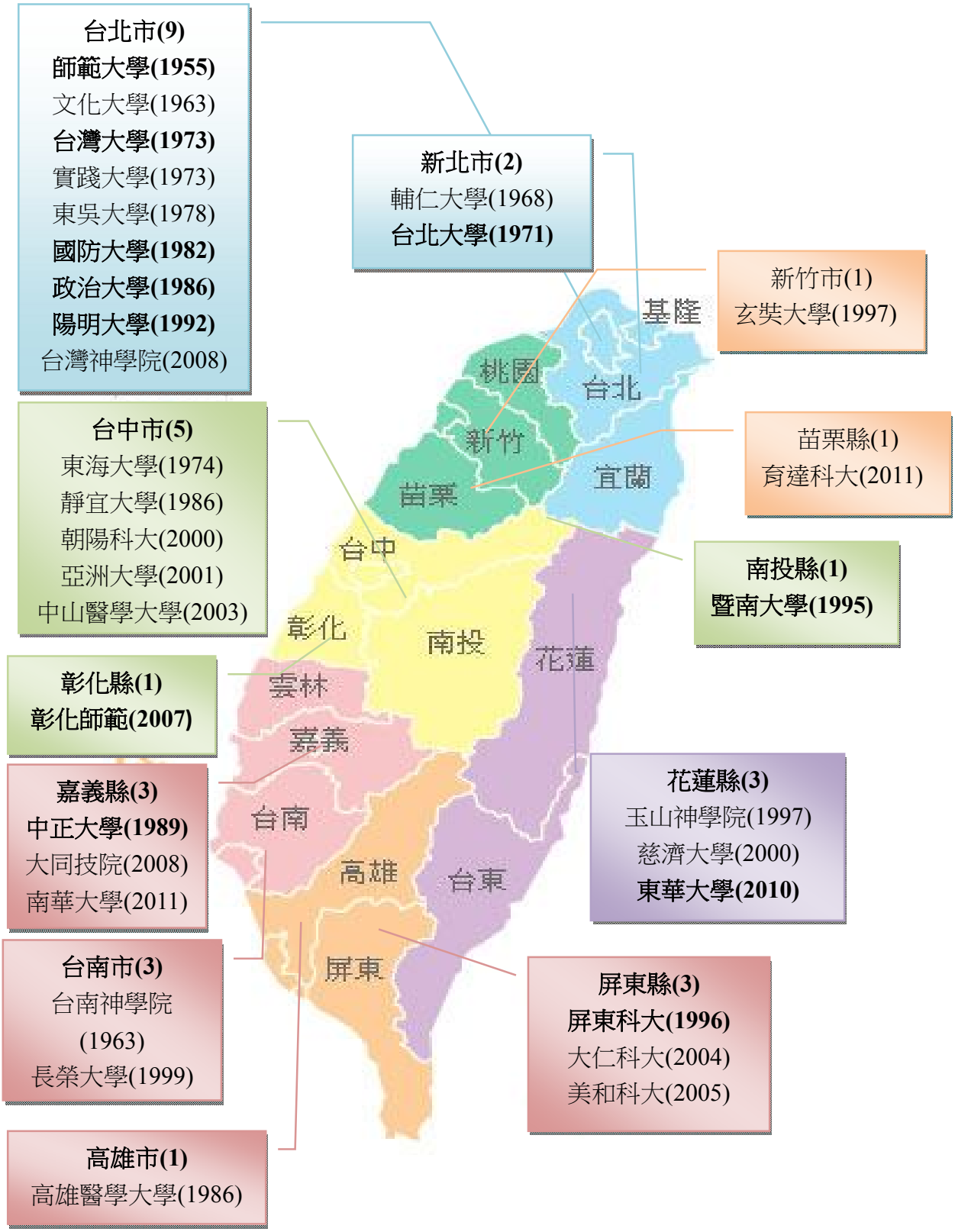

圖 5-5：台灣社會工作／社福／相關系所(組)的成立時間與地理分布圖[97]

[97] 資料整理自附表一、附表二；圖內粗體字為國立的大學／科技大學。

合格」／「不符專業期待」的社工之相關爭議開始浮上檯面（黃彥宜、陳美智、劉鶴群，2008；蕭信彬，2006：13-14）。

對於這個爭議，國內學者王增勇、陶蕃瀛（2006）曾試圖以 Foucault 的規訓權力和普同化（universalizing）效應對於社群內部分化、對立的現象做出以下的回應和解釋：

> 「規訓權力帶來的是一種『看見』與『被看見』的關係，這是一連串的看與被看的權力流轉……這個事件是社工教育界內部的彼此互看、相互檢視後所帶來的普同化過程。證照制度讓社工科系在學術市場中取得較以往優越的地位，讓技職與高等教育體系都紛紛成立或改名社工系，它雖然提供社工學者個人在學術體制內發展的另類途徑，但也提供社工學者集體行動的可能性。因為我們都成為社工證照制度的一份子，都具有建構社工師的主動性。因著社工師，社工專業被看見，我們也透過別人的眼光看見自己，希望社工教育訓練出來的社工師是被認為有一定水準的，因此開始彼此相互檢視……這種區分他者與自我檢視正是規訓權力之所有如此具有滲透力的原因。證照制度不僅讓實務界被學術界檢視，也同時帶動學術界內部的自我檢視與互看」（王增勇、陶蕃瀛，2006：212-213）。

我原則上同意王增勇、陶蕃瀛以社工師法作為如今社群內部分化、對立及衝突的解釋論點，但我認為兩者還遺漏了一條非常重要的訊息，以致他們都沒有更進一步碰觸到真正的問題核心。作為一名時常莫名體認到自己不被社群肯認和飽受賤斥之苦的科大社工，使我在這裡必須更基進的反問：「**規訓權力是由誰發動，又作用在誰身上，也就是說，以社會工作教育為專業基準的『社工常態』是由誰決定？又普同化是誰同化成誰！？**」單純片段的描述「客觀」現實，提供理論層次上多元主體的正當性，依然不足以深刻的捕抓人們精神分裂失序在真實存在層次上的痛苦，亦不能對於無所適從的斷裂經驗提供療傷的策略，只因多元主體的文化資源和歷史傳承通常是相當薄弱的（陳光興，2006：112）。特別是當我多次看到被社工師法認定為第一類的科大社工，依然還是會被某些社群夥伴（特別是菁英學院的社群夥伴、教授）賤斥為他者的矛盾現象時，在這裡亦即充分反應了

社會工作研究現有的文本並不足以（或根本無法）解釋、改善多元社工主體的矛盾處境……因為專業衝突的問題本質，其實直指著「階級」衝突的再現。是故，若我們不直接面對這個問題，我們根本沒有機會解決社群集體的衝突。

當然，我之所能夠如此篤定問題成因源自於「階級」的理由，理由除了我是相對於高教社工的科大社工之外，其中最大的關鍵就在於我是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的的學生：朝陽科技大學不同於其他由五專升格的科技大學，其是技職體系裡極少數直接以二年與四年制的技術學院規格設立，並在升格科技大學後直接創辦社工系的技職院校，這使得朝陽社工系不像其他科大社工系可能會面臨更名或是師資轉型的歷史包袱。因而，朝陽科大社工系除了生員是高職生之外，其餘幾乎與一般大學相同。再加上我修習過的社會工作專業科目，除了團體工作、人類行為之外[98]，其餘幾乎全都是社會工作／社會政策博士親自教授，而且社工師法規定相關課程我也幾乎全部都有修過（有問題的地方大概會是我有些課是兩學分，但新制的社工師法規定都是三學分）。所以，當高教社工的社群夥伴／教授賤斥、責難我／科大社工時，以往慣用的專業師資、課程、高職生的程度不佳（很不巧的我又剛好是五專生轉學生）等義正嚴詞的理由在我身上大多都說不通[99]。於是，在沒有辦法多挑毛病，雙方極其相似的社工主體必然硬碰硬的情況下，問題的詮釋方向最後只會剩下兩個極端的結果：一是我個人的問題，也就是我智識程度和專業能力的高低好壞；二是學院階層化的教育體制問題，也就是朝陽（科大社工）與政大（高教社工）於「學校階序」中所相對應的社會位置。

雖然，我原本也曾很擔心這會不會是真的是我個人的問題，但法國的社會學大師 Bourdieu 卻站出來大力的支持了我一定要說出自己的處境與心聲，他的理論學說讓我確定這絕對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直指著社會的不公平。因為若以 Bourdieu 對於「學校」做為一種階級再生產工具的文化再製理論（邢克超譯，2002；邱天助，2002；楊亞平譯，2004；孫智綺譯，2002）來看待我／科大社工的問題時：

[98] 教授的老師背景是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另外，我研究法老師的背景是教育學博士，但想到她曾經是社工師的出題委員，所以我把她的科目列入社工教授的範疇。

[99] 坦白說，今天如果我不是朝陽的學生，而是其他科大社工系的學生，我可能就會在某些地方被抓到可以挑問題的把柄(如系名、師資、課程)，進而讓我自覺理虧而退縮，也不會讓我這麼的矛盾和敏感。因而，讓我能夠破除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朝陽社工系很像高教社工系，所以只要兩者一出現衝突，原先被隱藏的問題就會跑出來。

「先於個人而存在的社會差異已經部份地轉化成學業的差異，它將出身於權力場域不同區域的學生分離開來，進而將一批又一批職級參與的新生指定在與他們偏愛的體系最協調的學業前景上。分配機制正是利用這些預先存在的社會差異，在各種教育機構之間周而復始地分配著青年學生……最後，就是要為所有追求抱負的人指定一個封閉且能分開彼此的場域，以便迫使人們再持續的鬥爭中接受制約」(楊亞平譯，2004：289-291)。

這不由得讓我馬上就注意到，除了大學部和研究所的差異之外，朝陽科大社工系與政大社工所的「學校階序」不就正好是反應了彼此極其懸殊的社會位置嗎？而政大社工所對於我／朝陽科大社工系／科大社工的批評指責，不就代表著我國社會工作專業於校際之間的衝突是「階級」延伸而來的衝突嗎？

異於常人的身份和特殊的升學經歷（而且我還是勞動家庭的孩子），意外讓我徹底看懂社會工作專業的專業之爭，到底在爭什麼：人們所謂「學校階序」的社會位置較高就會比較「專業」、比較會助人的論述邏輯，說穿了就只是優勢、宰制階級企圖合法化自身權力、地位而不斷強加於普羅學子們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

二、社會工作教育品質的爭議：誰才能教出「專業／合格」的社工？

通常而言，專業師資不足，大概是社群內部最常用來批評、指控科大社工(或學分班社工)專業能力堪憂的主要理由。雖然，我能夠充分理解社群對於我國社會工作專業師資不足，以及其可能將會大幅影響我國社工教育品質，甚至衝擊專業服務、影響專業地位的憂慮和擔心：

「台灣社會工作系所快速設立是在師資準備不及的情況下發生。由非社會工作專長師資來教導社會工作學生，其專業認同、知識、能力、技巧、倫理會出現何種後果？教師與學生可以不知。但是，社會福利機構與案主卻最清楚。大量這樣的社會工作畢業生進入職場，其專業地位、就業機會、工作保障如何？學校可以裝不知道。但是，學生自己，冷暖自知」(林萬億，2010：163)。

然而，這卻也直接延伸出了另一個重要的問題：那些「學校」才能教授出「專業／合格」的社工呢？為此，若我們實際以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2010）近期對於各大專院校專業師資的調查為例（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篇還是刊登在必須經過同儕審查的 TSSCI 論文）[100]，該研究曾逐一調查各校師資，並於研究結果中依序指出國內目前社會工作和社會福利的專業師資未達 50%的不合格系所，分別為中正、陽明、國防、屏科大、高醫大、靜宜、實踐、玄奘、亞洲、中山醫大、嘉南、朝陽、大仁、美和等，其中屬應立即改善者（專業師資比率未達 40%）有中正、陽明、國防、屏科大、高醫大、玄奘、中山醫大、嘉南、美和等。

但在乍看下無懈可擊且極度客觀和理性的推論邏輯下，若我們再更進一步試著將這些「師資不合格」的系所（組）逐一透過附表一、附表二即先前圖 5-5 整理、區別出其異同處，並帶入我們先前爬梳的社會／歷史脈絡時，我們卻也可以發現這些系所（組）通常可能會具有以下幾種共通的特性：

1. 非社工本科的系所（組）（也就是社福／相關科系）
2. 私立中、後段普通大學院校
3. 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系（既有的科大社工系全部入列）
4. 非大台北地區的社工系所（組）
5. 大多為 1990 年後成立的社工系所（組）

我想這將帶給我們一個看似簡單，卻又非常重要和危險的後設啟發：我必須指出，林萬億（2010）看似客觀、理性的推論邏輯性其實徹底忽略，甚至去除了各系所（組）成立、變革背後所對應的社會／歷史脈絡因素。例如，早在學分班社工和科大社工大量出現之前，專業師資不足就已是我國的社會工作教育長期、普遍存在的問題（林萬億、呂寶靜、鄭麗珍，1999），而社群內部教師、學生、教學與實務脫節的教育問題亦是早有耳聞的疑義（高迪理，1995；廖榮利、藍采

[100] 我附表一和附表二的學校資料與林萬億（2010）的研究範疇有些差別，如 2010 年後新增的系所（組）（東華、南華、育達），或有些學校則是在一開始就沒有被林萬億的研究納入（如彰師、大同、玉山神學院、台灣神學院），以致我在文本的敘述、呈現上可能有產生部分差異。但這並非代表這些學校合格，因為若同樣以該研究的標準評比，我相信上述這些社工院校大概也免不了是不合格的一員（更直接一點的說，這些社工相關學院或許根本沒有被視為社群的一份子）；另外，我在這裡沒有提及學分班社工的原因是，就常態經驗而言，我不得不說社工學分班的師資常是直接被預設為不合格的（至少我個人接受到的訊息一直是如此）。

風，1993）（**請特別注意時間點，這時候並沒有所謂的科大社工**）。可是，我們卻也可以在許多研究中看到社會工作教育的問題焦點，如今卻不置可否的隨著社工教育體制的擴張，一點一點又無聲無息的一路轉向後續接連成立的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系和中、後段的社工系所（組）（王卓聖，2004；林萬億，2010；林萬億、沈詩涵，2008b；簡春安，趙善如，2010；Feng, 2007）。最後，台灣社會工作教育的「問題」就這麼被「去歷史」，就這麼被當下歷史「客觀化」定調了。

換言之，前者的優越感，很有可能僅僅只是自欺欺人的建構在後者相對普通、落後的位置上，但社會工作教育過往今來的問題本質真的改善了嗎？這似乎仍是一個沒有人敢大膽回應的問題。因而，我想我們只要多花點時間持續比對不合格者與合格者的異同處，接著就能清楚的看見啟動社群內部的規訓權力和普同化效應之慾望原型／參照基準，幾乎都是來自高教體系前段、知名的國立／私立的本科系社工系所（組），亦大多是位居大台北地區、早期創立的社工系所（組），繼而使得這些象徵菁英學院的社工系所（組），能夠毫無阻礙又順理成章、自然而然的隨著社會／歷史的流變成為我國社會工作專業領先的優勢群群體，取得了理所當然的「合格」位置，亦成為在美式社會工作專業殖民下，台灣「社工」主體的相對「上位者」，最終……得以成為了某一種理所當然的「絕對」。

所以，我大膽認為造成今天社群的呈現二極分化、對立衝突的源頭，絕對與這些位居前段系所（組）（菁英學院）又握有知識生產工具的知識份子脫不了干係。只因，我國掌握專業建制和社會工作教育改革知識／權力的知識份子，在不斷追逐、襲取美式社會工作專業之際，以及對於本土社會工作專業／教育體制進行改革和批判時，通常沒有返身醒覺自身於社會／歷史的優勢條件。例如，在批評中、後段學院專業師資不足的問題時，絕大多數的社會工作學者們迄今仍未公開正視社會工作教育體制內新生代和中堅的專業師資往往普遍呈現出「**從技職到高教、從私立到國立、從中南部到北部**」的流動趨勢更加助長了絕大多數的中、後段學院師資持續陷入患寡又患不均的惡性循環[101]，甚至根本未曾提及、考慮我國教育資源和機會的不平等，早已在無形中大幅制約了諸多文化資本不足的中、

[101] 就我自身經驗的觀察，在我進入朝陽之前，先有一位老師去了暨大，後來教我社工概的老師去靜宜、教我統計的老師去了實踐（一年後又轉去北大），近期又有三位師長分別到了慈濟、亞洲、東吳；而另外一種逆向流動的情形，則大多是出現在國立大學先退休過一次，再轉進至私立學院的老一輩專業師資。

後段學院或弱勢學子們（普羅／中下階級）的生涯發展路徑（符碧真，2000；蔡淑鈴、瞿海源，1992；章英華、薛承泰、黃毅志，1996；黃毅志，1995，2002，2011；楊瑩，1988，1994；駱明慶，2002），就只是一味透過客觀實證的研究結果，不斷責難後進者／下位者不符專業教育的期待或素質不佳。最後，我國社會工作的知識份子就這麼不著痕跡的全盤藏匿／轉譯／簡化了原先就已經存在於教育體制內部諸多影響社會工作教育品質參差良莠爭論的真正問題成因，並將所有的問題責任都轉嫁給不符專業期待的學子身上，終使得「學校」成為一種非常具有解釋力的專業社會化要素，進而不斷形塑、強化「學校」階序等同於「專業」能力高低的論述和虛假意識。

是故，諸如「私立學校教師的位階和師生比較公立學校不理想，私立學校的教師通常較不具經驗、教學負擔沈重，意味著研究產出和教學品質較低落」的研究結果（Feng，2007：597），真的公平合理？真的正確無誤？又此種近乎不斷企圖將中、後段社工學院刻板化和他者／劣者化，持續賤斥、責難不屬於領先群體的下位者，以及掩飾、簡化既有社會結構階級的不平等，缺乏後設、反思的實證研究結果，不禁讓人想問，這真的是社會工作的知識份子們應有的作為？或者是說，過往的研究根本沒有幫助我們發現和解決問題，反而又自行製造出了更多的問題、動亂及衝突呢？

貳、一張證照，兩個世界：與專業化／專精化無緣的科大社工？

不幸的是，科大社工與中、後段社工學院的社群夥伴除了必須想辦法克服「學校」出生的原罪之外，同時還必須要面對一個十分困窘的問題：那就是我國的「社工師考試」。遙想我對於「社工師考試」最早的認識，依稀是我大二、大三時從師長、學長姐們嘴邊偶爾會提起的一種聽起來很重要、很厲害卻又難以考取的專技證照。所以，我真的曾經以為「考上」社工師證照就可以證明自己是個很「專業／優秀」的社工。但這似乎也正意謂著：我國的社工師法對於「專業」的定義邏輯十分簡單：「有照」與「無照」，而此種透過考試的專業邏輯不免也使得錄取率的高低起伏歷來一直是引發社群關注、批評、爭執的核心焦點。

不過，比起聚焦於錄取率的爭議，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記得我在 2007 年

底推甄暨大社工系的研究所時，我和大學死黨站在佈告欄前，一同瞧見了一排由左至右、很長很長的考試錄取名單，反觀我當天回到母校後，我在系上的布告欄前，我卻看到當年度只有一位夜間部畢業的學姐考取，那是我第一次明顯感受到校際之間遙不可即的程度差異。而這股科大社工人考不上又「輸人慘慘」的差距感，在我來到政大社工所後更是越加沉重。特別是我在就讀政大社工所期間，連續兩次的落榜經驗，更是讓我深刻體驗了在政大社工所考上社工師是「應該的」，沒考上是「奇怪的」的學院差異：很多時候，在你還沒有考上前，根本不需要別人對你多說些什麼，當自己看見周遭的人一個接著一個考上，或者是師長無意間對於誰還沒考上社工師證照的點名提醒，身體的五感就會不斷感受到不請自來的恐慌和焦慮。或者，也曾有台大社工所的朋友半開玩笑的對我說，她覺得台大的同學們比較的重點不是考上與否，而是在於自己出現在榜單的第幾行第幾頁，還有之後能不能考上公職社工師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處在菁英學院的考試經驗與我過往在朝陽社工系時眾人大多都考不上的情境、感受截然不同，這不由得更讓我開始懷疑，社工師法到底是為了要證明「誰」的「專業」？

當然，這個懷疑絕對不是無病呻吟。因為在 2010 年第二次社工師考試放榜的那一天[102]，機構擔任管理職的資深工作人員在恭喜我考取社工師之後，同時也不自覺的脫口說出：「**我也要叫我們其他社工趕快去考，這樣下次評鑑我們就可以加分了。**」我頓時才明白，原來我考上社工師的好處，就是機構評鑑時可以「加分」，但我與沒考上之前的我，其實一點差別都沒有，我根本沒有任何改變，沒有任何自己變得比較「專業」的升級感，而這也使得我上榜的喜悅很快就消失殆盡：我很快就意識到我的改變似乎僅僅在於我擁有證照，而別人沒有，兩者的差異僅此而已。所以，我後來反而會覺得想辦法把手邊的案主服務好，把方案設計的完整周延一些時，案主和工作夥伴對我的感謝和肯定還比較重要[103]。

另外，最諷刺的又莫過於：雖然我在政大社工所不時常會聽到某些師長批評母校或科大社工，但我想可能真的是師長們夜路走多了，終究還是會碰到鬼的緣故，有位政大學妹的期中實習督導，非常湊巧是我很要好的大學同學，而學妹的學校督導，剛好也就是最常批評母校很糟的師長。然而，這個讓人有點擔心的微

[102] 我當時正好處於休學的就業期間。
[103] 這大概也是我考上社工師證照這麼久，卻一直很抗拒去領牌的原因吧。

妙組合，卻意外得到了十分正向的結果：我後來多次聽到政大的學妹和我的同學都非常讚賞彼此。對此，我很開心聽聞我的大學同學在實務界是個好社工、好督導的消息，這更讓我能夠確定專業能力跟「學校」出身可以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只是，不久之後我卻又發現兩者好不容易打平的學校差異卻在社工師考試後再一次明顯被區隔了，因為政大社工所的學妹後來順利的考上社工師證照，但我的大學同學迄今仍然考不上。這不免又讓我開始警覺社工師考試所標的、關心的「專業」，終究不僅僅只是人們會不會「做社工」或「提升服務品質」，而是透過考試制度來繼續維持、延續原有的學校／階級關係。是故，社工師法造成的層級分化問題並不完全在於「錄取率」或「學歷高低」（就考選部既有的公開數據來說，擁有研究所學歷者考上社工師證照的機率較高）[104]，我們接下來應重新以「學校」作為判定的基準[105]，未來也才得以逐漸確認問題的全貌。

藉由上述的討論，我們約莫已可勾勒出問題的形成軌跡：社工師立法得以提升、維持專業地位的爭議終究是虛幻的假議題，如今社群成員外在的「專業」差異，本質上其實是從個人家庭社經狀況的社會／階級差異為基底，接著透過考試、分發制度建構為「學校」階序的差異，然後再經由社工師考試進一步轉化成為有無「社工師證照」的差異。更甚者，當我國在 2009 年又一次通過「專科社會工作師分科甄審及接受繼續教育辦法」，社群接下來又將於「社工師」之上進一步區分出五種的「專精社工師」，而且還要再「考」一次試和「發表」學術性的期刊文章。由此，在最科學理性的情況下，若以我政大社工所學妹和我大學同學為例，我不禁想追問未來她們兩人誰成為「專精社工師」的機會比較高？

如果，我那總是考不到社工師證照，但專業能力卻十分優異且受到眾人肯定的大學同學，其實根本難以在既有專業體制中證明自己，那麼我們一直以來在推行的專業化、專精化，不就僅僅只是在鞏固極少數學院菁英的利益嗎[106]？那社群長期以來致力推行的專業化與專精化，不就都只是「專」了少數學院菁英的「業

---

[104] 詳細資料可自想參閱考選部網頁資料。

[105] 考選部並沒有釋放社工師錄取人的學院背景資料，以致目前在統計分析上暫不可行。不過，到底都是那些「學校」的學生考上社工師？我相信這勢必是我國的研究者未來必須深入進行探察、分析的重點。

[106] 例如，目前學校社工師的職缺幾乎就都規定必須有「證照」才能應徵，而這是否是一種變相的就業歧視呢？

／精」嗎？最後，眾人歷來苦心期盼建構的社會工作專業制度，是否只是一場經由既得利益者們精心設計、企圖瞞天過海的大騙局，只因在既有的專業體制裡，絕大多數不擅考試的科大社工／中、後段學院的社工學子，根本難以成為社工師法所承認的「專業」社工；或者，我們依然還是只會聽見某些位高權重的社工大老們不假思索說：助人能力出眾卻又考不上社工師證照的科大社工／中、後段學院出身的社群夥伴……其實只是極少數的「特例」呢？所以，這些面臨被體制系統性排除卻又尚未完全醒覺的科大社工／中、後段學院出身的社群夥伴，真的是……「社工」嗎？

叁、重構「科大社工」的故事：社會工作「教育／專業」爭議的再脈絡化

朱元鴻（2000：143）曾指出：「一個社會的『常態』需要由許多的『變態』來界定；一個社會的『安全』需要由許多『風險』來對焦」。反觀台灣的社會工作專業，是否也是經由許許多多「不專業」的「他者／劣者」所建構而成的「專業」呢？據此，在逐步收編、匯集我／許多科大社工人、社群夥伴的故事／研究發現後，我越來越確定我／科大社工的故事，無疑即是我企圖透過敘說、書寫自我／科大社工的生命經驗，藉此清楚標示在專業邊陲境地的他者／劣者們對於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現代性的詮釋反動。

一、再探「高教／科大」的社群衝突：「士人」與「工匠」的詮釋鬥爭？

當我們已經知道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中有著許多種「社工」，我們接下來或許就可以進一步探析高教社工與科大社工的衝突、對立關係。不過，有別於其他社群成員的衝突、對立關係，從先前的討論中我們已陸續確認主體形貌極其相似的高教社工與科大社工，兩者在於「社工」的主體差異，其主要的可能成因是家庭社經的「階級」因素，背景脈絡則是「教育體制」、「考試、分發制度」等體制因素所交互形塑。立基於以上種種，兩者在「教育／專業」的衝突、對立事件，問題的濫觴雖然不脫是「階級鬥爭」的一種，但若進一步以意識形態來討論探之，或許也可說是「士人／高教社工」與「工匠／科大社工」對於「社工」主體階級位階的詮釋鬥爭。

對此，最能夠被援引的生活例證大概就是，我記得我曾多次聽到幾位反對技職體系設立科大社工系的社工教授毫不猶豫又異口同聲的說出過類似的言論：「科技大學應該是在訓練工人的，是在訓練技術人員的，但我們社會工作不只有技術，還擁有著許多藝術、哲學層次的思辨訓練，所以技職體系的科技大學怎麼能夠設立社會工作系？」在這裡我們必須要稍微放慢腳步，因為這段話接連浮現了兩個重要的議題：首先是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在台灣教育體制中對應、鑲嵌的階級位屬，其次則是「社工」自我定位的階級意識。換言之，高教社工與科大社工人的衝突對立，有一部份其實是經由「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士大夫意識形態造成的，也就是說，這是一場士人階級與工匠階級對於「社工」階級位屬的詮釋鬥爭。

然而，「社工」究竟是該歸屬於何種「階級」？是屬於專業人士的「中產階級」，亦或是受政府／組之雇用的「勞工階級」呢？為此，蔡培元（2002 ）就曾指出，台灣的社工人歷來對於自身的階級位屬往往存有著一種錯置的迷思盲點，也就是不認為自己是「勞工」，而是「專業工作人員」的階級盲。所以，隨著許多不明就裡的社會工作教授一同賤斥、責難科大社工人的高教社工人是最可悲、可憐及可憎的。因為相對享有豐富資源的他們放棄了自行思辨，捨棄了相信人性，背棄了社會工作貼近底層階級的價值信仰，就只是一股腦的暗自竊喜著建構於他者苦難之上的專業與尊貴，最終忘卻了自我，成為了被異化可悲的盲目之人。

二、何去何從的科大社工：「科大社工」真的……是「社工」嗎！？

延續前言，雖然可能會引起許多科大社工人的不快，但有些話我想在這裡說出來會是好的。只因，比起其他同樣遭遇賤斥、排除窘境的社群夥伴，我認為絕大多數的科大社工人都還懷抱著某種極其殘酷的無知與絕望而不自知：例如，在內部的自我意識方面，台灣的科大社工人根本不知何為「科大社工」，科大社工人很少發現他們完全服膺於以「高教社工／美式社會工作專業」為主體的專業價值系統；同樣的，在外部的教育／專業體制方面，遭逢困境的科大社工人並沒有真正意識到自我卑下意識的由來，甚至也還未能清楚感知科大社工人正面臨社工師法已造成體制層次的系統性歧視、排除。換言之，就好像是我曾遇見過對於高教社工感到恐懼的科大社工，我必須說，這是一種病；反之，我也曾遇見認為自

我專業能力與高教社工幾近無異的科大社工，或是欣喜自己轉換身份成為高教社工的科大社工，或是攻擊、訕笑不同院校科大社工人專業能力的科大社工，我認為他們也同樣有病，而這一切完全就如 Fanon 當初形容黑人同胞的一段話：

> 「黑人就是比較。這是首要的事實。意思是他們無時無刻地關心著自抬身價和自我理想。每一次和他者接觸，就會出現價值和才能的問題。安的列斯人沒有自己的價值，總是附著於他者的現身。總是有比我不聰明的、比我黑、比我差的問題。所有關於自我的定位，都與他者的潰敗維持著依賴關係」(陳瑞樺譯，2009：312)。

如果，掌握台灣社會工作主體歷史詮釋權的高教社工人最大的錯誤在於不把科大社工當「社工」，那麼科大社工人最大的不幸，就在於不知道自己不是「社工」，沒有發現自己是不被台灣社會工作專業肯認的「社工」。就我長期以來的貼身觀察和訪談經驗的整理，我更是發現越是嚮往主流社會工作專業價值的科大社工人，其身上似乎越發存在著一個詭異的糾結矛盾：實力出眾的科大社工人可以想盡辦法證實、表現「自己」是沒有問題的好社工，但卻始終無法證明「科大社工」是沒有問題的好社工。也就是說，科大社工自己可以是沒有問題的社工，但在自我意識的深處，特別是只要與高教社工發生衝突時，穿透「科大社工」一詞所浮現的主體印象很容易是負面的，是低下的，是有存有疑慮的。所以，不知道自己是誰，無法擺脫高教社工陰影的科大社工，真的是……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的「社工」嗎？

第三節　「誰決定的歷史？」：顛覆自我／帝國臣民們的異化輓歌

當我一方面持續向內試圖安頓自我，一方面不斷向外企求自身問題對應的結構成因，但曾幾何時，我卻仍不斷驚覺眼前的一切已經越來越不可盡信，思考則逐漸變成是無止盡的精神折磨和午夜夢魘。問題千繞百轉之後，始終還是回到了我身上。就好像我曾做過一個惡夢，我夢見週遭的師長、友人拼了命的指責我／科大社工不是社工，以及我背叛了他們，然後我回家不斷努力翻書想要證明自己卻又找不到合理的證據，於是一邊痛哭一邊撕書、燒書，最後燒死自己的惡夢。雖然，我確實曾有許多機會可以聽從友人、師長的建議，選擇不去理會或是乾脆

臣服於既有的認識和社會現實，安穩的順著眾人的期待，樂天知命的繼續扮演一個眾人稱羨的政大研究生，藉此擺脫惡夢連連的狀態。可是，我從來沒有打算這麼做，也無法這麼做。因為我始終不能忍受、原諒自己變成一個拋棄自我認同和存在尊嚴又不持續思考的蠢人。更重要的是，我是科大社工，我身後有著許多和我同樣飽受不明賤斥之苦的科大社工兄弟姐妹。為此，冥頑不靈的我，終究還是義無反顧的挺直腰桿選擇直入自我意識深處的不甘和存在衝突，並從政大社工所的優越社會位置回頭走向培育我作為一名社工的起點－技職體系的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但這卻必然要承擔超乎言表的意識衝突，更必須不斷抗拒造成自我「存而不在」的社會／歷史現實連番侵蝕，不斷看見許多和我一樣落入相同處境的社工夥伴。但也就在這個時候，最令人感到不解和遺憾的，又莫過於是我在 2012 年 04 月 07 日，看見推動社會工作專業建制最不遺餘力的民間組織，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理事長暨台大社工系教授鄭麗珍以《社工日，社工不快樂》為題投書至蘋果日報寫道[107]：

> 「民國 1997 年 4 月 2 日，為了增進社會工作專業，保障廣大社會民眾與社會工作人員的發展，在社工實務界、學術界，與眾多社會福利團體的努力奔走下，終於公告修訂《社會工作師法》，是台灣社福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但**反觀今日，社工人員的專業地位不僅沒有提升**，每當家暴、兒虐等案件發生時，如近期發生的台中市三姐弟情殺案、雲林縣女童渾身傷痕躲在土地公廟、或是台北市文山區三胞胎男童離奇死亡之兒虐事件，主責社工人員往往成為媒體關注、追逐的焦點，最後甚至成為未善盡處理責任、千夫所指的責罵對象，社工人員之專業形象常年來遭受極為嚴重的扭曲和誤解。身為社會工作人員權益之捍衛者，我認為不只需要扭轉社會大眾對於社工人員的認識，更重要且急迫的是，**我們必須關注全台各縣市的社工人員，長年在社會福利預算不穩定、編制員額不足、約聘人力年年異動的狀況下，極其艱辛地固守社會福利安全網的重要角色**，面對『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不合理困境」（**粗體為我自行強調**）。

[107]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orum/20120407/34143798，取自 2012 年 8 月 26 日。

壹、存而不在的自我衝突：「我，難道不是社工嗎？」的悲憤絕叫

見報的那一天，我忽然又想起記載台灣社會工作發展的歷史文獻，或多或少都曾記載台灣的社工人過去曾走過一段附屬在社會系下，主體認同不明、缺乏社會認可的日子（呂寶靜，1979），以及曾經歷過被其他強勢專業和國家機器的打壓漠視，專業地位不清的困頓過往（方雅麗，1999；王增勇、陶蕃瀛，2006；陶蕃瀛，1999；黃侃如，2004；羅曉瑩，2005）。為此，無論是楊玫瑩（2000）或簡春安、趙善如（2010）對於社工師建制立法過程的文本記錄，我相信每一個讀者都可以在前人悉心記錄的文字點滴中，感受到當初所有社工人苦苦盼著有天能從邊陲專業，一舉躍升到核心專業的那一份悸動和渴望。

只是，我始終不懂為什麼如今早已脫離社會系獨立多時的我們，也已通過社工師法的我們還是不快樂？為什麼凡事總宣稱以美國為師就可以變得更好的我們至今還是無法擺脫過去的社群困境？那當初宣稱的立法目的是騙人的嗎？更可怖、遺憾的是，為什麼造成我／科大社工人／許多社工人產生自我懷疑和卑下意識的原兇，竟然會是社工人？為什麼社工人昔日的困境不但沒有被阻斷、被改寫，反而又延續至今，而且是以一種更令人感到苦澀、噁心的形式回返、作用在社群的後進夥伴身上？

如果說，長期過度依附國家機器的發展經驗是造成台灣社會工作學術與本土經驗斷裂的禍首（王增勇，2007），而追尋美式社會工作專業的西方殖民現象是造成台灣本土的助人事業分裂為學院派與非學院派的成因（陶蕃瀛，1999），那我／科大社工眼下體現的衝突究竟又是什麼？曾經，我以為我是社工，如假包換的社工，身邊的每一個科大社工都毫無疑問的這麼對我說。於是，當原住民社工和神學院社工被社工師法排除時，我還不是「社工」，而且事情也早就都過去了，沒什麼好追究的，所以我沉默；學分班社工被說不是「社工」時，我認為他們的訓練本來就糟透了，所以我沉默；社福系的夥伴被說不是「社工」時，我也認為社福系本來就不是很「社工」，所以我沉默；許多後段的高教社工和科大社工被說不是「社工」時，我也認為他們的師資和課程不符資格爛透了，本來就不應該是「社工」。

但當我第一次感受到其他社群成員將我賤斥為他者時，我很驚訝，我有點不悅，我苦笑，不過我仍樂觀的繼續前行，因為我修滿所有社工師考試規定的社工學分，有過符合規定時數的實習經驗，而且我記得國內學者周怡君（2007）曾說過高教體系和技職體系對於社工教育的安排是一模一樣的，我確定我是社工，這一定只是個無傷大雅的小誤會，他們說的一定不是我；接著，我又不斷聽到有人不分青紅皂白的對我怒斥：「你爛透了」、「你不夠好」或「爛學校的學生」，我很難過，我很憤怒，但我咬緊牙根安慰自己，我現在確實技不如人，可是我會努力充實自己，我有天一定會變得更好；不久之後，我開始注意到母校的師長，一個接著一個離開我們，他們可能是前去高教體系的普通大學，也可能是前往北部的國立名校，我理解良禽擇木而棲的人之常情，可是當我又不斷聽聞母校因師資、教學品質、課程不符期待被人指責時，我隱約萌生些許猶豫，有些不知所措，感到些許不公平，我認為一定是那裡搞錯了，我猛然覺得有那邊不太對勁，但我仍堅信母校的教育培訓沒有問題，所以我鼓起勇氣，抬起胸膛繼續前行，我一定會證明我是社工，我有天一定可以比那些人輕蔑、攻擊科大社工的人還要好；然而，當我再次繼續往前，未曾止歇、一次接著一次的他者指控，逐漸讓我的精神感到有些疲累，我的認知基模開始動搖；有天，當意識即將瀕臨極限的我，再一次聽見我沒有被教好，耳邊又一次傳來鼓吹科大社工是他者／劣者的言論時，來自四面八方的他者凝視和分崩離析的自我存在感開始讓我頭痛欲裂，心中妒忌的怒火更是熊熊燃燒。我感受到我的存在感不斷瑟縮、消逝，而我也終於忍不住發狂、怒吼、吶喊：「我／科大社工，難道不是社工嗎！？」

緊握著無端被社群成員視為他者／劣者的不甘和憤怒，我同時卻也忽然感到無比的羞愧和汗顏。只因，此刻的我究竟該如何回過頭去，面對那些曾經在我意識深處或行為表現上被我極力賤斥和否決的他者和劣者們袒露：「親愛的朋友，我……也是你們的同伴」呢？

貳、科大社工，不是社工：從美式社會工作專業殖民到自我殖民的多層次斷裂

從朝陽到政大的社工路上，我努力彌補自我在經濟、智識上的不足和劣勢，盡可能的跨越體制的層層阻礙，但拖著傷痕累累的疲累身軀，我卻又不只一次覺知、體驗科大社工進退維谷又虛無飄渺的存在。比起「社福／相關科系」和「學

分班社工」的夥伴，我總是看見「科大社工」不斷需要提出證據證實自己和「高教社工」無異的詭異現實（陳麗欣、王慧琦，2003）[108]。但我卻完全無法理解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為何總是需要花時間證明自己？我們的課程要求有什麼地方有不符合社工師法嗎？反觀東海、東吳、輔大、暨大或台大的社工有需要向社群證明自己是「社工」的困擾嗎？在敘說、書寫論文的過程中，我深刻的經歷、體驗到的就是技職體系科大社工人的歷史，是他者／劣者的歷史，是不斷承載了社群所有「惡」的歷史，是不斷被賤斥、異化的問題歷史。

一、成為他者／劣者的悲劇歷史：被迫不是「社工」的科大社工

科大社工，究竟由何而來，又將由何而去？回顧台灣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歷史時，我先是看見了實踐家專的社會工作科和文化大學夜間部的社會工作系，但隨著歷史的演進，我卻也開始遇見技職體系最早設立社工學程的屏東技術學院（後升格為屏東科技大學）應用生活科技系（1996 年），先是被林萬億（2000：124）以「特例」形容；接著，在社工師立法後，隨著技職體系科技大學的社工系高速擴張，高雄醫學大學的陳武宗副教授首先義憤填膺、憂心忡忡的在 2004 年 6 月 30 日以一則「**誰是社會工作教育的終結者？**」公開發難投書至自由時報[109]：

> 「對有心從事社會工作助人專業教育的同道，看到當前技職體系社工學系的改名、新設，師資不變，學生遽增，面對此現象，有時我們充滿了無力與憤怒，甚至紛紛表達出對社會工作教育潛存的危機與憂慮……當社工學生在技職體系，進入量產的階段，是否符合當前整體社會發展的需要？」

此文自此點燃了社群內部對於技職體系教育品質淪喪低下的一連串論戰（蕭信斌，2006）；再來，近期林萬億、沈詩涵（2008b：227）則是非常誠實的一語道破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真正所欲對象：「目前臺灣的國民中小學校的教師，多的是碩士，甚至博士校長一堆，不論其獲自哪一所大學的學位，他們不會相信一個只是學士學位，尤其是排名在後面的學校畢業的學校社會工作師具有多大的專業能耐。」

---

[108] 該研究的結果指出，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與高教體系的高教社工，專業內涵本質上並無二異。
[109]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jun/30/today-o1.htm，取自 2012 年 8 月 26 日。

由此，我也才警覺到，原來出身中、後段學院的我，得不到台灣社會工作專業肯認，即使是考上社工師亦是不被信任的；不久之後，簡春安、趙善如（2010：98）亦赤裸裸的寫下：「普通大學的學生來源是一般高中，科技大學的來源則是高職。考大學時難易度及學生素質難免會有差異。進了大學都是一樣的社會工作系，嚴格說來，難免有混淆之嫌。」然而，更讓我感到十分氣餒的是，當這篇論文進行到最末段時，某位任教於國立知名社會工作學系的師長，有天突然不經意的向我分享他任教的系所，在碩士班推甄的面試結束後，其所上有幾位教授毅然堅決拒收科大社工系學生的事件經過。在那當下，我深刻覺悟了科大社工人此刻必須面對的問題已經不只是「偏見」，而是已逐漸演變為某種根深柢固又理所當然的「歧視」了！

只是，為什麼科大社工就一定是素質不良的！？為什麼人們總是不相信科大社工是會學習、會進步的！？為什麼科大社工必須承擔如此沉重又卑下的宿命！？從朝陽到政大的身份錯置，讓我有機會看到了全然不同的問題景象，但我總是只能眼巴巴細數著身上一道又一道的社會／歷史傷痕，卻沒人能夠告訴我，究竟是什麼讓許多位高權重的知識份子，可以如此理所當然的一點一點撕裂、賤斥、否認、剝奪我科大兄弟姐妹的存在與尊嚴？又是什麼讓人們甘心放任這些目空一切的知識份子對於諸多社工學子心靈造成斷裂、流離的苦痛而又繼續沉默不語？難道，真的都沒有人自省或發現我們「社會工作專業」所謂的「專業」，根本就只是一路不斷將他者建構為不專業的自慰行為嗎！？難道，都沒有人發現、自省我們不斷深陷「社工」主體異化的自我殖民困境嗎？

二、殘酷又矛盾的生活現實：支離破碎的自我／社工圖像

透過敘說、書寫自身經歷和文獻的回顧，我看見隨著歲月的流變，**台灣的社會工作一路從號召美式社會工作的專業主義（鼓吹建制社工師法），過渡到社群內部極端的專業主義（日漸嚴苛的學歷、學分門檻），再到盲目的排外主義（非本科的人都不是社工），最後形成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理所當然的偏見及歧視（某些學校的社工師資是不齊全的，其理所當然是素質不佳的、應當要被賤斥、排除的）**。換言之，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的建制發展史，也正是一部帝國殖民逐步轉向內部／自我殖民史的再現。於此同時，我也終於認清了令我錯置混亂的一切，

醒覺我／科大社工人／諸多社群夥伴的自我懷疑／自卑情結，皆是一種因自我認知矛盾、斷裂所致的存在焦慮，而這全都始自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的建制過程沒有「我」的存在，沒有「我們」的存在。在台灣既有的社會工作專業體制中，「我們」只能夠想辦法跟社群的主要成員「高教社工」一樣，否則「我們」就有可能被視為是社群的他者。

望見此情此景，我不禁感嘆，當初在中正紀念堂聲嘶力竭的搖旗吶喊、渴望專業建制的人們，不知有誰曾想到苦盼多時的社會工作專業竟會是建制體制的知識份子們巧言羅織的海市蜃樓？不知有誰曾想到「高教社工」的身形在此刻徹底轉化為是台灣社工人分類彼此和象徵優越現代性的絕對「上位」，更是不容質疑的前見範疇？最後，禍首的身形被徹底藏匿，而所有的社工人只能透過以「高教社工」的形貌來認識自己，進而徹底制約「我們」的身、心、靈只有在更像主流的「高教社工」時，才能稍微免除「我們」的存在焦慮。但，又有誰會想到，「我們」費勁心力的模仿卻又可能會被某些菁英學院裡的知識份子認為不夠像，甚至還可能被口頭或撰文告知「我們」根本不應該存在。

就像那天，我永遠不會忘記的那一天，我又一次親眼目睹、耳聞頗負盛名的社工大老毫不遲疑的對著台下的社工學子說：「技職體系的科技大學不應該設社工系，他們的專業師資都有問題……我有研究證實……。」那天，我看見旁觀的眾人沉默、無感，或點頭如搗蒜的認為理所當然，只留下一臉茫然，不斷浮現惶恐不安的存在焦慮，不知道自己是誰的科大社工；更可怕的是，當我試著將目光轉向表現優異的科大社工尋求協助、警告問題可能的嚴重性時，我卻接著發現眼前大多數的科大社工，我最親密的友人、師長看待、理解問題的視框和態度、解釋問題的思考邏輯，竟然完全與那些賤斥我的「高教社工」完全一模一樣。接著，我總是聽見人們對我說：「別人說的不是我們，他們是在說後面那些更爛的學校」、「這是你的自卑，一切都是你個人的問題」，亦或是「你有沒有比他們認真？你有沒有努力比那些輕蔑你的人還要好？」，不然就是「這個社會就是如此」、「你為何總是要如此的憤世嫉俗呢？」又或者，我也多次覺察自己和身旁科大社工人面臨專業爭議時，很容易同樣套用了高教社工人的思維邏輯，毫不猶豫的賤斥、責難了出身更後段院校的科大社工／社群夥伴。

望著支離破碎的一切和眾多早已停止思考的蠢人，多次遇見扭曲人性的惡意，我終於明白，我……根本無處可逃。科大社工，和我同樣崇尚社會工作專業卻又被社群夥伴賤斥為他者的科大社工，某種程度恰巧正如 Fanon 書中安的列斯被白人殖民的黑人（陳瑞樺譯，2009），或 Freire 筆下失去自我主體的受壓迫者（方永泉譯，2003）。其往往擁有分裂的雙重人格，以及「為他存有」（beings for another）的行為特質，也就是說，我／科大社工一方面雖然是承受上位者（主流的高教社工）施予壓迫的下位者，但另一方面受壓迫的我／科大社工卻也會不斷內化壓迫者／高教社工的形象，持續美化、模仿著壓迫者的言行舉止，最終使得受壓迫者無法擺脫，甚至全面內化對於壓迫者的依賴與自卑情結，只能循著壓迫者指引的方向前進，進而更使得壓迫者與受壓迫者兩造之間的宰制奴役關係更加牢不可破。

身為一名科大社工，在尋找自我和答案的過程，我不得不悲嘆個人的精神存在深陷於個人、集體、社會／歷史的多重斷裂，社群圖像是破碎分裂的；大多數的知識份子更是自私自利、單向度思考或噤聲的，而人我的差異價值、教育體制資源／機會的不平等更是全然被無視的。眼下，我／科大社工所要承擔、面臨的除了美式社會工作專業殖民和本土助人經驗的斷裂外，還有在決意起身追索自我存在的那一刻，隨即就會觸發自己熱愛、投入許久的社會工作專業其實並不承認我的現實反撲；處在一個知識份子與國家機器共謀又不反思，大多數社工人自我意識被壓制和異化的專業體制中，我／科大社工彷彿只有一種命運，那就是想盡辦法讓自己變得更像高教社工，然後持續不斷追逐著美式社會工作專業的想望。

社工人至今未曾警覺科大社工已逐漸成為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的他者，而科大社工人迄今也還未能認清殖民、異化自我的社會／歷史結構；我，存在崩解又無處可逃的科大社工，究竟該如何從此種「科大社工，不是社工」的多層斷裂又「存而不在」的精神狀態中找回自我？重做一名社工呢？

叁、逆寫社會工作專業帝國下多重自我：旨在呼喚逝去的人性

我是科大社工，亦是政大社工所研究生的雙重專業身分，迫使我必須落入同時是社群內部界定「社工」主體和客體的模糊地帶，更造成我必然要面對自我在

主觀情感和客觀情境中左右搖擺不定的斷裂經驗。可是，也就是身陷在這令人苦不堪言的斷裂絕境中，讓我得以遇見自我／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的生命實相。

一、「社工」主體的十字交叉斷裂：苦澀的悲劇回返？

作為一名生命故事的敘說／書寫者、作為一名從社會工作專業／教育體制邊陲走向核心的社工人、作為一名社會／歷史的考究者，我的家庭社經位置和專業社會化的求學經驗，賜予我「特異」於過往先人的觀察、發言位置。所以，我雖然很清楚我的故事／研究將有很多種可能的進行和回應方式，例如，我能夠對於高教社工的他者指控感到嗤之以鼻，或反諷一笑，或做出犀利的評論，甚至索性痛斥知識份子的無知或無道德等。然而，在先前各章節的文本中，除了上述的行動之外，我同時也毫不掩飾的呈現我承認、體現了因他者錯認而起的自我懷疑和自卑情結，並持續貼近自我內在最真實的上升慾望。結果發現，在自我慾望的深處，相較於高教社工，我／科大社工不論在他者或自我的存在意識中，通常都只是次等的，或根本不被認為是完整的社工。但透過一連串社會／歷史脈絡的探索，我更是深刻的體驗到我／科大社工如今要面對、覺察、省思的絕不僅僅只是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發展深受美式社會工作專業殖民的社會／歷史脈絡，接下來必然還要投身抵抗、顛覆隱藏於諸多專業論述、研究中不斷僅以少數菁英學院的「高教社工」為台灣「社工」主體的「他者的知識生產過程」（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bout the Other）。

誠如 Foucault(1980：93)所言：「**任何一種權力的運作或施行，都會根據一種真理的論述為導引，但我們不是因為真理而運用權力，而是因為權力的關係，才臣服於真理的生產。**」當代所有的社會生活必然涉及一系列知識／權力的運作，但隨著社會改變，知識／權力的運作卻也隨之越加細緻與隱晦（王增勇、潘承揚譯，2012）。因此，我／科大社工不是社工的矛盾處境，即是體現、揭露台灣社會工作不斷以美式社會工作為師，進而造成在追求專業化、專精化的過程中，持續陷入只看學分、只看學歷、只看學校出身、只看證照、甚至只看問題或行為表象的虛假意識，同時也致使有越來越多的個體（學子／工作者）逐漸被諸多看似理所當然的專業論述，暴力切割成片段、零碎的他者／劣者，最終成為我群眼中充滿問題的卑賤客體；而這也就是為什麼陳武宗（2004）當初義憤填膺率先跳出

來批評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系、社工學分班的專業師資不足，將危及社會工作教育的專業品質，但其所代表的高醫醫社系，如今卻也必須面臨被林萬億（2010）同樣以師資不足可能使得學生專業素質堪慮的理由列入「不合格」系所名單的主要原因：在這裡，內外的問題是多層次重疊交錯的，但當問題指涉的對象改變時，引發問題的邏輯卻沒有太大的改變：會主動賤斥、攻擊科大社工人的高教社工人，有天必然也會以相同的理由賤斥、攻擊同屬高教社工的同伴。只因，**科大社工被高教體系的高醫醫社系認為不是社工的賤斥、責難，先是體現了社群集體在「社工」主體歷史的斷裂，但林萬億（台大社工系／合格的社工院校）在研究裡對於高醫醫社系的不合格評比[110]，也就高教社工人內部的衝突，則充份反應了社群集體在「社工」歷史主體的斷裂情結**。

我承認我對於陳武宗／高醫醫社系／高教社工加諸於己身／科大社工的賤斥、責難依然抱持著十分憤恨難平的負面情緒，但我在這裡著實無意回諷或反擊陳武宗／高醫醫社系／高教社工，因為也惟有當有越來越多類似陳武宗／高醫醫社系／高教社工的社群夥伴被迫落入、不得不面臨與我／科大社工相同的險惡處境時，問題的真相才得以更加清晰透徹，社群集體的對話契機也才得以大幅展開。當科大社工與部份高教社工被賤斥、責難的經驗開始重複交疊，我們隨即可以看到，擺放在我們眼前的問題全貌，完全就如同Fanon當初面對黑人處境時的哀嘆：**黑人不是人，黑人想變成白人，但白人卻也想要變成另一種人**（陳瑞樺譯，2009），以及**帝國殖民的特徵就是持續不斷將整個世界一分為二**（楊碧川譯，2009）；承接 Fanon 的思想和提醒，我依樣畫葫蘆的想說：科大社工不是社工，科大社工想變成高教社工，但高教社工卻也期待成為另一種更完美卻又不存在的「社工」。許多高教社工有天也將發現自己不是「社工」，只因……台灣社會工作專業追求的是美式社會工作專業。

如今，試著釐清陳武宗／高醫醫社系／高教社工於專業立場的對立矛盾轉化，亦即充分揭示了不論是科大社工人也好，高教社工人也罷，我們／台灣的社工人似乎都還未能真正認清彼此所承載的社會／歷史現實，使得我們都被美式社會工作專業「殖民／異化」了而不自知……只是，我們真的還要讓相同的衝突、斷

[110] 在林萬億(2010)的研究中， 就社工／社福專業師資的合格比例觀之，高醫醫社系甚至比朝陽科大社工系還要來的低，而這其實也就是讓我得以顛覆專業論述最重要的關鍵線索。

裂的悲劇不斷衍生、持續回返嗎？而問題的濫觴，此刻究竟是人我之間難以消弭的「階級」歧見？亦或是始終不願意試著重新看見、努力諒解彼此的「自己／我們」呢？

二、我，不僅僅是「社工」的斷然覺悟：在多重斷裂的社會／歷史中心呼喚人性

長期間存而不在精神狀態是令人異常痛苦、難堪的，但斷然覺悟來自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社工」主體於社會／歷史間十字交叉的多重斷裂卻也讓我領悟，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的知識生產只重視專業或不專業的工具理性，以及在持續競逐專業地位、精進專業能力的過程中，社群集體已逐漸遺忘了「社工」其實僅僅只是個「人」。

是的，「社工」可不可以僅僅只是個「人」？即使我們都是「社工」，但我們每一個人所據的社會位置卻都不一樣。我們可以看到有人比較聰明，有人比較笨；有人家裡比較有錢，有人家裡比較窮；有的人出生在完整的家庭，有的人出生在破碎的家庭；有人運氣比較好，有人運氣比較差；有人比較會考試、有的人不會考試；有人念好學校、有人念不好的學校……我們每個人的性別、階級、經歷完全都不一樣，所以我們不僅僅是一個「社工」，我們承擔著許許多多各式差異極大的社會身份。就好像我訪談完某位科大社工，關掉錄音筆後，她收拾包包時不經意的嘆了一口氣：「我很羨慕台大畢業的同事下班後有一個可以回去的家，然後她的母親已經煮好飯在等她下班回家……還有她可以不用還學貸……為什麼我們的人生會差這麼多？」受訪者訪談結束時無由來的一段話，讓我想起了在家裡辛苦工作供我念書母親，更讓我當下有點難過，因為在社群不斷競逐專業地位的過程中，當大多數的人都越來越看重的是學歷、學校出身、有無證照、專業能力時，越來越少人會關心在一位社工的身後，可能是父母自小離異、從小到大都是四處漂泊的租貸房屋、下課就要趕著去打工、有大筆的學貸需要償還、家人身體健康狀況不好需要經濟支持和協助照顧[111]。

從朝陽到政大，以及在敘說、書寫此篇論文和探尋答案的過程中，不論是高

[111] 黃彥宜等（2008）的研究就曾以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為例，指出來自中、後段社工學院的學子正面臨被邊緣化的問題，進而使得我國的社會工作呈現雙軌化的發展趨勢。

教體系或技職體系，我時常遇見許多與我有類似境遇的社群夥伴。然而，她們在既有的專業體制裡除了憂慮家庭經濟之外，同時往往也要擔心自己只要表現不佳，接著很容易接著就被人們以「學校」認定成是一個自己不夠努力，不夠聰明，糟糕的社工。結果就變成是，看似文明、進步的社工「專業」，骨子的運作邏輯卻異常的「原始野蠻」：我們一點都不把社工當「人」看。

我不懂，我們為什麼不能好好善待這些生命本身已經充斥著諸多苦難的社工人呢？對此，我只有一個問題，也僅僅有一個問題：我們／台灣的社工人，要追求的究竟是什麼呢？我真心希望我的主觀經驗能更被更多的他者所理解，所以暫時無力改變現況的我似乎也只能喋喋不休的呼喊：台灣的社會工作專業已成一個不把社工當「人」看的規訓體制。而只會不斷相互比較誰好、誰差的二元對立意識形態，終究無法讓社群集體變得更好，更專業；此外，趨於客觀化與一元化的社會工作研究則是構築此種持續扭曲、異化人性的規訓體制之幫兇，迫使人們持續內化美式社會工作專業帝國遙遠凝視的殖民遺緒，從而造成有越來越多的社工人落入異化、斷裂的存在困境，必須懷疑自己不夠社工、不是社工，最終亦使得極其單純、簡單的助人工作必須變得很複雜，更讓我和許多社群夥伴無法僅僅是個「社工」。所以，也才讓痛苦不堪的我必須不斷反其道而行的拼命想辦法證明：我／科大社工，不僅僅是「社工」。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六章　召喚：論文的故事與說好的「解放」呢？

社會壓迫的形式千奇百怪，而且總是與時俱進、不斷變形的。面對這樣的情境，很難像過去一樣，好像有一個具體要去打敗的敵人，因為敵人總是不清楚的。這是一個多重戰線甚至是沒有戰場的戰爭。在這樣的狀況下，發現自我並促進自我的解放，或許就是一種最好的抵抗。我知道沒有社會的解放而僅有自我的解放，是沒有辦法朝向那個良善社會的藍圖的。只是，沒有自我的解放，那宣稱社會的解放，只能說是緣木求魚。所以邁向自我理解、自在的歷程，一種自我與社會緩慢前行的步伐，就是一種溫柔而有力量的抵抗(蔡培元，2008：111)。

我／科大社工，究竟該如何面對、卸除社會工作專業帝國的殖民壓迫，如何面對科大社工不是社工的自我殖民困局，如何重新從自我「存而不在」的絕望斷裂中再生呢？諸多立基於前一章的發想和提問，使得我這一章的敘說和書寫，即是我藉由回顧、反思自己同時作為一名勞動家庭的獨生子／科大社工／政大社工所研究生在書寫這篇論文的心路轉化歷程，描述我為何這麼堅持、如何對於自我總是「存而不在」的問題進行回應。因而，敘說、書寫我如何從寫不出論文到寫出論文的故事經過、掙扎及轉變，記錄自我意識前行、復甦的軌跡，「我」和「論文」的交織連動，就是我不得不細說清楚的研究田野。

第一節　為母則強的裁縫女工：母親的願望／我的論文

對我而言，想要完成這篇論文和突破困境的生命動力和壓力幾乎都是來自於母親。只因，在我的記憶深處，一直有著那麼一幕。四歲多的我站在固定的公車站牌前，超過平常的等待時間，仍不見母親歸來的身影；我焦急的來回穿梭屋裡與屋外，喊叫著父親，但父親恰巧也出門未歸，我只好一個人蹲在街口，眼巴巴的期望母親趕快回來。那年，阿根廷的冬天很冷，在氣溫逼近零下的街口，我嘴邊吐著白霧，瑟縮著身軀冷的直打哆嗦，不斷摩擦的雙手和維持小跳步……我等了好久，好久，好久。最後，在太陽快下山時，我終於看到母親。原來，母親那天回程時太累，瞇了一會，結果認錯了站牌，坐過了站，加上語言不通，又看不

懂西班牙文，只能靠著比手畫腳的問路，還好後來有幸遇到一位懂中文的華人告訴他該如何搭車歸來……母親大步奔向久候多時的我，並奮力的抱起我，然後忍不住放聲大哭。為此，在成長的過程中，我總是在想當時滴在我臉龐的熱淚，或許就是母親對於父親幫不上忙的嘆息，還有得不到家族奧援必須獨自在異鄉拼搏的疲累等積蓄多年的無奈吧？也許，就是因為我從小跟在母親身邊體認了這一切，還有拼命想要讓母親可以過好日子的自我期待，潛移默化的形塑了我撰寫論文的初衷……或者是說……一直存放在我心靈最底層的生命包袱。由於寫或不寫，對我而言都是個難題，但為了讓自己知道該如何梳理這份總是不受控制的情感，害怕自己拖累母親，無法成為好兒子的焦慮，所以我決定跟母親好好聊聊這些心裡話。

壹、母親的矛盾：經由苦難淬鍊的人生智慧[112]

我的母親出生在台灣正準備要邁向工業化、現代化前的 1950 年代。台南歸仁，是母親的老家。貧窮，則是母親描述童年時光最常出現的字眼。母親說，外祖父日據時代是鄉下的小學老師，但後來因為外祖父跟校長打架，使得工作沒了，連帶使得全家的經濟收入也跟著沒了。失意的外祖父也從這時候開始變得會喝酒、賭博，甚至還常常會動手打外祖母和小孩。母親說她人生最大的遺憾不能好好念書，而她的小學學業幾乎是有一搭沒一搭的完成的，也因為她跟阿姨們常常沒有辦法準時交學費，所以經常被學校老師趕回家向父母拿錢。可是，時常沒飯吃的家那來錢可以繳學費呢？所以她們往往會趁著被老師趕回家的機會，跑去田裡偷挖番薯或偷拔菜。母親常說當時日子能過一天就算一天，能填飽肚子又無痛無病的生活就是一種恩賜。等到小學畢業後，母親先是到了大姨婆的雜貨店幫忙；年紀再大一點，則是在朋友的介紹下進入了當時的加工出口區當了快十年的裁縫女工，然後一邊工作一邊去國中補校念書，後來再看報紙應徵上高雄大統百貨公司知名專櫃的櫃姐，直到相親嫁給父親，然後提著一只皮箱跟著父親飛出台灣，縱遊南美，闖遍天下。

[112] 這一段是我論文口試結束後，在 2012 年過年團聚期間訪談母親、阿姨及母舅整理而成的。本來只是想說簡單收集一些家族歷史，結果她們每一個人都是一開口就完全停不下來，還對我喊著說以後要出本書。礙於篇幅我最後只有簡單節錄母親跟我的幾段重要對話。然而，訪談她們最大除了論文之外最大的收穫，大概就是透過家裡的長輩讓我領悟「痛苦的過去」原來是可以一直被超越、改寫的。

只是，母親的故事在平淡之中卻常帶有些許的哀愁，因為故事的內容雖然精彩，卻總是圍繞著家庭和家人與很少有其他的支線，也很少出現自己。在資源困窘又沒有太多選擇的狀態下不斷想辦法找到出路，幾乎可說是母親敘說生命故事的核心。但當我回過頭追問母親她當初怨嘆外祖父跟外祖母嗎？還有為什麼一直可以忍受糟糕的父親而不跟父親離婚呢？母親笑了一下後對我說，外祖父雖然酗酒、嗜賭又家暴，但外祖父其實是很顧家的，所以母親一家人的感情到現在都還是很好，母親說這是她這輩子最驕傲的事情，使得她堅持同樣要給我一個相同的家，縱使她知道很困難，但她很努力的在營造。

聽到母親這麼說，我忽然感到很訝異。母親看到我表情的轉變，接著不慌不忙的對我說，外祖母連生了五個女孩子，第六個才生了母舅，所以在那之前只要每次外祖母一生產完，當週遭的親戚朋友總會對外祖父說女兒只是吃米的賠錢貨，然後到處宣傳要找人來抱走女兒時，外祖父一定會很生氣的拿起掃把趕走那些想要抱走阿姨們的人，然後對來人大喊大罵：「誰都別想帶走我的女兒！」。母親說她是從這件事情外祖母對她分享地，這讓她隨著年紀的增長，慢慢體會到外祖父其實是很顧家又愛孩子地[113]。也就在這個時候，當母親說著、說著外祖父的故事時，說到最後自己突然蹦出一句：「唉呦，你爸如果不要喝到爛醉[114]……想想你爸爸只是比較沒責任一點，他偶爾也還算是顧家，而且至少他不敢打老婆。」聽到母親這麼說，我忽然忍不住挖苦她：「妳好矛盾喔。」母親則滿臉無奈的對我說：「就遇到了不然你要我怎麼辦，日子總是要過啊……反正你快點把你的論文寫完，我就可以輕鬆一點了……還有，你有天一定能像我一樣原諒你爸，原諒這個家。這是屬於你的修行。」

母親那天很認真的對我說，我從朝陽到政大的經歷和故事是重要的，因為像朝陽一樣平凡受苦的人多，像政大一樣聰明富足的人少；因為我的出身普通，所以會有很多人跟我一樣，將來一定會有很多人可以從我的故事找到自己，所以我要努力寫出來；因為我還年輕，所以就算我犯錯、跌倒、受挫都沒關係，我還有

[113] 阿姨和母舅們也都有提到和這個故事一模一樣的心路轉化。這不由得讓我很開心的覺得：我們真的是一家人耶。

[114] 母親後來還有對我說，她曾對父親說她在乎不是爸爸喝酒到爛醉，很多時候是擔心他發生什麼意外(但更多時候是擔心他撞到別人)，還有過度飲酒會傷身，這樣會以後拖累我要照顧他，她希望爸爸不要再增加我的負擔。母親說她覺得父親有聽進去……只是完全改過還要點時間，但往好處想，母親說她的「善念」已經種下去了。

時間可以再爬起來；因為身份既特殊又矛盾，所以我能比起別人多看到更多問題的面向，更能體會不同人們的痛苦。至於論文反正已經寫了這麼久所造成的麻煩，母親說她可以再多等我一下下，她要我靜下心來，不慌不忙的誠實面對、感受一路以來的苦痛，那麼原先看似走投無路的生命一定就會出現新的選擇。

母親說，透過苦難淬練而成的果實，就叫做「長大」。

貳、母親和我的論文：母親是我生命的指導教授

關於這篇好幾度陷於不知道為何而寫，又為誰而寫的論文，若沒有母親無條件又源源不絕的支持和鼓勵，我大概早早就休學放棄了。這些支持往往不只是經濟的，更多時候是精神的。打從我來到政大社工所面臨一連串挫折起，母親的加油打氣從來沒有斷過。雖然母親一開始真的以為是我愛抱怨、想偷懶的老毛病又犯了，也曾經懷疑是我英文太差，造成我功課進度跟不上別人所致。但當類似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甚至還在電話裡說著說著就莫名崩潰大哭時，母親嚇傻了，更讓她因為過於操心而使得她有天忽然半夜掛急診住院。

父親曾為了這件事，偷偷打電話跟我說如果這麼痛苦就不要繼續念了，他不想在看到我們母子倆這麼相互折磨，他希望我放過自己，也放過母親；相對於父親，母舅則是打電話來痛罵我一頓，但當母舅髒字連篇批啦啪啦的罵了一長串後，他最後還是忍不住對我說：「**台北的老師很多都很勢利，你自己要堅強一點，我知道你很辛苦，但是你都快三十了，你要長大，你要學會堅強……不要再讓你媽擔心了，我怕她身體受不了。**」[115]我知道父親和母舅其實都是心疼我的，但父親和母舅的喊話，卻也不由得讓我更加氣憤自己的無能，因為這一切都是自己不夠「堅強」、不夠「努力」、不夠「優秀」、不夠「強悍」、不夠「兇狠」，才造成自己被別人蹧蹋時無力反擊，把自己搞成這副狼狽不堪的德性，更讓身後的母親和家人為此必須不斷為我擔心和操煩。可是，當母親知道這件事情後，卻又完全反其道而行的想盡辦法想要導正我這種想法。

[115] 母舅會這麼說，有很大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母系家族的表妹來台北念書時，也遇過跟我類似的問題。而這也使得我們家對「台北人」有著很深的成見。

自從母親病倒出院後，母親對我說她發願每逢初一十五會接連到玉皇大帝、關聖帝君及文昌君的廟寺祭拜，更辛勤的祈求我有天能夠時來運轉，走回正途。母親說：「她的兒子絕對不會活在仇恨裡，現在的我一點都不像是她那會喊著要改變世界、樂觀積極的兒子」。更讓我印象最深刻又匪夷所思的是，在她某一次問完我政大師長們的年齡後，母親往後在我不斷在政大遇到各式難關時，她總是會不斷對我說：「她們跟我一樣更年期到了，脾氣會比較差，你要體諒年紀到了某一個階段的女人」、「老師們研究很忙，很多會要開，會亂發脾氣是正常的……你想想看我們家以前很忙我會也會你亂發脾氣，但我沒有不疼你啊……我相信老師也是一樣的。」

坦白說，我一直很抗拒理解母親為何千方百計的要這麼替這些對我而言幾乎形同壓迫者的師長說情，為什麼總是要阻止、壓抑我反擊、報復的口語，我為此還常對她說她這種胡亂忍讓的行為，根本只會助長壓迫者越來越「軟土深掘」汗「吃人不吐骨頭」。而此種漢賊不兩立的思維接著一直要到我後來確定找上老王擔任指導教授，母親偶然問起老王個性如何時，我不經意說出了「同志」兩個字後，我才真正融會貫通了母親想要傳授給我的人生智慧。當母親知道老王是同志後，她剛開始先是有點訝異並直覺的回了一句：「男生喜歡男生的喔？這個好嗎？」母親的問題忽然讓我有點尷尬，但我好像也只能回答：「恩……但不找他我還能找誰啦，而且指導論文的能力跟老師是同志沒關係啦」。於是，那通電話就在這種有點詭異的氣氛下結束了。然而，隔天早上，母親卻有點興奮的打電話對我說：「我昨天晚上睡覺時認真的想了很久，我覺得你選一位『同志』當指導教授其實很不錯，因為他可以像媽媽，也可以像爸爸，不然你們政大的老師好像都太陽剛、太絕對了，你選這個老師是對的，他一定能懂你的問題，一定能帶你渡過難關。」

母親態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先是惹來我一陣大笑，同時卻也帶給我有別於以往的省思。我終於明白母親想要教給我的原來並不是「**無能為力的忍讓**」，而是「**積極進取的退讓**」。母親的「柔」在無形中超克、渡化了我的「恨」，讓我看到問題和敵人的形象在改變，看到如何先退一步爭取空間然後重新找到前進契機的積極轉化，看到那個一直只能用憤怒和怨懟維持的自我有機會可以變得不一樣。於是，我終於明白我接下來該如何擺放、挪動自己的視野和位置來處理眼前的問題和面對自己的敵人，同時也原諒那個軟弱、無能的自己……我，終於知

道怎麼跟自己和解了。

第二節　傳授所學的恩師們：專業的啟蒙、恩情及走向獨立

除了母親，我生命裡最重要的幾位恩人，是我多位大學老師。沒有他們的教導，我不可能從一個不學無術的浪子，轉而成為一名社工。只是，我在這一段裡想分享的不是什麼專業師資、不是老師會不會做研究、不是什麼核心課程，更不是什麼教學評鑑或專業社會化，而是很單純的師生互動和信任關係。就像是教我社工概／個管／社工管的師長在我過於任意妄為時曾語重心長的對我說：「因為你是學生，所以我能接受你犯錯……我的工作，就是讓你從錯誤中知道自己以後能夠更好。」[116]諸多類似的記憶片段，讓我在朝陽社工系和政大社工所的學習過程中，一次又一次的從許多願意投注心力在學生身上的師長身上確認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是被「相信」可以成為一名社工，而不是被「教育」成一名社工的！** 是的，我以後一定會成為一名能夠把人們笑容找回來的好社工，師長們是這麼告訴我的。

壹、我的思考很「社會學？」：我可以不要很「社會工作」嗎？

成為社工這幾年以來，認識我的人大多很少對我說：「你好社工。」我反而是比較常聽見人們對我說：「你的思考好社會學喔」或「你應該去念社會學的。」身邊的同學幾乎都是說我看待問題的觀點通常很「階級」和很「經濟」，久而久之，我好像也慢慢習慣自己沒有很「社工」這件事。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一位對我說：「你的思考超級社工」這句話，是一位政大的學妹。我記得我當下一度非常驚恐的愣了好一下，然後上下仔細打量了眼前這位從高醫醫社系來到政大社工所的學妹到底是那根筋不對，怎麼會對我有如此異於常人的評價。在那一瞬間，我下意識忍不住懷疑是不是因為高醫醫社系比起朝陽社工系沒有那麼「社工」的關係（學校出身對我的分類毒害實在太深）？結果，學妹的回答竟然跟「學校出身」一點關係都沒有。她對我說我的思考雖然時常很「跳躍」，但我常常不會

[116] 某次我和師長有些言語上的衝突，我脾氣一來索性就拍桌子從教室走出去。而這段話是老師先寫了一封長信狠狠嚇了我一頓後，下次上課前把我叫出去時說的。社工概老師到現在偶爾都還會在她任教的班級提起這件事情。

只針對微視的問題，而是會同時關注形成微視問題後的整個社會脈絡，所以她認為：「我是社工，但我是個非常不一樣的社工。」聽完她的回饋，我不禁開始回想，如果這跟學校沒有太大的關係，那我是怎麼長成現在的樣子呢？又我以為的「社工」該是什麼樣子呢？我想著，想著，想到了兩位對我很重要的老師－我最崇拜的社會學老師、我最愛的社工概老師。

一、社會學的大刀：社會工作不是只有個案、團體、社區？

剛進朝陽社工系時，我們幾個非本科系的轉學生首要的任務除了要先搞清楚各個專業科目的關係，安排那門課先修那門課後修之外，最重要的事情大概就是打聽那些課程比較生硬或乏味，藉此避免自己誤觸地雷。其中，只要是朝陽社工系的學生大概都一定會提起社會學老師是最嚴格，也是每次都當掉最多人的傳說軼聞，因而社會學老師的代號就叫「大刀」。大刀之所以是大刀，之所以可怕，就在於日、夜間部的社會學都是他教的，所以，你想躲也躲不掉，被當掉也還是要遇到他，就是非得要面對他不可[117]。因此，我們私下常會開玩笑說，努力不成為社會學老師的刀下亡魂，通常就是朝陽社工人必經的試煉。

社會學老師大概是我重回學生生活以來，迄今少數仍全程堅持「板書」的教授（現在幾乎都 PPT 化了）。所以，同學和學長姐都會交待和提醒學弟妹們上課一定要照著老師的板書抄筆記，因為老師每上完一個章節就會有個非常困難的小考（考試題型大概是每次都猜不對的複選題、總是不會寫的簡答題、申論題及專有名詞的中英翻譯）[118]，而抄筆記是一種幫助、訓練自己記憶和整理資料的學習過程。現在回想起來，雖然我一直沒有學會怎麼完整敘寫申論題，但我的思考問題的層次感大概就是一路跟著社會學老師的板書和小考一點一點養成的吧。再加上我在後來大二升大三的暑假，我毛遂自薦擔任社會學老師的教學助理，而老師

[117] 在大一的班級遇到重修的同班同學時，同學都還會眉飛色舞的補充分享以前教他們社工概的老師是「小刀」，他們當初是如何在雙刀合併的狀況下求生存的故事(我知道這麼形容有點誇張，但我後來發現這似乎是我們那一屆的集體記憶)。我當時就曾在心裡偷偷慶幸還好我遇到的社工概老師是新來的，而他們口中的恐怖「小刀」則要到我三年級上方案規劃與設計後才遇到。

[118] 我當初有問過社會學老師我該怎麼讓自己文筆好一點，老師說可以多看報紙社論，多看看人們是怎麼用字書寫、批判論述。這使得原本很少看報紙的我，從此開始養成會翻閱報紙社論的習慣。

在暑假期間帶我重念一次社會學的課程後，要我開始試著從學生的身分轉化成教學者的位置來思考。坦白說，當下我並壓根不懂老師的用意，只是覺得不是念懂和能應付考試就好了嗎？為什麼要他總是不多教我一些新的東西，反而要把簡單的東西搞得這麼麻煩？而這大概要到我大四和上研究所後，我才逐漸發現原來我的邏輯思辨能力是那時候打下的基礎，也才注意到原來我和旁人看待問題的思考邏輯模特別歧異。我也大概是從那時候起，經常被身邊的人說我的思考方式很社會學。

認真說起來，社會學老師是教會我「如何念書／思辨」的啟蒙者，但身為一名社工，被人們認為很社會學的感覺其實很微妙，不過想起社會學老師曾提醒我說：「**社會工作不是只有個案、團體、社區，別總是以為幫助人的方法只有這幾種**」，卻又讓我覺得問題好像又沒有那麼嚴重。雖然，社會學老師從來沒有直接對我說他認為社會工作是什麼，但社會學的啟蒙與訓練確實讓我看待問題的位置一直是比較偏向結構面的。特別是我在大四時又遇到由歐陸歸國的社會政策老師，更進一步帶我認識了馬克思和新馬克思主義（我大四時超迷 Habermas），配合自己回看台灣經濟發展、社會政策與邊陲勞動力(中下階級的裁縫女工／母親)的學習經驗，即使那時候我的理論基礎仍十分不足，但卻已全然拓展、翻轉了我此後看待個案問題的視野，更使的我立下志向與傳統以個案問題為基礎的社會工作分道揚鑣（而這也讓我就讀研究所後，很快就跑去外所、外校修習相關的課程，如社會安全網、社會保險、東亞社會福利政策……我其實一直很清楚我自己想要學什麼）。

我一直很喜歡這樣的自己，特別是當我在社會學裡習得的知識比起社會工作往往更能回應勞動家庭必須面對的諸多問題（另外大概就是我喜歡問題是來自於社會，而不是來自於家庭或家庭成員的切入視角），這和我的生命有非常直接的關係，我想要思考「解決」問題方法，而不是只學會「處理」問題的技術（雖然我知道這都很難），所以我很早就決定我想要成為比較偏社會學一些的社工，因為我想要當一個能夠從大結構全觀看待與自己貼身相關問題的社工，而不是變成一個帶著病理化視框，只懂的處理個案、幫案主做個管，可是卻看不懂社會壓迫結構的社工。

二、可以不一樣的社會工作：「我」的社會工作是什麼？

說完了社會學老師對於我的影響，接下來當然就是我最愛的社工概老師了。我的社工概老師是東海社會學系畢業，然後在實務界工作好幾年後，才又回到東海攻讀社會工作碩士和社會工作博士，老師豐富的實務經驗，常讓課堂的講授變得很生動立體又笑中帶淚，更讓人有種身歷其境的感覺。另外，我跟社工概老師也很有緣分，我們除了一樣是高雄人外，老師以前也是五專機械科插大轉考社工的轉學生，而且還是我當兵學長的碩士班學妹。我記得當初學長一聽到我社工概老師的名字後非常興奮的交待我一定要跟著社工概老師好好學，學長說她一定能把我教成一個好社工。雖然社工概老師在我升上大三時離開了朝陽，但她還是都有回朝陽兼課。我一直是社工概老師的忠實粉絲，就如我的個案管理和社會工作管理就都是她親自教授的，而這也使得我對於社會工作的認識和學習，基本上很多都是來自於實務經驗非常豐富的社工概老師[119]。

關於我的思考邏輯一直不太「社會工作」這件事，當初最先給我正向肯定和鼓勵的人，其實就是我的社工概老師。她給我的回饋跟別人很不一樣，她說：「為什麼大家都要一樣？別人說你很社會學又如何？我把基本的都教給你了，接下來是當然是靠你自己要找出屬於你喜歡的『社會工作』啊……這個社會本來就是需要各種不同的人才能順利運作。」社工概老師當初簡單的一段話，給了當初的我無比的「勇氣」，更使得我雖然很喜歡「社會工作」，但我始終能夠很放心的沒有完全走向人們所說的那個「社會工作」。我有時候會跟著大家一起走，但我也有很多時候會依然故我的離隊漫遊，默默摸索、尋找著適合自己的「社會工作」。我很喜歡這個跟別人不太一樣的自己。雖然我迄今還是不清楚自己想要的「社會工作」是什麼，也曾經因為這件事被不少人批評我沒什麼專業認同或處於一種「迷路」的狀態，或被旁人視為不合群的「怪咖」。不過，我並沒有太在意，因為我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麼，我只是還沒找到，我只是比較愛到處亂跑，想要四處瞧瞧，就只是這樣而已。

但詭異的是，當我開始遵循著大多數人的升學想像，努力獲取優異的成績，

[119] 另外，我對於各個實務機構組織運作概況的認識，則是透過教我方案的小刀老師。小刀老師常會在課堂上向我們分享他去各個機構評鑑的觀察與心得。

一路向北的進入了國立頂尖大學的研究所，我單純的以為我會找到我夢寐以求的「社會工作」，但來到政大社工所的第一天，在我還沒有遇見我期待的「社會工作」前，我過去所經歷的一切竟然就毫無理由、無預警地完全被否決，而原先標示在心裡那條通往「專業」的前途道標更自此徹底崩潰。為此，我總是想不通我過去遇到的每一位師長明明都那麼用心，為什麼我還會被否定？我的專業科目都是東海社工博士畢業的師長親自教授，難道是真的是我學不好，真的是我的問題？難道我真的這麼差嗎？而且，在這種情況下，我還冷不防的被政大師長說我很固執又很愛爭辯，更是讓我越來越慌亂。可是，就在我迫切的想要找答案，思緒經常混亂不堪，情緒異常激動失控，完全不知道該自己該怎麼辦時，我永遠記得社工概老師輾轉得知我在政大的狀況後，淡淡的在電話裡對我說：「**真的不開心，就不要念了……不管你是哪間學校畢業，你永遠是我最驕傲的愛徒。**」[120]很奇妙的是，我的慌、我的亂就這麼被老師的話帶走了（雖然，我後來還是決定回頭面對這個莫名其妙衝突……然後又多吃了許多苦頭）。

大學師長們的信任和善待，一直是我能夠肆無忌憚前行的最大動力[121]。就好像我一直記得我幸運推甄備取上政大社工所之後，先前不斷對我打預防針，鐵口直斷認為我不可能推甄上國立研究所的某位老師[122]，有天忽然把我叫到研究室，語重心長的交待了政大社工所幾位師長的性格，要我自己往後在應對進退上絕對要多加小心注意；教我社福導的老師，陸續給了幾本政大師長們的著作給我，然後開始對我碎念要把書讀好，千叮嚀萬囑咐台北是個信奉實力主義的地方，千萬不要因為沒認真念書而被台北的老師看不起和被同學欺負；快退休的心理學老師在某天夜晚，把我叫到他的研究室，對我分享了他的人生觀，然後勉勵我去了政大後要「無欲則剛」，千萬不要因為見識了台北的花花世界或過度沉溺於追逐秀

---

120 比起其他人，社工概老師大概是極少數對我說，如果真的念的不開心，覺得沒有意義，就不要繼續念下去的人。

121 師長們對我的照顧即使是在我跟第一任指導教授翻臉，闖下研究生最忌諱的大錯時，教我團體工作的師長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只是：「**志南，辛苦你了。**」帶我志願服務的老師聽完我在政大的遭遇後，給了我一個大擁抱；而教我統計，後來轉去北大的老師，當初知道我因故休學後，二話不說打了一通電話邀我去當他的研究助理（可惜我已經找好工作了）；或者，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教我社會政策的師長，知道我在進行科大社工的研究時，在德國的社工學者來台時，即刻主動聯絡我，表示要當我的口譯，讓我可以訪問她德國的社工經驗(因為德國的社工主要是設立在技職體系的科技大學，跟台灣剛好完全相反)。這些恩情都是被我牢牢記在心底不曾忘記的恩情。

122 他當時對我說：「**國立大學的老師都很討厭科大社工，他們想要消滅我們。**」這句話一時深深的刻在我腦海裡，同時也讓我明白，許多身上技職院校的老師們身上其實也有跟我類似的精神創傷。

異的外在表象而迷失了真實的自我（經歷這麼多事情後，我比較明白花甲之年的心理學老師當初為什麼會這麼提醒我）；而當時已經轉去他校的社工概老師，則是特別託人捎來小卡片和黑企鵝的隨身碟，而卡片上頭寫著：「**愛徒，我等你把論文存在裡面拿給我**」。

或許，就是因為師長們都對我太好了，所以相對於師長們的信任，讓我在這段一路向北的求學過程，同時也不知不覺背起了太多、太多的「期待」。從朝陽到政大，我有很多時候分不清楚，我堅持追求的事物到底是我的期待，還是師長們的期待。我很努力的想要表現自己，表現朝陽科大的學生沒有問題，所以在面對來自政大師長對於科大社工的質疑時，我總是很怕我只要失誤敗退下來，就代表我讓朝陽丟臉了，我常很擔心我表現不好，會連帶斷送了學弟妹們以後來到政大社工所的機會，或是被人拿來做為攻擊學弟妹和母校師長的藉口。所以，每當學校出身不佳的挑釁言語不斷由政大師長的口中撲天蓋地而來時，我看見東海、東吳等私立名校的同學心裡雖然不是滋味，但她們很快就能夠以我好歹也是「老牌社工學院的學生」來重新建構自己；社福系、醫社系、學分班的學弟妹則是可以透過「我本來就沒有那麼社工」來重新認識自己；而非本科系的同學、學弟妹呢？她們社工生涯的起點，不就是政大社工嗎？他們根本沒有什麼好懷疑跟猶豫的認同衝突；但我呢？我要承認我自己很差嗎？但我一點都不想要跟別人一樣選擇認命、退縮或逃避，因為在某種意義層次上這不就是背離了過往苦心栽培自己的母校嗎？比起因學校出身不斷被師長言語賤斥，或者是自己不斷在比較誰是那一種社工，我在乎的反而是在語言論述背後的社會／歷史結構，而我當下的情緒、行為及反應，其實就是真實自我下意識的在抗拒將科大社工人他者化／劣者化／問題化的社會／歷史結構。只因，我面對的是一個還沒有被人們命名，甚至是被人們認為理所當然的社會壓迫。

我記得我曾對接受我訪談的朝陽師長說：「**如果我真的覺得朝陽很差，我根本不會有任何認同的問題，因為我一到政大，我就徹底變成政大人了，不論是口語或心態，我可以跟著政大一起回過頭來賤斥、責難朝陽……但我做不到，因為我的自我認同是科大社工人。**」我當然知道我只要承諾我自己差，接著安靜順著政大師長們語意的指涉處，低頭承認朝陽科大社工系是不好的、有問題的，我身上所有的焦慮和混亂瞬間就都解決了。可是，每當我想起朝陽師長們過去對我

的「期待」，我就覺得我不想認輸，更無法認輸，使得我無法順利由邊陲的朝陽科大社工人進化為秀異的政大社工人，最後讓我不得不逐漸陷入進退兩難的絕境。為此，敘說、書寫我／科大社工的故事，或許就是為了能夠徹底釐清、顛覆這個折磨我許久的兩難困局，解開禁錮我身上這道對應著整個社會工作專業、社會工作教育體制的難纏枷鎖。縱使我無法否認，在客觀的社會現實裡，政大比起朝陽有著更專業的師資、有著更舒適的求學環境、有著更豐富大量的學術資源[123]、有著更高一層次的象徵地位、能幫我更精進我的專業知能、能負擔比較少的學費……但不論政大有多好，政大卻永遠無法完全取代位在有點偏僻的霧峰鄉間，不具什麼象徵價值，而且若認真挑剔大概也真的會被挑出一大堆缺點和問題的朝陽社工系。因為，在我主觀的生活世界裡，朝陽社工系才真正是耐心將一個什麼都不會的「我」孕育成為一名「社工」的起點。

宛若某種濃郁的遊子鄉愁，我曾經很認真的回覆某位很關心我的大學師長說：「**我是高雄出身、高雄長大的高雄人，所以我不會因為到了台中、台北求學念書，就變成台中人或台北人。同理，我非常確定我僅僅只是到政大社工所念書的科大社工。**」雖然，我確實無法否認我曾經認定能夠就讀政大社工所代表著一度程度的階級翻身，亦是件光宗耀祖的樂事，但在跌跌撞撞的生命旅途中，我反而更加深刻體驗到國立大專學院所象徵的階序地位終究只是外在的虛幻假象：我深刻感受到在遇到困難時，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才是最真實的、最重要的。畢竟，不管是常犯錯／書念不好的學生，還是不夠專業的社工，或者是不願合作的案主，每個人都需要被信任、被善待、被包容。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活生生又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冷冰冰的機器工具，不會有人喜歡自己在一開始就被當作是「問題」／「麻煩」，而且還是十惡不赦般、無藥可醫的大問題、大麻煩。換言之，返身回首看懂「我」從朝陽到政大不斷遭遇、萌生的自我內在衝突，其實也就是對應著一個「人／社工」如何被他者化／劣者化／問題化的過程。也就因為這份極其特殊的斷裂經驗，所以我相信我未來一定能比別人更懂得該如何成為一名不把「人」他者化／劣者化／問題化、破解壓迫結構及重視人我之間真實「關係」的社工。我想，這才是循著大學恩師們的諄諄教誨，而我追尋多年，千呼萬喚始出

[123] 政大不只是館藏多，就連社會科學類的電子期刊資源也非常豐富。這除了台大之外，其他學校大概很難比擬吧。或許就是這個原因，我大學的同學、學弟妹，都還滿常向我借帳號來抓文獻的。對此，我也只能說各校之間的資源差異真的很大。

來的「社會工作」。

貳、像媽媽一樣的研究法老師：我希望我是優秀的好學生

如果說，社會學老師是讓我學會念書／多層次思考的啟蒙恩師，社工概老師是形塑我對於社會工作思潮的引水人，那研究法老師一定就是把我當成自己兒子照顧的乾媽。我和乾媽的相識過程是有趣的。我轉學進入朝陽社工系的那一年，乾媽剛離開朝陽轉到實踐社工系去，但等我升上大三時，乾媽不知為何又回到朝陽，並擔任我們大三研究法的授課老師。或許是某種緣份的指引或老天爺刻意的安排，乾媽在班上的第一堂課，我因為上課愛講話，被乾媽指派下課後要和上課睡覺的死黨[124]去幫忙搬東西。也就在走往乾媽研究室，乾媽回過頭來隨口問了我一句：「你以後想念研究所嗎？」我點頭回答說：「想」。乾媽接著又問：「你想考那一間呢？」但乾媽才剛問完，我就非常肯定、想都沒想的大聲回她：「台大！」乾媽聽見我回答後瞬間愣在原地，不知其然的皺起眉頭看著我。瞧見她狐疑的模樣，我當下不知哪來的勇氣，隨即又毫不猶豫的舉起手指著她並對她說：「等著看，我一定會考上台大！」看著我自信滿滿的模樣，乾媽終於忍不住在走廊上開始哈哈大笑。也因為這件事，乾媽往後總是說：「她教了幾十年的書，從來沒有遇過如此自負和極度狂妄的學生。」是的，我還真的是讓她最頭疼，但也最花最多時間和心思拉拔長大的學生。沒有乾媽，就不會有今天在政大工所的我。乾媽，是我社工之路的鮑叔牙，是我生命的第二個母親，因為……她總是能容忍我在錯誤中學習。

一、容錯率很高的乾媽：我，是胡作非為的壞學生？

認真說起來，我算是個很「自我中心」又非常「驕傲自大」及「囂張臭屁」的問題學生，這使得我的功課雖然不錯，但身旁許多同學、師長都對於我的風評其實都不太好，而我的人際關係也一直很緊張。例如，乾媽當時最常提醒我的，大概就是：「你從來都不管別人怎麼想，也不聽別人講完話，幾乎就只是自顧自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類似的碎念大概不下千百回，我就算是被乾媽叫去當

[124] 這段因緣更讓大學死黨自此一路擔任老師的助理到研究所。

研究法的 SPSS 教學助理，我過於狂傲的性格依然沒有收斂。可是，也就在我畢業不久後，某個實習結束的學妹有次遇到我時忽然對我說：「學長，謝謝你當時對我很兇，所以我該學的都有學起來……我實習的地方只有我會跑 SPSS，我覺得我好棒。」不過，我有次跟乾媽分享這件事情時，乾媽笑了一下回應我：「我早就知道你可以……所以啊，你脾氣再改一點，嘴巴不要那麼壞，他們會學得更好。」當我聽到乾媽這麼說的時候，我真的打從心底覺得乾媽很厲害，因為她一直都是先看見我的優點，容許我犯錯[125]，然後再找機會繞回來趁機點我一下。

大膽嘗試，就會有機會成功，就算失敗了，也記得還要再試一次，是乾媽教給我的人生信條，因為不嘗試就永遠沒機會，嘗試會不斷帶來追求自我進步的動力。就好像大三下時我跟著同學們一起投大專生國科會計畫，結果四個同學投遞參加，但就我一個人沒上，更嘔的是公佈那天還是我生日。或許是為了撫平我落選的哀怨，所以乾媽在我暑假實習回來，重新帶著我重寫了一次研究計畫，然後剛好學校給了一小筆研究補助，讓乾媽能夠繼續親自帶著我設計問卷、發問卷、做信效度分析、跑統計分析、撰寫研究發現和研究結論，然後跟我一起發表[126]。坦白說，研究發現是什麼我幾乎都忘記了，可是我卻永遠記得乾媽在那段時間陪著我一起討論、一起熬夜、把我不懂、不清楚的地方教會。就這樣，乾媽放下身段蹲了下來，讓我踏上了她的背，然後讓我有機會可以碰到每個人聽到時都會笑我，每個人都不相信我有能力踏足的「政大社工所」。乾媽對我的好，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但更讓我難以忘懷的是，在我要離開朝陽的那一天，乾媽把我叫到老福系的主任辦公室（乾媽當時是系主任），因為擔心我初到台北沒零用，強塞了一包三千元的大紅包給我。但當我要歸還研究室的鑰匙，正式結束助理的工作關係時，乾媽卻推開了我的手，對我說了一句：「收著吧……不管你去那裡，被誰欺負或受了什麼委屈，你隨時都可以回來，朝陽社工是你的娘家……你永遠是朝陽社工的孩子。」

是的，朝陽是我的娘家，因為我有一位母親在朝陽。

所以，我不允許政大社工所的師長冠冕堂皇的攻擊我的家，特別是當初我來

[125] 雖然這有點連累了被我教過的學弟妹。
[126] 見陳麗欣、郭志南（2008）。

政大的第一天，師長在訓完我後，接著批評的就是乾媽新任職的系所。對我而言，我自己挨罵就算了，但今天如果連自己的母親都被拖下水，縱使那背後多麼崇高的理由，有些東西是不能忍耐跟退讓的。只是，我跟乾媽說這件事時，乾媽先是苦笑了一下，然後說她的臉皮厚不怕挨罵，反而是提醒我自己言行要在更注意一點，不能繼續像在朝陽一樣我行我素，不然遲早會出事[127]。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當類似的事件三不五時的發生，我混亂沉溺的狀況遠比乾媽想的還要嚴重：我沒有乾媽想像的那麼堅強，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放下三不五時總是直衝腦門的憤怒……我後來還是倒下來了。在我來到政大後，乾媽不只一次用很驚恐的口氣跟表情對我說：「你怎麼會把自己搞成這個樣子？這不像你阿！」或者是在我跟第一任指導教授鬧翻之後失魂落魄，不知道該自己怎麼辦的模樣時，乾媽嘆了一口氣後說：「我去幫你跟你的指導教授說情吧……反正我快要退休了，不怕得罪人……我至少要把你喚回來。」聽到乾媽這麼說，我內心在滴血。來到政大後的我，不但連累自己高雄的母親，現在連朝陽的母親都必須要為我擔心，我對此深深感到非常羞愧，更覺得自己真的很沒用。我害慘了高雄的母親，更把朝陽母親的臉給丟光了，我這個最被花心思栽培的兒子／徒弟到底在搞什麼。

或許，就是揮之不去的愧疚，讓兩個母親望著我的失落神情從此變成了我夜裡最可怕的駭人惡夢。可怕的惡夢，同時也帶來了長期性的惡性失眠。焦躁、混亂的情緒，卡在想休學卻又害怕母親／乾媽失望的兩難，更痛得讓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在放不下問題，且又找不到出路的情況下，敵視政大社工所、怨恨政大社工所變成了我唯一可以安頓自己的方法。然而，乾媽跟母親一樣，從來沒有對政大口出惡言，總是對我曉以大義，更在我不經意開口問她說：「我真的是個很糟的壞孩子／壞學生嗎？」時，乾媽卻對我說：「你絕對不是，沒有人覺得你是壞孩子……年輕的時候跌倒是好事，因為你一定會再爬起來，然後變得更好……你沒辦法改變別人，但你可以改變你自己，**你要告訴你自己，你以後不會跟那些傷害你的人一樣**。」

乾媽一直都是讓我能夠在挫折中能夠繼續學習、正向長大的推手，即使我有

[127] 在我精神狀況不錯的時候，乾媽有時候就會挖苦我說，你現在知道我多寬容你，朝陽對你多好了吧。只是，陸續看到某些學弟妹有出現跟我類似的問題時，乾媽自己也曾挖苦自己說，我們朝陽的老師是不是都對你們太好，怎麼每個去國立研究所的都有點適應不良？

點走偏了，她都還是會以不傷害我的方式把我拉回來。而乾媽的包容和不放棄，常表現在我偶爾回到朝陽時，站在乾媽上課的教室外頭，乾媽看到我時，總會二話不說的直接丟下麥克風，很開心的走出教室（學弟妹應該都很錯愕吧），然後給我一個大擁抱。

來到政大後起起伏伏的這五年，我是這樣被對待、陪伴的。五年了，對也好，錯也罷，寫完這篇論文，我終於能夠給在朝陽的母親一個交待，然後也給我自己一個交待。對此，我很常問我自己：寫論文，真的是要追尋所謂的「真理」嗎？不，人們原先認識的那個「真理」其實是阻礙我回頭走向自己的大石頭，所以我才會奮不顧身的挑戰它、搬動它，因為它阻擋了我回到「母親」身邊的路。我從一開始就很清楚我寫論文就只是為了我的兩個母親。我想要達成兩個母親的希望，回應我對她們的承諾，保護最疼愛自己的母親。我很高興我撐過來了，也真的做到了。所以，從現在開始，少讓她們擔心，讓她們能夠看見我開心、自在的樣子，是我最重要的事情，而這也才是屬於我論文所欲探得的「真理」。

二、無法成為「好學生」的「痛」：痛苦呢喃的發聲與覺察

為了回應家人、師長的恩情和期待，獲取旁人對於我是好學生的肯定，對我一直是件很重要的事情。特別是蒙受乾媽許許多多的恩情，我很希望我可以一直是好學生，但從朝陽來到政大，然後在變成一名在政大社工所極度適應不良的科大社工，我很多時候是很孤單的，甚至是被迫分裂的。我孤單是因為身邊從來沒有人能真正理解我的痛[128]，也不像其他本科系畢業的同學有機會在政大社工所能遇見自己的學弟妹，這五年來我從未遇見任何一位有機會進入政大社工所的科大社工；我分裂則是因為除了面對身在政大的衝突之外，我同時也必須要面對來自己人的質疑。然而，也就是長期流離擺盪於朝陽／科大社工與政大／高教社工兩邊不是人的絕望斷裂間，最終得以讓我遇見顛覆社會工作專業帝國的內在動能。

[128] 有位私立社工名校畢業的學妹曾對我分享，她也有過台上的師長從國立大學的社工系一間一間算下來的恐慌，我記得我當時苦笑了一會後對她說：「妳要開心才對，因為妳的學校還會被算到，像我畢業的學校連提都不會被提起，不然就是提了也大概也沒好事。」

1. 兩邊不是人的斷裂經驗：雙重身份的流離煎熬

或許是過往我不受控制的言行舉止在一時之間難取信他人，但這也使得我一直很難釋懷，也很混亂，特別是在來到台北政大社工所，還有在進行研究訪談的日子裡，每當我試著把相關的研究心得帶給母校的恩師和故友時，人們總是會回應我：「你為什麼總是要把你自己跟那些很糟糕的學校擺在一起？……我們朝陽有如此的不堪嗎？」或者，也有人知道我的研究主要內容後，很熱心的跑去問了幾位曾就讀研究所和在職場工作好些年，表現都非常優秀的學長姐後回來對我說：「我問過其他人，她們一致都認為我們和東海、東吳等實務名校畢業的學生比起來完全沒有差，你為什麼要那麼堅持我們和別人有差別？」但我試著想拿我訪談的結果回應時，他卻又非常果斷的對我說：「你剛剛說的第一個科大社工的受訪者本來就是沒有自信的那種人，所以她很容易會被別人的話影響……第二個和第三個受訪者都是和你一樣在大學時很得老師寵愛，去了研究所後沒人疼才適應不良……最後的那個受訪者大學本來就不認真念書阿，所以她會覺得自己很差或被別人批評都不意外阿。」聽見同學劈哩啪啦一長串的說明、反駁，我深刻的認知到無論我怎麼提出證據，同學接下來一定都會有一套他自己對於個體客觀表現的觀察說詞，而非集體和社會結構的共同經驗，但在多說無益和擔心引起不愉快爭執的情況下，我似乎也只能放棄繼續爭辯和解釋；或者，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受訪者，私下將我訪談的問題拿去詢問某位大學師長，但我後來耳聞師長當時的回應是：「這是他個人的問題。」或者，也有同是科大社工的受訪者很激動的質疑我說：「你怎麼可能理解那種被別人輕視的眼神，你已經是政大社工所的高材生了，早就不再是眾人喊打的科大社工了。」

跨越兩個截然不同的教育體制，以及擁有迴異評價專業身份的交互錯置，使得我在面對政大社工所時，我時常必須小心因自己表現不如人而招來的批評；反之在面對大學母校的師長和友人時，我不是被當成愛抱怨的怪胎，不然就被認為是我的問題成因是無法與他人競爭所引起的自卑情結，甚至有時候還可能不被某些科大社工視為是我群。因而，我敘說、書寫這篇論文的最大挑戰，就在於我必須不斷同時面對外在與內在的多重衝突，縱使我知道這不一定是每一位科大社工人都曾有過的經驗，縱使不論是在政大或是在朝陽，我也都曾被人批評過於偏執，或被警告我會因此而得罪不少人，縱使有人對我說挑起這個問題會讓部分科大社

工人的處境更加為難，堅決說出自己真實經歷和感受的結果似乎讓我註定要成為一個不甘於現狀又愛到處惹事生非的大麻煩，也必然會跟某些理念不同的恩師、故友起衝突（很多時候這些衝突在一時之間是沒有辦法被解釋清楚的），而無法成為一位處事圓融、討人喜歡的好學生。

我不知道為什麼說真話、陳述真實的感受，以及追索問題真相的過程會變得這麼難、變得這麼繁瑣複雜，但如果我在追尋答案的過程中，帶給身邊的人們預期之外的麻煩，我真心的想說：「對不起，請你們原諒我的任性……但我真的只是想要證明『我／科大社工』真的不是人們想像的那個樣子。」因為我如今首要的任務，就是勇敢挺身「拒絕」社群對於我／科大社工的負面標籤，至於我是不是好學生／好社工，能不能繼續得到大家的認同或誇獎，對我而言已經不是最重要的目標了。在經歷過這一連串的事件後，我想要開始學習更貼近、信任自己的經驗和感覺，所以我想替我自己說話，想替科大社工人說話，想替與我有相同經驗和遭遇相同問題的社工人說話，僅此而已。

2. 從朝陽到政大的錯置返身：誰好誰壞？又誰強誰弱？

我一直有話想對政大社工所說，但我究竟想說些什麼？長時間身陷未知又莫名的斷裂經驗，讓我對於政大社工所很難有什麼好的評價，因為我很討厭政大，非常討厭政大社工所，非常非常非常的討厭，可是我卻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說不清楚的我到底討厭政大社工所什麼。但不論討厭也好，或非常討厭也罷，總之大概就像是許多位高權重的知識份子在文獻裡想盡辦法嫌惡科大社工人的筆觸和發生在日常生活中許多不知其然的偏見、歧視，我彷彿也依樣畫葫蘆的複製了同等的嫌惡還給位居高教體系頂端的政大社工所，孤身一人持續進行著不知所謂又無以名之的主體抗爭。我知道我很傻，但在無處可逃的情況下，我似乎也只能靠著這種方式來維持自我／科大社工的認同和存在。而我不斷努力回觀自我、忍受痛苦正視衝突、追尋問題真相的最終期待，無非就是要讓我能夠脫離此種冤冤相報的輪迴狀態。

(1) 流動的位置／權力：當……政大社工所也僅僅是邊陲的「弱者」時

因為討厭政大社工所，所以我當初對政大社工所最大的抵抗行動，就是不論是意識或身體，我想盡辦法拒絕自己／科大社工完全被政大社工所／高教社工收編。於是，我成為政大社工所創所以來第一位對外尋找外所指導教授的研究生。而這也使得我從碩二起就開始不斷遊走在政大的社會所、勞工所、公行所及台大的社工所、陽明的衛福所間，並陸續旁聽、修習了好幾門跟社會工作沒有太大關係的課。遊走在不同學校和學科之間的日子是我來到台北念書後最開心的一段記憶，因為除了可以認識許多來自不同學科、思想迥異又稀奇古怪的新朋友之外，我還發現我真的可以完全不用在乎我是政大社工或朝陽社工（即使我自我介紹時依然習慣會同時報出朝陽和政大的學校出身，但學校出身在這時候可以很單純的只是一個協助人們認識自己且又無關痛癢的身分代稱）[129]，身旁的每一位同學、師長，他們在乎、重視的是我在課堂討論的內容和深度，或是分組報告負責任的態度和成果。更重要的是，我可以放心胡亂發言，完全不需要擔心答錯問題或表現不佳時，台上的師長會露出鄙夷的神情，然後輕蔑的脫口說出：「你們那間學校教出來的都是那個樣子。」也就是在此種安全、自在的情境下，我慢慢甩脫了自身長期以來的混亂，同時更慢慢重新找回了昔日純粹想要學習、想要懂得更多、想要把問題搞清楚、想要變得更好的自己。

坦白說，從政大社工所出走的決定，不論對現在的我或對這一篇論文而言都創造了非常寶貴的經驗。雖然我後來因故與社會系的第一任指導教授鬧翻，導致在求助無門的狀態下，我一度不得不先藉由休學來暫緩師生之間的衝突，等待更換指導教授的契機[130]。但也就因為不斷四處遊走和接觸不同的專業學門，以及實際在政大社會系的第一任指導教授研究室待過一陣子的經驗，讓我得以隱約從複雜的人際關係中覺察到，在同是政治大學的科層體制下，許多系所的大老們壓根沒有把「社工所」放在眼裡。或者，我應該說，政大社工所的「尊貴」到頭來其實僅限於社工領域，但相對於其他發展更為完備社會科學學門，政大社工所並沒

[129] 例如，曾經教授我社會保險的政大法學院院長郭明政教授在路上遇見我時，總會喊我：「朝陽的，你怎麼還沒畢業？」說真的，這莫名讓我有一種被關心的親切感。

[130] 在這裡要特別補充說明的是，最初的論文原稿有我與第一任指導教授衝突的詳細經過，但為避免節外生枝和造成不必要的誤會，經兩位口委與指導教授的同意後，我最後決定拿掉我與第一任指導教授的衝突經過，並重新編寫此節。

有太多的優勢，甚至有些系所依然是把社會工作視為邊陲的學門。是故，相對於在社工領域傲視一切的強者之姿，政大社工所似乎另外也有著弱者的一面。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發現和轉向。我在這裡觀察、參照的基礎並不是政治大學科層體制間的私人恩怨，而是我特殊的求學歷程和身份轉換經驗讓我有機會跨越了既有二元對立的認知結構，也就是我從朝陽社工系到政大社工所，後來出走遊走在各校際、學院之間，接著再經由辨識政大社工當初脫離社會系的歷史經驗，以及自我社會角色位置的多重挪移，讓我很快意識到我／科大社工與政大社工所／高教社工的衝突經驗，反過來剛好就是台灣社會工作教育發展銘刻的社會／歷史縮影，使得「政大社工所」就是我／科大社工逆向體驗這段社會／歷史的生活戰場。於是，在面對來自政大社工所師長／高教社工／上位者們看似理所當然的賤斥、指責，最終致使意識覺醒又不願臣服的我／科大社工／下位者開始不顧一切的反抗，這並不是偶然，而是台灣社會工作社會／歷史的必然。這不但是與理性無關，我們反而還必須要去重新透過我國的社會／歷史脈絡來理解這其實是自我意識不斷被以高教體系社會工作學系為主的社會工作專業逼至極限的社工人，為了不被視為他者，為了捍衛自我存在尊嚴的鬥爭實踐。然而，就在我為了捍衛科大社工的主體尊嚴，也幾乎已經成為與政大社工的師長／高教社工／體制的壓迫者誓不兩立的「科大戰神」[131]時，我卻又在政大社工所的師長們身上發現了過往同樣曾為社工主體而戰的鬥爭痕跡……我彷彿穿越了時空，看見社工仍附庸在社會系底下的弱小模樣。

不同於其他早期成立的社工系所，政大社工所是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在分組、獨立運動過程中，最慢脫離社會系的社工系所。或許，就是因為最慢脫離，所以有些衝突的記憶和社會／歷史的傷痕還未消逝，也都還有跡可循。我雖然無從準確獲知政大社工所過去在社會系時分組、獨立的詳細經過[132]，但回想碩一剛進入政大社工所時，所上師長有次在課堂上就曾分享當初為了順利脫離社會系獨立，她們為此不斷在校務會議尋求校長和其他系所主管支持，也曾和社會系同仁有過爭執的心情點滴。就在那當下，我確實曾感受到她們付出過許多努力，而這一切

[131] 這是後山對於我論文發聲行動的暱稱。

[132] 老王曾鼓勵訪談所上教授過去在社會系時的經歷，藉此瞭解政大社工所的成立經過，不過我始終沒有進行這件事情。

都是為了要替將來的社工學生創造一個穩固、明確的主體／專業認同。忽然間，我似乎領悟了除了攻擊鬥爭之外的另一種解放方式。我隱約發現在科大社工和高教社工之間，好像還存在著某種可以讓雙方相互對話與和解，共同前進的可能！？

(2) 跨越時空的孿生鏡像：挖掘「彼此都曾為弱者」的集體情感連帶

長久以來，高教社工人與科大社工人在客觀的意識層次上，持續如兩條陌生的軸線持續平行發展，沒有交集，但在主觀的專業體制中，特別是當大多數的社工人普遍仍活在「誰是／不是社工？」、「誰優／誰劣」的二元對立虛假意識間，而我的經歷，我的敘說／書寫、我的研究、我的鬥爭行動，其實就是要把讓這兩條線看見彼此，藉此破除禁錮著人們的虛假意識，找到一條嶄新的出路。而這也是 Freire 說被壓迫者／下位者比起壓迫者／上位者最大的差異，就在於被壓迫者／下位者有機會可以選擇不成為壓迫者／上位者（方永泉譯，2003）。對此，雖然我在重新理解的政大社工所的過程中幾度浮現異常惶恐和抗拒的情緒，雖然我對於師長們的憤怒和怨懟，以及科大社工（或是說大多數中、後段學院出身的社群夥伴）的社會／歷史劣勢很難在一時之間完全消失不見。但從社會工作教育發展的歷史重新看見我／科大社工和政大社工所師長的交織連動處，讓我明白不論是高教社工或科大社工，我們對於社工主體獨立自主的盼望，還有堅持的目標本質上完全一模一樣，而今天科大社工人面臨的問題，說穿了其實就是過去附庸在社會系下政大社工所／高教社工曾經歷過的弱勢處境。

因而，如果我的觀察無誤，那就如同陳光興（2006）不斷強調多元族群的和解一定要回到過去的在地歷史，回到人們內在深層的情感結構，我認為這對於台灣的社工人亦是一則非常重要的提醒。如今，社工師法造成社群內部的分裂是事實，不同社工院校在專業化程度上有所差異也是事實，特別是深受美式社會工作專業殖民，面臨「社工」主體多重異化問題的我們／台灣的社工人確實有必要更積極、正向的面對社群內部的多重差異，重新梳理生成彼此的社會／歷史脈絡，而不是持續強硬的追逐近乎暴力的統一規格，否則台灣的社會工作專業終究只是落入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惡性循環，毫不自覺的逐步朝向自我毀滅的死胡同罷了。縱使社工師的建制立法徹底激起、實現了社工人主體獨立自主的強大熱情，

但在這股熱情之後，我想大多數的社工人都無法否認「社工」在台灣的各個體制和專業團體間從來都不是「強者」，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是處於各個體制邊陲位置的「弱者」，這人們難以否認的事實。也由於曾為「弱者」和正身為「弱者」的經驗，我相信許多被壓迫的記憶仍存在於大部分社群夥伴的情感記憶之中，還未完全消逝。就好像我過往偶然在政大師長身上曾遇見的獨立期盼和情緒抒發：她們的呢喃細語背後，其實深刻標記著一段社會工作尚不為人知，還未被正視、釋放的記憶／歷史，更使得深掘社工人「曾為弱者的記憶／歷史」變得有意義。

雖然，礙於自身對於社大社工所的某種情感糾結，我到最後都未能鼓起勇氣逐一訪談每一位政大社工所的師長，但我相信當未來有越來越多的高教社工、科大社工，更多的社群夥伴開始能夠更貼近彼此的情感結構和社會位置，更細膩重新看待過往社會工作的獨立過程中曾為弱者的被壓迫經驗，一定可以為台灣社工人帶來全新的理解，共同為彼此相互責怪、憎恨的糾結情緒找到出路。這並不是來自科學知識的理性，更不是出自同情或憐憫的同理，而是一種建構在「彼此都曾為弱者」之上的集體情感連帶。就因為自己痛過、被壓迫過，體驗過有苦難言的壓抑過，所以一定更能深刻諒解正在受苦的他者，知道該如何更細膩的幫助別人，貼近人們的真實情緒和心理感受；雖然，我也必須很坦率的承認我在理智上雖然能夠超克過往的二元對立困局，但我在情感上卻還是需要一些時間思考該如何重新擺放自己重新看待政大的師長[133]。雖然，我應該還需要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放下某些說不清楚的怨懟。只是，找到一條不同於過往的出路仍是件令人非常開心的事情。畢竟，比起過去不斷被賤斥、責難或是憤怒、怨懟彼此的死胡同，重新找到一個能夠相互理解，共同對話與前進的方式，似乎不失為一個更好的方法？不是嗎？

3. 政大與朝陽相互看見的社會／歷史意涵：顛覆內部／自我殖民的內在動能

對政大社工所的師生而言，我的論文或許是個極其尖銳的存在。熟識我的同學、友人大概都聽我抱怨碎念過，只因這篇論文從開始到結束，數度招來政大社工所師長們的反對、質疑，而這不免也常使我的論文時常寫得心驚膽顫。我真的

[133] 最實際的例子，應該就是我到畢業之前，我即使能夠跟每一位學弟妹都處的很好，但無論學弟妹不厭其煩的多次邀約，我始終還是很抗拒出席有所上老師的公開活動。

很討厭政大社工所，但真正令我討厭標的是會賤斥科大社工的政大社工所，所以我敘說、書寫自我經驗的初衷，絕非是刻意為了攻擊、報復政大社工所任何一位師長。認真說起來，政大社工所的師長對「我」有著和朝陽母校師長同等的培育之恩，也從未刻意針對或特別傷害「我」，但部份政大社工所的師長歷來對於「科大社工」在言語和行為上的不友善，卻是不容政大社工所全體師生否認，更是難以迴避的事實。不過，我在這裡仍必須更進一步強調和申明的是：政大社工所的師長對於科大社工的不友善，絕對不是唯一、單獨的特例或偶發事件，因為就我訪談諸多受訪者所得的資料和經驗，我十分篤定相似的事件是持續不斷發生在許多知名社工學院和散佈各個實務場域的生活常態，而這也使得我／科大社工在政大社工所的痛苦呢喃，剛好就等同於整個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社會工作教育被美式社會工作專業制約、異化的問題縮影。

雖然，我對政大社工所確實有著說不完和說不清的怒氣，特別是每當我聽到政大社工所的師長理所當然的批評我們科大社工很糟、很爛的言論時（縱使那看似是非常有道理、有數據佐證的客觀陳述），更是令人怒火中燒。我總是在想，我們技職體系科技大學的學生程度就算真的是比政大社工所的學生差了一點，但我們會慢慢進步啊，畢竟每個人都有「菜鳥／新手」過，難道就不能給我們點時間嗎？為什麼不能多相信我們一些，多給我們一些信心呢？而且，我總覺得最奇怪的地方：那就是如果政大社工所的師長真的如此憂慮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在意學校出身，那麼為什麼政大社工所每年依然還是會招收超過三分之一以上來自社會系、教育系、資管系、地理系、法文系、俄文系、外交系、新聞系……等隔行如隔山的非本科系學生呢？照理來說，這些非本科系的學生，在研究所期間最多也只是修個三、四十個學分、實習兩次，多寫一篇論文，他們充其量也只是學校出身好聽一點，取得能考社工師資格的「學分班社工」，宛若變種學分班社工的他們這樣真的比的上經過四年正統社工教育薰陶的「社工」嗎？他們就真的能成為「專業／合格」的社工嗎？這不是很矛盾嗎？

當然，在我丟出這個質疑的同時，我想這大概也會讓已經陸續投入家暴中心、學校社工領域或進入公部門的研究所同班同學暴跳如雷（還沒畢業的非本科系學弟妹應該也會很不爽吧），因為她們大多都表現的很好，平常根本不會有人無聊

到去質疑她們那一種「社工」[134]。畢竟，她們都跟我提過在實務場域裡，人們真正在乎的是工作能力，特別是工作時間一久，身份背景和學校出身的因素往往會迅速被淡化（但剛開始工作時，可能還是會有些影響），取而代之的則是實務工作經驗。這也讓我想到我有一位在青少年領域工作的大學學姐每次打電話來提醒我趕快畢業時都會對我碎念：「我跟你說過幾百次了，在實務工作大家不會管那麼多啦，你說的問題根本全部都是你們那些學術界的教授自己搞出來的……你就不要理他們就好了……而且就算是你們那些台大／政大畢業的學生，很多剛來的時候一樣什麼都不會阿，她們還不是要客客氣氣叫我聲前輩／學姐……累積經驗和喜歡自己的工作比較重要啦……反正你趕快畢業就知道了，實務比學術好玩多了。」

透過釐清政大社工所非本科系同學專業身份的轉化經驗和大學學姐的提醒再一次讓我確認，成為某一種社工／學校出身／資質程度很多時候只是掩飾問題真相的假議題，我們如今對於「社工」的認識大多是仍未被解構的虛假意識與象徵暴力，反之在地的實務經驗其實才是判斷我們能否成為「社工」的問題核心；於此同時，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進一步「看懂」政大社工所錄取眾多非本科系學生所蘊藏的內在錯位矛盾：為何非本科系的同學透過政大社工所兩、三年的教育培訓旋即能成為「社工」，但接受過四年大學教育的科大社工卻不足以是（或不是）社工呢？對此，問題的重點不僅在於兩者專業程度的差距。特別是在既有的專業體制之下，錄取非本科系出身的社會工作研究生，一方面突顯了政大社工所基本上是相信社工的多元助人主體是存在的，亦是一支可被期待的專業生力軍；不過在另一方面，因著我國的考試、分發制度與社會工作發展所對應、銘刻的社會／歷史，致使政大社工所得以盤據學院鰲頭之一的社群位置，但這不免也使得政大社工所的師長們似乎過於忽略／漠視（或不願意回頭看見／認真思考）究竟是何種家庭社經位置的「學生」相對比較容易出現在政大社工所：在既存的教育、考試制度之下，進入台大政大等知名頂尖學校的學子大多出自中上階級的家庭，反之絕大多數的科大社工／勞動家庭的孩子往往難如登天。

如果，政大社工所能夠接受、願意相信非本科系的多元主體得以成為「社工」，

[134] 坦白說，我打從心底相信這些非本科系的研究所同班同學，每一個人可以成為好社工。

那又為什麼不能夠接受、不願相信技職體系出身的科大社工可以成為「社工」呢？即便是政大／高教社工與朝陽／科大社工之間存在著難以消除的「階級」差距，但這依然不應該是造成人們今日得以互相傷害、憎恨的理由。只因，多元主體之間的階級關係雖然難以消除，但人們依然可以試著互相看見、互相理解、互相幫助、互相分工，而不是輕言我們無法改變社會現況（我聽過太多社工的夥伴和師長對我說這句話了）！雖然，我在這裡暫時無力改變什麼，但我衷心期盼這一篇論文的經驗能讓政大社工所的同學、師長，還有更多的社工人有天能夠開始醒覺自身對於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的偏見和歧視，而出身於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人能夠逐漸擺脫高教社工的凝視陰影，然後更正向的看待自己。那麼，吾願足矣。

三、超越乾媽／上一代銘刻的經驗視野：踏尋新一代「社工」的助人樣態

比起我對於政大社工所的諸多衝突，我其實還有一個更說不出口的自我議題必須要處理：我記得，乾媽曾對我說：「我相信我是極少數十分深入瞭解你的人……某些時候，我甚至比你媽還要瞭解你的某些問題。」但最令我遺憾和失落的，卻也就是在我敘說、書寫這一篇論文的過程中，我最常感受到我最無法說服、傳遞解放思想的對象，其實就是向來與我最親近也最瞭解我的乾媽。

這些日子以來，就如乾媽所言：「我可以接受你的研究論點／發現，但這不代表我認同你的研究論點／發現……因為這是你關心的議題，但不是我的問題。」無法順利被乾媽理解的懊惱，使得偌大的無奈、沮喪等情緒在我越來越清楚問題的真相後依然越滾越大，也越積越深。對此，我仍舊一廂情願的以為讓乾媽清楚知曉我的問題，無疑就是象徵著我作為科大社工的解放，就是我／科大社工的自我救贖。我真的很想要向乾媽說明、解釋清楚，不過我始終無法順利如願。磨人的懊惱，後來一直要到某一次我去台大參加某位學弟的論文口試結束後與指導教授老王一同走在椰林大道時，老王聽完我的呢喃細語後回饋我說：「你跟大多數的社工人不一樣，特別是你有著乾媽／朝陽科大社工人所沒有的攀升經驗，所以他們無法理解你是正常的，你不能怪他們，這需要時間……很長的一段時間。」聽到老王這麼說，我知道老王是在提醒我，我必須試著要放下我自己的堅持，稍微挪移自己的立場，辨識生成我與乾媽的社會／歷史軌跡，因為乾媽與我所承載的社會／歷史經驗有著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不能過度強求我們倆在短期之內就馬

上能互相理解。也就在那瞬間，我忽然想起，乾媽似乎曾對我說過她畢業於台大社會系，那時根本沒有所謂的社會工作系，甚至連分組都沒有；我也記得，乾媽曾說詹火生、林萬億是大她一屆的學長、楊瑩是她的同班同學，而馮燕、呂寶靜等人是她的學妹……雖然乾媽一直都拒絕接受我正式的錄音訪談，但她卻總是能夠毫無保留的對我分享她的生命故事／經驗，有些迂迴的讓年輕的我能夠更為貼近台灣社會工作「上一個世代」的模樣，同時也讓我能夠從終不斷思索自己究竟該如何跨越我與乾媽的「不一樣」。

因著老王的提點，以及配合著乾媽對我陳述的生命故事／經驗，讓我注意到生成我與乾媽的社會／歷史情境脈絡其實是很不一樣的：如果，乾媽所認識的社會工作專業是起於一個社會工作依附於社會系下主體未明至逐漸成型的時代；那我則是接續乾媽處在一個社工被分為很多種，而我是其中之一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但人們／專業制度卻往往只把部分高教體系的社會工作系認為是社工主體的時代。換言之，我無法順利被乾媽理解的懊惱，其實是肇因於社會／歷史的主體差異斷裂，也就是台灣社工的歷史主體，還有主體歷史的異化造成我們師徒倆對於「社工」主體的認同有著極大的差異。是故，這是一場因時代變革所致的社會／歷史悲劇，但這卻也是我／新一代社工人接下來勢必得要超克的難題：我承認我無法完全體會上一個世代為了成就社會工作專業所遭遇的苦難，但隨著時代巨輪的滾動，台灣社會政治經濟的持續變遷，我／新一代的社工人未來必然要超越、克服乾媽／上一代社工人的經驗制約，我們已不能夠再用過往的舊思維和保守的意識結構來看待、處理當代的社群衝突。為了徹底擺脫舊時代的制約，我／新一代的社工人要學習重新擺放乾媽／上一代社工人的經驗，在全盤接受和全面否定的對立、模糊間，亦步亦趨的再次尋覓屬於自我／新一代社工的新樣貌。

我想，當我完成這一篇論文後，我真的該慢慢釋懷、放下我對於乾媽的莫名堅持了，因為我知道我涉入、創造的是與乾媽／上一代社工人截然不同、甚少踏足的自我意識／研究領域，而我不顧一切超前了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的社會／歷史之目的，就是為了尋找到一個不同於過去的答案，一個能夠讓更多的助人工者重新信任彼此、互相和解的答案。我已無愧於乾媽過往今來對於我的教誨，我真的寫出了一篇驚人的研究，找到一個能夠讓人們過得更好的未來，我終於能大聲的對乾媽說：「**我真的沒有讓您丟臉**」。所以，縱使人們在這過程中會對於我有所誤

解，但我絕對不會輕言放棄，我會繼續努力實踐我所期望的未來。我相信，乾媽和許多誤會我、暫時還不能夠理解我的人們，有天一定能夠理解我為何如此堅持。有天，一定會有那麼一天。

第三節　無以為報的師恩：超克禁錮自我的現代性

書寫這篇論文並不輕鬆，過程更是坎坷無比。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遇見老王，我認為這篇論文大概不會有機會出現在眾人面前。老王，對我而言，就是一位如此重要的論文指導／生命導師。我和老王相識相遇的經過最早可以追溯到大學時期，因撰寫大專生國科會計畫而曾拜讀過他與陶藩瀛老師合著的期刊論文，那是我首次知道老王這號人物；第一次見到本人，是我跟研究所的同窗健瑋，跨越捷運淡水線的兩側，大老遠的從政治大學跑到陽明大學去旁聽老王的質性研究；質性研究課程結束一年之後，再一次見到老王，則是在 2011 年政大後山櫻花初綻的二月天，同時也是我休學再復學，還有健瑋已經通過畢業口試，正準備辦理離校手續，將論文裝訂本分送口試委員的那一天[135]。在生疏的政大，遇見有點熟悉、半年前剛由陽明轉任來政大的老王，感覺很奇妙，但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老王隨即當面邀請我成為他的兼職研究助理。但想起先前不甚愉快研究助理經驗，我為此猶豫、消失了好一陣子。後來，過了許久之後，老王又寫信問了我一次，接著當小老闆[136]將老王研究室的鑰匙交到我的手上時，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才正式成為老王身旁的小小跟班，爾後也就這麼成為了他的指導學生。

壹、師傅的傾聽與引導：解放自我慾望最深層的妒恨鎖鏈

認真說起來，老王指導我論文的這兩年多來，他主動叫我閱讀的文獻大概不超過五篇。但我論文的內容，卻有超過三分之二以上的內容，幾乎都是透過跟老王在政大後山散步（練習說自己的故事）、開車帶我參加會議／別人的論文口試（觀摩別人說故事的模樣，還有決定書寫自我和選定口試委員）、跟著學弟妹旁聽老王的質性研究、社會政策課程和參與質性團體（在大家的協助和鼓勵下完成

135 老王後來恰巧是健瑋論文的口試委員。

136 小老闆，是我對老王研究室正職助理的暱稱。當我重新開始寫論文後，小老闆一直是除了家人、女友之外給我最多支持和鼓勵的好朋友。

勞動家庭的獨生子故事之雛型）[137]公開發表論文發現（發聲練習與召喚有相似經驗的同伴，我與後山就是這麼認識的），或是日常生活裡跟老王吃飯時對他碎碎念（老王會幫我集結零碎卻有社會意義的故事）[138]等大大小小的事件慢慢累積而來的。在這裡，我必須懷抱著感激的心情說，老王真的是一位非常優質的聽眾，縱使他大概已經聽過我講過上百回一模一樣的生活故事，但他還是都會耐心聽完，然後靜靜的問我：「**所以……對於這則故事，你有什麼新發現嗎？**」不過，這個看似簡單的提問實際上卻異常尖銳，因為我寫論文時遭遇過的最大困擾和壓力，很大一部分是老王很常透過這個問題提醒我，我的敘說、書寫時常充斥著個人對於壓迫者（如父親或政大師長）的憤怒和怨懟[139]，不然就是我很容易不知不覺的以非常客觀的立場在進行自我敘說（量化實證典範對我的制約非常根深柢固）。對此，他總是不厭其煩的提醒我必須要透過個人故事的再現，一邊感受自己的經驗，一邊重新把我個人問題放回政大社工所和台灣社會工作所處的社會／歷史脈絡來重新觀看問題，試著甩脫掉過於客觀的實證知識對於自身的綑綁，藉此把真實的自己給「認」回來。可是，老王說的很簡單，但我做起來卻真的好難。

一、不斷被解封、翻轉的苦難：逐漸被故事療癒的傷口

其實，學習如何把痛苦、難堪的舊故事，不讓自己持續陷於為賦新詩強說愁的窘境，從而有條理的「重說」成有意義的新故事，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讓我通達如何重說故事的啟發和領悟，當初的關鍵就在於老王平日對我的身教。我在寫論文的過程中，最大的挑戰和衝突事件是我將論文題目提報為「我在政大寫不出社會工作碩士論文的日子」的隔天，政大社工所為此特別召開所務會議，然後我就在沒有被告知、也沒有被徵詢意見的不對等情況下，所上的師長們似乎以多數決的方式否決了我的題目。我並沒有實際參與會議的過程，也不知道現場的討論狀況，我只知道我隔天忽然被老王叫進研究室，然後直接被告知我必須更換題目。也就在那當下，我只能說我對政大社工所過往今來的新仇舊恨全部都攪和在一起，情緒失控的我開始在老王研究室大吼大哭。縱使當下被老王花了一些

[137] 我覺得這個經驗對我很重要的，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公開在那麼多人面前坦率的說出自己與父親的恩怨情仇，然後聽取別人給我的回饋。我當場甚至還加碼演出，我操作網路地圖顯示出自己家的樣子，還有奶奶在街上撿拾紙箱背影。

[138] 說來好笑，我每次跟老王吃完飯回來大概都能順利生產出一、兩頁的文本。

[139] 如老王給我的論文回饋上曾寫著：「你總是想攻擊你的敵人。」

時間後安撫，應許一定會和我共同前行，但政大社工所加諸在我身上那無以名之又難以言說的「傷」卻又扎實的多了一道[140]。

對於論文題目不受尊重的被政大社工所要求修改(不過我承認我刻意、堅持以此為題)，我感到非常的憤怒，我想反抗，可是我使不上力，而且想到我已經是一個大麻煩，如果我繼續堅持下去應該會使得老王的立場應該也很難為吧？畢竟自己指導學生的論文在所務會議上公開被質疑、否決，我想老王自己心裡也不好受吧？所以……忍吧，就忍下來吧，在無計可施的狀態下，我也只能這麼對自己說。但幾天之後，老王在質性研究課堂進行到 Habermas 對於**實證、詮釋、批判三種知識典範**的差異時，忽然特別用我論文題目被政大社工所否決的事件當課堂的討論實例。那天，老王在課堂上出了我畢生難忘的話：「1980 年代美國芝加哥大學開啟了社會工作研究於知識典範之爭的序幕……時隔三十多年後的 2011 年，志南的論文代表台灣社會工作研究的知識典範之爭即將在政大社工所展開。」[141]在那當下，我不知道其他同學的腦子裡想的是什麼，但對我來說，那是一個很重要的意境翻轉，更是一個非常大的精神鼓舞。

如果，敘說、書寫「我在政大寫不出論文」的故事是台灣社會工作研究知識典範的戰爭，那我想呈現的就是我對於社會工作研究為什麼總是看不見自己／科大社工的批判反思，甚至能被視為被殖民者決意返身去殖的重要起點。而這也使得說「我」寫不出論文的經過，不但不是為了控訴我和政大師長們間的私人恩怨，反而是為了探索形塑我們衝突背後的社會結構之努力，以及我們對於台灣社會工作的知識、真理應該為何的再思辨。因此，這是一場非關私怨，堂堂正正的君子／淑女之爭，亦是一個將問題從個人逐步「外化」至承載整個台灣社會工作的社會／歷史，以及描繪社會工作專業知識／權力運作全景的行動過程。

---

140 當時為了解套，老王親自把我的題目改為「書寫作為自我解放的途徑：探究台灣社工教育的階級關係」。

141 關於美國社會工作對於量化與質性研究的典範之爭的起點，始於一場博士論文的論文口試對於研究方法的爭議（問題情境幾乎可說是完全與我一模一樣），詳細可查詢 Geismar(1982)、Heineman(1981)、Hudson(1982)、Schuerman(1982)等人在《Social Service Review》期刊的唇槍舌戰；近期的相關爭議則可參閱 Gilgun(1994)和 Padgett(1998)對於社會工作質性研究方法的論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國內學者劉曉春(2009)整理相關文獻後就指出，美國社會工作知識觀大致是呈現出一條由最早的宗教、哲學及人文的非實證觀點，到強調客觀性科學性的實證主義觀點，再到近期反思風潮的變革路徑。反觀國內，我國的社會工作雖然承襲美國，至今也仍不斷推崇美國，但我國社會工作學界目前仍較以實證典範為尊，反思風氣和相關研究似乎才剛處於萌芽的起步階段。

雖然，我約莫猜想的到讓我寫這麼樣的一篇論文，老王自己其實也必須承受到所上其他老師很大的壓力（雖然他總是跟我說沒什麼，但我聽到的耳語從來都不是這樣子），但他卻依然堅持幫我撐出些許敘說、書寫空間，不斷耳提面命的告誡我絕對不能意氣用事，而是更要更深入情境脈絡來理解我和政大社工所的衝突緊張。因而，老王親自用言行如一的身教讓我明白，敘說、書寫苦難帶來的痛，標示、命名讓自己難堪的傷，闡述交待心靈深處不愉快經驗的最終目的並不是為了要指控、報復傷害自我的他者（不過我承認這確實很容易會引起直接關係人的緊張），而是要藉此解開封存的痛苦，重新讓舊的痛苦長出新的意義。換言之，我身為科大社工而被迫承受的他者原罪，以及我論文題目不符政大社工所規定的諸多衝突，其實都必須超越僅有「是」與「非」／「對」與「錯」的二元對立結構，重新放回台灣社會工作研究普遍慣用科學量化的實證研究典範的社會／歷史脈絡，我個人的問題也才有機會能夠出現新的理解。因此，我跟老王最終所堅持、所欲爭取的是知識真理究竟為何，該以何種方式呈現，而不是停留在私人的情緒抒發和呢喃自語。也就是透過老王親身的示範和帶領，讓我開始意識到我接下來究竟該如何「重說」我的故事。

透過敘說和書寫，讓我能夠了悟尋覓真理的知識探究，並不只是從「外」而來的，而是要不斷經由返身「內」省而來的，進而又實現身體力行的實踐。就好像當我把父親和家庭的故事必須放置在勞動家庭在全球化下的變遷觀看，我從父親對於阿扁的相挺支持，看懂了父親處在時代洪流下的無力與無奈；或者，從看見政大社工所脫離社會系的成立經過，我進一步覺察到社工主體在分離、獨立過程中懸而未解的糾結歷史，並在其中覓得能讓正陷於相互爭鬥又持續異化的社工人彼此相互和解的線索；亦或是，我在進行論文畢業資格考前，我鼓起勇氣邀約政大社工所的現任所長宋麗玉教授（2012 年 8 月就任），親自向她說明我當初為何堅持要以「我寫不出論文」為題，希望她能夠諒解我的任性。宋麗玉所長在聽完我撰寫論文的初衷、原委及內容後，不但非常溫暖的給了我一些很棒的提醒，同時還提出一些我能夠再繼續思考的面向。這一次非常正向良好的互動經驗，更讓我學習到可以不用在以兩敗俱傷的方式對待立場對立的彼此[142]：對此，我開始

[142] 我邀約所長面談後，我有事先向老王表示，如果所長最後還是不同意我的論文題目的話，我不會跟她起衝突，我會跟她討論完後改題目。但在對談的過程中，宋麗玉所長很清楚的向我闡明她主要顧慮的是：我的論文僅陳述自己的經驗，而不包含其他人的經驗，這並不符合科學實證的研究精神，至於我的論文題目為何她並沒有太大的意見；因此，在我後續與所的長

願意相信我／科大社工與政大社工所／高教社工未來一定能夠互相和解。

當我逐漸能夠透析看待自我生命故事／研究的面向原來可以一轉再轉，而故事／研究所傳遞的意義更是能夠一變再變，我感受到原先令人痛苦不堪的傷痕其實正一點一點的慢慢在癒合。這使得我透過自我民族誌返身敘說、書寫自己寫不出論文的故事／研究，最終得以讓我能從「存而不在」的狀態邁向自我解放的實踐行動，藉此一點一點的喚回真實的自我。

二、 感同身受的生命故事：我……要改變和原諒的終究是自己？

能夠邁向自我解放是令人興奮的，但達成自我解放的助力，僅僅只有老王的示範和引導卻還是不夠的，我可以順利更加貼近真實自我的關鍵事件，在於老王有次邀請了一位名為 Barbara 的童年受暴者在質性研究的課堂上訴說、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Barbara 在課堂上陳述她是如何從一個受暴的小女孩到她成為一名母親，這些年來她是如何回頭面對痛苦的過往，以及她是如何原諒自己與放下對於父母的仇恨。Barbara 用自己的故事，親自獻身對我展演了邁向自我解放的最佳示範，而 Barbara 的生命故事更讓我頓悟在敘說、書寫生命故事的過程中，我最需要反覆詢問自己的是：究竟是什麼讓我一直沒有辦法放過我自己，然後必須要不斷折磨自己。敘說和書寫自己，讓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必須去坦然的面對自我心裡最深層的恐懼，也就是時常憂慮無法成為好兒子／好學生／好社工的自我。我知道就是他讓我沒有辦法平心靜氣的過日子。然而，我為什麼那麼想要當個好孩子／好學生／好社工，害怕被人們否定，擔心自己不被人看見，不被認同，憂慮自己「存而不在」呢？藉由 Barbara 生命故事的現身和分享，讓我重新遇見了我藏匿在內心最深處的自我……遇見了害怕變成父親、痛恨自己無法保護母親的小男孩……惶恐自己被人們視為是「郭家壞種」的小男孩。

對話中，我簡單的向她表明科大社工人面臨的問題現況，以及我確實有去訪談許多有類似經驗社工，同時我在第四章內也有整理放入部份的訪談文本。雖然我當時沒有明確的回應我的研究是否符合科學實證的精神，畢竟我要說的是我個人與社會交織連動的故事，但彼此坦然的相互對話的經驗確實讓我與所長都清楚了彼此對於論文／研究的期待與堅持，也讓我們找到一個可以相互妥協的空間，避免重蹈先前不必要的誤會與衝突。

1. 鬆脫妒恨輪迴的鎖鍊：放過無法原諒自己的小男孩

透過 Barbara 當場獻身敘說自我生命故事的示範和指引，讓我有勇氣回到自己的生命故事裡，重新試著遇見了心裡那位害怕沒有辦法保護母親的小男孩。回憶童稚時，我知道我最怕的就是父親喝酒宿醉歸來。因為，平時和藹可親的母親，接連下來幾天很容易就會氣瘋失控到變成另外一個我不認識的陌生人，她總會莫名其妙的生氣暴怒。我記得，為了避免父母的爭執，我有次還故意尿尿在刷牙的鋼杯裡，然後往父親臉上潑灑，希望他臭到醒過來。我知道我很蠢，但我單純的只是希望父母不要吵架，我從小到大的第三個生日願望，一直都是我的父母親不要吵架，不過好像從來都沒有實現過；等我再大一點，懂事一點，隨著父親賭博欠債的狀況開始越來越嚴重，喝酒宿醉的醜態更是時有所聞，我總是眼睜睜的望著母親為了要撐起這個家，只好更隱忍、只好更拼命工作。可是，繁忙的工作，再加上無法預料的經濟狀況、失控的家庭生活更是使得母親的情緒越來越暴躁。

然而，在論文計畫書口試時，王行老師卻對此特別說了一句我很在意的話：「**妳的母親在困苦的環境中，德行是崇高的……，但你有沒有想過，你的母親可能是全家人最大的道德壓迫來源？**」坦白說，我心裡當下對於王行老師提問有很強烈的情緒反應[143]，因為我實在很難相信母親怎麼可能會是壓迫者。但隨著敘說、書寫的返身體悟，以及重新遇見父親和自己的過程，還有 Barbara 的獻身分享，我慢慢感受到師長們不斷企圖提醒我的用意是：我很愛對我很好的母親，可是我卻也很害怕會咒罵我像父親一樣的母親。類似的咒罵每一次都會讓我渾身發抖，然後不由自主的跟著母親一起情緒失控。所以，我從小到大最重要、也最內化的心理防衛機制，就是不斷告訴自己：我絕對不能像父親，我恨父親，我要變強，我要變優秀，我要保護母親。我單純以為我只要把一切的錯誤全部都攬在自己身上，然後不斷告訴自己，我只要表現的很好，只要能夠出類拔萃，只要能保護母親不受到傷害，她就會一直是平常那個對我很好的母親。而這個自我防衛的內在邏輯後來也再一次複製到了我從朝陽到政大的經歷。因為政大的師長在指導我、批評社會工作教育時，常在語意之間一併牽連了乾媽和朝陽科大，或者是我只要對母校友人、師長反應我在政大過的不順遂，我時常非常惶恐有些人會反過來質

[143] 說真的，王行和成虹飛老師在我論文計畫書口試當天有很多看似溫暖的回饋，我再重聽錄音檔的過程中，其實都是刀刀見骨的面質，更翻轉了我原先最理所當然、最根深柢固的認識。

疑我不夠努力，是我程度太差比不上別人。就這樣，我內心深處的小男孩最不能被碰到的恐懼被外人碰到了，而且還是三不五時的不斷被連碰踩踏……所以，我也才必須要想盡辦法的證明這一切不是「我」的錯，也才義無反顧的背起了屬於「科大社工」的興衰血淚。

縱使，很多時候我打從心底很清楚，我其實根本沒有辦法改變些什麼，但就是因為這份恐懼，成為推動我必須死命前進、反抗的內在動力，但這卻也是我始終掙脫不了的妒恨鎖鍊，是我必須不斷追求外在認同，必須不斷發狂怒吼，卻又無法對內安頓自己的禍首。解鈴還需繫鈴人，我知道我該試著原諒我自己了。特別是當我在故事裡重新遇見自己的父母後，重構勞動家庭存在於全球化世紀下的生存處境，我知道他們沒有不愛我，就像我從沒有不愛他們；我知道我不僅僅是個「社工」，我面對的問題真的不是科大社工人的錯，我不需要再繼續背負著科大社工人的原罪了。如今，我已經遇見願意相信我的夥伴，我知道我還有許多不一樣的選擇，我看到說故事做為自我療癒和解放的力量，所以我已經沒有必要繼續責怪無能為力的自己了。而我也真的該放過心裡總是不知道該怎麼辦的小男孩，讓他能夠放心安然長大，因為我終於知道……這一切真的不是「我」的錯。

2. 壓迫與解放自我的多重糾葛：超克現代性下優越／卑劣自我的兩難與路徑

原諒無能為力的弱小自我，是我能夠走向自我解放的發端，但我想很多人應該都和我一樣，無法馬上理解或接受王行老師當下為何會特別提醒我「母親」是壓迫者的用意。承接王行老師的提醒和語意，我必須更明確的指出：「母親（勞動家庭）／乾媽（朝陽科大）」對我的協助和期待之終極指涉－望我成才－很多時候其實就是我身上最看不見且又最難面對和處理的自我壓迫／多重殖民制約，但「母親／乾媽」同時卻又是我得以安然走向解放的最大助力。因而，如何解開壓迫與解放兩者之間複雜難解的難纏糾葛，是我大步邁向自我解放前，必然要重新思考和交待的關鍵議題。

(1) 超前兩位母親的寄望與期待：被壓迫者與壓迫者模糊的差異重複？

其實，在成為一名好社工之前，成為好兒子／好學生是我最為重要的生活任

務，而這讓母親與乾媽兩者話語期望交互疊影的指涉處－勞動家庭的翻身期待與社會工作的專業地位／學術成就－亦即是我不斷努力前行、奮力追逐的目標，最終也才使得政大社工所的學位對我而言為何會變得如此重要。在這段日子裡，我就是卡死在一個看似必然為之，卻又無法閃躲的責任之中，但在努力前行和向上攀爬的過程中，我總是苦尋不著可以讓安歇自我徬徨的方式，因為我越來越沒有辦法不斷理解、忍受許多看似理所當然但實際上卻極度不合理的「潛規則」。

雖然，我想盡辦法努力適應的生活環境中各式各樣的潛規則，臉上強行堆積起自信的樂觀笑容掩飾了心裡的不安，讓我幾乎順利騙過了身邊的每一個人，讓我依然能是人們眼裡的好兒子／好學生／好社工，但心裡那道不斷隱隱作痛的傷口，卻總是騙不過自己。從一個平凡的普通人晉升至菁英知識份子之流，從專業的邊陲之地走向專業的核心處，這一路上我看到、遇見很多我無力擁有又心神嚮往的美好事物；曾經，心裡有股說不出的感嘆，但我知道那不是羨慕、也不是忌妒，因為我還是非常能夠以平常心來看待周遭的一切，提醒自己按照自己的步調前行即可，我仍然活得很自我，更慰勉著自己，我相信我有天一定會更好；可是，當我來到台北，進入政大社工所之後，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我身上沒有的、我比他人差的部份，不斷被大大小小的事件放大檢視，甚至因而被攻擊……我沒有一位好的父親、沒有好的家教和談吐、沒有好的家世背景、沒有好的學院出身、沒有好的讀書腦袋、沒有好的英文程度……我開始有點慌，但週遭的人們說我對他人的目光、評論太過敏感；接著，當我開始有些沉不住氣，想要大聲說出自己過往的光榮事蹟，證明自己不是師長口中差勁的科大社工時，人們卻又開始會說我不夠謙虛、太固執或過於張狂自大；最後，當止不住的憤怒推使著我想盡辦法要反抗時，人們對我言行舉止感到錯愕，而他們的神情、舉動更彷彿在告訴我：我是……問題學生？

不知該如何陳述、訴說的斷裂苦悶，宛若巨石壓在心裡的難言之隱總令我無所適從，而我就好像是發福後卡死在煙囪動彈不得的聖誕老人，害怕自己從此就這麼下落不明，被世人遺忘。但當我回過頭去想要向最親近的母親／乾媽傾訴，想要試著減緩自身的停不下來混亂和焦慮時，我卻又在母親和乾媽心疼神情的另一側，遇見了她們殷切的期盼。我知道母親和乾媽能夠理解、接納我身上的悶痛苦楚，但是為了實現翻身前行的宿願，為了不讓她們掛心，為讓她們感到驕傲，

為了要跨越人們莫名的惡意，為了證明自己／科大社工和贏得人們的認同，母親和乾媽還是只能不斷叮囑我必須要更小心謹慎，必須要加倍努力。我當然知道我不要太在乎別人的眼光和評價，我當然知道我要勇敢做自己，但在始終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優秀的政大社工／被賤斥的科大社工的精神錯置狀態下，體內從未消失的憤怒卻也不斷告訴我：聽從母親與乾媽的話，似乎就代表著我／科大社工向政大社工／壓迫者所屈服，我依然無法逃離高教社工優於科大社工的意識形態霸權……於是，我不由得開始有些懷疑母親和乾媽的立場，到底是站在我／被壓迫者這邊，還是站在政大社工所／壓迫者那邊？為何被壓迫者和壓迫者的身形不但相互交疊，更模糊的令人難以辨識？

(2) 邁向解放的起點與終點：始於自我，但終於他者的漫長旅程

看懂、辨識自我內在對於母親／乾媽為何同時是被壓迫者與壓迫者的交疊錯置，是我在敘說、書寫的過程中最難以面對卻也是最必須要審慎處理的核心議題之一。但有別於我對於政大社工所／高教社工／壓迫者的憤怒，我對於母親／乾媽的情緒卻是更為糾結複雜且更難以釐清辨認的。不過，隨敘說和書寫的進程，我終於逐漸能夠明白王行老師為何要特別提醒我「母親是壓迫者」的緣由：只因，母親／乾媽的存在對我而言雖然真的很重要，但王行老師的用意卻在於提示我必須更進深入的通透母親／乾媽對我的「期待」和「照顧」，其背後所依循的價值邏輯其實有很大一部份依然是壓迫者的價值邏輯，同時也是無所不在的現代性得以存續的宿主，而這往往就是存在於日常生活中一連串最隱而不見的壓迫、規訓、殖民、制約之再現。所以，惟有真正看懂母親／乾媽對於我的影響，我接下來才有可能重新面對自己，找到自我解放的出路，成為僅僅只是的自己。

總結前述的討論，在這一篇論文裡，為了實踐自我的解放，我認為返身覺察自我遭受殖民壓迫的現況，通達自我意識覺醒是絕對必要的先決條件，但在理解母親／乾媽對於我的影響後，卻又讓我深刻領悟只有自我的意識覺醒的解放依然不足以讓我邁向真正的解放。事實上，許多後殖民／去殖民研究的解放論述（如陳光興、Fanon、Said、Memmi、Nandy 等人）都曾不約而同的指出人們通往解放的真實路徑，必然始於自我意識的覺醒，但卻必須要終於他者／壓迫者／殖民者／上位者。所謂的反壓迫／去殖民，其實就是整個社會都必須要一同對話、思

考、前進、覺醒，然後一同動身力圖實踐改變得政治革命。所以，懷著成就真實自我的想望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意識覺醒後的被殖民／壓迫者必須不斷嘗試來回於諸多的他者凝視與成就真實自我的想望之間，努力逐一理解人我之間多如牛毛的差別歧異，不厭其煩促成自我／被壓迫者／被殖民者／下位者與他者／壓迫者／殖民者／上位者的對話與和解，改善人我之間的關係。也惟有從雙方最矛盾的人我差異中，抽絲剝繭的找到雙方的共同點，未來才有機會讓解放自我的意識覺醒不再僅僅只是自我／被壓迫者／被殖民者／下位者所擁有的解放，同時也將會成為壓迫者／殖民者／上位者所擁有的解放，進而促成整個社會共享的政治資產。那麼，人們對於僅僅只是自己的解放期待，有天必然會發生。我知道，我已經得到它了，也正走在這條邁向解放的道路上。

貳、師徒的傳承與對話：從他者走向自我的生命／理論旅行

除了在謝誌之外，我想大概很少研究生會在論文內大量紀錄、交待自己與指導教授的關係。不過，就好像老王曾經對我們學生輩分享他姐姐成為身心障礙者的家庭經驗[144]，Foucault 對他思路的影響，以及建制民族誌創始人 Dorothy Smith 對於他在知識研究／社會實踐上的理念傳承，都讓我更加知曉明白老王為何會是今天我所遇見的老王。據此，完成這一篇論文，以及我這一位菜鳥知識份子的生成經過，師徒的對手、傳承是十分重要的一環，所以交待老王與我的師徒關係，讓讀者們深入瞭解老王對我敘說、書寫這篇論文的影響，以及老王協助我寫出這一篇論文的解放意義，即是「完整解放」我從高雄、台中到台北，從朝陽到政大的斷裂經驗，最終能夠順利走向真實自我的最後一段生命／理論旅程。

一、師徒立場的差異分歧：勾勒 Foucault 與 Fanon 的實踐衝突

如果要我形容被老王指導論文的經驗，那我一定會說老王是個非常堅持要學生清楚交待自我的指導教授。此外，老王在指導我的過程中，他最常提醒我又最讓我不能明白的一句話是：「你的經驗對於台灣的社會工作很重要……但我很擔心我的提示和指導會擠壓了你的經驗。」

[144] 老王曾在課堂上分享，他是因為姐姐出車禍變成身心障礙者，瞭解到台灣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家庭是多麼的不友善後，才讓他從台大機械系畢業後，轉而決定成為一名社工。

其實，我論文一度寫的很辛苦的部份原因，肇因於我在辨識研究問題和確認研究問題意識的初期，我有時候會覺得老王與我之間似乎有道難以言喻的鴻溝：老王雖然能夠無條件的傾聽、接納我的主觀經驗，但從我平日跟老王的相處和對話中，我卻又隱約感受到我似乎無法讓老王順利瞭解我／科大社工對於政大社工所／高教社工的憤怒，致使我們在研究議題上遲遲無法達成某種共識。所以，在我論文寫作的期間，我不斷遭遇到的難題就是我要想辦法讓老王瞭解我的憤怒，也就是我必須要想辦法把我／科大社工的憤怒給說清楚（畢竟，如果我連指導教授這關都過不了，無法讓將自己的憤怒正當化，我未來又將如何面對口委和眾多的讀者的質疑和挑戰）。因此，我除了要更清楚的交待自己／科大社工的憤怒感究竟是由何而來之外，我同時勢必還要不斷試著釐清老王為什麼不懂我／科大社工人的憤怒？又為什麼老王說他可能會壓迫我？

為此，我卡這個問題好長一段時間，直至後來隨著與老王在日常生活的相處，以及在逐漸積累敘說、書寫自我的返身覺察，我才慢慢發現老王並不是不懂我／科大社工的憤怒，或不願直接給我明確的提示和答案，而是我與老王處在社會工作專業體制之經驗和位置上的先天差異（老王是留學加拿大的海歸博士／教授，但我是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學生），某種程度早已決定了老王努力實踐的是他作為帝國的知識份子／上位者對於台灣社會工作知識／權力結構的返身自省（可閱王增勇，2004），反之我／科大社工／下位者的任務卻是必須更深刻的敘寫、超克作為被殖民／壓迫者的自我慾望，也就是帝國臣民們被殖民母國深層制約而又不自知的精神狀態和意識結構。

因而，老王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靜靜的等待，等待著我願意回頭梳理自己，等待著我藉著習取 Foucault 的知識理路後，慢慢重新看懂知識／權力既是孿生又為互證的依存關係，進而透析我／科大社工的主體被迫成為客體的歷程和辨識自我主體的原始形貌。但在同一時刻，我還遇見了另一位幫助我更加深入看懂自身問題的救命恩人：Fanon。相對 Foucault 對於知識／權力的解構，Fanon 在《大地上的受苦者》（楊碧川，2009）裡聲嘶力竭的暴力怒吼，就如一股神祕的力量在冥冥之中不斷召喚著我，撫慰了我那徬徨不安的憤怒心靈。我知道，就是 Fanon 了，他不但引領我更深刻的重新認識了自我內在的慾望與憤怒，更讓我頓悟了該如何說清楚我與老王之間那道無法輕易訴諸言語的師徒鴻溝：我遇見 Fanon 後才

逐漸明白，老王／Foucault 雖然協助我確認了自我／多元主體的存在，但這還是無法止息我內心深處源源不絕的憤怒，因為我／科大社工所代表的多元主體，依然還是被排除於在台灣社會工作的主體歷史之外，也就是僅以高教社工為主體的純化壓迫，只要是繼續處在此種專業意識形態之下，我／科大社工將永遠不會是自己／社工。不過，相較於我對前者的不滿足，Fanon 卻完全順應了我渴望回歸自我的慾望和無處可以宣洩的憤怒，不斷呼籲、鼓吹我／科大社工等多元主體接下來不但要徹底顛覆壓制台灣社會工作多元主體的普同性，突顯個人／多元主體的正當性，甚至還必須想辦法更進一步的斷然覺悟台灣社會工作的主體歷史，也就是要起身擺脫美式社會工作專業的現代性／帝國殖民。

二、成就 Foucault 與 Fanon 的循環辯證互補：超克現代性下的自我意識

但就在我不顧一切的訴諸反抗，藉著憤怒的情緒鞏固、確認自我／科大社工的多元主體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老王又不厭其煩的回過頭來提醒我要試著諒解與我／被殖民者／被壓迫者相反的對立主體經驗（如我與乾媽或政大社工所的關係……特別是我對於高醫醫社系陳武宗教授的批判，而我印象很深刻的原因是我論文在這裡被老王退稿很多次……老王堅持要我重新正視陳武宗教授對於社會工作教育的憂慮），再次試著解放自我埋藏在內心最深層的憤怒（父母與我的生命糾結），也惟有如此，我有天才得以順利原諒自己。

於是，Foucault 對於知識／權力的解構再一次的派上用場，不過這一次分析、解構的主要對象不只是我自己，同時還包含了殖民者／壓迫者，只因我同樣要幫助他們解放自我。所以，我的故事／論文幾乎可說就是一個不斷從個人到集體再到社會，再從社會回到集體和個人，然後再由個人、集體到社會……的辯證循環，也就是我的敘說、書寫的理路亦即是 Foucault 與 Fanon 對於「現代性」的循環辯證互補。

老王與我的相遇，或許是緣分，或許意外，或許是某種歷史的必然。或者，這一篇論文，其實就是一位留洋海歸的政大教授與一位無法肯定確認自己是誰的科大社工在意識層次上不斷生死相搏的辯證實錄，同時也是 Foucault 與 Fanon 兩人穿越地理時空的經驗再現，更是足以顛覆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無所不在的現代

性想望，大步邁向後／去殖民領域的新篇章。花費了將近五年的時間，我終於了悟，面對台灣社會工作優越的現代性指涉，卑下主體的反抗是必然發生的，但在反抗的過程中，同時也不能遺忘重新認識對立的主體形貌，然後繼續尋找、創造雙方和解的新可能，進而不讓自己變成下一個「殖民主／壓迫者」。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已無負師傅所託，真正領悟了除了對立衝突與無視逃避的二元抉擇之外，我永遠擁有許多有別於以往的「選擇」：我可以勇敢做自己，可以促進差異主體的對話，可以試著創造對立主體的和解契機，我終於徹底超克了優劣／好壞的現代性結構。是故，現在的「我」，已不再是過去的我，也不再是他者所定義的我。而陸續經歷眾多差異、矛盾、斷裂後的我，也已經不僅僅是原來的我，所以我可以僅僅只是我自己。就是這麼的簡單！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七章 結論：成為真正的「人」

Said：「我……堅決主張知識分子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不能只是化約為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只是從事自己那一行的能幹成員。我認為……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而這個角色也有尖銳的一面，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非產生)正統和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迫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單德興譯，2011：96-97)。

話說我動筆書寫完成第七章結論的原因，只是有天一覺醒來時，我發現我已經知道該如何看懂我身上的問題和安頓自己，也真的想畢業離開政大社工所了；另外，想到老王最常在課堂上引述 Foucault 的一段話：「寫作是為了改變自己。為了不再和以前一樣思考同樣的事情」。我想，我確實做到這件事情了，而且我似乎也該空出平日念書的時間出來做些其他的事情，譬如：我想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行動實踐者一同為共同的目標行動，又或者是……我該回家了，也真的該慢慢跟我的論文說再見了。回首從朝陽到政大的點點滴滴，以及敘說、書寫這一篇論文的歷程，還有從在政大遇見老王的那一天起，我總共花了將近乎二年多的時間，一次又一次的來回穿梭在自己三十年的生命中，用盡全身的力氣去尋求我寫不出論文的原因，竭盡所能的去重新認識、詮釋、超越自我多層斷裂的生命經驗，同時也為和我承受相同問題和痛苦的社群夥伴標示了一條得以走向自我解放的道路，我認為這就是我通篇研究最大的貢獻。此刻，我為自己長期以來屹立不搖的堅持到無比的自豪和驕傲，我證明了我自己對於社會工作的價值信念沒有錯，而我接下來該做的是回到現實的生活中，親身實踐我在這一篇研究裡的發現，這對我而言才是引渡自我／科大社工人／社群集體真正走向集體解放的發端。至於，如何處理現存於台灣社會工作專業體制內的衝突對立，還有解開一堆與台灣社會／歷史糾纏不清又複雜難解的死結……姑且留著以後有機會慢慢「再說」吧。

第一節　書寫自我的生命解放：橫跨兩代「賭徒」的共振參照

在討論社會工作專業之前，形成此篇論文的基底，在於「我」背負的獨子宿命／勞動家庭的沉淪，也就是說，這一篇論文的起點，完成始自於我／科大社工鼓起勇氣回頭面對自我勞動家庭的出身。但面對勞動家庭的出身，即是要回過頭去面對存在於勞動家庭內部的諸多衝突，也就是要同時面對父親與母親，面對形構家庭的社會／歷史，面對自我主體最真實、也最無法藏匿的自我期待：勞動主體面臨下沉危機時，對於階級翻身的上升慾望。因而，我的論文就是忠實記錄資本不足的勞動主體，如何不斷以身為度，透過返身看見自己的家庭／父母，重新形塑全球化下勞動主體該如何反「客」為「主」，未來又將何去何從的政治批判行動。

壹、重唱成王敗寇的父子樂章：「像」與「不像」之間的互相看見

長期以來，「像父親」一直是我最根深柢固的夢魘，所以我想盡辦法不斷努力讓自己「不像父親」。不過，在敘說、書寫自我的過程中，我卻又多次發現，我真的完全「不像父親」，因為我擁有許多許多父親所沒有的，而且我在眾人眼中比起父親總是來的更加閃耀奪目；可是，當我接著發現我從朝陽到政大，卡在放棄與不放棄碩士學位的斷裂經驗，其實也就與當初父親不斷出國／回國，苦苦渴求成功歸來卻始終無法順利如願，最後只能沉溺酒鄉與方城牌桌的心境如出一轍。就這樣，當我開始能夠看懂自己卡在朝陽與政大間的恐懼和悲傷時，我竟然也開始長出能夠擺脫來自於父親的陰影，開始知道我究竟該如何重新看懂父親卡死在成功與失敗間的失落和遺憾。而這一切就好像成虹飛老師在看完我論文初稿後回饋我說：「你真的完全不像你父親……但認真說起來，你又真的跟你父親好像……真的好像好像。」聽到成虹飛老師感性的回饋，我才又意識到原來在我和父親兩代之間的「像」與「不像」裡，其實同樣蘊含著極其豐富的社會／歷史意義：我與父親的故事，其實就是兩個世代的男性為了家庭賭上自身一切的故事，因為兩個男人即使相隔了快三十多年的時光，處在大異其趣的生活環境裡，卻依然編織同樣的夢，想要讓一家人過著更好的夢，而其中的最最最微小的差別僅僅就只是其中的一個運氣好成功了，另一個則是時運不濟失敗了。然而，結果雖然不同，但愛家的「心」卻是一樣的。也就在這裡，我如實改寫了我與父親的

故事，甩脫了因為因父親而加諸於我身的陰影。我知道，我已經能夠毫無保留的原諒父親，也真的能夠放下我害怕自己無法成才的深層恐懼了。

貳、再探父母子三人的交錯共賭：發現自己不僅僅只有一種選擇

「賭」，大概是最能代表我們一家人的行動哲學；「賭徒」相對則是我們一家人為了實現階級翻身所選擇的實踐身份。但在敘說、書寫自我的故事後，我最大的發現就是我們這一家的人的「賭」，幾乎都呈現出某一種共同和相似的經驗：無論是父親、母親或是我，我們一直都以為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所以我們只能孤注一擲的拼下去。譬如，就好像是父親多次前往國外企圖實現的掏金夢、母親把全部的資源和期待都灌注在我身上，亦或是我以為念了國立大學研究所才會比較專業(或有出息)，既有的社會價值、常態邏輯往往很容易讓我們以為僅僅只有一種選擇，但卻過度忽略了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資本」投入眼前的這項選擇，所以相對缺乏資源的我們／勞動階級在面對實現選擇的重重阻礙時，非常容易陷入是否要「賭」一把的精神狀態，更使得我們永遠難以擺脫「賭徒」的輪迴與糾葛。

我無法否認，很多時候人生即是賭局，賭局亦即是人生，因為許許多多的抉擇機會大都只在一念之間，甚至稍縱即逝，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斷要面對的人生課題。可是，這並不代表著我們無法擁有許許多多的選擇。從前的我，真的一直以為人生在面對問題時通常只有「對」與「錯」、「做」與「不做」，以及「前進」、「停止」、「後退」……等選擇，我以為我所知道的選擇就是最好的，但當我敘說、書寫完自己的生命故事後，我才發現我身上其實有存在著許多其他更是和我的「選擇」。就好像是在論文計畫書口試時，王行老師就非常犀利的面質我說：「朝陽社工系畢業就沒有辦法當社工？以後就無法照顧好你父母嗎？」王行老師的提問直接衝擊了我原先最根深柢固的自我意識：「我需要國立研究所的學歷，因為擁有好的學歷才能找到好工作，而有好的工作以後才能照顧父母。」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我才逐漸明白王行老師的目的就是在提醒我，我原先以為的選擇只是「眾多選擇中的其中一種選擇」，所以我要開始試著去重新發現存在於我身上的其他選擇。

說來奇妙，發現自己其實擁有許多選擇後的世界是不一樣的。雖然我仍必須要遭遇相同的問題和挑戰，但當日常生活裡的「必須」、「應該」、「理所當然」慢慢變少了，令我苦不堪言的壓力也隨之淡化了，因為我知道我有不一定要這麼做，我還有其他更適合我的問題解決方法。於是，當以為自己沒有退路的「賭／賭徒」困境逐漸被釋放，當我開始能夠發現身上越來越多的可能性和創造性，我知道縱使有些時候為了生活難免要「賭」一把，但現在的我終於可以不再需要害怕自己總是個不斷孤注一擲的「賭徒」。最後，我終於可以不僅僅只是個「賭徒」。

參、全球化下勞動主體政治的再思量：不是國民黨、也不是民進黨的新選擇？

循著解放被殖民／被壓迫主體的獨立軌跡，最後必然還要涉及一連串的政治行動。特別是當我看見我的父親作為台灣政治經濟體制下的失敗／被排除的勞動者，以及在父親對於阿扁／台獨的信仰中，隱約發現父親迄今仍深信不疑的「台灣獨立」和「拼經濟」似乎只是一個交互強化的假議題，但這個假議題卻也徹底綁架了許多和父親一樣的勞動者。只因，我在敘說、書寫父親的故事時，遇見了父親深藏心靈深處的上升慾望：階級翻身的渴望，還有讓家庭過好日子的願望。

其實，我猜想父親應該是知道的答案的，不過這卻是個只能放在心裡，永遠不能主動說出口的答案。遊歷南美諸國的經驗讓我們一家人都很清楚「台灣／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劣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出、入關有時候會被找麻煩……或會被懷疑是中國的偷渡客)，可是在諸多的劣勢(先進國家／白人的歧視)背後卻還有著一個非常矛盾的弔詭處：就好像是國外機場的國境管理處，經濟狀況普通的台灣人拿著會中華民國的護照，但屬於中上、甚至資產階級的台灣人卻會拿起美國護照。我記得，父親和母親為此就曾對年紀還很小的我說過：「**等我們賺到錢，我們也可以當美國人，也可以拿美國護照，到時我們去那一國都不會被人家找麻煩。**」在這裡，所謂國族／民族的強弱，基本上與學院階序高低好壞的假議題相同，本質都是一連串經濟資本的轉換；再者，近來所謂的「拼經濟」，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都是拼到失業率越來越高，物價越來越貴，存摺裡的數字越來越小……即便 GDP 高漲又如何、股市狂飆又如何，當經濟成長的果實中下階級的勞動家庭無法實際受惠，政客口中的「拼經濟」最終都只是在「拼『資產階級』的經濟」。

換言之，我的父親／失落在全球化時代下的台灣勞動者，就是卡死在這麼一個經由政治、經濟交互糾結、制約的意識結構中，然後不斷被高舉著國族／民族大旗(不論是台灣獨立或兩岸統一)的資產階級恐嚇、挾持而又無法脫身。更可悲和無奈的是，人們的身體即使早已領悟了問題的真相，但智識的理性卻絲毫不容許人們自行拆穿這個能夠暫時慰勉、安頓自我心靈的政治、經濟神話。因為，拆穿這個「只有統獨與沒有左右」的政治、經濟神話，後果很有可能就必須面對無一是處又一無所有的自己。也就是在這裡，我再一次看見了父親說不出口的悲傷，看見了存在於台灣中下階級勞動者自我意識最深層的哀慟，看見了全球化下勞動主體渴望翻身卻又無所依歸的上升慾望。

如果說，政治即是眾人之事，那麼協助父親／眾多勞動者發聲，幫助他們能夠放過自己的「政黨」在那裡呢？就現況而言，我認為答案不是國民黨，也不是民進黨，而是目前尚未出世的政黨。只是，望見錯綜複雜的世局，面對暫時無解的一切，我彷彿還是聽見 Fanon 對於被殖民者／被壓迫者的沉痛的吶喊和嘆息：我們／第三世界的台灣……依然未能走出帝國殖民的現代性陰影，依然鄉愿等待著不知何年何月才得以現世，才得以解放自我／勞動主體的奇蹟和救世主。超克佇立在眼前的殖民壓迫，似乎還是一場永久的革命。

第二節　不僅僅是社工的多重可能：成為像「蟑螂」的社工

認真說起來，大家現在看到的文本和我原訂的論文口試計畫書和研究方向有著很大的差異。在 2012 年一月論文口試結束後，我大概額外又花了兩個多月改寫了我的研究動機，暫時拿掉了原有的文獻探討，重新擬訂和編排說故事／研究的架構[145]，並將原先的論文題目由最初的「我在政大寫不出社會工作碩士論文的日子」到老王為了幫我從政大社工所的反對中解套而定名的「書寫作為自我解放的途徑：探究台灣社工教育的階級關係」再重新修訂為「從一位寫不出論文的研究生說起：逆探沒有我／科大社工的社會工作專業」[146]（不過，在論文畢業資格考後，為更貼近「去殖民」的意境，論文題目最後在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的建議

[145] 這部份我真的必須要特別明文感謝大學學長莊凱翔，在我卡住的過程中，他花了很多時間和我討論和分享他當初書寫自我敘事論文的經驗，協助我度過難關。
[146] 中間斷斷續續的其實還編修過數十個題目，但礙於篇幅，我就不一一贅述。

下最後定稿為「從一位寫不出論文的研究生說起：逆寫社會工作專業帝國」）。

在這段寫論文的過程中，我有許許多多的小動作是當初連老王和許多朋友都覺得我有點莫名其妙，最後更是讓我幾乎多花了快半年的時間才完成論文初稿（另外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我從個體走向集體經驗的連結過程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因為我一直逃避面對我對於政大社工所有很深的怨念，我很擔心放下自己對於政大的憤怒之後，就必須承認自我／科大社工的低劣卑下）。當然，我很清楚這個行為徹底違反想要趕快畢業的期待，但如果真要我說出個理由，撇除受太多悶氣以致我始終想要正面挑戰政大社工所師長代表的主流專業論述，翻轉實證典範的知識霸權之外，我主要是想以一種不逃不躲又不壓抑的姿態，還有誠實坦然的態度，逐步清楚記錄、呈現我尋找答案和面對自己但卻跌跌撞撞的歷程；我覺得這是重要的，雖然這個過程真的不輕鬆，真的很辛苦，有點幼稚，有點莫名的偏執，有點自找麻煩，也有點違背既定的研究規則，但這就是我活生生的研究歷程，被我寫進論文裡的每一件事情對我來說都是重要的，有意義的。我相信大概很少有社會工作的碩士論文可以這麼「露骨」記錄和呈現研究生書寫論文的生活世界和思路轉化進程，再配合陳述我很特殊的專業社會化經歷……我想，我已經有盡我所能完成了一篇還不太完美，但我有自信我的論文絕對會是一篇十分生動又非常貼近「勞動家庭的獨生子／科大社工／政大社工所研究生」的碩士論文。

壹、邁向解放的漫漫長路：面對知識困境的自我民族誌

停滯／卡住，是我在敘說、書寫故事／研究來回探究自我和社會／歷史時最常面臨的難題，特別是我常常不知不覺的猶疑在諸如好／壞的獨生子、好／壞的學生、好／壞的學校、好／壞的社工、好／壞的論文等難題之間。但也因為我不斷費盡心力想要追求「好」的和遠離「壞」的斷裂拉扯，終使得疲憊不堪的我時常會不斷陷入一種進退維谷又動彈不得的尷尬窘境。對此，我想我最終尋得的解放，或許就是找到一個能夠重新感受自己，一個能讓自己覺得「恰如其份」的存在位置。而這一篇記錄拋棄過往的舊思維，重新尋找適合自己位置的自我民族誌，也就是我從寫不出論文到寫出論文的過程：我用「我」生產了屬於我／科大社工和能夠感動人的故事／知識。

一、故事的召喚／感動：帝國臣民的現身與覺醒

碩士班念五年的最大收穫，大概就是我常有機會可以「完整」看完許多比我早一步離開學院的夥伴們寫論文的轉變過程;有些時候,我很羨慕找對指導教授、選對研究議題，能夠從一而終早早畢業的夥伴；有些時候，我很開心能和志同道合的夥伴你來我往討論著感興趣的研究主題，即使我完全不熟悉該領域；但更多時候，我很同情、心疼和我一樣寫論文寫到已經失去求知熱情，滿腦子只剩下趕快畢業的研究生夥伴。我並不是想要批評、比較指導教授應該如何，或是評論人們的論文寫的好或不好，而是感嘆看似口口聲聲訴求追尋真理的「論文」，終究也不過是研究生不斷與各方角力，以及經由研究生自我主體在一連串抉擇、行動及妥協下的政治產物。

雖然，我無法否認拿到「畢業證書」這件事真的非常重要，不過我敘說、書寫這篇論文的目的絕不單只是為了擺脫論文書寫壓力、畢業領取學位證明的自我解放，我始終有很大一部份的理由和用意在於：我特殊的經歷、身份及位置讓我得以清楚看見人們在受苦，看見社會所謂的不公平，看見普遍存在於社工人之間卻又尚未被明顯覺察的惡意和扭曲。因而，我一直很想大聲說些什麼，轟轟烈烈的做些什麼，但我一個人實在無法承擔和處理所有的錯誤與罪咎，或是扭轉改變普遍存存在人們生活中的偏見和歧視，所以我只能選擇以「我」的生命故事為賭局，用「我」的多重身份作為與社會工作專業帝國對賭博弈的翻盤籌碼，期盼從中召喚出更多、更多、更多能夠相互理解的夥伴，並期盼透過「我」的生命故事，對內得以是結束自我罪咎的輪迴循環，對外則是尋求社群夥伴與謀求共同行動的可能。

就如後山某一次看完我的文本後，很嚴肅且慎重的對我說了一句:「對不起」。他說要不是因為我願意獻身道破這件人們總是看似理所當然的事情，畢業於輔大社工系的他，就不會有機會認真思索、反省自己／高教社工過往未經思索就看不起或輕視「科大社工」不專業的印象／認知後的意識形態（也就是人們還未深刻覺察的深度自我殖民）。因此，就現實層面來看，我一時之間或許難以撼動整個被美式社會工作專業帝國殖民的專業意識形態，有效改變台灣社會工作社群集體的衝突關係，但後山簡單的一句「對不起」，還有在我敘說、書寫的過程中，許

多願意和我／科大社工對話的「高教社工」，以及開始願意試著站出來發聲的「科大社工」與擁有不同專業身份的社群夥伴，卻也讓我願意試著相信、期待助人工作社群內部的和解、共生及分工是可能實現的未來。縱使既有的專業體制是如此的不友善，縱使某些既得利益的掌權者仍不願意改變立場，縱使某些錯誤依然在延續，但那怕就只是一點點也好，我由衷希望我的論文能夠感動更多的人，並讓更多來自不同社會／歷史位置的助人工作者能夠暫時放下成見，開始願意看見、認識彼此，進而攜手合作……所以，就讓我們以「認識自己／彼此」為起點，期待我們能夠一同攜手改變台灣的社會工作，重新建構屬於我們的「專業」吧！

二、敘說、書寫自我民族誌的掙脫與轉折：記述一段走向真實自我的旅程

敘說、書寫這一篇論文過程中遭遇的最大麻煩，無疑是我一直不知道我最主要的問題意識是什麼，或者是說，我的問題意識不斷隨著敘說、書寫的歷程一直在改變。就過往養成的研究習慣來說，這著實令人有些不安，因為這讓我沒有辦法很明確的說出我的終點或是答案大概在那裡，更使得我一度受到所上師長的許多質疑，以及承受諸多莫名的委屈和壓力。但我真的想說，我比誰都還要認真看待這一篇論文，比誰都還要認真、不顧一切的想要追尋問題的真相。

縱使我曾經跟大多數的研究生一樣，遇到問題時，最直覺的反應大概就是透過文獻來界定自身所欲探究的問題。而我為了探索科大社工的問題，也真的徹底把圖書館和網路上相關文獻都翻過一次，但這卻也讓我不斷陷入一種越念越慌的狀態，因為我在文獻裡一直找不到不被賤斥、責難的自己／科大社工。當時的我不知不覺的不斷死命撞上高教社工比科大社工優越的意識形態（蕭信斌，2006）。坦白說，在還沒遇到老王，還未開始敘說、書寫自己的故事之前，我並沒有注意到這是個虛假意識的陷阱，同時也讓我一直不知道該如何下筆怎麼寫論文，特別是在「常態／客觀」的概念下，透過科學理性的評比檢測，十分熟知基礎統計分析方法的我很清楚的意識到科大社工在各方面很難有贏面，這不由得讓我更加沮喪。

這種情況後來一直要到我偶然覺察到老王總是很堅持要我回答的問題，往往不是文獻寫了什麼說了什麼，而是我親身的經驗是什麼，還有我究竟是帶著什麼

樣的「前見」來看待我自己的問題，這是老王指導我論文的核心關懷，同時也使得我面臨了我生命／研究一次的轉折，也就是我問題意識從外而內的轉向（第一、二章）。為此，我實際改以「我」為論文研究問題意識的核心，並選取自我民族誌為研究方法，重新回答「我」為什麼寫不出論文。於是，我開始說我自己／家庭的生命故事（第三章），說我如何成為「社工」的經過，以及我莫名卡在朝陽與政大之間的故事（第四章）。就這樣，隨著故事的進行，除了更加認識自己之外，我開始也陸續遇到了聽得懂我在說什麼或有過和我相似經驗的夥伴，並透過彼此經驗的連結共構和交互啟發，我慢慢有能力揭露人們習慣視而不見的生活世界，以及看懂我們平日習以為常、看不見又摸不著的規訓權力。透過返身覺察自我主觀的過程，我清楚看見了我與他者的異同，也讓我認清、掌握了延續、強化人我異同的社會秩序／體制，而這也就是一個自我意識覺醒的過程。緊接著，在促成自我意識覺醒之後，我仍積極的持續透過檢視社會工作相關的社會／歷史文獻，企圖重新跟既有的客觀現實對話，並依序指出其矛盾和弔詭的地方，以及試圖重新尋找自我的主體定位（第五章）。但很可惜的是，我後來還是失敗了。經過一連串的探索，我依然在台灣的社會工作專業裡找不到自己／科大社工，我依然滿懷著說不清和數不盡的憤怒，不過這一次卻也讓我確定了我為什麼寫不出論文，因為我發現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化、專精化所預設、期待的主體鏡像，到頭來其實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社工」（也就是後山／輔大社工系畢業生／高教社工說自己未來將不是社工的事件）。

換言之，我寫不出論文的問題成因，除了要深究我／科大社工與高教社工的衝突經驗之外，同時還必須將兩者的衝突重新置入台灣社會工作專業深受美式社會工作專業殖民的社會／歷史脈絡，看破我國的社會工作專業體制得以被少數知識份子持續以「美式社會工作專業」的「買辦」之姿，假菁英學院的「高教社工」為主體的建制趨勢，還有我國的社會工作研究大多輕忽、壓縮了本土的專業社會化歷程和多元的助人實踐經驗等諸多要素，最終才得以完整描繪出我寫不出論文的問題全貌（如下頁圖 7-1）。緊接著，當我能夠通透我／科大社工「存而不在」的斷裂困境後，我確定台灣既有的社會工作專業不符我從事助人工作的初衷，我企圖想要重新成為表裡如一又恰如其份的自己／科大社工，所以我決定要重新喜歡自己和相信自己。因而，我轉而又回過頭來貼近自我的生命經驗，重新探索、梳爬我認為的好兒子／好學生／好社工之間的人我關係是什麼（第六章）。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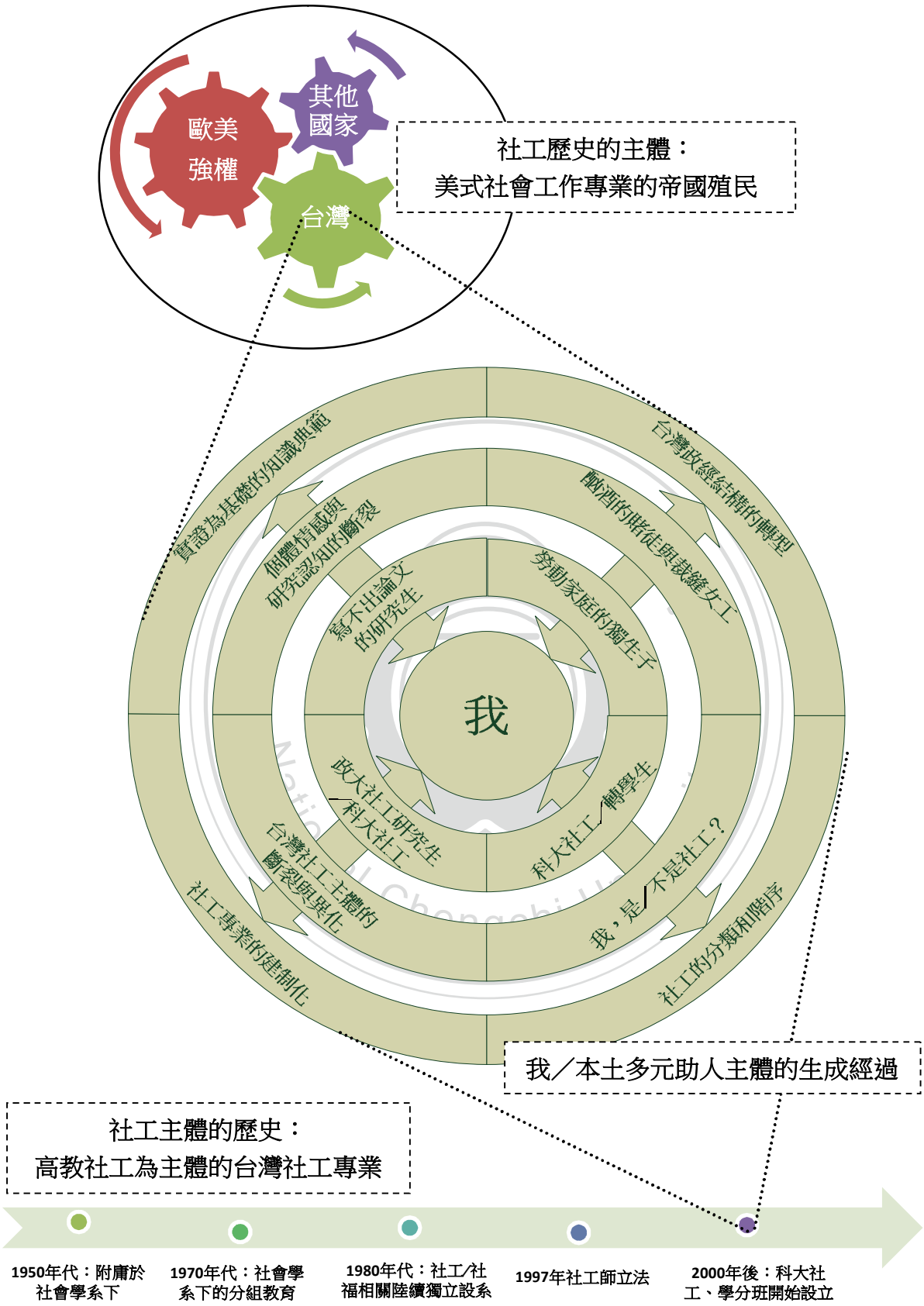

圖 7-1：我寫不出論文的問題全貌

在透過與母親的對談，回顧朝陽社工系的師長們、乾媽對我的教導和恩情，重寫我對政大社工所的認識，以及老王對於我的指導後，我終於逐漸能夠從他者的錯認和凝視中掙脫，並重新看見自己，循序漸進的找回了自己從事助人工作的初衷和感動、緩緩的走出禁錮真實自我許久的妒恨牢籠，而我也才又能夠重新成為表裡如一又恰如其份的自己／科大社工。也就是在這瞬間，我知道我超越了所有的他者，我終於感受到最真實的自我回來了。

三、學習、實踐自我去殖民：從他者的凝視中找回自我的多重可能

回顧這一篇論文最讓人寫不出來又最累人的部份，我認為應該是我常要處理在敘說、書寫過程中不斷跑出來的情緒反應。誠如老王有好幾次非常嚴肅的提醒我：「當你能平心靜氣的交待你在政大社工所的衝突經驗時，你才能夠畢業」（老王會這麼說的原因，是因為我每次在團體討論時間，只要談及我在政大社工所的經歷，我很常會不由自主的失控暴怒）。就因為要面對自己真實又容易失控的情緒，所以長時間的「停滯／卡住」和反覆的「修改標題」、「修正詮釋」時出現的矛盾和抗拒感，一直是我敘說、書寫過程中最常要花時間面對、克服的難題。但我後來也慢慢覺察到，我陷入此種狀態的主要時間點，絕大多數都是發生在我企圖重新理解、詮釋自身最不愉快或最不願意面對的衝突／苦難經驗(譬如，重新詮釋有關於父親、家庭或科大社工在政大社工所的衝突經驗，相較之下，單純描述、交待自我的衝突／苦難似乎比較簡單一些)。所以，為了脫離上述的困境，我時常必需要多方嘗試各式各樣的方法，例如，尋找有相同／對立經驗的受訪者對話[147]，或大量閱讀後殖民主義的相關文獻，協助自己多方面的思考，來回轉換自己敘說的立場和位置，以及稍微停頓、慢下前行的腳步，更深刻的感受自己糾結複雜的情緒[148]。而這一連串不斷積極想要為衝突／苦難情緒尋找新出路與新可能的嘗試和掙扎，我認為就是陳光興(2006：175-176)所追求的「去殖民」：

[147] 我一開始大多是先找有相同經驗的人對話，而這一直要到我比較能夠掌握集體經驗和問題的社會／歷史成因後，我才會接著尋找有對立經驗的人們對話，因為我這時候已經比較有能力判別出彼此社會位置的差異對於自身經驗可能帶來的影響，而這也使得我的看待、理解問題的面向得以更加多元。

[148] 關於這個部份，我想要特別提起和感謝的是：對於我自己同時是朝陽／科大社工和政大／高教社工的認同錯亂，有位性別認同是 T 的政大學妹幫了我很大的忙(我常說她是我目前遇過最自在的女同志)。因為平時與她相處，以及閱讀她身為女同經驗的書寫，讓我在她身上領悟和學習到許多如何調適自我認同的方法。我常在想，這或許大概可以被稱為是某種非主流群體成員間的弱勢互助吧？

「如果我們追隨 Fanon 所開啟的問題，將『殖民』的概念擴大解釋，把結構性宰制權力關係都視為去殖民的對象，那麼去殖民將是永久的過程，不同的抗爭主體位置也會有不同的關切。另一方面，無論任何位置的主體而言，去殖民的意義不可能在於『回歸』狹義的殖民時期之前 找回不受『汙染』的過去，這不僅是在美化被殖民者過去的一切，也暗示著去殖民主體本身能夠超越殖民史的銘刻，然而，去殖民的意義不在於找尋『純種」、『純粹』的主體性，而是在於『祛除』殖民主義過程中所強加的保守因子及單一性、層次化的思考架構，在於『解除』於歷史遭遇、碰撞過程中的反動情結……在全盤否定與全盤接受之間，存在著多重的可能性，去殖民就是在夾縫中揚棄僵硬的軸線，尋找新的連結點，開發新的空間……研究／論述本身要能夠成為去殖民的力量，必須透過不斷的反思、檢討，不斷地自我去殖民」。

在理論層次上，去殖民必然是暴力且痛苦的，它需要被殖民者透過高度的自我覺察，並在精神、文化、政治以及經濟的總體層次上，反思、處理自身與殖民者之間（新）的歷史關係(陳光興，2006：6)。若要更簡單一點的解釋我以自我民族誌進行自我去殖民的成果，那大概就是寫完成篇論文後，我不會再輕易地認為自己是別人眼睛裡、嘴巴中那糟糕的「我」了。因為我已經能夠從「別人看我」回到「我看我」，就算我真的有一些地方是比不上他人的不完美，但這些不完美並不是「我」生命的全部，它僅僅只是一小部份，更重要的是我身上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優點，而且這些不完美說不定能在某些特定情況下能對我有所助益，那不完美不就不僅僅是不完美了嗎？因而，我又從「我看我」走向「我們看我」的位置。如今，通達論述弔詭處的我，開始知道別人在想什麼，而我又該如何自在面對、處理人們來自四面八方的凝視，我逐漸能夠帶著嶄新的主體意識，悠然的遊走在各種不同的論述之間，並適時的反省自己和為弱勢的他者發聲倡議，所以我最後才能夠「僅僅只是」我自己。

雖然，我最初很單純的只是想要找回「僅僅只是」的「自我」，但在敘說、書寫自己的過程中，從我寫不出論文的斷裂作為回首過去的起點，然後透過理解過去，回頭重新改寫、再造寫不出論文的斷裂的過程，也就是當我真的能夠擁抱不堪回首的「過去」時，我才能夠好好重新活在「當下」，重說「我」寫不出論文的真正意義，更讓我能夠一點一點的通透、親身體現了諸多有關於第三世界去

殖民論述中「不僅僅是」的多重可能，脫離了他者帶有優勢和支配性的錯認和凝視，慢慢找回全新的自我。我想，現在的我終於不僅僅是個寫不出論文的研究生，我還是勞動家庭的獨生子、科大社工的轉學生，政大社工所裡的科大社工。我重新認識了諸多「不僅僅是」的「我」，所以我終於又重新能夠「僅僅只是」個有血有肉又活生生的「人／社工」。

貳、我寫不出論文……只是騙人點閱、下載的假議題

人們常說，社會科學關心的是常民的日常生活與環境之間的關係與變化，因此如何確切探知兩者的連動關係，可謂是眾多社會科學家前仆後繼，窮盡一生持續追尋的人生志業。同樣的，回顧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歷史，從社會工作自開始自詡是一門助人專業起，瞭解常民生活的樣態和講求實證理性的科學化研究，就一直是被社會工作社群視為是一種累積、增進專業知識和實踐社會正義的重要手段（簡春安、鄒平儀，2004）。只是，作為一名初入門的知識生產者，我相信陷入某種寫不出論文的狀態，或多或少是許多研究生都曾遭遇的生命難題。對此，為了釐清、解決突來又不知所謂的經驗斷裂，我故事／研究最初的指涉和挑戰，即是企圖要找到造成我個體情感和研究認知不明斷裂的問題阻礙和成因，而這也就是本篇論文研究最初問題意識之所在。

為此，我的敘說、書寫策略除了先是大膽將「寫不出論文的研究生」暫時存而不論，同時亦帶著「個人的都是政治的」的批判意識，返身經由一位勞動家庭的獨生子的「社會位置」出發，並依序敘說、書寫自己一路由南至北，成為一名科大社工，以及前往政大社工所和考上社工師的生命故事，一步一腳的將寫不出論文的個人問題，重新連結、置入社群集體的經驗和台灣社會工作專業所銘刻、鑲嵌、對應的社會／歷史脈絡，戰戰兢兢的跨越自我意識的邊界，一切都只是為了尋得能夠解放自我的答案。在這段敘說、書寫自我的旅程中，我一路橫跨了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再到後殖民／去殖民的理論論述。然而，當論文真正寫到終末段時，我卻又發現眼前的一切有關於理論層次的爭執衝突其實早就不重要，因為我已經知道我真正想要敘說和書寫的終究不僅僅是「勞動家庭獨生子／科大社工／政大研究生」的故事，也不是控訴台灣社會工作專業透過知識／權力對於本多多元助人主體的異化壓迫，而很單純的僅僅只是「我」的故事。

在這一篇論文裡，我奮不顧身在鬥爭、不斷在抵抗諸多因身份「矛盾」所引發的斷裂，使得我寫不出論文的故事，說穿了其實就是在忠實記錄「我」如何面對生命裡常和別人「不一樣」的矛盾經驗。於是，為了開拓轉化「矛盾」的視野，提升自己對於他者賤斥、責難的抵抗力和免疫力，「論文」變成是「我」重新面對自身多重「矛盾」的修練場，而「說故事」／「寫論文」則是記錄我逐一與各個「矛盾」交手、拼搏的過程。最後，我終於看懂、醒決了我身上許許多多、極端對立難解的「矛盾」一直是存在的，就算我處理完了一個，新的一個還是會隨著越來越複雜的社會控制機制接連而來，它是永遠不會消失的磨難，它甚至根本就是我生命的一部份。既然甩不掉它，那就接受它吧。接受自己的矛盾和不完美是一種常態，是我在這一篇論文裡最大的學習和成長，因為透過敘說和書寫，我明白「矛盾」是協助我繼續成長前進的寶貴資產，而不僅僅是拖累我前行的包袱負債。我知道該如何照顧好自己了。然而，當我了悟這一切時，我的論文其實也正準備要寫完了。所以，關於我寫不出論文這件事……打一開始就只是我打算用來騙人點閱、下載的假議題。

叁、生活在夾縫的真實感受：遊走在公／私領域的「蟑螂」社工

持續大篇幅的深究台灣社會工作的歷史由來終究是場美麗的意外，特別是今天我如果不是「朝陽科技大學的科大社工」，我相信我的論文絕對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但如果要我為自己敘說、書寫的研究發現命名，那大概沒有比「蟑螂」還要來的貼切的形容了。蟑螂，原本是我論文計畫書口試時，成虹飛老師詢問我：「你覺得什麼東西最能夠比喻你的處境和狀態？」後，我想都沒想的直覺回應[149]。而這個來自直覺的回應，此後就這麼一路隨著我論文的敘說、書寫過程，讓我越加篤定「蟑螂」是最能代表我研究成果的精華！

一、「衛生、乾淨」預設的背後：必須被消滅的蟑螂！？

請回想一下，您平時看到蟑螂時，第一時間的反應通常是什麼？

[149] 王行老師當下聽見我以「蟑螂」回應後，還當眾拍桌叫好，並直說他們幾個老師是學界的大蟑螂，我是小蟑螂，我們以後要組個蟑螂俱樂部。

慌亂？皺眉？尖叫？生氣？閃避？拿拖鞋打它？拿殺蟲劑噴它？……總之，眾人的反應千奇百怪，但我想人們最終的目的無非只有一個，那就是「消滅」蟑螂。可是，當你以為你消滅了房間裡所有的蟑螂，把房間打掃得乾乾淨淨後，某天你偶然往牆角一看，你好死不好的又剛好看到一隻大蟑螂窩在那，而它的蟑螂鬚更是隨著電風扇的頻率自在搖擺著。於是……第二次滅蟑的行動只好重新展開。然而，第二次由於作戰策略似乎設計不當，本來已被準確被拖鞋擊中重傷的蟑螂忽然展開翅膀，然後在房間裡飛了起來……它盤旋的模樣彷彿是在向你宣示:「我一定要活下來」。就這樣，負傷的蟑螂躲到了櫃子裡，留下在房間裡緊張兮兮，害怕蟑螂無限繁殖又到處散播細菌，開始準備第三次滅蟑行動的你。

當然，我這裡要交待的重點不是蟑螂，而是一篇社會工作碩士論文的研究發現。但為了讓大家深刻體驗我的研究發現，我認為適度讓大家重新感受一下蟑螂是必要的。因為我所謂的「蟑螂」，其實就是私領域的真實自我，就是我們骨子裡跟別人「不一樣」或「見不得光」的生命實相，特別是某些容易引起旁人側目、攻擊或自己主動會覺得羞恥的特徵或行為。而期待、預設擁有一個衛生、乾淨的整潔房間，就是日常生活中理所當然又無所不在的社會控制，這是社會壓迫的極致，是一公領域的社會議題。但也就因為這個乾淨整齊的期待和預設，所以我們生活的房間永遠容不得「蟑螂」的存在，所以「蟑螂」永遠必須被消滅。結果，見不得光的「蟑螂」永遠都只能生活在不見天日的櫥櫃暗角，只能背負「死路一條」的悲慘命運。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二、像蟑螂的「科大社工」：卑下生命的頑韌遊走與另類反動

基於衛生、乾淨的預期心理，蟑螂當然必須一死，但我並不是要倡導大家不要殺蟑螂，而是在打蟑螂的時候我們或許可以試著思考一下，我們每一個人心裡是不是也都有好幾隻被社會定義成有害的「蟑螂」，所以我們總是必須要想辦法透過各式各樣的「包裝」自己說不出口又見不得光的弱小自我，好讓自己從一隻隨時會被攻擊、自覺羞愧「蟑螂」轉變成一個光鮮亮麗的「人類」。特別是在面對自我的慾望時，讓我意識到我們渴望成為不會被消滅、淘汰的「人類」，然後我們就可以受到別人的尊敬或崇拜。可是，包裝成「人類」卻需要大量的資本，使得有的「蟑螂」的資本比較雄厚，所以可以包裝的比較像「人類」；反之，有

些「蟑螂」沒什麼資本，所以缺乏包裝的它還是很像「蟑螂」。是故，所謂的好社會(good society)，一個看似是沒有「蟑螂」亂竄橫行的完美世界，骨子裡卻通常是有資本的「蟑螂」想盡辦法在消滅沒有資本的「蟑螂」。然而，「蟑螂」根本不會消失，因為資本的差異一直存在，我們每一個人都在逃避呈現在我們眼前的社會現實。因而，從「蟑螂」進化「人類」，對應的實例就是我從朝陽到政大的求學經歷，也是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競逐演化的社會／歷史進程。長期以來，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社工人拼了命的要從櫥櫃暗角、總是被人們漠視、否決、攻擊的「蟑螂」晉升轉變成為光鮮亮麗的「人類」。但也因為有一群慢慢開始像「人類」的社群夥伴，當他們回過頭去賤斥、責難很「蟑螂」的科大社工時，似乎忘記了兩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們忘了自己也曾是蟑螂，以及他們要幫助的對象，往往也就是不會出現在人們房間裡的「蟑螂」。

比起大多數的社群夥伴，夾在「人類」與「蟑螂」之間的內外煎熬，似乎是大多數科大社工人終身無法迴避的「天命」，特別是身為同時像「蟑螂」的朝陽科大社工，還有比較像「人類」一些的政大社工所研究生，經過了一連串的自我磨難後，我終於也找到了屬於我／科大社工的「自在」位置。例如，有位科大社工就曾在訪談時很有自信的向我分享：「因為我書讀得不好／家境很差／學校功課很爛，所以我絕對比那些念好學校的社工還要能夠貼近弱勢的生活喔，因為我很懂他們的處境……所以我能成為更『專業』的社工！」

那天，受訪者簡簡單單的一段話，突然讓我頓悟了原來人人喊打的科大社工身上那像「蟑螂」一樣亂七八糟的卑下經驗，反而是讓我們科大社工人能夠從中淬煉出更為強大的內在動能，而這一股打死不退、我一定能活下來的旺盛生命力，卻也是越來越像「人類」的社工人沒有的先天優勢，更視一時之間學不來的在地知識。

原來，我／科大社工，體內有著別人沒有的先天優勢！？

敘說、書寫論文的過程讓我明白所謂的助人專業，其實就是助人工作者必須知曉如何讓自己成為「弱者／他者／劣者」，貼近常規邊陲者的經驗，而不是不斷追求更加崇高社會地位。所以，我終於能告訴自己：我／科大社工已經不需要

再為難堪的過去感到自卑了，只因過往苦難、卑下的經驗，以及被社群成員賤斥、責難為他者／劣者的不堪，如今反而讓我深刻領悟我／科大社工比誰都還要有條件能成為一名好社工。特別是我的家庭出身，還有我曾是被人們視為「蟑螂」的科大社工的生命／求學經驗，讓我未來一定能夠更善待、貼近像「蟑螂」一樣處在邊陲之境的案主／夥伴。由此，我立志要成為能更貼近自我一些，更加表裡如一的「蟑螂社工」，努力在壓迫、衝突不斷的現實社會中活出自己最真實、自在的樣態，而這也才是我所信仰，所欲追求、實踐的社會工作專業。

第三節　下一站，下一戰：成為知識份子的現實困境與自我期許

因為這一篇論文，讓我開始意識到我不僅僅只是個社工，而是一名拒絕噤聲、誓言要對權勢說真話的知識份子，但就如 Said 所言：「知識份子並不是登上高山或講壇，然從高處慷慨陳詞。知識份子顯然是要在最能被聽到的地方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且要能影響正在發生進行的實際過程」(單德興譯，2011：155)。是故，成為知識份子的條件除了必須要貼近弱者的感受和處境，要能對權勢說真話之外，同時也還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實踐自己異於常人的發現。而這也就是我接下來對於真實自我的期許。

壹、說真話的代價：批判知識份子的現實困境？

在敘說書寫這一篇論文的過程中，最令我感受到知識份子的難為之處，不外乎是我遇見許多師者的無奈和沉默。特別是有幾位師長在閱讀完我的論文後，不免異口同聲的提醒我說：「你可能會一次得罪很多人／大老。」或者，也有親近的師長直接向我挑明：「如果你以後還打算在學術界發展的話，記得稍微『修飾』一下你的內容。」在那當下，我真的看見有一股碩大的恐懼圍繞著眼前的師長，而他們擔心我的眼神更是不斷傳遞出「**冒出頭說真話的人必然要付出某種代價**」的憂慮。

我同意處在規訓權力的宰制結構中，我們每一個人無可避免的都是參與其中的共犯。可是，當我們明明知道問題就在那裡，特別是比起一般人更有能力看懂宰制結構全貌的學者／知識份子，為什麼只能明哲保身的選擇無奈與沉默？甚至

為什麼要將人們所受的痛苦視為理所當然，或者是想盡辦法掩飾太平？然而，就好像是有朋友曾經問過我：「**我真的不怕得罪人嗎？**」說真的，我怎麼可能不怕，我怕都怕死了。但我實在無法因為自己的攀升，而去否決自己的出身；我，不想再放任我自己漠視科大的兄弟姊妹蒙受諸多不白之冤，而且我始終無法確認我的恐懼到底是什麼？或者，當我說出真相的瞬間，我究竟會得罪誰？我會得罪的是政大社工所的師長？是當初第一位公開批評科大社工的高醫醫社系教授？是引用文獻裡跟我立場相左的學者？是許多沒有發現問題的科大社工？是社會工作的專業團體？還是更為巨大卻又還未被人們透視的宰制結構？或者，殖民／壓迫的母體根本不存在，一切都只是我們自己在嚇自己！？我不知道答案可以是什麼，或者是說，我已經知道答案，但答案卻不應該只是由我來說，由我來做，因為只有我一個人根本無法改變什麼。

如果，亦步亦趨的勾勒出宰制結構的全型，指出壓迫者的身形樣貌，還有糾舉既得利益團體的自肥錯誤，進而解放被殖民者／被壓迫者的自我意識，真的是知識份子必然為之的工作和任務，那麼眼前阻礙人們說出問題真相的深層恐懼又是什麼呢？是故，為了處理眼前許多無法輕易言說的無奈和沉默，坦然的面對自我慾望裡的深層恐懼，並完整交待它究竟是由何而來，又可以讓它由何而去，或許就是知識份子最為重大的挑戰和日常生活的實踐。只因，返身面對、接受、處理自我慾望的深層恐懼，其實就是人們得以認清問題，進而成為批判知識份子最大的動力來源。所以，請不要繼續選擇無奈和沉默，請勇敢的站出來為痛苦的自我發聲倡言。當我們每一個「人」無非尊卑貴賤，都可以是對權勢說真話的批判知識份子，那麼每一個人都能夠活出真實自我的明天，才會有機會到來。

貳、下一個自我的期待：成為活出自我的追問人

細數我埋首書堆中的日子，以及我從朝陽到政大所經歷的流離苦難，還有敘說、書寫此篇論文的理論旅行，其實完全呼應著論文開頭我引述Foucault所寫的：「**由人走到真正的人，瘋人乃是必經之道**」（林志明譯，1998：629）。雖然，類似的生命磨難／智識衝突絕不會因為我一篇論文的產生而馬上有所改變，但我相信在這一篇論文裡的學習，應該暫時足以讓「我」接下來不論在那都能「做自己」／「做研究」，而且說不定是能以一種更多元或超乎奇想的樣貌出世與流傳。雖

然，母親曾嘆息我把世局太透徹，未來將會活得很辛苦，但比起當一隻快樂的豬，我想我還是會選擇當一個痛苦的人，我終究沒有辦法接受停止思考的自己。我相信我身上的矛盾，如今已是我得天獨厚的優勢，促使我能自在的穿梭在諸多不同的專業／非專業群體之中。此種橫跨在生活與研究之間真實的連動關係，就像老王最常掛嘴邊，也是他對我最重要的身教：「**質性研究就是一種生活的方式**」在未來的日子裡，我會努力把自己照顧好，更要為了貼近真實自我而活，開始更相信自己一些。縱使這裡是我碩士論文的終點，但我的故事／研究將隨著我生命的延續，持續勇敢的追問下去。

當了近乎五年的瘋人，我……終於在「政大社工所」寫出論文了。

我想，這篇論文該畫下句點了，我終於暫時說完了「我」的故事。

不過，看完這篇論文的您，是否已經準備好要試著訴說你／妳的故事呢？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附表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附表一：我國高教體系暨宗教學院社會工作／社福／相關系所(組)概況[150][151]

編號	校名	地區	成立時間(年)			師資人數	100 年日間部考試入取分數	100 年各系所招生學生人數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小計
1	國立師範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前身為社會教育學系)	台北市	1955 分組 2007 停收、更名	2005	-	5	-	-	15	-	15
2	台南神學院宗教社會工作學系	台南市	1963 成立 1998 更名	1994	-	3	獨招	視況 率取	視況 率取	-	-
3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台北市	1963 夜間部成立 社會工作系 2007 年停收	-	-	-	-	-	-	-	-
			1973 成立 1974 更名 1975 更名 1998 更名	2007	-	11	326.60	118	14	-	132
4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新北市	1968 分組 1981 獨立設系	1998	-	10	315.65	66	15	-	81
5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新北市	1971 分組 2000 獨立設系	2004	-	11	520.58	43	18	-	61

[150] 台灣社會工作教育最早起於 1952 年台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的社會行政科，1958 年改名為社會學系，並分為社會學理論和社會行政兩組，為國內第一個提供社會工作教育的教育事業單位(林萬億，1994)，也是後來台北大學社會系之前身，但附表一與附表二整理之依據主要是採計「社會學與社會工作正式分組教學」或成立「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系所(組)的起始時間點為主，特此說明；此外，在比對林萬億(1994，2000，2011)、許展耀(2005)、詹火生(2007)、曾華源、白倩如、李仰慈(2010)，以及各系所網頁資料後，我發現所記載之成立時間點不太一樣(約莫都有 1 年左右的誤差)，因此本表呈現之資料主要是以各系所網頁提供之資料或透過電話詢問後得知之時間點為主，相關紙本文獻資料為輔。

[151] 100 年度日間部考試入取分數(各校採計學科不同僅做參考)及各系所招收人數，主要是以教育部提供之資料為主，另國防大學、台南神學院、玉山神學院、台灣神學院則是以電話詢問或招生簡章所得之結果。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6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台北市	1973 分組 2002 獨立設系	1974 分組 2002 獨立	2007	15	521.58	48	16	4	68
7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台北市	1973 成立社工科 1991 改制社工系	2004 分組 2006 獨立	-	12	317.40	105	10	-	115
8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台中市	1974 分組 1979 獨立設系	1984	1994	13	356.20	120	22	5	147
9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台北市	1978 分組 1990 獨立設系	1981 分組 1992 獨立	-	18	430.20	125	20	-	145
10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	台北市	1982 成立 2006 與心理系合併分組	2000 分組	-	5	獨招	20	21		41
11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台中市	1986 成立 2009 更名	1996	-	22	385.00	116	34	-	150
12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高雄市	1988 成立 2002 更名、分組	2005	-	9	370.35	60	10	-	70
13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台北市	1990 分組 2006 停收-	1986 分組 2006 成立 2009 改名	-	5	-	-	17	-	17
14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嘉義縣	1992	1989	1992	15	474.35	46	21	6	73
15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所	台北市	-	1992	2006	8	-	-	20	5	25
16	玄奘大學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學系	新竹市	1997	2003	-	14	283.30	85	60	-	145
17	玉山神學院教會社會工作系	花蓮縣	1997	-	--	-	獨招	視況 率取	-	-	-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南投縣	1997	1995	1999	15	439.15	51	25	5	81
19	台灣神學院宗教社會工作研究所	台北市	-	2008	--	2	-	-	視況率取	-	-
20	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台南市	1999	2004	-	12	387.40	60	12	-	72
21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花蓮縣	2000	1998	-	11	332.58	51	11	-	62
22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台中市	2001	2005	-	13	甲組-415.80 乙組-410.80	122	16	-	138
23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台中市	2003	2007	-	11	348.00	56	4	-	60
2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社輔導與諮商學系社區諮商與社會工作組	彰化市	2007 分組	-	-	23	477.53	36	-	-	36
25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花蓮縣	2010	2010	-	9	456.80	42	14	-	56
26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社會工作組[152]	嘉義縣	2011 分組	-	-	14	215.20	40	-	-	40
總計	-	-	-	-	-	286	-	1410	395	25	1830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各校網頁、教育部統計處(調查時間 2011 年/12 月)。

[152] 另，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設有職訓局補助的社會工作學程(符合 105 年四十五學分的考試資格)。

附表二：我國技職體系社會工作／社福／相關系所概況

編號	校名	地區	成立時間			師資人數	100 年日間部考試入取分數	100 年各系所招生學生人數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小計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屏東縣	1996 分組 1999 獨立設系	2006	-	10	596.00(商管) 584.00(幼保)	110	14	-	124
2	嘉南藥理科大社會工作系	台南市	1999 年成立 2003 更名	-	-	20	368.00(商管) 420.00(幼保)	210	-	-	210
3	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台中市	2000	2007	-	16	570.00(商管) 548.00(幼保)	167	15	-	182
4	大仁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屏東縣	2004	-	-	10	222.00(商管) 334.00(幼保) 346.00(生活)	156	-	-	156
5	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屏東縣	2005	-	-	19	260.00(商管) 412.00(幼保) 322.00(生活)	379	-	-	379
6	大同技術學院社會福祉與服務管理系	嘉義縣	2008	-	-	7	238.00(幼保) 192.00(衛護) 182.00(餐飲)	211	-	-	211
7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健康照顧與社會工作系	苗栗縣	2011	-	-	4	258.00(商管) 384.00(生活) 334.00(餐旅)	140	-	-	140
總計	-	-	-	-	-	86	-	1,373	29	-	1,402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各校網頁、教育部統計處(調查時間 2011 年/12 月)。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附表三：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認定標準[153]

一、適用對象：自民國102 年之後畢業者適用，且實習以課堂外實習為限。（民國102 年之前畢業者，應考人可出具登錄有實習成績之學校成績單。若確曾修習實習惟成績單上無登錄，民國98 年之前畢業者，應由學校出具註明實習成績之實習證明，民國98 年至102年之前畢業者，則應由學校出具註明實習成績及實習內容之實習證明。）

二、實習項目應符合下列之一：

實習工作	實習項目學習內容
1.個案工作	● 建立關係技巧、訪視技巧與會談技巧演練 ● 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 ● 紀錄撰寫 ● 個案管理及資源運用 ● 社工倫理學習
2.團體工作	● 團體工作規劃 ● 團體帶領 ● 團體評估及記錄 ● 社工倫理學習
3.社區工作	● 社區分析—含人口、問題、需求、資源、社會指標等 ● 社區方案設計、執行與評估 ● 社區資源開發與運用 ● 社區組織與社會行動 ● 社工倫理學習
4.行政管理	● 社會工作研究 ● 方案設計與評估 ● 資源開發與運用 ● 督導、訓練與評鑑 ● 社會政策與立法倡導 ● 社工倫理學習

三、實習次數與時數：應至少實習二次且合計400 小時以上。

四、實習機構資格條件：實習機構應聘有專職社會工作師或具社工專業背景之專職社會工作相關人員乙名以上，且具備實習制度之下列各類組織：

（一）公立社會福利、勞工、司法、衛生機關（構）。

（二）經立案之民間社會福利、勞工、司法、衛生機關（構）。

[153] 正本可上考院部網站(http://www.moex.gov.tw/)查詢。

（三）經立案之團體（以章程中之宗旨或任務含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規定者為主）。

（四）公立及私立各大專院校、中學、小學。

（五）經中央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其他機構。

五、實習督導資格條件：社會工作師或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工師考試應試資格之社會工作相關人員專業背景，且至少應有2 年以上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

六、督導學生人數條件：每位符合資格之機構實習督導，其督導之學生人數以4 名為限。方案實習督導之人數以15 名為限。

七、經考選部審議通過之社會工作相當、科、系、組、所、學位學程，由考選部公告。應考人畢業自未經公告之科、系、組、所、學位學程，需開具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證明書之證明。開具證明之單位除由實習機構之實習督導及負責人簽章以證明實際實習內容及實習時數外，不同機構實習，請分別開據證明。本證明書仍須由學校依申請人實際情形詳細查核填註，如有不實，出證者皆應負法律責任。證明書格式由考選部統一規定如附表。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證明書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系所	學校　　系所（　　組）						
實習機構名稱	（請填機構全名，含部門/單位名稱）						
實習項目 （請勾選）	實習內容 （請勾選）						
□個案工作	□建立關係技巧、訪視技巧與會談技巧演練 □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 □紀錄撰寫 □個案管理及資源運用 □社工倫理學習						
□團體工作	□團體工作規劃 □團體帶領 □團體評估及記錄 □社工倫理學習						
□社區工作	□社區分析—含人口、問題、需求、資源、社會指標等 □社區方案設計、執行與評估 □社區資源開發與運用 □社區組織與社會行動 □社工倫理學習						
□行政管理	□社會工作研究 □方案設計與評估 □資源開發與運用 □督導、訓練與評鑑 □社會政策與立法倡導 □社工倫理學習						
實習期間	第 1 次：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合計　　小時。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ble>
<tr><td></td><td colspan="2">第 2 次：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合計　　小時。
（至少二次，超過自行加註）</td></tr>
<tr><td>實習時數</td><td colspan="2">共計　　小時。（至少 400 小時）</td></tr>
<tr><td rowspan="3">（實習機構蓋關防處）</td><td colspan="2">實習督導資格（請勾選）：
☐ 現任社會工作師
☐ 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試資格之社會工作相關人員專業背景，且至少有 2 年以上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td></tr>
<tr><td>實習督導：（簽章）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td><td>機構負責人：（簽章）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td></tr>
</table>

學校系、所名稱：	
學校系、所主管：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1. 本證明書可作為報名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之用。
2. 本證明書須由學校依申請人實際情形詳細查核填註，如有不實，出證者皆應負法律責任。
3. 實習若係在同一機構實施者，本證明書僅需填寫 1 份，並由實習機構及學校證明即可；但

   實習若在不同機構實施者，本證明書請分別填寫 1 份，並由各該實習機構及學校證明。
4. 本證書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
5. 申請人如持用已開具修正前之證明書仍為有效。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網頁資料

教育部技職司：http://www.edu.tw/tve/

考選部：http://www.moex.gov.tw/

社工專協網頁：http://blog.roodo.com/tasw/archives/4692353.html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丁興祥等譯（2006）。質性心理學。台北：遠流。

方永泉譯（2003 ）。受壓迫者教育學。台北：巨流。

方佳俊譯（2007）。逃避人性：噁心、羞恥與法律。台北：商周。

方雅麗（1999）。台北市公娼事件中政府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困境－一個行動研究的反思。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永智、鄧明宇譯（2003）。敘說分析。台北市：五南。

王行（2005）。擾人的傅柯與社工的擾人：閱讀 Chambon, Irving & Epstein 的《傅柯與社會工作》。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9：315-322。

王志弘、許妍飛譯（2006）書名？

王志弘譯（2011）。好研究怎麼做：從理論、方法、證據構思研究問題。台北：群學。

王秀燕（2010）。現實與使命的掙扎—台灣社工人力配置。社區發展季刊，129：124-127

王卓聖（2004）。台灣與香港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比較分析，台大社會學刊，9：137-183。

王玟等譯（2011）。拉丁美洲 ： 被切開的血管。台北：南方家園。

王振寰（2003）。全球化與後進國家：兼論東亞的發展路徑與轉型。發表於 2003 年台灣社會學年會。台北：政治大學社會系。

王增勇（2004）。透視專家權力：以台北市居家服務為場域的行動研究。應用心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理研究，23：51-77。
王增勇（2005）說故事、作社工。發表於 2005 年 12 月 15 日「敘事與社會工作研討會」。台北，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資訊大樓國際會議廳。
王增勇（2007）。台灣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的知識狀況與學術生產。收錄於當前知識狀況：2007 年亞洲華人文化論壇，頁 267-276。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王增勇(2009)。當福利運動進入國家體制之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4：407-417。
王增勇、陶蕃瀛（2006 ）。專業化＝證照＝專業自主？應用心理研究，30，201-224。
王增勇、潘承揚譯（2012 ）。傅柯和醫療知識的社會學。收錄於黃有志、陳竹上之醫療社會學，頁 171-189。台北：洪葉。
王增勇等譯（2012 ）。為弱勢者畫權力地圖：建制民族誌入門。台北：群學。
丘延亮譯（2012）。貼身的損友: 有關多重自身的一些故事。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朱元鴻（2000）。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社會學框作筆記。台北：唐山。
何粵東（2005）。敘說研究方法論初探。應用心理研究，25：55-72。
何粵東（2010）。課程想像的自我民族誌:課程研究與實踐的自我經驗反思。國立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博士論文。
余德慧（2003）。追索敘說自我的主體。應用心理研究，16：214-217。
吳就君譯（2006）。家庭如何塑造人。台北：張老師文化
吳叡人譯（2010）。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
呂又慧、王增勇（2010 ）。記錄一段被遺忘的歷史：以宗教體系畢業生之考試權及就業困境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29：281-294。
呂寶靜(1979)。從專業教育著手談社會工作專業化的途徑之一。社區發展季刊，6(1)：33-37。
呂寶靜（2011）社會工作與臺灣社會（第二版），臺北：巨流。
宋麗玉等（2002）。社會工作理論。台北：五南。
李宗派（2002）。美國社會工作教育發展趨勢。社區發展季刊，126：413-431。
李易駿（2002）全球化對社會福利的挑戰：兼論台灣個案初探。台灣社會福利學刊。2：119-154。
李易駿（2003）全球化與東亞社會政策變遷初探：1990-2000，社會政策與社會

工作學刊。7(2)：71-120。
李誠等（2003）。誰偷走了我們的工作：一九九六年以來台灣的失業問題。台北：天下文化。
沙依仁（2002）。社會工作專業教育之現況及發展。社區發展季刊，99：5 -23。
邢克超譯（2002）。再生產。北京：商務。
周月清（2004 ）。「社會工作與社會」暨福利國家轉型跨國觀點：參與 2003 年「社會工作與社會」國際學術會議與台灣社會工作發展之省思。社區發展季刊，105：421-432。
周怡君（2007 ）。德國高等教育中的社會工作教育制度看台灣的大學社工教育。社區發展季刊，120：149-159。
官晨怡譯（2005）。傅柯的方法取向：揭露視而不見的生活世界。收錄於王增勇等譯之傅柯與社會工作，頁 65-102。台北：心理。
林志明譯（1998）。古典時代瘋狂史。台北：時報，
林宗弘等（2011）。崩世代。台灣勞工陣線協會
林萬億（2010）。我國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後專業主義的課題。臺大社會工作學刊 ，22：153-196
林萬億（1994）。 福利國家－歷史比較的分析。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林萬億（2000 ）。我國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教育的發展。社會工作學刊，6：123-161。
林萬億（2001 ）。展望二十一世紀的臺灣社會工作－代序。社會工作學刊，7，頁Ｉ-ＸＶ。
林萬億（2002 ）。 當代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台北：五南。
林萬億（2011 ） 臺灣社會工作的歷史發展，收錄於呂寶靜主編之台灣社會與社會工作（第二版），頁 2-31。台北：巨流。
林萬億、沈詩涵（2008a ）。 1980 年代以來台灣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的發展。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期刊，12(1)：219-280。
林萬億、沈詩涵（2008b ） 邁向專精之路：台灣社會工作的下一步。社區發展季 刊，121：199-233。
林萬億等（1999）。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學科規劃研究報告。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林瀚生（1997）。山地社工員的心聲。社會福利，131：46-50。

邱天助（2002）。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

柯麗評（2009）。當敘事、女性主義走入社會工作—再度遇見受暴婦女。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論文。

洪嫈琳譯（2010）。敘事研究與心理治療。臺北市：心理。

洪維信（2003）。譯者導言，收錄於洪維信譯，外邊思維。臺北：行人。

韋彥如（2008）。論文指導關係中的權力運作。花蓮：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社會發展學系碩士論文。

夏林清（2011）。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台北：導航基金會。

夏林清（2010）。走在解殖的路徑中：拮抗同行的社會學習。應用心理研究，45：45-72。

夏曉鵑（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夏曉鵑（2008）。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上冊。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孫智綺譯（2002）。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台北：麥田。

翁開誠（2002）。覺解我的治療理論與實踐：通過故事來成人之美。應用心理研究。16：23-69

高迪理（1995）。社會工作教育在轉型社會中之因應策略，收錄於林萬億主編，臺灣的社會福利：民間觀點。台北：五南。

張秀卿（1985）。社會工作員對國家社會的貢獻。社會建設，56：91-99。

張紉、林萬億、王永慈（2003 ）。世界各國社會工作專業制度之比較及國內社工人力需求、運用、困境因應之調查評估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

畢恆達（2005）。教授為什麼沒有告訴我－論文寫作的枕邊書。台北：學富。

章英華、薛承泰、黃毅志（1996）。教育分流與社會經濟地位：兼論對技職教育改革的政策意涵。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教改叢刊 AB09。

符碧真（2000）。教育擴張對入學機會均等影響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44：201-223

莊宗翰（2008）。研究所教育中指導關係之探究－Freire 批判教學論的觀點。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莊凱翔（2009 ）。研究生之死—社工教育中的師生關係。台北：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莫藜藜（2007 ）。台灣社會工作學科教育的發展與變革的需求。社區發展季刊，120:30-47。

許展耀（2005 ）。台灣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發展：以 1990-2003 年碩博士論文分析為例。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郭芷余（2005）。都市治理的情感政治：高雄火車站周邊暨願景館的社會分析。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光興（2006 ）。去帝國：亞洲作為一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

陳向明（2002 ）。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市：五南。

陳武宗（2004 ）。誰是社會工作教育的終結者？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jun/30/today-o1.html，取自 2012 年 8 月 26 日。

陳芳明（2009）。膚色可以漂白嗎？。收錄於陳瑞樺譯之皮膚白面具，頁 12-18，台北：心靈。

陳阿月譯（2008）。從故事到療癒：敘事治療入門。台灣：心靈工坊。

陳秋山等譯（2008）。社工質性研究。台北：華都。

陳淑芳(2011)。與精神障礙者攜手並進——一位就業服務員的專業成長與反思。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逸淳（2003）。論社會分類（classification）— 從涂爾幹到傅柯與布迪厄。文化月報，34，http://www.cc.ncu.edu.tw/~csa/oldjournal/34/journal_park289.htm，取自 2012 年 8 月 5 日。

陳瑞樺譯（2009 ）。黑皮膚，白面具（第二版）。台北：心靈。

陳麗欣、王慧琦（2003 ）。國科會與教育部目標導向計劃－我國技職學校社會工作系學生專業能力指標之建構。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陳麗欣、郭志南（2008）。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導入成效評量對非營利組織影響之研究。發表於 2008 年 3 月 25 日朝陽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學院論文發表會。

陶蕃瀛（1999 ）。社會工作的發展分析與展望。社區發展季刊，88：190-196。

陶蕃瀛（2012 ）。社會工作、證照與專精化反思。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2(1)：65-78

單德興譯（2012)。知識分子論。台北：麥田。

彭懷真（2002 ）。低估教育與訓練等人力因素的社工運作。社區發展季刊，99：84-89。

曾凡慈譯（2010）《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台北：群學。

曾華源、白倩如、李仰慈（2010 ）。社會工作人力質量需求與專業人力資源養成制度之省思。社區發展季刊，129：76-94。

曾華源、黃俐婷（1996）。我國社會工作教育本土化必要性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96：53-60。

馮立可（2008）。專業方向與服務質素：社會工作專業化的反思。收錄於梁麗清、陳啟芳編知而行。行而知：香港社會工作教育的反思與探索，頁 67-18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黃心雅（2009）。「翻譯」法農：權力、慾望與身體的中介書寫。收錄於陳瑞樺譯之皮膚白面具，頁 19-24，台北：心靈。

黃侃如（2004 ）。精神社工專業認同形塑與掙扎。台北：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黃彥宜（1991）。台灣社會工作發展,思與言，29(3):119-152。

黃彥宜、陳美智、劉鶴群（2008）。不同的聲音：台灣社會工作教育發展方向的初探，發表於「2008 跨文化學習與社會工作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 年 5 月長榮大學。

黃素菲（2005）。我不看我時「我」在嗎？。應用心理研究，26：1-11。

黃毅志 （2002 ）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識：台灣地區不公平的社會階層體系之延續。台北：巨流。

黃毅志（2011）。台灣的教育分流、勞力市場階層結構與地位取得。台北：心理。

黃毅志（1995）。臺灣地區職業機會不平等性之變遷。東吳社會學報，4：265-292。

楊亞平譯（2004 ）。國家精英：名牌大學與群體精神。北京：商務印書館。

楊玫瑩（2000 ）。台灣的社會工作專業化：「社工師法」的立法過程，於蕭新煌、林國明編，台灣的社會福利運動。台北：巨流。

楊碧川譯（2009）。大地上的受苦者。台北：心靈。

楊瑩（1994） 教育機會均等—教育社會學的探究。台北：師大書苑。

楊瑩（1988 ）。台灣地區教育擴展過程中不同家庭背景子女受教機會差異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詹火生（2007 ）。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經驗與展望。社區發展季刊，120：

21-29。
鄒川雄（2005）。生活世界與默會知識---詮釋學觀點的質性研究。收錄於齊力、林本炫主編之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頁 21-56。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廖世德譯（2001）。故事、知識、權力 ： 敘事治療的力量。台灣：心靈工坊。
廖榮利、藍采風（1993 ）。臺灣社會工作教育之回顧與展望－教師、學生、教學之社會學分析。社區發展季刊，61：53-57。
趙旭東、方文譯（2005）。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台北：左岸文化。
劉北成等譯（1992a）。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
劉北成等譯（1992b）。瘋癲與文明。台北：桂冠。
劉曉春（2009）。重返實務—詮釋取向之本土社會工作實務知識建構。靜宜大學兒童與青少年福利系與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合辦，華人社會工作與兒少權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靜宜大學：2009 年 5 月 1 日。
潘慧玲（2003）。社會科學研究典範的流變。教育研究資訊，11(1)：115-143。
蔡培元（2002 ）。作為「階級盲」（class-blind）的社工。漂流社工電子報，第六期。http://mypaper.pchome.com.tw/fsw0621/post/1259925， 取自 2012 年 8 月 5 日。
蔡培元（2008）。我僅僅只是一個胖子：記述一段朝向自在的歷程。台北：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敏玲、徐曉雯譯（2003）。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台北：心理。
蔡淑鈴、瞿海源（1992 ）。台灣教育階層化的變遷。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2：98-118。
蔡敦浩、劉育忠、王慧蘭（2011）。質性研究敘說探究的第一堂課。台北：鼎茂。
蔡漢賢（1972 ） 各國社會工作專業體制之研究。台北：台灣省社會福利研究會。
鄧明宇（2005）。從沉倫走向能動：一個諮商實務工作者的自我敘說到社會實踐。應用心理研究，25：115-142
鄭怡世（2007 ）。台灣社會工作發展的歷史分析：1949-1963 年「社會部所從事的工作」與「美式專業社會工作」雙元化的社會工作認識。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1(1)：153-197。
鄭麗珍（2011）。家庭社會工作。收錄於呂寶靜主編之台灣社會與社會工作（第二版），頁 329-326。台北：巨流。
鄭麗珍（2012)。社工日，社工不快樂。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orum/20120407/34143798，取自 2012 年 8 月 26 日。

蕭信彬（2006 ）。共識的形成或想像的限縮？—關於社會問題「社工化」的專業社會學考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駱明慶 （2002）。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和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 30（1）：113-147

薛絢譯（2009）。世界，文本，批評者。台北：立緒。

謝國雄（1992）。隱形工廠：台灣的外包點與家庭代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3：137-190。

謝國雄（1994）。勞動力是什麼樣的商品？計件制與台灣勞動者主體性之形塑。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7：83-119。

瞿宛文（2003）。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台北：唐山。

簡春安（2004）。台灣社會工作歷史發展台灣社會工作本土化之分析。台灣社會工作學刊，1：45-71。

簡春安，趙善如（2010）。社會工作理論。台北：巨流。

簡春安、鄒平儀（2004）。社會工作研究法。高雄：復文。

簡憶鈴、王增勇譯（2005）。傅柯與治療：悲傷與規訓。收錄於王增勇等譯之傅柯與社會工作，頁 187-225。台北：心理。

魏章玲譯（1988）。家庭社會學。台北：桂冠。

羅曉瑩（2005 ）。研究者社工認同的形塑、探索掙扎－一種過程取向的差異對化研究。台北：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英文文獻

Adams, T. E., & Holman J. S. (2008). Autoethnography is queer. In Norman K. Denzin, Yvonna S. Lincoln & Linda T. Smith (Eds.), *Handbook of critical and indigenous methodologies* (pp.373-390). Thousand Oaks, CA: Sage.

Alsop, C. K. (2002). Home and away: self-reflexive auto-ethnography. *In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3*). http://www.qualitative-research.net/index.php/fqs/article/view/823/1788。取自 2012 年 7 月 1 日。

Austin, D. (1997).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The first 100 years – and beyond.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33 (3)*. 599-612.

Bruner, J. (1990).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Chang, H.（2008）. *Autoethnography as method*. Walnut Creek, CA：Left Coast Press.

Clandinin, D. J., & Connelly, F. M. (1994). 'Personal Experience Methods', in N. Denzin and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413-427. Thousand Oaks, CA: Sage.

Conquergood, D. (1991). Rethinking ethnography: Towards a critical cultural politic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8*, 179-194.

Denzin, N. K., & Lincoln, Y. S.(Eds.)（2011）.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4nd ed.). London：Sage.

DeVault, M. L. (2006). Introduction: What is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Social Problems, 53*, 294–298

Dominelli, L.（2002）. ..Basingstoke: Palgrave.

Ellis & Bochner（2011）*Autoethnography: An overview.*

http://www.qualitative-research.net/index.php/fqs/article/view/1589/3095 , 取自 2012 年 8 月 5 日。

Ellis, C. S. (2004). *The ethnographic I: A methodological novel about autoethnography*.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Ellis, C. S. (2007). Telling secrets, revealing lives: Relational ethics in research with intimate others. *Qualitative Inquiry*, *13*(1), 3-29.

Ellis, C. S. (2009). Telling tales on neighbors: Ethics in two voic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1), 3-28.

Ellis, C., & Bochner, A. P. (2000). Autoethnography, personal narrative, reflexivity.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733-768). Thousand Oaks, CA: Sage.

Feng, J. Y.（2008）. Build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The new focus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Taiwan.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1）：36-49.

Foucault, M.（1980）. *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eitings.* New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York：Panteon.

Geismar, L. L. (1982). Comments on “The obsolete scientific imperative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Social Service Review, 56*(2), 311-312.

Gilgun, J.（1994）Hand in glove：The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and social work practice research. in E. Sherman & W. J. Reid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ocial work.*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riffith, A., & Smith, D. E. (2005). *Mothering for schooling.* New York: Routledge.

Grinnell, R. (1993). *Social Work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4th Edition). Itaska, IL.: F.E. Peacock Publisher, Inc.

Heewon, C.（2007）.*Autoethnography as method*. Walnut Creek, Calif. : Left Coast Press.

Heineman, M. B. (1981). The obsolete scientific imperative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Social Service Review, 55*(3): 371–397.

Hudson, W. H. (1982). Scientific Imperatives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and practice. *Social Service Review, 56*(2), 264-258.

Jones, S. H. (2005). Autoethnography: Making the personal political. In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763-791). Thousand Oaks, CA: Sage.

Klaybor, G.（1996）. The future ofthe DSM-IV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R. R. Raffoul & C. A. McNeece (Eds.), *Future issue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Boston & Londin：Allyn and Bacon.

Ku, Y. W. (1997). *Welfare Capitalism in Taiwan: State, Economy and Social Policy.* Basingstoke: Macmillam.

Lin, W. I., & Chou, W. C. G. (2007). Globalization, regime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policy development in Taiwan, in J. Lee and K. W. Chan (eds), *The Crisis of Welfare in East Asia*. Plymouth, MA: Lexington.

Midgley, J. (1981) *Professional Imperialism: 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Heinemann.

Murray, J. B., Ozanne, J. L., & Shapiro, J. M. (1994), "Revitalizing the Critical Imagination: Unleashing the Crouched Tiger,"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1*(4), 559-565.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adgett（1998）. Does the glove really fit？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clinica social work pactice. social work, 43*(4)：373-81.

Payne, M. （1997）. *Modern Social Work Theory*. Chicago, IL: Lyceum.

Pratt, M. L. (1992).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Reed-Danahay, D.（1997）. Introduction. In Reed-Danahay, Deborah（Eds.）. *Auto/Ethnography：Rewriting the self and the social*（pp. 1-17）. Oxford, UK：Berg.

Schuerman, J. R. (1982). Debate with authors: The obsolete scientific imperative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Social Service Review, 56*(l), 144-146.

Smith-Sullivan K.（2008）. *The autoethnographic call: Current considerations and possible futures.* http://scholarcommons.usf.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502&context=etd 取自 2012 年 8 月 5 日。

Smith-Sullivan（2008）.*The autoethnographic call: Current considerations and possible futures*

Sorensen, B. (2008). *Only Child Experience and Adulthood*.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Spry, T. (2001). Performing autoethnography: An embodied methodological praxis. *Qualitative Inquiry*, *7*(6), 706-732.

Spry, T. (2011). *Body, paper, stage: Writing and performing autoethnography.*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Tillmann, L. M. (2009). Body and bulimia revisited: Reflections on "A Secret Life."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7*(1), 98-112.

Tillmann-Healy, L.M. (1996). A secret life in a culture of thinness. In C. Ellis & A.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76-108).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Turner, T.（1980）. The Social Skin. *In Not Work Alone*, edited by J. Cherfas and R. Lewin, pp. 112-140. Temple Smith, London.

Wall, S. (2006). An Autoethnography on Learning about Autoethnograp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5*(2), 1-1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Weiss, I. (2005). Is there a global common core to social work?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BSW graduate students. *Social Work, 50*, 101-110.

其他文獻

曹妲譯（2007）。東京鐵塔： 老媽和我，有時還有老爸。台北：時報。

陳枻樵譯（2010）。動物農莊。台北：麥田。

梁家瑜譯（2011）。邊境國。台北：一人。

胡晴舫（2010）。我們這一代人。台北：八旗文化。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後記：與志南同行

王增勇

通常我為學生論文寫後記，只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學生寫的太差，我需要向讀者解釋為何這本論文可以通過；另一種則是學生寫得太好，我想與讀者分享指導論文過程的喜悅。當蔡培元用自我敘事方法完成「我僅僅只是一個胖子」做為他的碩士論文時，當下我知道學者的老化是什麼，就是成就不必是自己；當學生有所成就時，我比自己得獎都高興。我以為我不會再遇到另一個培元，卻沒想到志南又讓我再一次經驗到以學生為榮的時刻。

遇見由大變小的志南

2009 年秋天，我在陽明衛福所的質性研究課程第一次見到當時在政大碩二的志南。當時的他，生猛有力，很有自己的樣子。第一份作業要寫自己的問題意識，他當時就將問題意識命名為：「從朝陽到政大有多遠？論社會工作教育的階層化」。他要為科大社工「正名」，我不懂他的憤怒，不懂為何他要把科大社工的興衰背在自己身上的使命感從何而來？但我看到一種從生命經驗而來的憤怒，這種憤怒是寫出讓人感動的論文的初衷。當天我特別點名他，請他說明他的題目。課後，他對我說，「我上課前就跟同學說，我有預感老王今天會叫我」。其實他一直知道自己想寫什麼，只是他要找個可以讓他寫自己的老師。

那學期，隨著課程進展，身為旁聽生的志南沒撐到學期終了，就不見了。那個學期，我到政大擔任論文口委，進教室前，志南已經在電梯口等候，並且告訴我他為我準備政大最有名的「香腸漢堡」。來到政大後，知道那所謂最有名的香腸漢堡，其實就是綜合院館一樓的餐飲店賣的餐點，說是最有名其實有些誇大，但在志南眼中，總是有新鮮事，要與我分享政大名產的善意，卻一點也不假。

2010 年秋天，我轉任到政大，意外地沒見到志南，直到第二學期，2011 年春天他才和他準備要論文口試的同學健瑋一同來找我，順便打聲招呼。我才知道原來他休學工作去了，那時我感覺「志南變小了」，不像一年前的他一般生猛有

力。那時我還不知道他與指導教授鬧翻的事，只希望他可以盡早回到完成論文的軌道上，我當場邀請他到辦公室來擔任助理。被師長權威傷害的他，對於另一位老師的邀請，舊傷還在隱隱作痛，不敢答應，他又消失了。

不斷用假問題來問我的志南

復學後的志南過了許久來找我討論論文。他問我，我敢不敢收他這個跟前任指導教授鬧翻的學生？對我而言，他跟前任指導教授的關係是他們之間的事，跟我無關，我只看我是否可以在學生論文中有所貢獻。但我可以理解他的擔心，只告訴他：我不擔心，因為我是新來的老師。他開始找我談論文題目，一開始他說他要寫「獨生子女」的議題，因為他是獨生子女，他還認真地寫了很多文獻回顧，讓我看了頭疼。我找他到後山散步，想聽聽他是個怎樣的獨生子女，為何這是他關心的議題。過程中，我知道他媽媽努力做裁縫養家活口，他感到自己責任重大，以後父母老了都要靠他養。我看到志南背負很多男性負擔的辛苦。之後，聽他細說他進政大社工所因為科大畢業生而感到被歧視的衝擊，以及後來出走政大社工所進入前任指導教授研究室的衝突歷程，一心要畢業照顧家人的志南卡在要學位卻又無法符合學術遊戲規則的困境中。我想起鄧明宇描述自己逃離勞動家庭在學校的「活死人」狀態，於是我邀請志南閱讀鄧明宇的論文。

明宇的論文激發志南寫自己故事的熱情，但他仍不敢相信學術殿堂真的可以有這個空間，或是他可以說出個好故事，但我可以感覺他想說清楚自己。我邀請志南旁聽東吳社工所郭姵妤的論文口試，讓他見識說故事的論文可能的樣貌。他放心了，也願意嘗試，我慶幸自己是在教學多年後，才遇到志南，所以有這許多既有論文、同儕可以介紹給志南。增強他走敘事研究的信心，不是我一人可以辦到的。

點燃政大社工所研究典範之爭的第一把火炬

儘管志南願意嘗試寫自己的故事，但我們仍須面對所上老師普遍不認為敘事研究是嚴謹的學術研究方法的挑戰。志南投身敘事研究論文路徑，固然是他個人的突破，但也挑戰我在政大社工所的生存姿態。我固然知道我的研究典範與其他

老師有差異，但我總希望這個差異是在適當的安全距離中，彼此欣賞與對話。對於剛進政大社工所的我，志南的論文凸顯了這個差異，並激化我與其他老師進行研究典範的爭議。志南在更換指導教授的申請表上，填入「我在政大社工所寫不出論文的日子」為題目，第二天所務會議中，所長與所上老師熱烈討論這個題目是否可以成為論文題目。許多老師提出「論文不是為了療癒自己」、「敘事研究太主觀所以不是一種嚴謹的研究方法」、「建議不要寫自己，而去訪問別人」的看法，我試圖辯解敘事研究的正當性，但時間太短。最後，我只能以「學術自由」來維護志南進行這個題目的機會，堅持論文是否通過是由指導教授與論文委員會的權責，不是其他老師可以直接介入的範圍，要求所上老師尊重委員會的機制。所上老師才將他們的意見改為對我的建議，我也同意修改題目作為善意的回應。對我而言，可以實質進行這份研究才是重點，暫時給個題目是可以接受的妥協。但對志南而言，當我提出修改題目的要求，志南認為我也和其他老師一樣背棄他，而有很大的情緒反應。我告訴他，在這場學術典範的爭議上，我們要一起努力，他要化這股憤怒為寫好論文的動力。並在課堂上講述 1983 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行政學院博士論文口試所發生的研究典範爭議紀錄著美國社工界對研究典範的論戰起點，而志南的論文則是三十年後，在台灣政大社工所研究典範的歷史起點。當從歷史重新賦予自己意義後，志南顯然更堅持用自己的方式完成論文。

越寫越有活力的志南

一般人寫論文都有個彈性疲乏的極限，通常寫完論文都不想再修改，甚至不願再閱讀。但是志南卻從頭到尾都充滿活力，他在網路上到處貼他的論文片段，他會跟我分享別人給他的回饋；也因此他四處訪談其他科大生的經驗；連很多科大的老師也成為他的受訪者。換句話說，志南寫論文是他交朋友的過程，是個科大生大串連的行動歷程。志南的故事也從個人的經驗變成科大生的集體敘事，反映出社工師法後所形成的社工教育體制。看到他找回自己，也找到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知道以前的志南回來了。

論文完成後，我到高雄遇到志南的媽媽，她送了我一只陶杯，上面刻著「有你真好」。我很高興她終於把寶貝兒子找回來，而且是完整無缺的。我知道，志南在自己的路上，會堅持作自己。他還是背負著照顧父母的獨生子重擔，但是他

知道他永遠是有選擇的。

我則會帶著志南給我的成長，繼續進入我下一次與學生的相遇，期望下一個圓滿，無論是對我，或對學生…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令人悲傷的分類遊戲

胡善喻[154]

很久以前的一個晚上，我跟志南學長在臉書上玩起了一個無聊的分類遊戲—以他的論文為基礎，把我們身邊的人按照學校跟科系一一分類，有的人是「山寨」、有的人是「雜種」、有的人是「庶出」、有的人是「嫡系」等等。就這樣我們玩了好久，兩個人興致高昂的講了一堆有趣的分類，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兩個人都沉靜了下來，不再說話。

從小，我就很討厭分組分類，因為沒有被分到組，或是被歸類為「其他」，實在是一件讓人很無地自容的事情。但人類的天性好像總習慣一定要分組聚集，才能夠壯大彼此；一定要分門別類，才能讓資源得到良好的使用與分配。就連那天晚上，我也很在意，我被分到那個類別去？

到現在我都記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被分到的類別是「雜種」。當時不以為意，不，應該說我最在意的是我能不能被分類，被分成什麼類別，我並不在意。但聽到自己被分到雜種時，腦海中第一個想起的是每次看到自己的大學畢業證書上的教育學士，我都覺得很茫然，因為我念的是社會工作，我不知道除了我因為興趣去修的中等教育學程外，我學的東西跟教育有什麼關係。更不用提我大學時最討厭別人問我讀什麼大學，因為我知道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妳讀什麼系？」「那妳可以當什麼科的老師？」

「我不能當老師，因為我念的系不能當老師。」

通常，用這句話回答完之後，大概十個問這個問題的人，有六個會當場傻住，嘴裡碎念著念師大不當老師以後能做什麼，有兩個會比較直接一點的面質妳以後要做什麼，有一個會露出妳大概沒救以後只能去拾荒度日的同情表情，還有一個

[154] 善喻是我在政大社工所的學妹，不過她後來讀了一學期就休學，並重考跑到台大社工所去。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的社會工作組的學院出身，是善喻當初與我對話的基礎點，也是她曾經長期懷疑自己是／不是社工的問題濫觴。感謝善喻的現身回饋，也希望這一篇論文能夠讓妳不用再為此感到悲傷。

是根本弄不清楚妳的答案。

大學畢業後，我去了政大，再跑去台大念研究所。從此身邊的長輩朋友路人不再問我以後能不能當老師，他們開始問我社工人最常被問的幾個問題：「妳以後沒薪水，要怎麼養家？」「義工不錯阿，那妳一定很有愛心喔？」「社會工作是幹嘛的？」無數次好氣又好笑的回答這些問題後，我才突然發現，從師大到政大再到台大，從社會教育系社會工作組到社會工作研究所的路上，光是幾個問題的區別，就能看出，原來，哪怕是在路人甲乙丙的眼裡，學校與科系的轉換提昇與否，無形中都是一種分類。

但，我念的，一直都是社會工作。

路人尚此，何況同類？

在追求專業與平等的平衡間，我們也不斷的在玩著這場分類遊戲，如果「雜種」在這場遊戲中面對的情景如斯，那麼「山寨」、「庶出」、「嫡系」…這些不同類別的人，在遊戲中面臨的又是什麼樣的情境？

從志南學長的論文中，我只知道，這是場多麼令人悲傷的分類遊戲。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